



魏 岷 / 编著

One Hundred Biographies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Giants
in the 20th Century

二十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戈培尔传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录

- 一、不幸少年
- 二、挫折频仍
- 三、找到主子
- 四、初兴风浪
- 五、当吹鼓手
- 六、宣传部长
- 七、情与爱
- 八、战争早期
- 九、死心塌地
- 十、垂死挣扎
- 十一、恶贯满盈

一、不幸少年

1897年10月29日，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出生于莱茵河下游的一个约有三万居民的工业小城莱特，该地是德国纺织中心。戈培尔父亲弗里茨·戈培尔是当地一家灯芯厂的工头，他是靠辛苦劳作而一步步爬到这个位子的，母亲玛丽娅·凯塞琳娜·奥登豪生是个铁匠的女儿，是一位纯真善良的荷兰籍女人，没有多少文化，也不懂社交礼节，但随其夫一生的操劳练就了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双亲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约瑟夫·戈培尔的童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每到晚上，全家就坐在一起替一家灯芯厂做些手工活。家里做活的地方总是在厨房里，他的父亲后来当了这家工厂的代理人，生活才逐步有了改善。孩子们中间只有约瑟夫·戈培尔才能使用家里最好的一间房间。他在那儿练钢琴。这架旧钢琴是他爸爸花了整整一个月的工资为他购买的。

尽管如此贫穷，但贫穷并不是戈培尔年少时仅有的苦难，更大的不幸在他四岁时毫不留情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那是1901年的暮春，已是万木葱茏，草长莺飞，坐落在莱茵河下游的工业小城莱特，在这春日融融的日子里，显得特别宁静。

在这座城市中，达伦街156号拥有一栋简朴的二层小楼。临街的阳台直接对着马路。淡蓝色的窗帘给这座楼房增添了不少神秘、肃穆的气氛。

那个星期日，四岁的约瑟夫·戈培尔在客厅的沙发上正玩得起劲。突然，他号啕大哭起来。看样子，是某种急病突然降临在这个孩子身上。戈培尔的父母闻声迅速从楼上跑了下来。经医生诊断，是小儿麻痹症。

“怎么办？好治吗？”戈培尔父母焦急地问着。

“必须立即动手术！然后再看结果”。医生不容置疑地回答。

手术后，四岁的戈培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慈祥的母亲坐在一边，照顾自己的孩子。

“妈妈，我的腿还好痛。”

“慢慢会好的，别急，好吗？”

戈培尔把头依在母亲的怀里。妈妈扭过脸去，两行眼泪潸潸而下。

“妈妈，你怎么啦？你怎么哭啦。”

“没怎么着，妈妈想你外公外婆了。”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童年就是因为这次突发病症而终身残废的。

手术出院后，幼小的戈培尔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腿会终身残疾。他以为自己好了，一切都没事了。

随着时日的流逝，童年的戈培尔总觉得自己右腿没有力量。他不只一次对母亲说：

“妈妈，我这条腿有些不管事。”

越来越明显，左腿比右腿粗壮，从而两腿走路也日渐失去平衡，一跛一拐的。

戈培尔不时发火，生气，哭闹。父亲看到儿子发火时，尽量安慰。母亲是一位善良的女人。手术后的最初几年，母亲总是牵着他的手，带他去教堂。母亲跪在他旁边，乞求天主，愿天主赐给她孩子力量，去承受虚弱的身体给他造成的精神负担。这样，戈培尔很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病和因此给父母带来的苦恼。这些，都深深地铭刻在他心中。这就是他自卑和由此而生的过分的虚荣心的根源从此，他经常躲进他的小阁楼间。阁楼间的墙是斜坡式的，窗户很小，从那儿可以看到天空，如果紧靠窗站，也可以看到房子的后院，阴森森的。戈培尔在这里，不知消磨了多少时光和流过多少泪。

德国人喜欢粗野、凶悍、好斗。戈培尔不具备这一条件，逐渐，他变成了“书虫子”。在阁楼间的寂静中、在从各图书馆借来的一堆堆书中他是独立自主的。他可以自己决定读什么书、读多少书。他的父亲对他最大的帮助是允许他把小迈尔百科全书（一种简缩的而且已相当过时的版本）从客厅的书柜里拿到阁楼间去。这两本已磨损的辞典成了戈培尔最喜欢的读物，它是一种通俗的百科全书。后来，这部百

科全书对戈培尔帮助特别大。从这部书里，他获得了如何容易地把在学校里和家庭里与他谈话的人吸引住的本领

戈培尔的大部分教育是在天主教会里得到的。他先在一个天主教教区小学上学，后来上雷特的文科中学。可以想见，像他那样，一跛一拐的双腿上，架着一个又瘦又窄的上身，而双肩上的脑袋又出奇的大。同班的同学，同校的同学都不愿跟他在一起玩，还不时地耻笑他。他在他早期的自传里曾提起他与同学的关系时，这样写道：“同学们都不喜欢我。他们从未喜欢过我，除了里夏德·弗利斯格斯以外。”尽管身材瘦小，与脑袋奇大显得滑稽可笑，然而更让他饮恨终身的是自己是个瘸子这一事实，也是他早年心中满怀不平的原因之一。据说他在自杀前一年半曾对一个朋友说：“别人对我所能施加的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检阅仪仗队。而这并不总是可以回避的。每当在庆典的日程上列入检阅仪仗队的活动时，我就一夜睡不好觉”。

耶稣基督当时曾被一度十分热忱的辅弥撒者戈培尔奉为楷模，他在中学毕业时的宗教考试中得了一分一分是德国学校中最好的成绩。然而，在戈培尔看来，教会无权把耶稣视为自己的圣灵。他所崇敬的并非是神父们所说的那个所谓升了天的耶稣，而是这个星球、这个时代的耶稣——一个被驱逐者、被剥夺权利者——即德国人的一个朋友。在贡比涅年代，戈培尔大肆散布关于德意志民族和种族的陈词滥调，认为同盟国、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为了赢得1914年至1918年战场上的胜利而欺骗了德国人。

戈培尔就这样在别人鄙视的眼光里过着孤独苦寂的屈辱日子，一天天地长大。但是，世事难料，有谁（包括并不嘲笑他的里夏德·弗利格斯）又能料到这个受尽冷眼的拐子日后会发达得那么显赫，并给他的家乡莱特带来那么昙花一现的辉煌。

到希特勒发动法西斯战争时期，莱特市为自己出个戈培尔而荣耀一时。戈培尔家门前的马路一度改为戈培尔大街。戈培尔家的院子，一时成了人们争相朝圣的庙堂。当战后一切都失去光辉的时候，德国的民众和欧洲的人们还经常提起戈培尔的故乡莱特市。

但是不管日后会有些怎样沧海桑田式的大变化，戈培尔的早年是在十分不幸中度过的。

二、挫折频仍

小学毕业后，戈培尔升入莱特中学学习。14岁以后，戈培尔的形象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他的外貌长相变得不那么令人讨厌了。一双大眼睛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闪闪发光，他用漂亮的手势强调他那洪亮的声音讲话。当人们注视着那双大眼睛或那双形状优美、精心保养的手时，他看上去是很吸引人的。约瑟夫的嗓音是粗犷的男中音，虽说与他的身材不怎么相配，但是听起来却令人感到很舒服。戈培尔十分注意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因为残疾，戈培尔被父母允许读到文科高级中学毕业。相反，他的哥哥们初中毕业就开始谋生了。父母下决心为有天赋、有抱负的小儿子提供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自豪地想，将来他们的儿子会是位博士，肯定会获得与这一称号相符的“典型中产阶级”的职业。

在莱特文科高级中学，戈培尔不特别招人喜欢。虽然他是个学习成绩一流的好学生，但老师们却从未喜欢过他。他的同学有许多理由不接受他，因为他傲慢自负，有时还有点诡计多端。有一次，就连他的知心朋友弗里茨·普朗都特别生他的气。他们共同的一个朋友逃避了宗教课，约瑟夫向默伦神父告发了他。“假如他不是个残疾人的话，他怎么也逃不脱应得的一顿臭揍。”戈培尔的长处是在每年的学生汇演时，因其表演天赋令人钦佩不已。他的外号叫乌勒克斯，“意为诡计多端的人”。戈培尔对这个名字感到很自豪，毕业以后他也喜欢在朋友圈内让人这么称呼。并且他延用这个外号作了他最初的新闻写作尝试的笔名。

除了极大的读书兴趣之外，年少的戈培尔就已显露出对音乐的真正理解和欣赏。他父亲懂得赏识他这一点。有一天他被叫到父亲面前。

父亲亲切地对我说，他决定给我买一架钢琴。我们一起去看货。那架钢琴卖300马克，当然是别人用过的，而且已相当旧了。但它是学识修养和生活富裕的化身，高雅生活方式的标志，中产阶级的象征。

冬天客厅很冷，因为只有星期天才生炉子取暖，所以约瑟夫练琴时必须穿大衣。有时候他为聚在一起的家人演奏。买钢琴的钱是多年

来一分一分攒起来的。戈培尔对他的助手讲述这件事时，还提起过那份父亲曾系统地和他这个注定要受高等教育的儿子一起反复练习过的“文艺节目单”。

父亲对我在音乐方面的成长特别关注。有一次，当他认为我达到了某个完美程度时，又庄重地把我叫到他跟前，对我说：“你现在达到这样的程度，下星期日你可以去科隆看歌剧”。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皮夹子，费力地打开，从里面取出一枚闪闪发亮的5马克硬币塞到我手里。

这一惊喜几乎比买钢琴还令人激动。因为钢琴本身还是钱，而且价值稳定。但大手大脚花整整5马克去看一次歌剧，这实在是我们当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我们觉得，做这种事太轻率了，甚至可以说是罪过。

但就是这一次，促使父亲花这样一大笔钱的既非轻率、也非故意让我高兴，而是精密的计划。我的未来要按这个计划去安排。看歌剧（我父母一辈子也没看过歌剧），如同钢琴一样，属于那种我应进入的环境氛围。

1914年8月，戈培尔想当志愿兵被拒绝，当时他感到非常失望。普朗博士是约瑟夫的中学同学和最要好的朋友，他自己很快就参了军。像其他同学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宣战之后，未满17岁的约瑟夫立即报名当志愿兵上尉军医只看了一眼他那瘦弱的身体和残废的腿，连起码的体检都没给他做就拒绝了他。真是悲剧性的开始，就像学生时代和同学们一起出现在舞会上总受冷遇一样，这一回军队又把他拒之门外。回到家里，他把自己关进小屋里，像孩子一样哭了。他一整天都没出来吃饭，两天不说一句话。这是年轻人特有的反应，真的痛苦难受和受到伤害的虚荣与一点装模作样和做戏给人看（约瑟夫的特长之一）交织在一起。毕竟这事使这样一个聪明人几乎无法接受，因为他很自负他是“能当兵的”。

很清楚，约瑟夫·戈培尔从未跟随他两个哥哥上前线，就是在战争后期上尉军医的体检要求越来越低的情况下他也没能上前线而那时他的同龄人有的却早已埋在佛兰德的土地上，有的蹲在法兰西的战壕里。与那些因战争去服役而耽误上大学的同龄人相比，留在家乡的这

个年轻人得到了很大好处。戈培尔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但他一生都忍受了这一折磨，并用他自己的方式补偿了未能服役的缺憾。在很多情况下，他表现出了有目共睹的勇气。他也寻找过这样的机会，在取得政权前的“萨勒战役”中，在最后的战争年月的枪林弹雨中，他以特殊的偏好方式和辛辣言辞批评了陆军元帅和将军们。

约瑟夫的父母曾希望，将来有一天能看到他们天才勤奋的儿子身着神父圣衣。高级教士默伦80岁时，当谈到高年级学生戈培尔的宗教课的成绩时，还在极力称赞他。在学校的最后几年里，约瑟夫是个特别出色的学生。他的毕业成绩堪称典范、十全十美。他理所当然地被免去口试，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在毕业典礼上发言的荣誉

他的朋友普朗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当时普朗早已得到了提早毕业证书，正在家休探亲假。毕业典礼上，戈培尔的发言虽然“形式很完美”，但却“夸夸其谈”。校长送他的学生上路并与之告别时说：“戈培尔，你一生中会很有成就，但是，无论你将来会干什么，却决不会成为一个好的演说家！”

毫无疑问，戈培尔学生时代对他父母最热衷的愿望没有反感，而且真诚地想成为一名神父。在信奉天主教的莱茵兰地区，长大的孩子对教堂的辉煌华丽和神父的威严权力有着深深的印记。身穿神父圣衣主持神圣的弥撒、在圣诞节列行仪式上受到人群的赞赏注视、被虔诚的忏悔者称作“圣下”，这一切都曾是这个敏感好胜的男孩子最初的理想。他曾梦想有朝一日端坐在科隆大主教的圣殿里，穿着红衣主教的长袍，赐给恭顺地跪在他面前的人们以幸福。可是，当约瑟夫·戈培尔1917年复活节通过高级文科中学毕业考试去波恩报名上大学时，他未能注册上神学院，而是接连上了八个别的大学，他学习文学史，此时他深信他有资格将来成为一流的作家。同一时期的信函使人感到像是文体练习，先后在波恩大学、弗雷堡大学、伍兹堡大学、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求学，在这些著名大学、德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里，戈培尔专修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兼修拉丁文和希腊文。

他的志愿是做作家。他在1921年写了一部自传小说《迈戈尔》，但是当时没有一家出版商愿意出版他的这部著作。以后两年，他又写了两部剧本，关于耶稣、基督事迹的《流浪者》和《孤客》，都是用

韵文诗体写成的，但是也没有一个剧团愿意演出。在新闻工作中，他的命运也不佳。1914年前后，身为帝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的总编辑，特奥多尔·沃尔夫早就名闻遐迩。1898年他已经到柏林日报社工作，而在此期间他曾和他人共同创办了《自由论坛》，这家杂志成为当时新文化生活的，而不是如皇上所猜疑的左派的聚集地。当时，戈培尔崇拜沃尔夫超过了所有人。沃尔夫是野心勃勃的戈培尔的榜样。戈培尔并没有把自己的文章随便寄给一个人。他“自然而然地”将它们寄给了全国最能干的报界人士——沃尔夫戈培尔徒劳地寄送了整整50篇文章，尽管其中不乏足以被《柏林日报》采用的佳作，但无一被中选。而戈培尔，一再碰壁，却仍然向万能的沃尔夫谋求一个编辑的位置，遭到了回绝。

戈培尔对这些工作的态度显示了他的性格特点，并对他以后的发展发生了长远的影响：这样的一个聪明人令人吃惊地缺乏自我批评。他坚信没完没了的写作和文学宣泄的真正的艺术价值，即使他很可能把这些批评认为别人写就的拙劣作品。

到了纳粹在德国势力猖獗时，沃尔夫虽及时地流亡到国外，但命运之神又把这位七十五岁的老人从法国解送回到第三帝国，戈培尔终于使他在萨克森豪森丧生。这是后话，于此可见戈培尔性格之一斑。

从1917年夏天波恩第一学期结束到1921年，年仅24岁的戈培尔在海德堡获得博士学位。他不安分地在六所大学里学习过。但就在第一学期之后，他在经济上就有了困难。后来由于得到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的帮助，他才得以继续他的学业。戈培尔第一次要求助学金的申请于1917年递交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是时他快满20岁，已在大学修了一学期。第一封信写于1917年9月5日，信号的十分谦卑，内容如下：

莱茵河畔科隆

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主教管区委员会

请允许我冒昧地向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主教管区委员会就1917～1918年冬季学期助学金一事提出诚挚的请求我已于今年复活节通过了莱特高级文科中学毕业考试，口试免考（毕业证书抄件附上），毕业后上了波恩大学，在文学院学德语、拉丁语和历史。这一

学期我用中学时授课挣钱节省下来的钱自己解决了困难，但我不得不提早中断我的学习，因为我的钱太少，很快就都花完了。我父亲是个会计员，在如今日常生活开销日益高涨的情况下，他还得从薪金中拿出一些钱供其他开支使用。从这点少得可怜的钱中我不能再要什么了，因为这钱还要用来资助我的两个哥哥，我大哥在西线战场，另一个哥哥在法国被俘。很可惜，我现在在假期里没有多少挣哪怕一点钱的机会。虽然我费了不少劲也没能找到临时工作。由于脚残

我不用服军役。下学期我想继续学习，这样我就得完全指望天主教教友们的善行。

所以我最衷心地恳求你们倾听我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请求，我热切地期待着您不久能给我答复。

我所讲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这一点我以前的宗教课老师约翰内斯·默伦先生可以向您担保。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您忠实的保罗·约瑟夫·戈培尔（文学院
学生）（哲学院学生）

莱特城，达伦街156号

第二封信写于9月14日，内容谦卑，封附在为提申请所必须呈交的资料文件里。

该信内容如下：

尊敬的教授先生：

请原谅我再一次向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提一些问题麻烦您。我不知道您是否知晓神父齐默尔曼先生已退休，现在已不在莱特市居住这件事。如您能把本地区地方小组新任主席的地址告诉我，我将十分感谢。

正如我上次的信中告诉过您的，由于经济困难我没能全部完成上学期的学习。此外，6月底我也曾作为适宜服役的人被军事部门征去做办公室值班工作，现在我已完全服务期满。正由于以上原因我不可能向您提供勤奋证明，因为这是我的第一个学期。我想请您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不要求提交勤奋证明，尤其是因

为没有您好心的资助我就不得不遗憾地放弃我今后的学业。调查表附上。我期待着您令人高兴的回音。随后我将把其他证件材料寄去。

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文学院学生约瑟夫·戈培尔

莱特市（杜塞尔多夫地区）

达伦街156号

四天之后戈培尔写的另一封信信中提供了所需的有关他的家庭状况。

莱茵河畔科隆：

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主教管区委员会

申请人的父亲是莱特市W·H·勒纳尔茨公司的会计员，年收入总计为3800—4000马克。没有值得一提的财产。申请人的母亲还健在。申请人是他们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大哥，24岁，在西线战场当炮兵。22岁的二哥在法国被俘。唯一的妹妹刚刚八岁。

父母亲没有能力资助申请人上大学，因为生活开销越来越大，而且还要资助另外两个儿子，他们是当兵的，当然应当优先。

约瑟夫·戈培尔（文学院学生）附在信中的还有几份由德高望重的人士写的支持申请的推荐书。比如，在莱特高级文科中学当过申请人的宗教课教师的神父约翰内斯·默伦博士写道：

证明

戈培尔先生出身于诚实正派的天主教家庭，仅就他的

笃信宗教的和合乎道德的行为也应得到最好的推荐

宗教课教师、首席教师

约翰内斯·默伦

申请书上附一份毕业生成绩单的抄本，上面的成绩都是“优秀”、“良好”。戈培尔在原文抄本上下了很大功夫，抄本非常干净整洁。

毫不奇怪，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申请得到了批准。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决定向他提供一系列的无息贷款。1917年10月8日，为了能支付第二学期的书费和听课费，助学金获得者戈培尔非常客气恭敬地请求马上付款时，180马克的第一笔款就汇来了。在最初的六个学期里，戈培尔从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得到了六次贷款，总额计为960马克。假如人们预料到，偿还贷款会引起什么样的麻烦的话，肯定连一分钱也不会借给他。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为索回这笔款，最后不得不诉诸公堂，被告拖延了多年的诉讼，一再导致抵押和要求他做表白清偿诚意并交代全部财产情形的宣誓。直到1930年才做了最后的处理。此时戈培尔已是纳粹党的省党部领导人和国会议员，并发表过尖锐的反天主教会煽动性讲话与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进行的旷日持久的争诉的全部卷宗现在都还存放在该协会的档案馆里。在最初六个学期里，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每次的支付平均超过150马克。此时应考虑到在1919年和1920年间马克开始贬值。除此之外，戈培尔还从他父亲那里每月得到50马克的补贴，偶尔他母亲也能给他寄少许钱或一个“食品包裹”。尽管他有时也能通过给人授课或在某个办公机构当临时工挣点小外快，但戈培尔的全部收入还是寥寥无几。

在波恩大学的第一学期，戈培尔主要听了历史课和文学史课，他对歌德的戏剧作品特别感兴趣他参加过一个受到天主教机构特别支持的大学生联谊会。在那个学期里，戈培尔好像是个非常热心的积极的成员。四十年后高级教士默伦博士还记得，有一次，他应他那位当年的得意门生的迫切邀请，到波恩去给约瑟夫及其同学们作关于基督教会发展史的报告。这位老先生说，很长时间后，他对那个令人激动的晚上还有着非常愉快的回忆这可以解释为由于他当年的学生热情积极地参加了那次活动而使他特别高兴所致

1918年夏季学期，戈培尔到弗赖堡上学，那里免收他的听课费。他主要研修艺术史，特别是温克尔曼和古典罗马及希腊文化对中世纪的影响。冬季学期他又重新选择大学和学习专业，转学去了维尔茨堡，学习近代史。

有一些1918年10月和11月那个时候的私人信件保留下来。其中几封是写给他的朋友弗里茨·普朗的，有的是写给他在莱特的家的。因各

种原因，这些信令人十分感兴趣。首先是日期的原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写的，让我们看到一幅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戈培尔所感觉到的未加润色的画面。而这些信也由于文体方面的原因是有启发性的，因为这表明只要戈培尔不感到被迫行文那样装腔作势，他能够怎样自然地表达。

亲爱的弗里茨：维尔茨堡，1918年10月2日

先致以亲切的问候。由于我心情挺不愉快，我必须马上告诉你，我那满怀希望的梦没有实现。这学期我不得不又一次放弃去慕尼黑……

随后他笔头一转，以一位导游者的华丽辞藻描写维尔茨堡的美丽景色，谈了他自己“年轻的大学生”的情况，然后继续写道：

……这所大学很不错。这学期我主要又修了艺术科学和近代德国文学。我希望今年冬天在艺术自由体方面有所发展。那么你呢，我亲爱的朋友？瞧，我就想到你会在这几周内到这个美妙的艺术天地来探望我。这肯定不会使你后悔。对于你中断你在那里的逗留，再来此地转一转你有何看法？你来这里会使我很高兴。今晚我还要读泰戈尔的《园丁集》，一部美妙的爱情诗歌集。我正想热切地向你推荐这本书。请你尽快把那幅小的圣诞节速写画寄给我好吗？请代我问候你尊敬的母亲和父亲大人。

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你的乌勒克斯

在他的文学虚荣心增强的那个时期，戈培尔着重培养了自己的这种偏好，即在他的信函中做一种文学的修辞练习。对此没有哪个例子可以胜过他给普朗家的——不是写给弗里茨而是写给他全家的一那封吊唁信。当时他家年仅18岁的最小的儿子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星期阵亡了。那帧阵亡者的肖像画如今依然挂在普朗家。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十分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毋庸置疑，约瑟夫为失去这位青年时代的朋友感到真切的痛苦，并且对朋友家的悲痛表示慰问。更有特色的是，即使在那封吊唁信中他也没能压住那种浮华的癖好，做了一次文学的修辞练习。他显然费了好大劲给普通人与“英雄”的语气做正确的定量分配。10月13日的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普朗一家：

我刚刚从弗里茨那里得到你们亲爱的儿子和兄弟汉斯英勇战死沙场的令人震惊的消息。这催促我在你们为这巨大的损失而悲痛的时候向你们表示我最深切的哀悼。你们会允许我这个曾同汉斯有过一段最密切的交往并且同他一起度过美好的日子的人向这位青年英雄献上几句缅怀的话。汉斯是一个可爱的忠实的同伴。他特别吸引我之处和一再使我感到自豪地同他走过一段人生之路的是他那依旧如此纯洁无瑕的品格、高贵典雅的品质修养和清新自然的举止风度。尽管他以他那有点一本正经的真正男子气的品格并不总是善于迅速取得人们的同情，但他却懂得，更值得的是在几小时平静谈话中不断赢得朋友与熟人的心。爱他的我来说清纯的年轻人中一位最优秀最有教养的典范逝去了，他正值豆蔻年华，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了不起的人。我可以想象得到，你们，他的双亲和兄弟，在他这位年青的英雄身上失去了什么。请恕我斗胆想在这沉痛的时刻说几句安慰的话。只有时间能医治这样的痛苦，而且唯独时间才做得到这位忠诚的烈士的形象在你们和我们的心中熠熠生辉，他还不是个成年男子，却像一个男子汉和胜利者那样牺牲了，他是我们心目中英勇青年的新的纯洁的象征。愿你们，尊敬的普朗家，今年要这么想，从中找到安慰，振作起来。如果这是为众神所爱而又让他年纪轻轻就逝去的人的命运的话，那么你们相信，汉斯就属于这些被选中的人我几乎觉得好像众神又一次派出他们那些决定该谁阵亡而把阵亡的英烈引入英雄祠的女神，在关门之前为他们到沃丁神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永恒之光去取那高贵的血。汉斯和恩斯特·海南属于勇敢优秀者，因此他们以早期德国式的对家乡对我们的忠诚而献身。下面这句话是我们献给恩斯特·海南的告别之言，同样也是献给汉斯的：“有一件事也许可抵得上许多行动……这就是为了你的祖国的危难而英勇献身。”再次向你们，尊敬的普朗家表示我最深切的哀悼

你们真正忠实的

约瑟夫·戈培尔

差不多正好是四周之后，11月11日，在盟军总司令福煦将军的豪华客车箱里签署了停战协议二十二年后戈培尔把这个车厢弄回到贡比河，为了在同样的历史地点象征性地表示战胜法国的胜利。

德国所直接面临的1918年停战的严重政治形势，自然也使大学生们非常激愤。最高统帅部最急迫地要求停战，懂得让政治家们承担接受和平条件的责任。鲁登道夫逃往瑞典，他以后一段时间成了希特勒的同路人。士兵、水兵和工人们开始哗变，要求和平。皇帝（威廉二世）退位，逃往荷兰。11月10日魏玛共和国宣告成立。

11月13日，革命后几天写的信中，戈培尔对他的朋友弗里茨·普朗讲述了维尔茨堡的大学生们对那些事件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和他本人的看法。在他信中所谈到的这点上，这位未来的主要号召者在“背后一箭”之说的争论中，坦率地承认德国在军事上失去了那场战争。

亲爱的弗里茨：

几天前，在大学里最大的教室举行了一次大型的学生集会会上全体维尔茨堡学生对我们政治生活的焦点问题进行表态。在辩论过程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想正好用它来答复你的来信会上提出了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德国人应当怎样看待统治权的问题。一位战时受过伤、年龄较大的学生回答：“我认为，如果我们平静地让这些事情自然发展，那对我们来说是最相称的。如今，是一群盲目的粗鲁的人在执政，然而，他们需要领导英才的时刻又会到来，那时就轮到我們尽全力去做”。你是否也认为，在低级的不知所云的民众喧闹中，重又呼唤英才与力量的那个时刻会再次到来吗？让我们等待这个时刻吧！为了这场斗争不要放弃通过坚持不懈的学习来武装我们自己！同我们的祖国一起经历这个艰难的时刻，这确实是痛苦的。然而谁知道我们从中不会得到益处呢。我认为德国输掉了这场战争，而对我们的祖国来说，战争却是打赢了。当葡萄酒发酵时，所有不好的东西都会浮到表面，但是却会被撇掉，只留下美味的东西。在我们所向往和希望得到的美味的东西中，我们愉快地发挥作用，贡献力量……

我们的祖国完全垮了，我们这些继承人也一样被毁了。古罗马诗人、文艺批评家贺拉斯或许像以往一样在这里也乐意把他的声音借给我们？

请允许我向你的尊敬的双亲大人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向你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你的永远忠实的朋友约瑟夫

1919年夏季学期，戈培尔回到弗茨堡再次享受免费学习。他还一直从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得到贷款助学金。可是那时他内心与天主教的联系毫无疑问已经很疏远了，他也退出了大学生联谊会。

1919年冬季学期他去了慕尼黑，在那里，他收到了由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向他提供的第六笔、也是最后一笔贷款助学金。从这时起，他开始懈怠他的责任，他也偶尔向协会通报有关学习进展和学业最后结束的情况以及他的职业方向有好几年根本听不到他的音信。显然他已经渐渐地不信仰天主教了，而是开始转向一崭新的信仰—受聘当诗人的坚定信念

在这个转变时期，他喜欢给自己和他最亲近的人演出他思想斗争的悲喜剧他这样做所产生的效应可以从他父亲的一封恳切告诫的信中得到证明。约瑟夫是在慕尼黑的冬季学期里收到这封信的。从信的末尾几句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约瑟夫比那些爱他的人更热衷于扮演“忏悔的罪人”，以此不使自己十分痛苦。这封信是他父亲深深地相信和真正的善良以及父亲对儿子发自内心的真正的爱的一个动人的证明。儿子未来的发展还使父亲有些忧虑。

亲爱的约瑟夫：

估计我前天寄给你的信你已经收到了。现在我想简短地答复你上月31日的来信从你来信的字里行间我获悉许多令我高兴的消息，虽然也有其他一些事使我感到伤心我认为如果双方都有良好意愿的话，以前那种相互信赖的关系或许可以很快恢复。其基本条件当然是你要始终坦诚和真心地面对你的父亲。

我始终确信你在大学里学习是用功和持之以恒的，并且你的成绩使有些学生感到羡慕。特别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你遵守社会公德。你讲的有关这方面的话使一个做父亲的心感到舒畅。

如果你现在继续写：“若是我失去我的信仰……”，我大概可以认为你还没有丧失它，只是怀疑在折磨你。那我可以安慰你说，没有任何人，特别是当他年轻的时候不受这种怀疑的烦扰。而且，就是那些最受怀疑之苦的人也远非是最差的基督徒。即使是他们，我们也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胜。因此说，你不参与圣事是个很大很大的错误，因

为没有哪个成年人能声称他始终怀着孩童一样纯洁的心来到圣桌前，就像他第一次参加圣体圣事（圣餐）时所做的那样。

现在，我要向你提几个问题。因为要让我们的关系恢复以前那样的信赖的话（没人像我一样再希望有这种信赖），那么，恐怕我已对这件事作出了答复：

1．你必须或者打算写一些与天主教格格不入的书吗？

2．你是否想从事一个不适于天主教徒的职业？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如果你的怀疑是其他方面的，那么我只说这一句：你祈祷吧！我也祈祷。我们的天主会帮你，使一切顺利的

但是，假如你还认为丢掉你的信仰的话，那么，我想让你回忆一下1915年。那一年，你天天早上在我身旁跪在我们那可惜过早夭折的伊丽莎白的灵床前，跟我一起为我们的小天使的灵魂念主祷文（天主经）。当时，什么是我们痛苦中的安慰呢？只有教会赐给这个死去的可爱的小女孩的安慰及我们能够一起祈祷那么，将来也会有那么一天，你被叫到你父亲的病榻前，那时你也想作为不信教者与你的父母告别吗？当你的兄弟姐妹在你的父母灵柩旁跪着的时候，你想在一旁站着吗？不，我的儿子，你可别这样做，你内心的事是什么样就随它所愿好了！即使它比我认为的更严重：振作起来，你还会再得到内心的安宁。如果你认为不能找到安宁，那么你就回家来吧！我给你出这笔路费。我刚刚想起一个亲身经历过的故事，我简短地告诉你本地一位纱厂主——他不久前去世了，曾是个天生的和受过教育的天主教徒。后来他失去了他的信仰，以新教的方式结婚，让他的孩子也受新教的教育他不再去教堂了但在五月的一个晚上，我看见他做完祈祷从教堂出来。是什么驱使这位被赐予丰厚财富的人又进教堂的呢？是内心的不安再次驱使他去他童年曾经跪过的地方！这个世界未能给他内心的平和。你把你最后的圣事描绘成幸福的一天有一天你也将建立起自己的家庭。我在我的孩子们头一次做圣体圣事时，以虔诚的心热泪盈眶地看着，为孩子们的幸福而高兴在这样的日子里怎么会使一个不信教的父亲的心激动起来呢？假如他回忆他的青年时代的话，他的过去怎么会给他造成沉重的负担呢？这位不信教者，这位以前的天主教

徒没有找到他的安宁。青年时这种不安可能会受到抑制，年纪大时这种不安就会变成痛苦的折磨。

你在信中写道：“告诉我，你不要咒骂我是个离开其父母、走入迷途的浪子（忏悔的罪人）吧！”还写道：“如果你认为我不可以再当你的儿子……”作为信奉天主教的父亲，这两件事我都不会做。像以前我曾经常为你祈祷那样，现在我再为你祈祷。

好了，就写到此。你不必急着答复我。不过你要保持与家里的通信联系。听说寄包裹不再受阻碍，今天我寄给你一个食品包裹。

亲切地问候你，也代你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问候你。

永远爱你！

你的父亲

爱装腔作势的戈培尔，其举止也就像个叛教者。他的行为举止都暴露出装腔作势和一种近乎病态的虚荣心。

1920年，戈培尔到了海德堡。第二年，他完成了有关一位柏林的浪漫派戏剧家的博士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在海德堡他深受弗里德里希·贡道尔夫的影响。贡道尔夫是当时最著名的文史学家和至今被公认为前人未达到过的《歌德传》一书的作者。贡道尔夫原名为贡德尔芬格尔，是个犹太人他是他那个时期最有影响的学者，一位卓越的熠熠生辉的人物每个青年文学大学生都无法避开他的影响。弗里德里希·贡道尔夫身上也有斯特凡·格奥尔格的余晖。因为在“斯特凡·格奥尔格文学社”这个团体中，他的排名紧跟在这位诗人之后。几位有幸在这位教授的专题研讨班学习的学生，可以自豪地认为，他坐在了诗歌高级文化和文学精华之源泉的旁边。无疑使年轻的戈培尔感到十分自豪的是被准许参加这位著名的犹太教授的研讨班。他当时23岁，差不多已完全专心致志于艺术和文学史的研究。当他在为其博士论文寻找题目时，贡道尔夫让他写威廉·冯·许茨，一位不怎么有名的19世纪前半叶浪漫学派的剧作家。文学院应届毕业生戈培尔给他的博士论文定的副标题为“对浪漫戏剧史的贡献”。当了帝国部长的戈培尔后来让人把这篇博士论文从大学档案馆中取出来，给论文加了一个新的副标题“早期浪漫主义艺术家的精神与政治背景”。对于一个帝国部长来说，理应早在上大学期间就对政治感兴趣。实际上这政治是许多年以后才到来的。

戈培尔所谴责的贫困曾使他这个爱出风头的人历尽艰辛就是今天也很难想像出这个舍不得花一分钱的穷光蛋怎样不安分地从一大学城搬到另一大学城。在波恩，他住在波特街18号；在弗赖堡住在布莱萨赫街2号第5层楼上；在维尔茨堡住在歌德大街8号；然后又搬到慕尼黑黑罗曼街一个名叫维吉尔的家中，住在一间有家具的小屋里；最后迁往海德堡。在那里他再也没有得到阿尔伯吐斯—马克努斯协会的微薄资助，只得全靠他父母所能寄给他的少得可怜的钱和他有时给人教课或在某个办公室做辅助工作挣到的一点微不足道的钱过生活

然而，他不能被聘当作家、当诗人吗？他不具备令人神往的、精心雕琢的写作风格吗？那些大报文艺小品栏的负责人就不渴求这样一位天才的同事，就不会以高薪聘请他吗？年轻的戈培尔坚信这些。就是当他的稿件成打地被编辑部和出版社退回来时，他也仍然很自负。

他将大量的作品寄往《柏林日报》，并且是寄给主编特奥多尔·沃尔夫，因为戈培尔特别欣赏他那尖刻的“星期一社论”。那么多连同华而不实的附信一起寄出的文章和文艺小品中，也只有一篇曾经挤上那位主编的桌子，这几乎让人无法接受。但是一个不管怎么说已经是22或23岁的有才华的文学大学生怎么能真的以为，那样的稿子也能顺利地在《柏林日报》或者在乌尔施太因各种报上发表出来呢！

因为戈培尔没有认识到是他的作品缺乏成熟以及华而不实的文体造成了没有成效，所以在他心中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信念：一群犹太编辑和出版商的奸党要阻止德国诗人约瑟夫·戈培尔发挥他的天才。这是戈培尔后来反犹太主义的开端。

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的境况变得更加艰难了。现在他虽然是位博士先生，并以此实现了他父亲的夙愿。但是他没有职务、没有职位、没有固定的工作。这种状况持续了许多年。这种不幸的状况让他双倍沉重地感到身体的缺陷。不仅仅是因他跛脚，另外他的个子太矮、十分瘦弱，体重不到100磅。但他却善于培养和强调在他出场时是什么总那么吸引人。他利用他美妙声音的效果，并且很快发现，只要他想，他就能获得一种对其他人的吸引作用。他能做到十分迷人，令人惊异地引人注目和狂妄。他能像留声机的唱片一样耍两面派。

他的脸瘦削，呈椭圆形，有一个坚挺的鼻子和高高的颧骨。他的宽厚的嘴可以通过迷人的微笑给人以魅力那双美的深棕色的眼睛看人时非常富有表情。他的手修长、纹理细嫩，很敏感。每当他以有力的手势强调其讲话时，总喜欢展示他的手。不管身体有多少缺陷他还是发育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但是他却根本不是那种他自己所宣传的理想形象：金发、碧眼、高个的“雅利安人”。后来有许多聪明的观察者试图描绘他的特征。特雷沃·罗佩尔教授认为，按精神和气质与其说他是日尔曼人倒不如说他显得更像罗马语族的民族类型。内维尔·汉得森曾经是战前几年驻柏林的英国观察员，他总习惯说，他觉得戈培尔像一个凯尔特类型的爱尔兰鼓动家。

戈培尔在结束学业之后——现在是约瑟夫·戈培尔哲学博士——用多年时间徒劳地寻找当记者、剧作家的职位。戈培尔本来还可以参加首席教师考试，这样可能（但并不一定）使他免受失业之苦。对此戈培尔却一直未能作出决定，其中的原因也许不难理解，一位跛足的教书先生会受到孩子们毫不留情的嘲笑。于是，他的未婚妻把他安置在科隆的德累斯顿银行，当了一名证券叫卖人。戈培尔在那儿工作并不长，不过这也很难责怪这位自命的日耳曼语文学者即使他在希特勒的帮助下成了一名富翁并拥有几处雅致的乡间别墅，他还是蔑视他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感促使他在战争后期更多地考虑同苏联单独媾和而不是同西方国家媾和。戈培尔对资本主义的憎恨在德累斯顿银行期间比当时在自己贫穷的家里更为强烈。

同时在文学上他一直也没有取得成功他的绝大多数想当作家的尝试都没有实现。他完成的少数较大作品之一是长篇小说《米歇尔》，更准确地说应把它称为中篇小说。小说以日记的形式描述了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在战争刚结束后的几年中其内心的斗争和思想的发展过程。

用某个文学尺度来衡量这部作品恐怕没什么意义人们或许可以称这部作品是库尔特丝·马勒尔和被误解的恩斯特·莱格爾的不成功的杂交产物。但是这恐怕只说对了一半，而且这么说对上面提到的那位女作家，特别是对一位有影响的诗人是不公正的。在该作品中只可零星地找到些值得惊叹的表现力的想法和表达，与大量哗众取宠的“糖汁调味品”形成鲜明的对照，其反差相当明显。如果说，尽管如此我们在这里

还要用许多篇幅摘引《米歇尔》的内容，那只是因为这部非常像自传的作品提供了有关其作者的令人感兴趣的情况。

乌尔施太恩—康采恩和其他一些“左”的公司也在众多没有接受这本书稿的出版社之列。书稿也曾被那些极“右”的出版社拒之门外，这可能因为他那过于浮夸的文风。这本书是在他完成七年之后，即1929年才出版的，当时戈培尔已当上柏林地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省党部领导人和帝国国会议员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能够促使党的出版社最终出版一本印数很少的书。在出版后的几年中，接连出了几次数量不大的新版本。与这位部长许多卷本的文章和演讲集相比，或与他的“畅销书”《从凯塞霍夫到帝国首相官邸》相比，其数量是微不足道的。无疑，作者本人是《米歇尔》这本书的最佳买主，这本书他有许多，以备赠送之用。戈培尔在一篇夸夸其谈的序言中写道，要把此书献给他逝去的朋友里夏德·弗里斯格斯。

献词

你，那条被子弹打坏的胳膊还缠着绷带，头上仍戴着灰色的钢盔，胸前挂满了十字勋章，站在富有的市民面前，为了获取高级中学毕业证书。因为你有几个数不知道，他们就宣布你还不够条件。

我们的回答是：革命！

我们俩正想向精神上的崩溃投降。此时我们相互安慰，几乎倒下。

我的回答是：坚持！

你向你的命运挑战。弯曲或折断！为时还太早。因此你成了蒙难者。

你的回答是：死亡！

我站在你的墓前；耀眼的阳光下静静地卧着绿色的坟丘。我一再劝诫这是暂时的。

我的回答是：复活！

弗里斯格斯出身于莱特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所有认识他的人，如普朗博士和爱尔泽，都把他描绘成一个十分令人喜爱的人，一个非常爱沉思的人。对戈培尔来说，这个青年时代的朋友体现了他自己所

没有的英雄气概的理想。弗里斯格斯仪表不凡，身材高大，是个多次受伤、佩带着高级勋章和奖章的战斗英雄。对这样的人来说他很难在战后迷惘、混乱的时期找到出路。他表现出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但他也同和平主义者辩明事非。他甚至试图做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地研究过列宁的著作和性格。弗里斯格斯激励戈培尔去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及研究工业家、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的社会历史和哲学著作。戈培尔对这些著作抱有很大的兴趣，这是在他作为帝国部长颂扬谋害拉特瑙的凶手时大约12年前的事。

弗里斯格斯引导他的朋友戈培尔去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我们将看到，在《米歇尔》一书中俄国诗人的影响是如何反映的。戈培尔在某些程度上还一直信奉童年时就信仰的基督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秘主义同他剩余的宗教感觉结合在一起那时戈培尔也写过诗体的耶稣剧，标题为“漫游者”，但该剧本从未上演或发表过。

毫无疑问，这两个朋友经历了一个戈培尔从未能完全克服的虚无主义的阶段。他自认为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革命者，但是他的行为却常常显得受到强迫观念的驱使：他一定要为他年轻时所受的屈辱进行报复。

弗里斯格斯试图赋予他的生活某种意义，因此他到一所矿井干体力劳动同矿工们的交往中他寻找着他心中所想的真正的联系民众的纽带。1923年他在一次矿井事故中遇难。在这一时期，戈培尔和这位朋友之间的接触已经很少了，但是《米歇尔》一书证明了这位年轻的虚无主义者的影响有多大。同样“米歇尔”这位主人公也是以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与政治不公正的殉难者出现的。

戈培尔将这部作品设计成日记的形式。戈培尔有写日记的恒心。从12岁起直到去世那天上午，戈培尔几乎天天写日记。在这些日记中，他常常表现出自我陶醉，确实像个爱在镜子前扮鬼脸或英雄姿态的小男孩一样爱表露自己。他滔滔不绝地述说着长长的、非常自信的空话和反思、放纵的感情流露，这种感情奔放有时被肤浅的注释所中断。以差不多一行字为一段落的文字分布在本应该使一首诗给人以版式设计上令人醒目的印象戈培尔一生都是以同样的乐趣触摸他文学的涌流，就像一个守财奴以极大的喜悦抚摸他储藏的金条一样。

此外，在《米歇尔》这部作品中他创造了一个他自己梦想的主人公形象。这里作者自身的性格与他的梦想、与他朋友弗里斯格斯的形象融合成一个浪漫人物，一个现代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一个具有戈培尔的精神和弗里斯格斯的体魄的栩栩如生的士兵形象。米歇尔是士兵和工人，诗人和情侣，爱国者和革命者。单凭在第一行就让人看到一个不能骑马、听不到马的响鼻声的残疾人发泄出的那种隐藏于心中的苦恼，可见这是很有特色的，简单得令人感动。

5月2日，火车上

不再是纯种马在我坐下打着响鼻，我不再坐在炮座上，但我仍脚步沉重地走在废弃战壕的泥泞中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啊，那时我还走在俄国广阔的平原上或穿过荒凉的满目疮痍的法国大地。

结束了！

我慢慢地摆脱了。我像只长生鸟从战争和毁灭的灰烬中飞起来了。和平！

这个词像止痛药膏涂在还在颤抖流血的伤口上。我觉得，我好像能用双手抓住这个词的祝福

我向窗外望去，看到德国大地怎样在车厢两侧闪过：

城市、村庄、森林、田野……

祖国！德国！

之后，米歇尔把战争抛在脑后，成了一名大学生。他租了一间小屋，自己当家作主。当一位青年时代的朋友问他，他曾在大学学过什么时，他没有立即回答。

我到底学什么？

要么都学，要么都不学。我觉得我学专门科学太慢太笨。

我要成为一个男子汉！有了初步想法。

名人！一条成为德国新人的路！

首先他要更多的考虑他自己而不是学习。

5月17日

我已思考了很长时间，究竟什么可以让我不假思索地、尽情地享受生命。现在，我的双脚站在了坚实的祖国的土地上。身边充满家乡泥土的芳香。我的脸色慢慢地红润起来。

在课堂上他遇到一位名叫赫尔塔·侯尔克的姑娘，和她交上了朋友。他们长时间地散步，进行深入的交谈。他对她谈关于他炽热的爱国之情。

“对于一个德国青年来说，只有一个职业：为祖国承担责任。”

然后，当他又单独一个人时，他抱怨他们的困境。

这听起来差不多是从戈培尔自己的日记中节选的：“我的钱花光了，金钱是粪土，但粪土不是金钱”。

又和赫尔塔在一起时，他享受音乐和爱情的喜悦。

草丛里无数昆虫鸣唱，青草发出浓郁的清香。

所有这一切显得大自然是多么寂静。

我吻着赫尔塔·侯尔克柔软狂热的唇：我们俩都感到非常害羞。

多么宁静的夏日的下午！

阳光洒在绿葱葱的山上。城市位于山脚下山谷宽广的凹地中。

红色的屋顶闪闪发光。

风儿轻轻吹过山顶，轻轻拂过草地。

远处是深色的枞树林。

我们在马路旁告别。她那双灰绿色的大眼睛谜一样让人捉摸不透。我感到非常幸福。

夜晚！

我漫步穿过田野和草地，呼吸着充满野玫瑰芳香的空气。

孤独！

我渴望那些不能说出的东西。

路上闪耀着黄白色的目光。

我返回城里。每家花园的墙上都垂挂着蔷薇，浅红色的蔷薇。我越接越多，我把一束红色的蔷薇放在她的窗台上。

极乐地归天！

我心中的一个渴望现在实现了。

万分快乐变成万分痛苦！

我迈进了另一个世界

幸福的时刻！

“赫尔塔·侯尔克给了我写作的勇气”。他如是说。此间还有一个人走进了米歇尔的生活：俄国学生伊万·维努罗夫斯基，有弗里斯格斯的影子（痕迹）。这位俄国人借给米歇尔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这本小说对书中的主人公影响很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魂灵飘荡在宁静睡梦中的国家的上空。俄国觉醒时，世界将看到一个民族奇迹。

民族奇迹？是的，就是民族奇迹。政治奇迹只能在这个国家中发生。国际性组织只是理智的学说，是反对流血的。民族的奇迹从不存在于头脑的想像中，而总是在血泊中

在俄国被称作是国际的东西是犹太人的诡辩、卑鄙的血腥恐怖和广大民众无边忍耐的大杂烩，这一切被唯一一个人的杰出意志推进到世界政治的纪元中：他就是列宁。

没有列宁就没有布尔什维克

再一次表明：英雄创造历史，即使是不幸的历史。

过了些时候米歇尔在同赫尔塔·侯尔克的一次长谈中说：“我想的和做的正如我必须想的和做的一样。每个（不寻常的）特殊人物都会这样做。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我们当中起作用，引导我们走早已安排好的路。人们不能违抗。事情就是如此。

另外，在戈培尔的笔下，米歇尔从不直呼他女朋友和俄国朋友的名字，而总是连他们的姓一起叫：赫尔塔·侯尔克和伊万·维努罗夫斯基，这表现了他装腔作势的作风。米歇尔开始写作，他受到的赫尔塔和那位俄国朋友的激励不亚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魂灵。他写作——像他的作者约瑟夫·戈培尔一样哗众取宠，故弄玄虚。7月12日

我与耶稣基督对话。我认为我战胜了他，但仅仅是他的偶像神职人员们和虚伪的依附他的人。

耶稣基督是严厉无情的。

他把犹太商人们从庙宇中鞭打出来。

向金钱的一次宣战。

人们来到监狱或现今人们所称的精神病院。

我们所有的人都病了！只有与腐败堕落抗争才能拯救我们自己。

虚伪是堕落的资产阶级的典型标志。

权力阶层已疲倦了，没有勇气再做新的事情。

理智毒害了民众的心灵。

好像他曾让赫尔塔朗读这几行，因为在这篇日记的末尾有这样一句话：“赫尔塔·侯尔克看着我，摇摇头。”

7月15日

好几夜我都睡不着觉，与涌出来的各种念头较量。

我内心充满激动、愤慨、革命。

一个思想在我脑海里形成宏伟壮观的形象。

死的舞蹈和复活。

7月18日

我觉得我好像已不在现世。我在醉意中、在梦境里、在愤怒中发狂。

我预知新的世界。

未来在我心中。

噢，上帝，让我说出我所忍受的一切！

我读尼采的理论——《快乐的科学》。

7月19日

耶稣基督是爱情的天才。

他是曾活在世上的最伟大的和最不幸的人。

赫尔塔·侯尔克像相信基督福音一样相信我。

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米歇尔成了着魔的人，忍受着“有创造力的孤独”之苦。

7月25日

我突然醒悟了。

我写一个剧本，主人公是耶稣基督。

现在我沉默不语，陶醉在快乐之极的感动之中。此时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的、陌生的。

现在我要亲自经历见识一朵花、一首诗、一幅画。我感谢上帝！

学期结束了。赫尔塔回了家，米歇尔则利用假期时间在弗里西群岛的一个岛上写他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剧本。他收到赫尔塔一封信，这信反映了约瑟夫·戈培尔的性爱理想。他曾喜欢看到女人们因他而受痛苦的情景。8月7日

有时我怀疑你的爱，于是想痛哭一场。请原谅！有时直到深夜我都睡不着，我怀念你坚强的自尊心。

我知道，你我到了爱情之路，因为你强壮，有决心奔向未来。

但是你应当作出牺牲，事情就是如此。对此人们不能改变多少。你不必走好些弯路。可我知道，你会回答我说，弯路是征途上最好的东西。而笔直的路从不因此引入歧途。

你的赫尔塔·侯尔克

米歇尔写道：“一个真正的女人爱雄鹰。”于是感情突然激烈爆发。

8月9日的一段文字让人十分怀疑。

时至今日我未见到任何犹太人。这真让人舒服。对我来说，犹太人简直是令人讨厌的。看他们一眼都令我恶心犹太人与我们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根本不恨他们，而只是鄙视。他们损坏了我们民族的形象，玷污了我们的理想，又是他们使国家丧失了力量，使社会风气败坏、道德堕落。他们是我们病弱民族躯体上的脓包……

耶稣基督根本不可能是犹太人。这无需我做科学的证明，就是如此！

问题出在此处，这一段内容是不是后来当这本书在纳粹党出版社出版时由作者加进去的补充部分呢？

弗里西群岛的人给米歇尔留下很深印象。

“我想在这个岛上当传教士向普通人讲解耶稣在山上对门徒的教训，不去管世间的事”。

他说这些居民是“正直的、自豪的”，妇女们身体“健康强壮，这些人的眼睛透着永恒的和谐”

米歇尔已成长为革命者。有时对赫尔塔谈他对卑鄙的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的仇恨。他说：

一个阶级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面对新的年青阶级的创造意志正准备退出历史舞台。正像工人阶级进入历史舞台一样，资产阶级必然退出。这与职业毫无关系。起最终决定作用的是感情立场。人们不想成为资产者，人们已是资产者！

一个阶级总是在激烈的革命动荡中战胜他之前的阶级

资产者，这是一个可怕的骂人话。

应捣毁没落的一切。

我们都是劳动革命的战士。

我们要取得无产阶级战胜金钱的胜利。

这就是社会主义。

可见现在他是社会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神话优等人种和耶稣基督（他不是犹太人，而是反犹太人主义者）的赞扬者。

伊万在写给他的信中说，他必须到慕尼黑来，慕尼黑是德国的令人感兴趣的都市。后来赫尔塔也写信来说，她在施瓦宾给他租了一个房间，她冬季学期也去慕尼黑。他与赫尔塔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看来是他虚荣心的需要。他的爱从来就不是明白单纯的。他把爱情称为“我的痛苦和我的解脱”。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他几乎不能没有爱情。这个米歇尔有着真正的戈培尔式的乐趣忍受痛苦和使人痛苦。“赫

尔塔·侯尔克因我受着很大痛苦”，这是他11月份一篇日记的简短记载。然后他们一起在山里度过圣诞节假期。

我感谢她，她是我的安慰和力量。”但几天后他写道：“我们因小事吵架伤了彼此的感情。”

12月30日的日记中只有一句话：“啊，山！啊，方石塔！”

米歇尔在这年的最后一天写道：我们的生活是犯罪和赎罪的锁链，受着按玄妙莫测规律支配的命运的安排。午夜12点的钟声已敲响，新的一年开始时，赫尔塔说：“你应是一个为祖国开辟道路的男子汉。

占卜时，我预示新一年的象征形状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

我们一直坐到深夜。

赫尔塔·侯尔克向我倾诉着她全部的心里话。

冬天剩下的时间里，米歇尔时而情绪高昂时而十分痛苦地写他的耶稣基督剧本。伊万的影响是很大的，米歇尔把他称作他的魔鬼。赫尔塔不喜欢这个俄国人。有一次她说：“我恨伊万·维努罗夫斯基。”她不能全部理解米歇尔的精神痛苦，甚至使他更痛苦。但是米歇尔超然于与他的姑娘的关系之外，不倦地编造着他革命的思想和世界政治的计划。1月15日

我们民族被迫戴上了枷锁。世界上的优等民族不得不像奴隶一样为其他民族效劳，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全体人民要起来造反，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可是遗憾的是：在上和下之间有道由自高自大、财产和文化教养构成的隔墙。我们相互不再理解。我们不是一个民族，而是愤怒地相互攻击的两个阵营。因此我们也就成了某些统治世界的强国手中的玩物。如果我们上下团结一致，那么世界就会属于我们。

但是我们决不通过空谈和决议达到此目的。

这种情况下必然掀起巨大的雷雨风暴。

我们必须从头开始。

一些人将高举旗帜，紧握仇和爱的利剑，开辟前进的道路。

高喊激起行动的口号。

共和国万岁！

人们在外面这样高喊。共和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德国万岁！德国的未来万岁！

而稍晚些时候他又很无生气地补充说“我想当指路人，我想为祖国服务。”这本小书的基本观点是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奇特的混合物，特别在米歇尔与伊万的戏剧性争吵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1月22日

“伊万·维努罗夫斯基，你想夺走我最后的所有——祖国。你想使我成为乞丐。”

“这只是暂时的痛苦。我要使你鼓起勇气为你的最后所有——祖国而牺牲。”

“我会绝望。”

“世界都在绝望。”

“我可能不再活着。”

“很多人都这么说，很少有人讲真话。”

“你是魔鬼。”

“只有一个撒旦是魔鬼。”

“我恨你！”

“这对我来说无所谓，但我不放过你，米歇尔。”

“为什么你单挑中了我？”

“你单纯、有热情，你是我们的希望。”

“我恳求你放了我。我要自己找到路。”

“你还处在旧的残余观念之中，你会走很大的弯路。你会耽误我很多的时间。”

“这就是说，你要让我停止做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人？你要我当你的奴隶？”

“是的！”

我站起来，他的脸色突然变白了，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

我不再独立自主。我一拳打在他脸的正中。

然后我疯了似的坐到沙发椅上。

伊万·维努罗夫斯基呆在那里成了哑巴。

突然他向我走来，抓住我的手，请求我的原谅。

或者，在两个相爱的人的谈话中也可以看出这本小书的基本观点是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混合物。

1月31日

“赫尔塔·侯克尔，你不理解我！”

“我不能理解你。”

“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彼此。”

“我还没有放弃希望。”

“一切都在我心中烧尽了。”

“因为你被别的热烈的感情所吸引。”

“我不能抗拒。”

“你必须这么做，你才会又找到自我。”

“你不能离开我。”

“如果你不离开你自己（不失去自我），我就不离开你。”

这段爱情结束了。三月份米歇尔收到赫尔塔写来的下面这封信：3月16日

“我的生活只是因你而不幸。你让我尝到了最苦的滋味。比如从你信中流露出的所有焦虑不安中，我感觉到不幸。这是最糟糕的事。为什么我们再不能相互理解了呢？我就是我，这难道是我的错吗？

我不得不这样做，你听着，我别无选择。我非常爱你。正因为如此，你给我造成的痛苦是极大的。如果你绝望了，那么我不得不和你一起绝望，我不再有任何可以求助的东西。

赫尔塔·侯尔克

后来他又到山里去了，回来后他发现了赫尔塔的分手信。他失望地跑到她的住处，但她走了，没人知道她到哪里去了。

而后突然有件事使他猛烈醒悟。本书引录的是两个章节中的第一章，在这两个章节中出现了一个不知姓名的救世主式的人物。显而易见，这是一位出自运动最初时期加以理想化的希特勒式人物。米歇尔偶然地参加了一次政治集会，在那里他亲眼见到了一位不寻常的、简直有磁石般吸引力的演说家。4月27日

我坐在从未来过的大厅里。在一群陌生的人中间。贫穷的、忧虑的人们。工人、士兵、军官、学生。这就是战后的德国人民。穿着破旧的撕烂了的制服，肮脏褴褛的军装上留着大战的痕迹。我看着这一切，像在梦中。

我几乎没有发觉，一个人突然站在高处，开始讲话。最初，当他寻找表达某些事的合适的话时，他讲话结结巴巴，有些胆怯，因为这些事太大，不能用简单的形式表达。

这时，突然他的讲话开始像决堤的河水奔涌而出。我被深深吸引，侧耳细听。台上的演讲人越讲越快，像神赋予他力量。

荣誉？工作？旗帜？我听到了什么？这些东西在上帝撒手不管的人民中间还存在吗？人们开始激动起来。肮脏苍白的脸上闪着希望的光。这时有个人站起来，高高举起紧握的拳头。坐在我身边的那个人好像衣领系得太紧，脑门上全是汗，他用衣袖抹去汗水。

在我左边第二个座位上坐着一位老军官，他像孩子般哭着。

我感到忽冷忽热。

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突然觉得像听到了大炮的轰鸣声。像在云雾之中，我看见几个士兵突然站起来，喊着“好哇，乌拉！”没有人注意到这些。

上面的人讲着话，他用一块块方石垒起未来的大厦（描绘着未来）。多年来在我心中所想的在这里变成了具体的形象，明确的形式。

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

废墟中站着一个人，高高举起一面旗帜。

突然我觉得周围的人不再陌生。大家都是兄弟。那边一位身着旧军装的人冲着我笑，无缘无故地对我说“战友”。

我觉得我必须要站起来大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战友，我们要站在一起！”

我几乎无法自制。

我走向，不，我被拥到讲台旁边。我长时间地站在那里，看着台上那个人的脸。

他不是演说家，他是预言家！

他脑门上淌着汗，一双灼热的眼睛在他苍白的脸上闪闪发光。他双拳紧握。

像上帝最后的宣判，字字句句像雷鸣般震撼人心。

我无法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像疯了一样。

我高喊“好哇！乌拉！”没人感到惊奇。

台上那个人注视了我一会儿。那双蓝眼睛像一团火触到了我。这就是命令！

从这一时刻起我得到了新生。

我像是脱胎换骨一样，成了新人！

我知道，我的路通向何方。思想成熟的路。

此刻我再也听不到别的，我陶醉了。

我一下子站到高处，站在一把椅子上，在人群之上，我激动地大喊：“战友们！自由！”

我说不出生在此之后都发生了什么事。

我只知道，当时我把我的手放到一只有力的大手中。这是为生命许愿（发誓）我深情地盯着他那双蓝色的大眼睛

在这次经历的巨大影响下，米歇尔很奇怪地决定离开慕尼黑，没告诉他任何一位朋友。他到海德堡去，在那里他“数小时久地坐着，迟迟不作决定。”那位不知道姓名的演说家本能地征服了米歇尔，这真让

人惊奇。也许戈培尔想证实：通过与救世主的第一次相遇，通过救世主的力量的震惊作用，使他笔下主人公的精神上的虚无主义受到了一次打击。不管怎样，令人感兴趣的是，根据由戈培尔赋以灵感的那些传说，他自称在1922年6月第一次听到希特勒的讲话。这正是他写《米歇尔》的时间。

文体上的区别、在构思方面表现手法的突变和对戈培尔机会主义的了解，这些都使这种猜测很近情理，即上面所引用的“希特勒讲话的片断”，如同下面有关米歇尔与救世主第二次会面的报道一样，都是由纳粹党省党部领导人戈培尔硬凑起来的。在他当时写的与希特勒真正会面的日记中，戈培尔谈到这位元首的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蓝眼睛。特别重要的是，在第一个“希特勒讲话片断”的结尾处，米歇尔的眼睛也是深情地看着那双蓝色的大眼睛。

米歇尔至少是犹豫不定的。他每天晚上读耶稣在山上对门徒的教训，但是从中他找到的不是“安慰，而是绝望和羞愧”。然而他也有英勇的心血来潮

我戴上钢盔，抽出军刀，口中朗读着利林克罗思(Liliencron)的诗。

有时我特别心血来潮。

当兵！站岗放哨！

人们永远要当战士。

一名为他的人民的革命服务的战士。那时，米歇尔对工人问题作了许多思考，在他的日记中写道7月2日

相反，工人阶级必须完成一个历史使命，首先是在德国。必须彻底解放德国人民。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使命。如果德国毁灭了，世界之光就会熄灭。

从现在起，米歇尔的生涯与里夏德·弗里斯格斯的命运是一致的。米歇尔离开大学，成了一名矿工。他住在一户矿工家的无陈设的小屋里，屋内除了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外，别无其他陈设。他只带去了两本书，一本圣经，一本浮士德。他依靠自己双手的劳动过着

很自豪也很孤独的生活。他还一直爱着赫尔塔——“我爱过赫尔塔·侯尔克，我将会永远爱她，但她不是能够理解我的战友。”

最后，米歇尔——完全像弗里斯格斯一样——让人转到巴伐利亚的一个矿井，在去矿井的路上，在慕尼黑，他又听到了那位不知姓名的演说家的演讲。12月10日

晚上，我坐在大厅里许许多多的人中间，我又见到了他——使我觉醒的人。

现在他站在一群虔诚的追随者中间。我几乎没能再认出他来。他的簿据垢按？我坐在人群中，但我觉得好像他只冲着我一个人讲话。

关于劳动的收获！人们在这里把我曾感觉到的、忍受和感受过的东西用语言表达出来。我的信仰！它在这里形成。

把劳动当作救世主！不是金钱、劳动和斗争解放了我们、你和我、我们大家，而是我们大家使祖国获得自由。

我感到非常融洽和睦。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现在，年轻的德国站起来了，工人们，是他们锻造出帝国。还有铁砧，铁锤！

这里是我的位置！

当互不相让时，我要站在这里。

我们大家必须要成熟起来。只有当少数人比多数人更好时，少数人才能获胜。

坐在我周围的人都是我从未见过的，当我在悄悄流泪时，我像小孩子一样感到不好意思。

十月里他听说已返回俄国的伊万成了一次政治谋杀的牺牲品。米歇尔在他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他的房东恳求他别下井了。她梦到过他被石头砸死了。米歇尔嘲笑她。恰恰和弗里斯格斯一样，他也在一次矿井事故中丧生。以一位矿工写给赫尔塔·侯尔克的信作为终曲，他在信中描述了米歇尔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是怎么死的，嘴上带着笑意在他的口袋里人们发现了尼采的“索罗亚斯德”，其中有两句话用红笔重重地划了两杠：“许多人死得太晚，而少数人又死得太早。教训听起来是陌生的：要适时地去死！”

当戈培尔遭受频仍不断的挫折，处于穷窘交加的处境时，他还根本不是国社党人。戈培尔在为学生上拉丁文补习课得到一点微薄的收入，他还得靠父亲来养活自己，而他的父亲要用每月只有三百马克的工资来养活六口人。戈培尔每天都在为此深感羞辱。他有时甚至会对这位已经不应称做爸爸而应称为慈善家的生身父亲产生一股无名怒火。

1924年，戈培尔加入了国社党。这是因为他们为此向他提供了一个工作岗位，让他担任一家每周六发行的《民族自由报》编辑，每月有上百马克。这对于失业贫困的戈培尔来说，薪金不算少。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岗位。就在同一时期，希特勒正在兰茨贝格一个舒适的堡垒监禁中——他还从未住过这样好的地方——撰写《我的奋斗》。

这时，一个名叫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青年人在纳粹运动中突然抬了头。他比希特勒小三岁，但是他同希特勒一样，也得到过一枚铁十字奖章，在战争中从一个普通士兵提升为中尉军官。他在1920年加入纳粹党，不久就成了下巴伐利亚的纳粹党区领袖。他精力过人，有演说才能和组织才能，在精神和思想上都极其有独立性。他拒绝向希特勒低头，不顾在狱中的希特勒的反对，施特拉塞同鲁登道夫和罗森堡一起组织了一个纳粹党的人民运动，参加1924年春天的邦和全国选举。在巴伐利亚，纳粹得到了足够的选票，成了邦内第二大党，在德国，施特拉塞又在国会中取得了一个席位。

几个月后，施特拉塞在柏林创办了一张报纸，名叫《柏林工人日报》，由他的兄弟主编；还有一份双周刊《国社党通讯》，供党内工作人员阅读，内容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此外他还在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和工业地区莱因兰奠定了政治组织的基础。他在北方到处奔走，发表演讲，指派区领袖，建立党机器。有一次，施特拉塞在会上听了戈培尔的发言，认为这样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是他可以利用的人。戈培尔这时年方28岁，已是一个激烈的演说家，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有一支锋利的文笔，而且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而最后这一点在纳粹党领袖中可谓凤毛麟角。当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刚刚辞去施特拉塞秘书的职务去一心养鸡。施特拉塞就派戈培尔接替，并任命戈培尔兼《国社党通讯》主编。于是戈培尔暂时投靠了施特拉塞，而没有投靠希特勒。但事实证明，这对戈培尔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三、找到主子

尽管戈培尔的法西斯生涯后来很有发迹，但其初始，他仅仅是为生活所迫和出于好奇心而涉足政治的。

1923年冬天，戈培尔走向了政治，他的朋友普朗作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经常在慕尼黑，他从那儿带来纳粹的刊物、小册子和报纸。戈培尔越来越有兴趣经常翻阅这些读物。有一天晚上，普朗带戈培尔和其他几个朋友去参加一个政治集会，这是由一个左翼政党举办的，普朗也不清楚到底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共产党。普朗和朋友们鼓励戈培尔在辩论中发言。约瑟夫·戈培尔犹豫地一拐一拐地走上讲台。由于他很瘦而那件上衣又过于肥大，使他的形象十分滑稽。因为他被一位集会领导人作为辩论发言人介绍说他想按“民族”的意愿讲点什么，所以他受到的欢迎是口哨声。当集会领导人使会场又安静下来之后，戈培尔开始讲话。

“我亲爱的德意志民族的同志们”，他以那种尖锐的方式讲话，以后他又上千次地使用过这种称呼。这的确是一种所说的“民族的腔调”。大会报以经久不息的笑声、响亮的口哨和呼喊声。戈培尔很窘迫地站在那里，没有能力用他的声音压倒这种闹声。那位集会领导人也有好几分钟不能使会场安静下来。但是，当一个呼喊者好几次叫着“资本主义的剥削者”时，戈培尔发怒了。自己口袋里装着什么，凭什么受这样的侮辱？这位天赋的演说家的本能被唤醒了。突然，他知道怎样对付这个叫喊者了。集会领导人把喧哗稍微压了下去，戈培尔大声喊道：

“我请那位把我称作资本主义剥削者的先生到讲台上来，把他的钱夹子的钱都掏出来。那么我们会看到，我们之中谁的钱多。”

说着，他掏出他自己破旧的钱包，把几个10芬尼的硬币倒在讲台上。这样他用幽默诙谐的话把听众争取到他自己一边，得以把他那几句话讲完。这是一次政治宣传者的火的洗礼

渐渐地戈培尔对政治，特别是对那些“民族的”政党发生兴趣。他时常陪普朗去参加集会，他甚至作为他那些富有的朋友们的客人参加了所有的民族的党派于1923 ~ 1924年冬季在魏玛举行的大会。这些大

会的组织及其群众的呼吁给他留下的印象比当时发表的沙文主义思想和感觉还要深刻。

在戈培尔不断地寻找一个赖以生存的工作时，有一天谋到一个直接把他带入政界的秘书职位。帝国国会议员弗兰茨·冯·维格斯豪斯以每月100马克的薪水聘用了他。维格斯豪斯是许多极右团体中一个名叫“民族自由党”的议员维格斯豪斯住在埃尔伯费尔德，在那里发行他那个小派别的机关刊物“民族自由”报。戈培尔可以参与这个小报的工作，有时也可以在一些政治集会上发言这时他第一次接触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年轻的戈培尔被纳粹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联合体所吸引，年底时他出现在卡尔·考夫曼那里。考夫曼当时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莱茵兰—威斯特法伦省党部领导人他同格雷戈尔和奥托·施特拉塞兄弟俩商谈聘人的事，因为格雷戈尔当时是希特勒身边的领导人物，在德国北部是原来的党的领导人。施特拉塞兄弟打算在埃尔伯费尔德出版一个周刊，计划把它作为该党的思想的领导刊物”。该杂志名叫《民族社会主义通信》，由格雷戈尔负责出版发行，奥托负责编辑、校对，还要找一个能干的助理编辑。考夫曼向施特拉塞兄弟谈起那位已在他那里报了名的年轻人。经过商量决定，最后聘用了戈培尔，月薪200马克，在考夫曼的党的办公室任秘书，同时在施特拉塞兄弟编辑部当助理编辑。几天以后，这兄弟俩考查了这位新手戈培尔穿着一件灰色的西服，有点磨损，却异常干净。虽然已是深秋，但他却没穿大衣没戴帽子，他表现出引人注目的自信。他用棕色的大眼睛打量着这两位新上司，沉着地用尖锐的言词宣布说，“民族自由党”根本没有政治前途。

“那个党的领导人不了解人民”，“他们害怕社会主义。可是，我们坚信，只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才能拯救德国。”

施特拉塞注意到当戈培尔使用“我们”这个词时好像他已经属于他们之列的那种自鸣得意的样子。然后戈培尔继续讲：“我们将为民族社会主义赢得德国工人，我们将消灭马克思主义。”

他的眼睛闪着光，挥动着他那双漂亮的手做出狂热的手势，他用尽一切办法使施特拉塞兄弟俩确信，他是那个职位空缺最合适的人选。“至于资产阶级的糟粕”，他最后说，“我们将把它扔进垃圾桶。”

使施特拉塞兄弟俩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个年轻人的声音，他善于精湛地利用他的声音的转调能力。后来决定，戈培尔除了他的另一些工作之外还为施特拉塞兄弟俩做秘书工作。刚刚有一位年轻人由于不能干而在这个职位上被解雇。他的名字叫海因利希·希姆莱1926年德国两大事件引起了人们和各政党宣传机构的关注。一是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二是关于有补偿地没收贵族财产的议会辩论。在这一问题上，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希特勒开始还举棋不定，最后站到了他的贵族朋友一边。后来至少有一个霍恩措伦王室的王子和其他一些贵族的成员加入了纳粹党，使得纳粹党沾上了几分“上流社会的文雅”。纳粹党的左翼力量，主要是埃尔伯费尔德圈子里的施特拉塞、考夫曼以及当时的戈培尔。这些人观点和德国社会党、德国共产党一样，赞成无补偿地没收贵族的财产。为此，这位纳粹党的秘书戈培尔博士多次发表了蛊惑人心的演讲。这不仅使他在自己的纳粹党州分部，而且逐渐在整个帝国名声大噪，成了出色的演说家。

作为“巡回演说家”的戈培尔，尽管四处演讲非常繁忙，但为了那微薄的200马克工资他还得工作。他主要是在施特拉塞兄弟办的《国社党通讯》当助理编辑，还协助纳粹党部头目卡尔·考夫曼做一些组织工作。

戈培尔和纳粹党的关系最初是受了卡尔·考夫曼和施特拉塞兄弟俩的影响。他们创办了一份新的刊物，刊名叫《国社党通讯》，于1925年10月首次出版。戈培尔参加了该刊物的编辑工作。他当时已认为自己是世界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施特拉塞是出版人，我是主编”，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如果没有背景知识，在阅读戈培尔在埃尔伯费尔德时期的日记后，就会不假思索地把考夫曼抛在一边，而认为戈培尔是继帝国组织头目施特拉塞后的纳粹党分部的最重要人物。实际上，当时戈培尔几乎没有什么威信，只不过是一个站在讲台上演讲的人。那时的戈培尔完全赞成施特拉塞的国家社会主义激进思想，主要是因为他暂时还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寻求到一种施展其才能和满足他虚荣心的可能性。

1925年10月戈培尔写道：“与施特拉塞就有争议的所有问题作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我们完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施特拉塞说：他真了

不起，讲话中穿插着许许多多嘲讽”。在另一篇日记里戈培尔写道：“施特拉塞不是我认为的那种人。”11月戈培尔在柏林逗留了几天，施特拉塞的兄弟奥托又得到了他的赞扬：“施特拉塞的兄弟奥托同样也是一个可爱的家伙，我想与他交朋友。”此外，在他这次柏林短暂逗留期间，戈培尔在与鲁登道夫作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之后，鲁登道夫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2月考夫曼和施特拉塞起草一份新的党纲。戈培尔有时也参加意见，但从他的日记看来，似乎是他们在无望时求他帮助，是他一个人在拍板定音“施特拉塞拟的草稿不能令人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还在下面画了横线。而在几个星期后，他又一反常态，对施特拉塞深表敬佩。1926年3月他写道，施特拉塞是“一个诚实能干的巴伐利亚人”，“我很喜欢他”。当戈培尔后来进入希特勒的私人圈子以后，对施特拉塞就变得尖刻了。

戈培尔和他原来的上司、纳粹党区的头目考夫曼也很快就建立了友谊。1925年10月戈培尔写道：“在办公室我发现了一封考夫曼祝贺我生日的信。一个多么热情友好的朋友！对此我感到特别高兴。”然后用诗一样的格式写道：

“艾尔西——我漂亮的爱人！

考夫曼——我忠实的同志！

谁说我还贫穷！？”

因为考夫曼和他的这位部下共用一间办公室，他们之间不久便产生了摩擦并互耍手腕。在1925年11月戈培尔就已经开始了他与考夫曼之间的冲突。从1926年1月的日记里可看出戈培尔对他的上司那种倨傲而宽容的态度：“我为我的朋友考夫曼担忧。他太放纵了。我或许能够帮助他……”几天后他又写道：“考夫曼心肠太好了，太重感情了。”1926年2月1日的日记里只单独记下了这些话：

考夫曼没有像对待朋友一样地对待我，肯定是埃尔布雷希特在背后捣鬼。在这儿我的手脚被束缚住了。今天下午与卡尔·考夫曼进行了令人不愉快的交谈……”两天以后：“与考夫曼长谈。他很痛苦，但他对我很好，刚才有人给我打了电话，卡尔病了。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得关心这件事。”33年后当卡尔·考夫曼看了他当时的秘书写的

日记后，感到很吃惊，甚至有时对戈培尔那自鸣得意和发疯的腔调而感到惊愕。在他的日记中戈培尔是一个认真的雄心勃勃的人，如果没有充斥在他日记里的那些“愚蠢的胡闹”就好了。考夫曼把他的秘书描述为一个确实很讨人喜欢的、有时还很有魅力、几乎总在狂热地工作的人。当然他也是一个让人无法忍受的诡计多端的人如果有人不管有什么问题不请教他而去征求埃尔布雷希特，那他就会像一个醋意大发的主角女演员一样耿耿于怀。

在戈培尔日记中常出现对“阴险的敌人”埃尔布雷希特的长篇漫骂和攻击后来埃尔布雷希特博士在杜塞尔多夫读了日记里大量的恼羞成怒的词句后，和考夫曼一样认为，这些诽谤之词是由于刺伤了戈培尔的虚荣心所致。“我当时或许低估了戈培尔”，他从来就没有特别喜欢过戈培尔。他觉得戈培尔太饶舌和夸夸其谈了。考夫曼认为，埃尔布雷希特与戈培尔之间的争论与不和，或许与他们间六至七岁的年龄差有关无疑是戈培尔感觉到自己被这位比他年长和成熟的男人所战胜但在日记里戈培尔把他们之间出现的一切危机和困难，如果不是虚构的话，几乎全怪罪于自己。他常常把不大点儿的事看成是问题，而为此“内部的分歧”而担忧。然而，考夫曼在党内外以“严肃的交谈”方式，重新调解好这些内部的意见分歧。

1926年2月3日，戈培尔写道：“我与考夫曼长谈，他很痛苦，当然这都要怪他自己。”几天以后，他又一反常态。1926年2月，希特勒和施特拉塞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意见分歧，为此人们把戈培尔找来商谈。戈培尔在日记里满意地写道，他和考夫曼完全说了心里话，他把“整个心”都掏出来了，“我真想拥抱他”。可是两个月之后，1926年4月他又怀疑考夫曼在嫉妒自己在演讲方面取得的成就。在这段时间前后，他开始在内心想与施特拉塞和考夫曼分道扬镳。他已经看出，在希特勒身边他即将会得到更多的赞扬和荣誉。戈培尔生性轻信他所喜欢和崇拜的人非常善于网罗人才的希特勒很快发现了这位新上任的纳粹党的演讲家的这一弱点，投其所好抓住每一次机会，恭维戈培尔，把他拉向自己的一边。

考夫曼和施特拉塞则与此相反，他们已逐渐厌倦了戈培尔的那些阴谋诡计和自命不凡。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认识到，一个如此天才的演说家对于他们的事业是何等重要他能够对那个资产阶级的社会

痛加斥骂。即使是戈培尔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希特勒分子和极端的机会主义者之后，也仍然没有褪去那种年轻的激进主义的痕迹。

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鲁尔区，以后也在德国的其他地方聆听他讲演。在班堡群众集会上，戈培尔进入会场，迎接他的是雷鸣般的掌声。戈培尔讲话时，听众们虔诚得就像是坐在教堂里。戈培尔传教”两小时之久，会场上鸦雀无声，结束时大家欢呼着几乎要把戈培尔举起来。“我累得精疲力尽……”戈培尔自己写：“一次空前激动人心的集会。我就像从水里钻出来一样……晚上在兰茨胡特演讲……大家都激动得要发狂了。几位非常年轻的女性，发疯似的向我拥来。”

连驯服的本诺这条狗，也欣赏它的这位主人和演说大师。“昨晚在杜塞尔多夫讲演，带着本诺。这个长长嘴巴的小东西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好像在很有兴味地倾听。”

戈培尔年轻时喜欢演戏。实际上，一些重要讲话他都事先像演员一样进行排练。他所追求的，是个人给观众的印象而非其论据产生的效果。他谈的话仅仅是通往目的的手段。其目的是迷惑公众，尽量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迫切希望得到众人的赞赏，几乎每页都要写自己取得了一些什么成绩，偶尔才以憎恶的口气提到有些听众对他的演讲艺术不以为然、不感兴趣或者干脆表现出厌烦。戈培尔总是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势，以尖刻的嘲弄语气评论党内其他派别的发言人。听了一次他认为是特别无聊的报告之后，他在日记中写：“这样，干不成任何革命，缺少那么一口香槟。”另一次又写道：“我谢绝了讲话，另外那个人则在胡说八道。”

“那口香槟”是指像他那唤醒听众的口才。他喜欢经常造成轰动效应。戈培尔在日记中一再提到与共产党人的街头争战和大厅动武，提到通常由他的追随者挑起的混战。1925年11月23日他写的是在克姆尼茨发生的一次野蛮的群殴：“2000共产党人。嘘声一片。1000个啤酒罐被打碎。150名伤员，30人重伤，2人死亡……”这些数字无疑是夸大了的。无论如何，只要戈培尔讲话，警察必然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干预，有时勒令解散，戈培尔本人也因侵害住宅安宁而受到控告。这对他毫无妨碍，甚至还使他感到兴高采烈。真正能打击他的是严禁其公开演讲。“如此众多的德国城市在为了我们的事业而流血。”

当警察又在慕尼黑兴师动众时，他认为这正是要达到的目的。他评论说：“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斗争”，“人们会因此了解我们。”

有趣的是他常使用“传教”这个词。“我想做一名信徒和传教士”。这位抛弃了其童年信仰的叛逆者，仍然要提炉焚香。埃尔伯费尔德的这位信徒，首先传布的是施特拉塞的教义。他坚决维护本派的政策，既反对慕尼黑派，也反对希特勒本人。他在1925年9月写道：“慕尼黑正在发出阵阵恶臭”，“慕尼黑都是些骗子、无赖在那里为非作歹。一群容不得身边有智慧的头脑的笨蛋，所以他们反对施特拉塞和我……连考夫曼也失去了信心。看来，我非得去一趟慕尼黑不可……”好像他一个人就可以在那里包打天下。但是这种傲慢情绪似乎没有持续多久。10月份他就写了：

慕尼黑来电，要我在那儿讲话，他们可以拍我的马屁了！”他在几天之后写道：“昨晚与考夫曼在埃森，尤利乌斯·施特莱歇这位纽伦堡的英雄也在那里一个跟在屁股后面的吹鼓手！可怜的希特勒！可怜的纳粹！”这可以作为他反对希特勒周围的那帮暴徒的佐证。

希特勒是否要来埃尔伯费尔德与运动中的“社会主义者”谈心，希特勒是今天还是明天来？尚无确切消息”。“希特勒不来了。他埋怨我。他要是再责备我，我就甩开这个破烂货。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人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得到的竟然只有责备，而且这些责备甚至来自希特勒本人！在慕尼黑又是那些马屁精和阴谋家们在胡作非为，他们都想挑剔我和施特拉塞的毛病……”他洋洋洒洒，日复一日地写着。尽管戈培尔当时地位低微，却总是把自己视为领导。

投靠希特勒

尽管早在1922年6月，在慕尼黑皇冠马戏场第一次听希特勒演讲后，戈培尔惊叹道：“那时我仿佛是再生了！现在我找到了应该走的道路……这是一个命令！”他对于希特勒在慕尼黑政变案审讯时的表现更加心醉神迷。在判决后，戈培尔写信给希特勒道：“你像一颗初升的明星，出现在我们惊异的眼前，你所表现的奇迹廓清了我的思想，而且在一个充满怀疑和绝望情绪的世界里，给了我们信仰。你高高在群众之上，充满信心，掌握未来，有着坚强的意志，要用你对所有相信新德国的人的无限热爱来解放群众。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以雪亮的眼

睛看到了一个人从那利欲熏心的人的脸上，从那些庸庸碌碌的议会里的好事之徒脸上，把他们的假面具撕掉……

在慕尼黑法庭上，你在我面前表现了元首的伟大。你所说的话是俾斯麦以来德国境内的最伟大的话你所表示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痛苦……你提出了整个一代人的需要，这一代人在苦苦寻求领袖和任务。你所说的话是新的政治信仰的大纲，这种政治信仰是在一个崩溃的、无神的世界的绝望中产生的，我们都要感谢你。有一天，德国也要感谢你……”

可是现在戈培尔紧紧随随的主子是施特拉塞。

吸引戈培尔的是施特拉塞的激进态度，是他信奉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们两个人都想依靠无产阶级来建设纳粹党在这个时期，戈培尔的日记中到处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表示。1925年10月23日，他写道：“归根结底，我们与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受奴役，不如在布尔什维主义制度下结束我们的生存。”1926年1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纳粹党人）同共产党人自相残杀，我认为是件可怕的事……我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够同共产党领导人聚在一起谈谈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发表了一封致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向后者保证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是一回事。“你和我，相互反对，但是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敌人。”

在希特勒看来，这完全是异端邪说。施特拉塞兄弟和戈培尔在北方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激进的纳粹党左翼力量，使他感到越来越不安。因为如果这样下去，施特拉塞很有可能把整个党都抓过去。摊牌成为不可避免，1925年秋天和次年2月间，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建议共和国征用和接管退位的各王公贵族的大庄园和财产。按照魏玛共和国宪法，这个问题要交付公民投票来决定。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建议，纳粹党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支持这个征用贵族财产的运动。希特勒闻讯大怒。如果施特拉塞和戈培尔的计划得逞，希特勒的收入来源可能马上枯竭。这些前统治者有不少人曾经给纳粹党捐助了款项，而且有一些大工业家也开始在经济上对希特勒的新生的运动越来越表示关心。

1925年11月22日，施特拉塞不顾希特勒的反对，在汉诺威召开了北方党的区一级领导人会议。要求北方的纳粹党支持征用运动，废除1920年通过的“反动的”二十五点纲领，提出一个新的纲领，把大工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按照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方式组织一个社团院来代替国会。希特勒拒绝出席会议，派了忠于他的弗德尔代表他去镇压反叛者。戈培尔大声叫嚷：“我们不需要奸细密探！”他要求把弗德尔轰出去。当弗德尔和科隆区纳粹党领袖莱伊声称，这次会议是不合程序的，没有最高领袖希特勒在场，什么行动都不能采取时，戈培尔叫道：“我要求把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开除出纳粹党！”

戈培尔的提议，引起极大轰动。大会主席格里戈尔·施特拉塞没有将之付诸辩论，而是立即以“过急”和“过分”的理由加以拒绝。会议开了好几个小时，希特勒的代表特弗里德·菲德尔始终一言不发，直到最后结束时，他才说会议可能会产生令人不愉快的后果。后来，在莱伊和佛德尔的反对下，汉诺威会议通过了施特拉塞的新党纲，批准了在要求实行公民投票剥夺前王公贵族的财产的运动中同马克思主义者携手的决定。

戈培尔在日记中提到了这次大会，极为得意，自我吹嘘道：“然后我就开始讲话……讲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屏气，倾听，然后就热烈地表示赞同……我们胜利了……会终，施特拉塞和我握手，菲德尔低声下气卑躬屈膝。”

那段时间里，无论讲话还是写文章，戈培尔都认为，虽然德国共产党一时被引入歧途，但将来共产党人与革命党特别是纳粹联盟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对施特拉塞的观点进行真正戈培尔式的引申。

如果我们按照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的利益行事，戈培尔在《国社党通讯》中写道，“我们将一事无成。但是，如果我们向饥饿和失望的群众进行呼吁，我们将赢得一切。”戈培尔在《人民观察家》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苏维埃制度之所以站得住脚，不是因为它是布尔什维克的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是国际的，而是因为它是民族的，是俄罗斯的。”

戈培尔这种态度很讨施特拉塞兄弟欢心。当然，希特勒对此不会高兴。这事关戈培尔实现其权力的大政方针，他很快就明白了，如果

想要在夺取权力的斗争中获得成功，必须向希特勒一边靠拢。饥饿的无产阶级在他的心目中退到了次要地位。这样，当1926年希特勒进行反击时，戈培尔他们就屈服了。这一年2月14日，希特勒在班堡召开了一次会议，北方领袖只有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前来参加。戈培尔他们放弃了他们1925年才通过的纲领。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戈培尔在表面上已公开背弃了施特拉塞，倒向了希特勒一边。只是他在1926年2月16日的日记中仍然在咒骂希特勒。他说：

希特勒谈了两小时。我觉得好像有人揍了我一顿一般。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希特勒呢？一个反动派吗？非常笨拙、不稳。……我对希特勒再也不能完全信了。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我脚下的支柱给抽掉了。”

但是希特勒没有低估戈培尔的才华。3月29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又说道：“今日接到希特勒来信。他要我在4月8日在慕尼黑发表演讲。”戈培尔在4月7日到达慕尼黑。4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希特勒打电话来……在班堡会议以后他不提前嫌使我们感到惭愧……二点钟我们驱车前往贝格勃劳凯勒酒店。希特勒已经在那里了。我兴奋之极，心快要跳出来了。我进大厅，欢声震耳……我讲了两个半小时……听众欢叫。最后希特勒拥抱了我。我感到很快活……希特勒一直在我身边。”

4月13日，戈培尔则在日记中说：“希特勒讲了三个小时。精彩之极。他能够使你怀疑自己的看法。意大利和英格兰是我们的盟友。俄罗斯要想鲸吞我们……我敬爱他……他把什么事情都想过了。他的理想一个公正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至于土地——一切属于人民。生产必须是创造性的和个人主义的。托拉斯、运输等等要社会化……我现在对他完全放心了……我向这个伟大的人物、政治的天才鞠躬致敬。”

“希特勒万岁！”

过了几天：“……很愿意希特勒作为我的朋友。他的照片放在我的写字台上，我几乎不能容忍怀疑这个人。晚安！”

在班堡，戈培尔虽为反对派一方，但他显然被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吸引。确切地说，是希特勒迎合这位年轻人的虚荣心的手段开始获得成功。

2月15日，即会后第二天，戈培尔写道：“.....希特勒讲了两个小时，我就像挨了一顿打。这是怎样的一个希特勒呀？一个反革命分子！笨得出奇，而且不可靠。在俄罗斯问题上完全错了。说意大利和英国是天然盟友。太可怕了！认为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要给贵族补偿！法权就是法权！不能碰贵族的私有财产！

“太可怕了！

“那个党内已经够了！满意了。弗德尔点头。莱伊点头。施特莱歇点头。埃瑟尔点头.....

“在上流社会看到你的，真使我内心痛苦！”

在引用《浮士德》之后，他继续写道：

“短时间辩论。施特拉塞发言，结结巴巴，吭吭哧哧的。老实的施特拉塞，你这个好人。天哪！你可再也不是这个人的对手了。

“四小时的演讲之后是半小时的辩论！”

前面他说是两小时，现在希特勒的演讲又成了四小时。不管多长，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只是讲他自己的论纲，根本不考虑反对派的立场。接着是短暂无力的辩论。和人们预料的相反，戈培尔根本没有参加辩论。他日记里写的是：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像挨了当头一棒。”

“乘汽车去火车站。施特拉塞烦躁不安！我心里真难受！”

“与施特拉塞分手。后天在柏林我们不会见面。我想哭！”

“返家，悲哀的返家之行。与莱伊博士在一起。”

“我几乎一句话也没说。可怕的一夜大概是我一生中最失望的一件事。”

“我再也不完全相信希特勒了这才是最可怕的我的精神支柱完全垮掉了.....”

为了在一次会上发言，戈培尔前一天就被召到班堡。讲演后，希特勒派人向他祝贺，满足戈培尔的虚荣心。这也又一次证明了希特勒善于笼络人心

但是戈培尔当初是以政治观点相对的身份参加会议。考夫曼在埃尔伯费尔德脱不开身，因此决定由戈培尔代替他，协助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为本派观点进行辩护。戈培尔似乎对这个任务不大感兴趣。在日记中，戈培尔写得很简单：“我不得不跟着去班堡。”隔了几行，似乎又给自己打气说：“再也没有任何人相信慕尼黑那一派了。德国社会主义的麦加是埃尔伯费尔德。”接着继续写道：“在班堡。我们必须把希特勒吸引到我们这一方。”对此，他显然没有多大把握。在汉诺威作为煽动性讲话曾使他很兴高采烈，因为他知道在他的身后是大多数支持者，肯定可以得到赞赏；而在班堡，他要面对的可是大多数反对者。

可是班堡会议中戈培尔却又那么露骨地赞美希特勒，可以说那时候他已经站到了希特勒一边，成了希特勒的人，真是善变之极。可是戈培尔的功夫又不仅于此，他不仅朝三暮四，还善于两面三刀。班堡辩论过后没几天，施特拉塞就从柏林火车站接回戈培尔。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提到，“施特拉塞完全又回到了老样子”，他已“恢复常态”。他们打算跟考夫曼一起再去一次希特勒那儿，以便心平气和地全面讨论一下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

戈培尔在日记中倨傲地称慕尼黑派是“政治孩童”，“我们则相反”，“我们有着使命感，是历史之子……这就是我们！”但是使戈培尔赞叹不已的，是这些慕尼黑的“孩童”有的是钱，气派完全不同于寒酸的埃尔伯费尔德派。希特勒住在一套舒适的五居室房子里，拥有一辆带司机的汽车。只领200马克薪水的戈培尔认为，在埃尔伯费尔德，大家不懂得给他的工作热情以应有的评价。就此，他向考夫曼及其他人诉苦，用贬低不在场的纳粹分子的方式抬高自己。如果戈培尔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施展他的“口才”，反倒是纳粹分子值得庆幸的一件事。而戈培尔自己则认为：“我在埃尔伯费尔德是不可或缺的。”

希特勒从那时起就开始有计划地使戈培尔从埃尔伯费尔德一派中分化出来。他让戈培尔在整个德国作为会议发言人登场，经常把他接到巴伐利亚。四月份，戈培尔与考夫曼一起去慕尼黑，希特勒派人开车到火车站去接他们，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这样描写希特勒提供给他的享受的：“……到油煎香肠馆，香肠加啤酒，这就是慕尼黑的生活！舒适惬意！的确是一座美妙的城市！阳光明媚……回到旅馆。希特勒打过电话，说想要欢迎我们。一刻钟之后他就到了，

高大、健壮，充满活力。我很喜欢他。”隔几行又写到：“……他对我那么友好。下午把他的汽车给我用……去施塔尔恩堡，以100公里的速度呼啸而行，阳光灿烂。”为了收买戈培尔，通常都是让他在组织得很好的大会上发两次言。第二次发言时，希特勒甚至亲自到场。掌声是“经久不息”，“希特勒拥抱我，我热泪盈眶。我一生中前所未有的幸福。穿过人群，走向等候的汽车。雷鸣般的欢呼声”。没过多久，他被允许再次登场，希特勒充分了解这个人的特点。戈培尔在日记里吹嘘：

“希特勒已到，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我进入大厅。欢声雷动。”

“人挤人，头挨头。”

“我讲了四个半小时。全力以赴。人声鼎沸。”

戈培尔又是眼含热泪，又是“从激动的人群中穿过，走向汽车。”

后来他被允许与希特勒共进晚餐，又一次感到“空前幸福”

第二天，考夫曼对戈培尔的长篇报告提出一些批评，惹恼了戈培尔。他在日记中骂道：“这只能是眼红嫉妒。”原先对希特勒保留的那点怀疑，逐渐化为乌有。经过与东道主长时间交谈之后，戈培尔写道：“也许他和他的那些有关对外政策的论点的确是对的”。

他到底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对此我再也提不出多少反对的理由了。我无条件地承认他为元首。这个伟大的人物。这位政治天才。我向他鞠躬致敬！”

戈培尔与希特勒的蜜月开始了狼与狈的危险合作将给德国乃至世界人民无穷的灾难。

1926年4月17日，戈培尔离开慕尼黑时已成了希特勒的人，并且以后至死都是他最忠实的信徒。4月20日，他向希特勒发了一封祝贺生日的短信：“亲爱的和敬爱的阿道夫·希特勒！我从你那里得到了不少教益……你终于使我看到了光明……”那天晚上他在日记中说：“他今天已满三十七岁。阿道夫·希特勒，我所以敬爱你，因为你既伟大又单纯。这两者就是天才的特点。”

戈培尔在那年夏天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伯斯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一起度过的。他的日记中全是对希特勒的歌颂之词。8月间，他在《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一篇文章，公开同施特拉塞决裂。他说：

我到现在才认清你们的本来面目：空谈革命家而不是行动革命家，他对施特拉塞及其支持者说）.....不必大谈理想，不必自欺欺人地以为你们是这些理想的创始者和保护者.....我们坚决支持元首，并不是忏悔赎罪我们.....怀着古代诺斯人傲然挺立在他们日耳曼封建主前面的男子汉的、有骨气的自尊心.....向他鞠躬致敬。我们觉得他比我们谁都伟大，比你我都伟大。他是天意的工具，将以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热情来创造历史。”

这期间他也去兰茨胡特。在施特拉塞兄弟的家里受到盛情接待，使他兴奋不已。“多好啊！在和煦的春风里，漫步在施特拉塞的家乡。多么的和平、宁静！啊，你这个格利戈尔！”

但是慕尼黑的魅力是更不可抗拒的。“这些慕尼黑女人多漂亮啊。多么美好的太阳！”希特勒请他吃晚饭，甚至专门叫个可爱的年轻女士招待他。第二天一早，又派了他的车来接戈培尔。当然这位也不能太吝啬。“我带了鲜花给他，看起来他很高兴。”极其友好的接待显然使他喜欢上了慕尼黑前不久他还对希特勒所在的城市里的“笨蛋”们恼火。“再见，慕尼黑。”现在当他不得不离去时写道：“我爱你。”希特勒对戈培尔的争取还在继续。他让戈培尔在斯图加特作个重要报告，并在海斯的陪同下，亲自开车送他去。在戈培尔的详尽记载中，特别提到了希特勒的“汽车服装”。一副典型的小市民穷酸嘴脸，把坐在小汽车里兜风看成很了不起的事情，羡慕不已。

戈培尔详细描述了他们在一家小客栈里短暂停留吃午饭的情形。有多少过路人认出希特勒并愉快地跟他打招呼。

接着就是斯图加特的讲演，当然是竭尽全力地讨好希特勒。从日记看，这一目的是达到了：“他拥抱我。称赞我，把我捧上了天。我相信他是真的喜欢我。”

有一次他去汉堡讲演。朋友们带他看了红灯区，某种程度上是作为一处名胜向他介绍。在相当长的一篇日记中，他称这是“快乐的小巷”，当然是暗指G·W·帕斯特的著名电影，这正好在那个时候问世。

戈培尔以毋庸置疑的厌恶语气描述那里的景致：“每个门口都立着半裸的妓女，向路过的行人招手致意，大多数看起来令人作呕。”接着探讨了这个“色情的犹太区”的社会背景。他在那儿看到金发女郎搂抱着犹太商贩，警察不仅不予干涉，甚至还哈哈大笑。他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社会，肉欲和生意相互掺杂。“我只有离开这里。”他抱怨说，这条街令人羞耻的景象，使他不得不考虑许多问题，因而彻夜不眠。

不断巡回演讲的同时，戈培尔当然也得处理他在埃尔伯费尔德的党内工作和编辑部的工作，还有“跟考夫曼的烦恼与不快”。此外，又谈到他不在时别人策划出来的“阴谋诡计”。罪魁祸首总是那个凶恶的敌人埃尔布莱希特“可怜的考夫曼，”对那些在家的同事，他似乎不是生气，而是为他们感到伤心，戈培尔关心的还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一次乘火车途中，有位特别迷人的旅伴似乎使他倾心；显然他只是看了她睡觉的样子，可她并没有注意到他。尽管如此，他在日记中描写了她的美丽，并补充说：“渴望吗？肯定！”

连读书的情况在他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当时他正看一本关于拉斯普挺的书，似乎很感兴趣。虽然一再强调书是多么的引人入胜，但好像还是断断续续地读了好几个星期。“跟那些病恹恹的知识分子相比，这家伙身上藏着怎样强大的原动力呀。”他内心肯定在想，自己虽然是个知识分子，但也拥有类似的原动力。同一时期他也看了艾森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此电影当时正风靡德国。戈培尔说是考夫曼向他推荐的。他毫不掩饰自己看过之后的激动。甚至后来他当了部长，也仍称赞这部电影是宣传方面的一大杰作。

在这期间，慕尼黑和埃尔伯费尔德之间的激烈争斗还在继续。当戈培尔在巴伐利亚时，埃尔伯费尔德隐隐地成了他在良心上的一种负担。希特勒善于打出他的王牌。“他讲了两小时。把我捧上了天，并且是在公开场合。然后让我乘上他的汽车回去。他好像真的很喜欢我”。有了在慕尼黑那么多甜蜜美好的享受，再回到埃尔伯费尔德普普通通的候车室，肯定感到酸溜溜的不是滋味。“这里没有一个人关心我”，他在日记中写道，然后又诉说起他那在埃尔伯费尔德无人赏识的巨大成就。

“这里笼罩着邪恶的幽灵”，戈培尔断言，然后补充说，考夫曼可能也在背后策划，这使他内心很痛苦。他打算下次见面就向希特勒倾

诉衷情。对考夫曼，他现在已经感到厌烦了。戈培尔把“政治败坏人的品性”这句古谚颠倒过来，认为更正确地说，应该是政治教人认清一个人的本性。

此时，希特勒已打算把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派往柏林。那里急需一把“新扫帚”。但戈培尔——至少在日记中——拒绝了，尽管恭维他说是选中他作为柏林的“救星”。6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不想在那个“多石的荒地”生活。在柏林的日记也写道，他在施潘道讲了一次话，跟奥托·施特拉塞和省党部头目冯·施朗格进行了讨论不愿迁居柏林，也许是促使戈培尔又倾向于卡尔·考夫曼的原因。“他又成为我的好朋友了。”他写道，“我不能总生他的气。我喜欢好心肠的人。”

才过了两天，他就又觉得受到了伤害，因为在机关里没有人给他足够的吹捧。“由于考夫曼的软弱无力，省党部已陷入极大困境……阴谋一个接一个……区里的那些头头实在让人无法应付……这个组织我算是腻透了我们德国一定得把这路人消除掉！……今天一早就不痛快，老想骂街……”沮丧消沉地叹息一番后，戈培尔突然表露出他梦寐以求的愿望“我想看到希特勒接我去慕尼黑，这样我就可以从这些令人不快的境遇中解脱出来。现在，一切都看他的决定了。他要我吗？”最后是伤心的结束语：“睡吧，睡吧，睡吧！再也不要醒来。”

两天后，7月14日戈培尔写道：“昨天与卡尔·考夫曼进行了长时间争论。埃尔布莱希特是他的‘罪恶灵魂’，他本人倒不坏，这个不幸的可怜人！”最后他才写道希特勒这天要来：“我如此兴奋地盼着希特勒。我尊敬他，热爱他。”

7月16日：“希特勒来这儿两天了。星期一是可怕的等待。8点钟左右到达人们高兴地欢呼着迎接他……今天跟他一起乘车去科隆。今晚他在埃森演讲。”隔几行之后似乎又表现出了内疚：“……星期五施特拉塞要来，我还得先跟他谈谈。”

这个令他不愉快的想法在下一行就被对希特勒的赞美压过去了：“希特勒，这位可爱的老同志，作为一个普通人，大家肯定已经很喜欢他了，更何况他是如此一位杰出人物。人们永远也搞不懂这个才天的脑瓜，这是怎样一个非凡的演说家呀！天生的领袖！跟这个人一起我们可以征服世界。”

离开之前，希特勒邀请这位新的追随者下月到巴伐利亚去过三个星期。7月19日和20日两天的日记中恰如其分地强调了邀请以及它所带来的“至高无上的幸福”。

但在此之前，戈培尔还是先庆祝了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的胜利，大会是当年在魏玛召开的。“我得和千百人握手……然后动身去广场。柏林人来了，他们都很喜欢我。大家兴高采烈，微笑着招手欢呼。”几行之后又写道：“希特勒来了，引起一阵兴奋的骚动。”

第二天，纳粹内两位大演说家展开了竞赛“我的有关宣传的报告受到欢迎……”“希特勒讲话，讲了政治，理想和组织。神秘而又深刻……讲到人们心坎上。连最后的事也讲了。我感谢上帝，竟造出这样一个人。”接着描绘了15000名冲锋队员列队通过前往广场集会，提到“如林的旗帜”。他又要作报告，这次是向大学生们，他们把他扛在肩上，抬出了大厅。他又提到要不要去柏林接受党的工作，如果去的话是什么时候。

此后就开始了梦寐以求的巴伐利亚之行。部分是巡回演讲，部分是休假，但是没见到主人希特勒，他烦躁不安地坐在旅馆里。终于，7月23日可以记录下这一段愉快的经历：“昨晚有人敲我的门。哇，是头儿。与施特拉塞一起坐车来的。”来接戈培尔去伯希特斯加登。他可以坐在司机旁边那个他喜欢的座位上。希特勒当时还没有得到那著名的“伯格霍夫”饭店，而只是住在伯希特斯加登的普拉特霍夫旅馆的几个房间里，这还是属于纳粹内一位朋友的。

这位成功的追求者，在美丽的山区风光中度过了几个愉快的假日。希特勒多年的司机也在那里，如果“头儿”刚好不需要司机，戈培尔就让这位司机给他讲故事：“……直到深夜，整个晚上我们都坐在一起，他跟我讲1923年11月9日的事。毛里策是一个正直的守纪律的人。”第二天早晨，毛里策教戈培尔开车。“我不久就能学会。”实际上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戈培尔都没有学会。他不可能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只是为了有朝一日坐在方向盘前亲自开车。

戈培尔以激动的语言叙述他如何幸福地跟希特勒在一起，整夜整夜地倾听他的回忆。“……现在我要睡了”，这篇日记结尾写道，

在朋友和快乐包围中，我就在这极乐世界里睡着了。”

第二天，这种极度的快乐还在继续：“多幸福啊”，“我这辈子活到现在也值了！”随后一天，他就把对希特勒的赞颂搬到了纸上：

亲切的朋友，友好的人……

傍晚，畅谈着未来的德国。

了不起。一个国家艺术大师！

再见，我的土萨尔茨堡

连日里，指给我方向和道路！

困惑中，一颗闪亮的星

永存，德意志。

万岁，希特勒！

“他像宠孩子似的对待我。”戈培尔陶醉地写道，连分手都那么激动人心：“我们下了车，向山谷走去，他和我两个人走在一起，跟我说话就像是父亲对儿子。跟我谈德国……怎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啊。七点钟到慕尼黑。我们大家进了小广场，全都喜欢真正的、地地道道的巴伐利亚的民族性……跟头儿告别，谢谢！谢谢！”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长久的分别。然而，四天之后他们又在奥格斯堡见面了，戈培尔要在那儿演说。“3000（！）人倾听我讲话，鲜花像雨点般地向着希特勒和我飞来，毛里策送我上火车。希特勒把他的花送到我的车厢里，红红的玫瑰。跟他告别，我心里感到难过……”这是7月31日的日记。

从此，戈培尔把自己的思考完完全全地归属于对希特勒的信仰之中。为什么有些聪明过人的大主教们可以怀疑任何人，而唯独不怀疑他们那些救世的教义？戈培尔从来就没有过人的才智，这不仅是因为他把信仰看得高于一切，他常常强调这点，而且也因为他相信希特勒。1941年他在希特勒生日时说：“德国人民无需知道元首在制定什么计划；他们也根本不想知道。”对自己，他也是这样聊以自慰。他早就领教过，希特勒甚至对他也不谈自己的计划。在远征苏联之前，为了迷惑人，希特勒曾让他大张旗鼓地购买大量苏联国旗，以便造成斯大林要到达柏林进行国事访问的假象，除了这一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之外，对其他所有行动，戈培尔从没有参与制定计划，而只是到了前一天才获得消息。

1941年，戈培尔还说：“希特勒属于我们。他把我们的人民造就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要是没有他，我们如今岂能安在！让我们最衷心地祈祷：我们始终如一地祝愿他过去、今天和将来都永远是我们的希特勒”。

戈培尔实在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在他的心灵和头脑里，希特勒早已取代了耶稣的位置，他的信仰有时几乎使他丧失自己的思维。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只有真理是永恒的，所谓“信仰的真理”，这种自相矛盾的词语对戈培尔来说就只能是前后矛盾了。尽管如此，事实证明戈培尔根据他的元首的“旨意”曾多次重复过耶稣教会的信条：“正因为它是荒谬的，我才信仰它”

戈培尔的传记作者海贝尔说，戈培尔之所以“信仰”希特勒，是因为他需要一个领袖，一座靠山，一个上帝和一个抚养人，而不是他一直所不感兴趣的“目标”和政治。

希特勒没有亏待他。1926年10月，戈培尔这时刚刚满二十九岁。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柏林的纳粹党区领袖。在一年之间，戈培尔就从一个无名之辈爬到了纳粹党内领导人之一的地位，他毫无难色地着手完成他在这个巴比伦式大城市中的任务希特勒指示戈培尔，要肃清那些妨碍纳粹运动在那里发展的互相争吵不休的褐衫队员，把德国的这个首都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拿下来。

戈培尔对是否去柏林任职，整个八月都举棋不定。8月28日他在日记上写道：“为柏林的事去慕尼黑。再次回绝。我不想陷入那堆屁事中去……”他认识当时的柏林区党部头目冯·施朗格，好像还很喜欢那个人。但他知道，德国首都纳粹的工作非常糟糕，令人忧虑。看起来柏林绝不是一个使他出风头的合适地方。他最希望去的是到希特勒那儿，去慕尼黑的党中央。

不管怎么样，九月他还是受派前往柏林，任务是在那里讲几次话，特别是“再看看那儿的情况”。9月17日记写的是：“晚上我接见（！）了施朗格和施密德克两个人都希望我来。我来还是不来？”

获得区党部头目这一诱人官衔的愿望，渐渐战胜对到柏林任职的反感。“接见”施朗格后的第二天，戈培尔出游了一趟波茨坦，无忧宫的气氛激发他的灵感写出了他满意的日记。结尾的话是：“腓特烈大帝！举世无双的腓特烈大帝！”在普鲁士的光辉影响下，戈培尔做出了他的决定。吸引他的不仅是“区党部领导”这个头衔，而且还有它后面的任务。迷人的头衔迎合他的虚荣心，艰巨的任务满足他的政治野心。

此外，戈培尔庆幸离开埃尔伯费尔德。他听到一个令人厌憎的消息说，考夫曼正准备结婚，娶的是埃尔布莱希特博士“那头猪”的一个亲戚。希特勒十月份公布任命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作党内宣传方面的负责人，这个职位正是戈培尔垂涎已久的。在戈培尔离开之前，考夫曼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仪式。

1926年11月，戈培尔走马上任。他的面前是冬天的“红色”柏林。现在终于当上了区党部头目，时仅29岁，真可谓春风得意，一年九迁，平步青云。

四、初兴风浪

特快列车徐徐驶入波茨坦车站时，十一月柏林的夜空已是黯然阴晦了。两个小时之后，戈培尔第一次登上了讲台，对柏林的党员发表演说。他反复强调“柏林，必须成为我们向前发展的坚实起点”。自此，戈培尔在他的法西斯生涯中，逐步走向了顶峰。

火车到站以后，戈培尔拎着自己简陋的皮箱，顺着柏林大街漫游，他细心地玩味这座世界性都市的喧嚣。不同寻常的印象异常强烈，只是偶尔地，由于他任务的巨大而使他有些绝望。但他很快克服了这种眩晕感，牢牢地抓紧皮箱，径直地朝纳粹党员集会地走去。那儿有一小堆纳粹党员正等着新上任的党区领袖。

希特勒的政敌施特拉塞兄弟在柏林掌管总部，他们为新任党区领袖的到来已安置妥当。等着戈培尔的，是舒舒服服地下榻在纳粹党员约翰内斯·施泰格尔家中。施泰格尔夫人是位富有的妇人，她的丈夫是《柏林地方广告报》的编辑，该报是德意志民族党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的报业康采恩中的主要报纸。许久以来，施泰格尔夫妇已经成为积极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缩写为NSDAP，简称纳粹党）党员。在他们家中，戈培尔住得不仅舒适，而且便宜，并有权使用客厅和其他房间举行会议和接待客人。戈培尔一到柏林，奥托·施特拉塞就把他直接送至下榻处，他受到施泰格尔夫妇毕恭毕敬的接待几星期以后戈培尔对柏林区纳粹党员发表了演说。

戈培尔任职柏林之前，希特勒借一次桌边谈话详细解释了他之所以恰恰在那时委派入党尚未满18个月的戈培尔去柏林担任困难职务的原因。那时柏林区纳粹党的组织状况不佳，希特勒对此十分恼怒，党内圈子里对此尽人皆知。原因在于党区领袖冯·施朗格行事不够果敢有力，因为他的主要职业是政府官员，因而从未全职工作过，大权旁落到柏林冲锋队领袖库尔特·达吕格以及后来被开除出党的汉斯·豪恩施泰因手中。希特勒希望戈培尔能清除党内异己分子，重建组织。这位新任党区领袖直接向希特勒负责这样一来，原负责北德地区的组织领袖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就受到了冷遇。

老党员一再向希特勒报怨柏林党的领导工作。希特勒选中戈培尔是因为希特勒认为戈培尔具有驾驭柏林局势所不可或缺的三种素质：雄辩和智慧。他告诉戈培尔，柏林的下层领导很差，因此他可以无须党内法庭的介入，全权清洗党内一切不良分子。

当时，希特勒也不可能做出比这更好的选择，因为戈培尔完成任务比他所期望的要更好更快。这自然不仅仅归功于个人能力，而且归功于时代环境。1927到1931年间，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在德国的影响与日俱增。1928年的国会选举中，该党还获得了12张议席。议员中就有格雷戈尔·施特拉塞、赫尔曼·戈林和约瑟夫·戈培尔。1929年，国社党成功地获得了重工业和大地产主大规模的物质支持保证。像工业家蒂森、银行家施罗德等人的经济援助将这场日益壮大的运动置于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连国社党的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和党卫队也从中得利。当恩斯特·罗姆1931年接掌冲锋队大权时，这支队伍已达50万人，成为党内一份举足轻重的力量。

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也有经过军事训练的组织，但人数上没有这么强大。所以在凡尔赛和约签订没几年以后，按和约非军事化的德国出现了这种情况极大一部分能服役的男子参加了这个或那个私家的军队。

1929年10月份施特雷泽曼去世时，那些民族主义者还要用漫骂对他鞭尸三尺，尽管他们最终将建立了伪国防主权的坚实基础归功于他。他用其和解政策，成功地把协约国对德国的占领结束于1930年，也就是比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期限提前了五年。早在1928年施特雷泽曼就通过采纳扬格计划使德国的战争赔款重负大为减轻。但纳粹党的宣传恰恰以扬格计划为由辱骂政府。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该党并未将之归功于戈培尔攻击施特雷泽曼的“耻辱和约”四处散布的胡夸废话，而是将之归因于德国遭受了世界经济危机这一客观事实。失业人数由100万上升至600多万，还有数百万人只挣半份工资很多年轻人披上了褐衫——因为在冲锋队里做事比在家里游手好闲而被其家里人瞧不起要有意思得多。

这样的环境注定希特勒的飞黄腾达。他对城头变幻的联合政府的无能以及“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毫无出路而发出的克珊德拉警告看起来似乎完全有理。所以1930年9月选举之后国社党有107名议员进入了国民议会，纳粹党获得了6401210张选票。绝不是所有投国社党票的人都是党员，很多选民只是想到，情况不能再恶化下去了，应该给这个希特勒一次机会。登记在册的党员总数在三年之内从1926年的17000人升至176000人，1930年已达389000人，1931年甚至到了80万人

在夺权的阴谋中，希特勒需要三种工具：人员、金钱和选票。人员在冲锋队、党卫队以及其他党组织中供驱使；金钱除了较少的党费以外，来源于一些重工业家和银行家的资助，他们错以为用钱就可以收买该党作为工具；选票来自越来越多的不满者，票数逐步上升。希特勒决定避免使用暴力，用这种方式合法地在宪法框架内实施阴谋。从根本上，他并不反对暴力措施，但在当时情况下，他相信宣传的力量。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陈述了他的本质宣传观“就如同女人宁可屈从强者也不愿主宰弱者一样”，“群众更喜爱统治者而不是乞求者。”领袖本人必须满怀激情，这样才能感染运动的支持者。群众受口头影响之深甚于受书本影响，每一场群众运动的成长壮大和影响深远不是归功于伟大的作家，而是归功于伟大的演说家。

宣传对于希特勒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

.....由于（宣传）就自身而言不是也不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它因它的任务而必须存在——正如唤起众人注意的报贴画一样；但不是在于教化本来已富于知识经验或追求文化见识的人，而是越来越针对于情感，只是很受所谓的理解力的制约。每次宣传都必须是大众性的，宣传的知识水平必须按照既定宣传对象中最愚钝者的接受能力进行调整。这样，欲波及的人数愈众，宣传的纯知识高度就愈低.....

.....广大群众的接受能力十分有限，领会能力也低，但与之相对的是，健忘的人一直能掩盖点什么，即使现实中有上千个理由说这样不对.....

希特勒在向秘书鲁道夫·赫斯口授该书下一章时，把他在柏林交代给戈培尔的任务预先说了出来：

.....我们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红色作为我们海报的颜色，这样便于挑逗左翼，激怒他们，将他们诱到我们的集会上来，哪怕他们是来驱散我们的集会的，我们用这种方式终于可以和这些人交谈了.....

.....我那时采取如此立场：无所谓他们对我们持何等态度，笑也罢，骂也罢，说我们是小丑也罢，视我们为罪犯也罢；重要的是，他们提到了我们。他们得一再地与我们打交道，我们逐渐在工人自己的眼中真正作为一种力量出现，虽然目前这种力量尚存争议。

戈培尔为柏林纳粹党树立威望以前，首先在党内机构中建立了秩序。原柏林党部办公室的房间极为粗陋，是波茨坦街一所背街房屋里的一个肮脏的拱顶地下室。那里边住着一位所谓的经理，一贯老老实实地在账本上登录每日收支。屋角里四处散堆着成垛的纸张、报纸。前厅里，一组一组失业的纳粹党员同志站在那儿辩论，用吸烟和造谣打发时光.....

此处办公地点就像“鸦片烟窟”，这里边只有点上灯才亮堂一些。一开门，污浊的空气、雪茄、香烟和烟斗的雾气就扑面而来。

虽然面临持续的资金不足，但戈培尔还是在几个星期之内弄到一间合适的办公室。

1927年1月1日戈培尔告别了波茨坦大街上的“鸦片烟窟”，搬进了位于吕措大街新的办公地点。那里虽然既窄小且粗陋，但在当时可是一大飞跃——柏林党部从地下室升到了一楼，烟雾腾腾的辩论室成了一座坚固的、统一组织的纳粹总部。

那时，柏林区的纳粹党员总数约千人，戈培尔上任后第一件重大举措就是开除了约四百游手好闲的人他对剩下的六百人作了一次鼓舞性的讲话，要求他们做艰苦的党务工作，严格遵守纪律，勇于自我献身，连失业者每月也必须用失业救济金缴纳三马克党费。此外，他要求集会时收二十或三十芬尼的入场费失业者半费入场。由于他们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对当局又尤其不满，所以戈培尔主要将他们视为发展党员的对象。他决定把集会组织得轰动惊人，以吸引柏林人参加，即使他们开始只是出于好奇。他计划而已，让他们每次都欣赏一场“表演”。戈培尔当时的意思是：

无论是挨辱骂或受诽谤，浴血倒地或入狱坐牢，在我们看来都正是值得追求的可如果人们只是令人气愤地用无所谓的目光瞥我们一眼，或最多只对我们报之同情的一笑，这就会激发我们最后一丝力量，推动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出新的公众宣传方法，不放走任何提高党的主动性的机会。

戈培尔在柏林的首次公众活动中就为其聚集起来的纳粹党员献上了第一出“表演”他让听众等了十分钟才乘一辆出租车露面，而且引人注目地开到集会地门前。在这之后他不慌不忙，直到慢腾腾地在毕恭毕敬的冲锋队队员的护送下穿过大厅，登上讲台。戈培尔的老上级施特拉塞私下里指责他举止失当，先是让大家白等，然后还要在党内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把钱浪费在出租车费上，激怒了大家。

“您看上去不太懂宣传，亲爱的博士。”戈培尔惊讶地看着施特拉塞，“您的意思是，我不该乘一辆出租车驶到门前？您说的完全正确，我应该叫两辆出租车，另一辆放我的公文包！重要的是设法真正获得他们的好感。至于迟到的问题，我可以向您保证，我是有意来迟的。这是我的一贯作风和原则，让人等等很不错嘛，这样可以引人注目征服街道，大家听起来也饶有兴味。”

戈培尔征服柏林，是从征服街道开始的。他说道：“街道是值得征服的。这是现代政治的特色。谁征服了街道，谁就征服了大众；谁征服了大众，谁也就征服了国家。共和国首都的速度激励着我，同时柏林人天生正常的机智丰富着我。”戈培尔将海报设计得不仅仅富于挑衅性，而且风趣滑稽。

人们平常在广告柱上看到的党派政治集会广告无论是设计还是风格都不怎么吸引人正是在这一点上戈培尔看到了第一个引人注目的机会。他虽然用于海报宣传的经费不多，但只要印刷厂允许赊欠，戈培尔就丝毫不担心超出预算的问题。他用血红的字母印大标题。要是行人看到广告柱上用巨大的字体排出的惊人通知，谁自然都会驻足。

一次，有一张广告赫然醒目地写道柏林党区新任领袖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将于某时某地发表演说，所有想听一听的柏林人都被友好地邀请出席

在柏林，迫害和攻击德国共产党是戈培尔的一项重要法西斯活动。

每次戈培尔攻击共产党人时都要造成流血事件。他让手下失业的横小子、壮大汉们一刻不停地卷入与共产党人的巷战，制造“市民恐怖”，把那些可憎的“市侩”从舒舒服服中惊起给他带来了乐趣。

1927年2月11日戈培尔进行了他最大的一场挑衅。他租下了位于柏林工人聚居区威丁区的法鲁斯厅，而那里一直都是德国共产党（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传统集会地点。集会地点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挑衅，又加上柏林纳粹党全体近千名党员早早地就鼓乐登场，旌旗挥动。“这是公开的宣战，”戈培尔在《柏林争夺战》中写道，“集会迅速变为大规模的室内殴斗，一如希特勒当初在慕尼黑策划的运动那般。”

共产党人以及纳粹党的其余对手到场众多，挤满了大厅的一多半。当其中一人屡次针对议事规程提问，打断集会主持达吕格时，一些纳粹冲锋队队员抓住他强行带出会场，室内殴斗随即爆发。殴斗以普通的方式进行，啤酒瓶横飞，椅子腿乱舞。最后警察进行干涉，而且来了大队人马——因为法鲁斯厅纳粹集会发生骚乱几乎是肯定预见的。共产党人抬着伤员撤了，在多多少少都是纳粹党员的时候，戈培尔证明了自己是左右局面的行家里手。他让人把受伤的纳粹党员用担架抬到讲台上，就忠诚不渝、现场情谊和时刻准备行动等发表了一通煽动性的讲话，指着一个满身是血躺在担架上的大汉称道“无名的冲锋队队员”。那人是被一只飞来的酒杯击中头部，伤倒不重，可很添彩。

自那以后，戈培尔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能重演这种有效行动的机会。要是没有受伤的党员，他就让一些冲锋队队员从头到脚裹满绷带，躺在担架上。

通过法鲁斯厅的室内殴斗，戈培尔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即登上了市民报纸的斗版头条。当一些报纸称纳粹党扔洒瓶子的人为强盗时，戈培尔欣喜若狂。他飞也似的起草出一份海报，自称“强盗头子”，邀请大家出席另一场公众集会。

戈培尔于是开始极为精心地策划他的每一次行动和大部分讲话。施泰格尔夫人的客厅里立着一面很大的由三块组成的镜子，戈培尔就

面对这镜子试念讲稿，审视形象。这给施泰格尔夫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想像中的萨伏那洛拉就是这样，她对施特拉塞兄弟说：“戈培尔是如此的坚强，如此的苦行，如此的着魔于任务，简直宛如一位圣人或先知”。数年后，戈培尔回首往事：

当我今天把我来柏林以前讲话的速记稿和以后的相比较时，我感到前者几乎是温和平淡的。和我一样，柏林运动的鼓动家们莫不感觉如此。这座400万人口的城市颤抖就像整个共和国首都慷慨激昂的宣传演说中一次激动的呼吸。这里说的是一种崭新的现代语言，和那些古旧过时的、所谓民族的表达方式再也没有干系。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是专为大众着想的党的现代人生观在这里寻找并找到了一种吸引人的现代风格。

戈培尔习惯于手写起草每一份讲稿，用不同的彩笔标出鼓掌间歇以及从尖刻挖苦到激情爆发等各种色彩。同时他在训练自己自由演讲和根据临场气氛即席发挥的本领，并且精益求精。

他的每一篇讲稿，无论显得何等“发自肺腑”，都已从头至尾细细思量过，他首先想到的是听众：他们成分如何，情绪如何，他如何才能抓住他们，使他们保持紧张。他使出全身解数，身体上、嗓音上、表现力上竭其所能，以便从尖酸讥讽到狂热兴奋，从激情地表忠心到刻骨地痛恨处处吸引带动听众。他一向全身心地投入，直到他虚弱的身躯和紧绷得神经油枯灯尽。他出汗出得很厉害，一场累人的讲话下来，像他常说的：“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讲话前后他都要在洗澡间内称检体重，常常确认损失了好些磅重量。讲话时，群情激动的地方他却往往完全冷静旁观。开场白和结束语，精彩点和延长处都仔细而客观地计算过。登高台演讲没几分钟的时候，他经常在亲密的同事中提一个嘲弄的问题，“他应该放哪张唱片”

这当然是明知故问。大多情况下他都事先知道，等着他的听众处于什么精神状态和情绪。要是例外地一无所知的话，那他对集会地点气氛地震仪般灵敏的感觉就会起作用。在纳粹刚上台不久，这位刚刚走马上任的宣传部长在对大学生发表一次简短的讲话时就是这样。这些年轻人毫不例外地均反对新政权，虽然他们不敢公开批评，但他们商定用冷淡有礼的沉默来表达他们的反对为谨慎起见，他们放弃了大学礼堂里表达反感的传统方式——用跺脚声迎接这位部长。但是当这位

部长向他们发表演说以示敬意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像期待的那样顿足欢迎

戈培尔刹那间由于受到冷遇而吃了一惊，但他马上摆出他最富魅力的微笑，他向年轻的听众表明，他面对意想不到的困难是多么的镇定。他用消除敌意的坦诚解释道，有一些听众对新政府多多少少持否定的态度，但他正是要开诚布公地消弭这一可能产生的误解的原因。随后，他说了几句友好的客套话，讲到了学者们在新国家中的任务，悦耳动听但决不空洞无物。然后他必不可少地看了一眼手表，非常可亲地提到他尚有国事在身，遗憾的是比较紧急，但肯定没有和聪明的年轻学者们聊天这么有趣，就此告辞。他友好地微笑着退出大厅，让年轻人们愣了半天神。起码有一半人，被戈培尔这位部长的魅力征服了。

早在纳粹上台数年前戈培尔就娴熟掌握了这种适应能力他的放肆和大胆使支持者吃惊，将越来越多的观众吸引到谣言满天飞的集会上来柏林人虽然绝不是友好地谈起戈培尔，但他们在谈论他。戈培尔尚未征服柏林，但显然已征服了柏林人的注意力。

在柏林必须你死我活，别无选择。谁要是不懂得不顾一切，谁就要被辗于国车之下.....

柏林需要耸人听闻的消息就如鱼儿需要水。这座城市借此谋生，哪种政治宣传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会达到目的。

戈培尔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不断地试图耸人听闻。他发展并完善了希特勒曾在慕尼黑实践过的技巧在柏林到处打出旗帜，挑出写着党的口号的大幅标语，用进行曲和游行为每一次集会营造气氛。党员必须全体列队游行，离集会开始很久以前就占满大厅，在小乐队的高声吹奏下大唱党歌。戈培尔一贯等场里已挤得水泄不通，气氛也已相应备好之后才露面。他大多坐在就近的某家小酒馆里，等电话通知他时机已到。然后他就在“御林军”彪形大汉的簇拥下出现，戏剧性地入场，从大厅后门一直走到饰有鲜花的讲台出场时应伴有数分钟沸腾的掌声是不言而喻的1927年5月1日希特勒在柏林发表了一次演讲。这是他自戈培尔任党区首脑以来在德国首都的第一次演讲。由于希特勒当时在北德被禁止公开演讲，所以活动还伪装成党员内部集会。尽管如

此，那还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由戈培尔安排在市中心一家叫“精彩”的舞场内。

可是，在柏林纳粹党营地内并非事事如意。绝大多数柏林人是坚决反对党区头子手下那些“流氓”的，警察也严密监视着他们。连党区首脑大人本人也必须忍受一些警方检查。戈培尔被搜查严禁拥有的武器。搜身虽没有搜出任何武器，却搜出一瓶烧酒和一只闹钟。市民和报刊听到了风声，充分利用了一下这次好机会取笑这位武装”奇特的党区领袖。

当戈培尔置警察再三警告于不顾，拒不约束他那些“流氓”时，纳粹党在柏林地区遭禁了。1927年5月5日，希特勒在伪作“内部集会”的大规模群众集会登场的四天之后，警方发布禁令，其直接原因是一位退休牧师在国社党集会上被打伤戈培尔事后声言此人绝非什么牧师，而是一个声名狼藉的酒鬼和捣乱分子，当警方禁令的官方通知送交到柏林区党部办公室时，戈培尔拒绝在收据上签字。他派一名身穿制服的冲锋队队员将未开封的通知送回了警察总局。

警方态度更加坚决，戈培尔别无选择，只好同他的党员一道部分转入非法活动，把纳粹党的集会地伪装为体育协会，活动伪装为毫无危害的聚会。冲锋队制服被公开禁止，最严重的是他的演讲也被禁止。

禁止公开演讲只对那些作为国民议会或州议会议员的党员例外，他们按宪法拥有在选举集会上代表其政治立场的权力。国会议员戈培尔充分利用这一特权，滥用这一权力，作为辩论发言人他发表长篇论战性的声明，而那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选举宣传”。警察旋即识破了这套把戏。他一再被控告，被处以罚款，被重新“赠予”演说禁令。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创办自己的报纸，从而创造一个他眼下作为演说家被禁止拥有的阵地。

这样就产生了《攻击》。《攻击》起初只是一份微不足道的周报，无法与希特勒的《人民观察家》、施特拉塞的《柏林工人报》以及其他党办报刊相比

对于报纸的命名，戈培尔颇费一番苦心6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戈培尔一小圈人坐在一起苦思冥想，思考报纸的标题。苦苦思索中戈培尔突

然灵光一现：我们的报纸只能叫一个标题，攻击！这个名字宣传有力，它包括了我们所欲所求的一切。

戈培尔的朋友尤利乌斯·李佩特担任主编。戈培尔为预告报纸创刊的广告使用了他集会宣传成功的海报策略广告柱上先是出现了血红的海报，上面只有二个字：攻击，再加一个大问号。几天后新的海报宣告：攻击7月4日进行！直到第三份海报才得知，这是在宣传一家报纸，该报将于每周一出版。

广告无疑做得很好，但小报本身可实在不怎么样，纳粹党内虽然不乏众多演讲好手，但具有足够专业知识和经验以供编辑世界性城市报纸的记者却不多。连戈培尔那时也不是名熟练记者。

7月下旬一个星期一的早期，戈培尔在一次短期旅行之后自苏台德区返回，在希尔施贝格火车站售报亭里发现了刚刚首次出版的《攻击》创刊号。戈培尔把这张报纸同他本来意图相比较，感到了绝望：一份可怜的地方小报，一张倒霉的印刷品！期望甚高，而能耐太少，这便是第一期。

戈培尔认为新报纸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针对柏林警察局副局长魏斯博士不断地进行诽谤，其在禁令和警方规定屡行屡废中一直是戈培尔的主要对手。魏斯博士是犹太人。在他的坚持下，戈培尔等一行人多次被判入狱和罚款。戈培尔对魏斯大规模攻击的结果，是魏斯不久就成了纳粹运动反犹战斗中热门人物之一。

魏斯原只需稍施手腕就可以占上风，但他将一切都看得极为严重，于是提出诉讼。这正中戈培尔下怀，因为每一次开庭审理都意味着宣传的增强。不仅如此，伯恩哈德·魏斯典型的犹太长相对戈培尔和他手下的漫画家米厄尔尼尔来说简直是天赐之物魏斯每星期都要受《攻击》的污蔑和出版的小册子的诽谤，1928年还有一篇以成书的形式出版的尤其恶意煽动的文章《依斯多尔记》。

魏斯异常恼怒，因为渐渐地连纳粹的反对者都真以为他叫依斯多尔。他继续指控戈培尔诽谤，却由此再三地给戈培尔提供了恣肆法庭、从而在市民报纸上轰动一时的机会要是只判罚他几百马克，在戈培尔看来这与宣传收效相比代价甚微。此外，对魏的胜利对他而言证

明了其基本原则的正确英明：那就是必须将对手列入一种特殊的“替罪羊”行列，集中火力猛攻猛打。就连希特勒也曾依此计行事。

至于禁止他讲演，戈培尔绝不是默默无闻地甘受此击，而是尽力避开禁令，挑逗警方。

但不管戈培尔如何绞尽脑汁，柏林警方对戈培尔及其法西斯纳粹活动，还是采取了严格控制的措施，使得戈培尔一再受挫。

演讲受阻，戈培尔就将精力集中在他的《攻击》报上。报纸暂时着眼于柏林工人，采用非常大众化的风格。但要使小报获得成功却很不容易，尤其是因为它在纳粹党内都有反对者，既不被希特勒也不被施特拉塞看重在它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中显示的更多的是戈培尔自己而不是希特勒的想法。自然，他也是极端反共反犹的。谁要是非难该报，就会被戈培尔打上“犹太人”的烙印。他将他自己和纳粹党描述成惨遭犹太人、共产党人和警察迫害的无辜者，而万恶之首当属“依斯多尔”。戈培尔用自己写的一首两行诗来反抗党禁：

虽遭禁

尚犹存

1927年夏戈培尔进入低谷，《攻击》发行量少得可怜，极少能超过2000份。戈培尔还要不停地在法庭上与对手们周旋，这也很费钱。由于不许举行公开集会，也就没了入场费，而这曾经是纳粹党的一笔相当的额外收入。《攻击》和其他纳粹党办报刊的编辑工作陷于一种除了党区首领以外几乎无人能动笔的窘况。纳粹党内连能发表演说的后备力量也很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戈培尔表现出了韧性，他顽强地认为：必须尽快培养，以备禁令取消后形势之需；还有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待人去做，起码要做到随机应变，善于妥协。

1927年的大事当推八月底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代会。许多纳粹党员和冲锋队队员依然失业，他们有充裕的时间为大造舆论而行军去参加党代会。这一来回约需三个星期。柏林党区首领为那些能买得起25马克折价返程票的纳粹党员订了四趟专列。纽伦堡于是人头攒动，万人大会、授旗典礼、火炬游行接二连三。希特勒和随从站在台上向众人致意，万名追随者列队通过，接受检阅在柏林，整个1927年夏天

纳粹党被禁止任何活动。戈培尔想演说也得出了柏林才行在鲁尔区的一次会议上，他详述了群众集会的宣传意义。

谁征服了街道，有朝一日谁就会征服国家，因为每种权力政治的形式均扎根于街道。群众集会的益处我们取之不竭，这是能证明我们决心掌权的最好的手段，这比任何选举统计都重要得多。当我们看见自己人在街上列队行进时，那简直就是夺权动员了。

戈培尔动用一切手段，试图扩大《攻击》的销路。每位纳粹党员都奉命订阅并促销该报。尽管如此，还是没能提高它2000份的可怜发行量。施特拉塞的报纸已满足了人们对地方党报的需求。纳粹党的利益也无须另办一份报纸。《攻击》报归根到底只是服务于党区首领个人。

很快爆发了一场实实在在的新闻战。戈培尔命令他的冲锋队队员辱骂街头卖施特拉塞报纸的人。他认为可以这么干，因为几乎无法设想施特拉塞兄弟会在夺权的如此紧要关头诉诸法律，把党内的丑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施特拉塞兄弟确实没这么做，他们只是在希特勒处告了一状。希特勒于1927年秋天火速赶到柏林，突然出现在施特拉塞纽伦堡大街上的编辑部里，十分粗暴地告诉施特拉塞，这场党内纷争必须立即永远停止。

“您为什么不对戈培尔这么说呢？”施特拉塞问道：

希特勒避而不答，解释说，要是不和解纷争持续尖锐下去，冲锋队将来可能会冲进施特拉塞的编辑部，把一切砸个稀巴烂。“我实在是很担心，要是您在这种情况下能怎么办呢？”

“我会开枪的，希特勒先生，那样您的冲锋队队员就会少半打。”施特拉塞说着拉开写字台抽屉，指着他备好的两把手枪。希特勒吓了一跳，头一次对施特拉塞直呼其名：“可是奥托，您总不会对我这么干吧，您总不会杀我的冲锋队队员吧。”“要真是您的冲锋队队员，”施特拉塞带着巴伐利亚人的平静说道，“那您只需告诉他们，这儿他们不该来。”

在编辑部同施特拉塞这次少有的谈话之后，希特勒和戈培尔郑重谈了一次，因此冲锋队对卖报者的辱骂行为停止了。此后不久，希特勒就谋求集中管理党办报刊，他把施特拉塞兄弟召往慕尼黑参加有关

会谈。施特拉塞首次得见褐色大厦里的纳粹党部秘书处，这给他印象很深。大厦正面饰以一巨型纳粹十字，大门后的大厅有一个长长的窗口。再后面可以看到二十多名办事员在打字，送信人来往匆匆。要想进入赫斯领导的秘书处和希特勒本人的办公室，必须先穿过这所大厅，再经过一座院子。希特勒的工作间布置高雅，铺着厚厚的地毯，除了一张大写字台以外，还有一张会议桌，四周围以真皮沙发。希特勒身穿褐色衬衣，足登高统靴，还添了根马鞭，片刻不离身。他习惯用马鞭敲皮靴或桌面，用以强调自己说的话。

会谈涉及施特拉塞在北德党办报刊中所占的大部分股份希特勒想全部买下这些股份，而施特拉塞兄弟拒绝了这一建议，这激怒了希特勒。当奥托·施特拉塞硬说希特勒在有些地方犯了错误时，希特勒大发雷霆。

“我从不犯错误，我说的每个字都具有历史性意义。”说着，希特勒猛地将马鞭敲向桌面。施特拉塞随即一言不发地转向屋门，格雷戈尔也准备跟着哥哥走。可希特勒还需要施特拉塞兄弟。于是他对格雷戈尔说了几句缓和的话，留住他单独继续会谈。

慕尼墨总部的奢华与柏林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柏林党区头子没有梅塞德斯车用，只能习惯于挤电车或地铁。并且，施特拉塞兄弟从不穿纳粹制服，戈培尔也是如此，就是在以后的岁月中也极不愿套上制服。

戈培尔30岁生日和他就任柏林党区头子周年纪念日几乎是同一天，于是就庆祝了这一双重节日。纳粹分子私下凑了2000马克，给了他一个意外之喜。这是对纳粹党的财政状况的可喜证实。纳粹分子还向党区头子献上32500张新的党证。最后，纳粹分子郑重地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装的是撕碎了的债据。那些债据均有戈培尔的签名，是他为出版《攻击》而背上的私人债务。但是最受欢迎的礼物要数警方取消了对他发表演讲的禁令不过他以后每次公开演讲都必须取得书面许可。

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戈培尔扩大宣传规模了。1928年1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道：

.....不能从理论上探索宣传的孰优孰劣，那些引导成功的宣传就是好的，没达到预期效果的宣传就是差的，即使它异常巧妙也无济于事。因为宣传的任务不是巧妙，而是引向成功.....那样就无人能说，你们的宣传太低俗、太粗野或太残暴，或者不够光明正大.....

要诀何在？那就是人们的想法是不成形的，如果有一个人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那么每个人都会感到：对，我一直就是这么想、这么希望的.....在我认清某事的正确性，并在电车上开讲的那一刻，就是在做宣传了.....宣传就是一个组织的先锋。如果这个组织有此先锋，那这个组织就是国家的先锋宣传永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宣传，有人会，有人不会。宣传是一门艺术，这正如教每个半路出家的普通人拉小提琴似的，他们都定能教到一定水平，但到了一定程度，便无法再进步了，并不是没有可学的了，只能告诉他们，那只有天才才能做到了.....要是先生们说：“你们只不过是宣传家”，就应该如此回答他们：“耶稣难道不是吗？他没有进行宣传吗？他是写了书，还是布了道？穆罕默德不是吗？他写过妙趣横生的小品吗？抑或他没有走向众人，诉说自己的意图？佛祖和查拉图斯特拉不也是宣传家吗？环顾我们的时代，墨索里尼以前难道只是趴写字台的吗？他难道不更是一位大演说家？当列宁由苏黎士到达彼得堡时，他是直接从车站进了书房写了本书吗？难道他不是对成千上万的人发表演说吗？不是别的，正是大演说家造就了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演说家和政治家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

1928年3月底宣布，5月20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同时，普鲁士政府取消了在大柏林地区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禁令。

戈培尔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他抛弃了以前对进行议会活动的彻底拒绝，看见了争权斗争中议会党团所能提供的宣传机会。于是全力夺取之。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当时还太嫩，没指望在选举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绝大多数选民也没有拿它当回事。直到一年以后，日益增长的失业率才将数百万不满者推向希特勒国社党鼓动家一边。眼下，纳粹只得满足于80万张选票12张议席。戈培尔在进入议会之前先发表了一份声明，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无人能出其右。

.....但愿议会各党议员都作如此想法。我不是什么议会成员，我只是享有豁免权、免费乘车权.....

豁免权享有者是个在民主共和国里甚至也能偶尔讲讲真话的人。他和凡夫俗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可以大声讲话。他有权称粪堆为粪堆，而无须用称其为国家来敷衍.....这仅仅是一个序曲.....你们还将和我们一道开开心，现在让戏开演吧！

1928年11月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纳粹宣传部长，再次表明了他对戈培尔的宠爱。这意味着，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必须让位于他以前的秘书。但施特拉塞在党内高层领导会议之后保住了地位。因为，希特勒任命他为纳粹的组织部长。

作为宣传部长和国会议员，柏林党区头子戈培尔如今担任了全国范围内的权限赋予他的党内职务。此后的四年，戈培尔遍游全国，组织群众集会所有的活动均按费尽心机的仪式进行，有旌旗列队、火炬游行、排练好的齐诵、伴以高唱党歌、奏进行曲。空前的渲染使气氛神经质地紧张，主要发言人一露面，人群定然沸腾不息。

戈培尔懂得，只要集会准备得好、组织得好，就是最小的党也能填满最大的厅堂。当1928年9月希特勒想在柏林发表演说时，戈培尔在体育场的巨型圆形广场上组织了一次集会这是此类大规模群众集会的头一次。不久，柏林体育场和纽伦堡体育馆就成了宣传部长选上的活动场所。

戈培尔当时用以影响大众的工具还只有集会和报刊。时常也有些机会，用一些特殊的艺术品来给他老一套的日常宣传活动注入生机。1930年2月，霍斯特·韦塞尔之死给他制造耸人听闻的政治事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霍斯特·韦塞尔是个吊儿郎当的大学生，与一妓女同居。他还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党员，屡经街道战、室内战的冲锋队队员。他在《攻击》上发表了一首为行军歌曲而作的歌词。虽然尚未谱曲，但歌词却和一首欧洲共产党青年团多年来口唱哨吹的进行曲旋律很是相配。纳粹党人唱这首歌只唱韦塞尔写的词。

1930年2月初，韦塞尔被一个职业皮条客阿里·赫勒尔刺死。赫勒尔被捕，因杀人罪被判刑七年。

戈培尔获悉此事后，决定颂扬死者。在《攻击》上，在小册子中，首先是在演讲中他把年轻的韦塞尔的一生创造成了一部英雄史诗，把他的死说成是殉道。韦塞尔的葬礼由纳粹隆重举行。届时首次公开高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而且一跃升为纳粹党歌。

1930年，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兄弟间的宿怨再度爆发。兄弟二人中较为激进的奥托·施特拉塞在他编辑的党报上支持一次萨克森工人罢工，而希特勒则强烈谴责这场罢工，因为他不想惹重工业中掏得起钱的支持者生气。奥托·施特拉塞和希特勒在柏林进行了一次会谈。会谈私下在一饭馆里举行。希特勒下定决心通过合法手段夺权，避免反对“资本主义”右翼政党。奥托拒绝了这一立场。最后，希特勒彬彬有礼地起身致歉，他得去一下卫生间。他从另一个出口离开了饭馆，奥托·施特拉塞再也没见到他。希特勒返回慕尼黑，从那里授权戈培尔，立即将奥托·施特拉塞连同他的一些追随者一起开除出党。格雷戈尔直到希特勒夺权前不久还是党员，而奥托和他的追随者则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小派别，称作“黑色阵线”。

奥托·施特拉塞于1930年被清除出党。三个月以后举行了新的国会选举。希特勒的党此番获95张议席。这不禁令人大吃一惊，就连国社党内的乐观主义者也没预料到如此成功。这期间，经济危机的规模达到了顶点。不满者一周一周地增多，都来到戈培尔的集会寻找出路对一个能干的纳粹鼓动家来说，决不缺少国难的替罪羊，这其中有足够的犹太人和恶毒的协约国，更别提共产党人和耻辱的凡尔赛和约了。这期间还可以骂骂大托拉斯和垄断资本家，虽然它们也部分资助了竞选。这样一来就说出了数百万选民的心声，他们都说局势“不能再恶化下去了”。后来虽然又恶化了许多，但这期间人们可以在戈培尔的喧嚣热闹中自我麻醉，汲取希望。

1930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获得了640多万张选票。纳粹的国会党团包括了107名议员。一夜之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从最小的党派摇身变为国会第二大党。掌权的日子看来已不再是遥远的梦幻，而是实实在在的可能。

尽管取得了巨大胜利，纳粹领导人还是忧心忡忡。党内不满者、退党者比以前多了。这一点尤其波及到了主要由失业者组成的冲锋队。他们中间确有许多懒汉，可在一个连工作狂都成了失业救济者的

时代里，懒惰和失业的区别也就越来越模糊。无论如何，冲锋队的“莽汉们”毕竟在街头巷战、室内战和挑头痛揍敌人中找到了一种生活内容。他们乐于见到人们在自己面前发抖。但是，他们长年甘作打手所换得的物质报酬却迟迟不见踪影于是越来越多的失业冲锋队队员闲坐在党办酒馆里，等待着任何一次行动，如果成功了，起码可以付给免费啤酒和“夹肉三明治”。

可恰恰在眼下可以使这些“莽汉们”保持情绪的这类行动不多。在1930年9月的选举月中，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意外事件。一些柏林冲锋队队员闯入了戈培尔的办公室。戈培尔不得不向他柏林警方中的死敌求助。为了内部解决这些事，希特勒亲自来到柏林，向愤怒的冲锋队做了一些含混的许诺。为能利用自己的权威阻止其他不快事件的发生，希特勒把自己提升为冲锋队总领袖，任命罗姆当队长。

这样，担心就暂时解除了，但绝没有根除。主要问题在于，冲锋队也像古罗马人一样要求“既有面包吃，又有热闹看”。吃不上饭他们能忍受，但必须让他们看一场盛大的“马戏”作为补偿。可希特勒眼下不需要什么街斗巷战、流血集会之类的轰动事件。他不想让群众中的有产阶级感到害怕，他还希望能借助他们合法地攫取政权。

一日，戈培尔给柏林冲锋队制造了一次新行动的机会，那就是去破坏电影《西线无战事》的上演。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反战小说当时已获得世界性的成功，成了战后的畅销书。但对纳粹党、尤其是戈培尔来说，《西线无战事》多年来已是眼中钉肉中刺。它毫不妥协地反对战争，与纳粹宣传针锋相对。所以他们就谩骂“犹太人”雷马克的这部小说以及出版、资助该书的犹太出版社乌尔施泰因。

雷马克的小说是在好莱坞搬上银幕的它毫无疑问是当年最优秀的影片之一。在柏林首演于莫扎特厅，盛况空前。

戈培尔到第二天才采取行动。他差人暗中买下了莫扎特厅的上百张坐票，让冲锋队队员穿便衣就座。他们还在大衣下藏了恶臭炸弹以及小笼子装的白鼠。戈培尔十分得意于这一设想，因为他希望突然放出数百只老鼠会让女性观众大为惊恐。此外，他觉得如此表达他对这部电影倾向的反感相当滑稽。

行动按计划进行。座无二空的放映厅里格外安静。他们突然放出恶臭炸弹，放映不得不立即中止；一开灯，又放出白老鼠。效果正如戈培尔预计的一样。他自己却仿佛置身事外，正襟危坐在正厅前排座位上。警察出现了，那些为他们所熟识的捣乱分子当即遭到讯问。但他们已放完了“武器”，无从查证。他们放肆地说，他们和别人一样吃惊

《攻击》第二天发出的胜利嚎叫自然消除了人们对肇事者的最后一丝怀疑。此后不久，戈培尔也处处在人前自夸。当这部电影由于他们继续捣乱而从放映计划中彻底取消时，他们也便彻底胜利了。当局对戈培尔的暴力袭击束手无策，只好禁映了这部电影，借口说放映时骚乱不断，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

1928年以来，戈培尔充分享受着作为国会议员的议会豁免权。他对此大加利用。1930年10月13日，新选出的国会开幕了。为了庆祝这一事件，戈培尔派了上百名最粗野的冲锋队队员穿便服在柏林西区的库尔菲斯腾达姆等地对犹太商店的窗玻璃大砸出手。

1931年2月间，纳粹党国会党团全体退出了国会。这只是一场策略上的抗议行动，但却使戈培尔一时间丧失了豁免权。检察院抓住这个好机会，以上一年10月砸窗事件为名把他送上了法庭。他自然拒绝作任何法庭陈述，在检察官和法官面前装成“那个野蛮人”。从来没有任有被告在德国的法庭上如此嚣张挑衅和雷马克电影事件如出一辙，这时国家机构表现出令人忧虑的软弱性。被告最后由于藐视法庭被判罚200马克。

冲锋队在砸窗事件和电影院骚乱中又尝到了甜头后来又发生了些其他不法行为，这根本不合乎希特勒遵守宪法、运用合法权利的新政策。2月20日，希特勒发布了一项战略性命令，严禁冲锋队参加街巷殴斗败坏党誉。

这在冲锋队里引起了愤怒。毫无疑问，队员们、尤其是北德的队员群情激愤。北德的冲锋队首领是奥托·施特拉塞的朋友豪普特曼·施特内斯，他在施特拉塞被开除出党之后同情“黑色阵线”。施特内斯和希特勒之间世界观尖锐对立，数年来屡经商谈还是没有达成共识，因为矛盾实在是无法调和。无论如何，施特内斯准备联合施特拉塞的“黑色

阵线”一同反叛。他希望能通过断然展示党内激进力量使希特勒改走左派路线。戈培尔在此之前就秘密获知了反叛的计划、目的和步骤。反叛应于1931年复活节进行。第一步措施是要占领柏林党部办公室。为了不至于出丑，戈培尔要在此前赶往慕尼黑。要是反叛成功戈培尔会在慕尼黑假意革命，影响希特勒。在既成事实面前希特勒也许会屈服。然后戈培尔就会坦白，他知道一切并参与了谋划。

情况自然与此大相径庭。施特拉塞认为，施特内斯对自己的勇气产生了疑问。反叛始终处于不温不火，“占领党部办公室”只不过是个畏畏缩缩的姿态。戈培尔在“战略性骑墙观望”，几乎每小时都有电话打到慕尼黑通知他事态的发展。他看来马上意识到了事情不妙。为此，戈培尔果断改弦更张，装作一无所知，极为震怒。于是戈培尔像是大为光火地返回柏林，受元首之命来羞辱不忠不义的施特内斯并开除他党籍。至此，反叛已没有什么可镇压的了。

戈培尔做了四年半柏林党区头子，将近三年的国会议员和两年半的纳粹宣传部长，时年三十有三。他比以前更热衷于名利，善于怀恨，睚眦必报。而且，他喜欢没有什么来由地讽刺挖苦、幸灾乐祸，不光是政治对手，连自己党内的纳粹分子也能感受到他毫不留情的讥讽。戈培尔几乎每星期都露面检查小报《攻击》，看一切是否妥当。他坐在主编座位上，李佩特和编辑们站在桌子周围，像小学生一样等待校长训话。戈培尔先是摘下手套，放在桌上，然后由裤兜掏出两页叠在一起的前一天的《攻击》报解释说，他只能给先生们七分钟时间，顶多八分钟。接着他指着用蓝笔勾出的社论，带着他冷冰冰的客气转向主编，他常常以这种态度发难：

李佩特博士，我要是没弄错的话，人称您是这份报纸的主编可难道您真认为这篇文章代表了老练的新闻业务水平吗？那大概只是愚蠢幼稚，不是要铤而走险，就是要精神错乱……

虽然可怜的李佩特已在手下面前对这种训斥习以为常，脸还是越涨越红，这时戈培尔又开始逐篇吹毛求疵。他指着一篇经济政策的文章说：“主编大人看来对这一小角落的经济状况要比对经济选题熟悉得多，他还总写经济方面的社论。”然后他重新戴上手表，已经过了七分或是八分钟。戈培尔起身离座，友好地点了下头，随随便便地敬了一个致最高元首的“德意志礼”，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房间。

他有一次出现时朝贝格尔傲慢地挥了挥手，让他作陪。他想讨论一些技术细节，但由于还要参加一个葬礼，在编辑部一刻也不能久留。他在车上讨论了一些贸易部分的编辑和印刷问题。当他检阅在通向墓穴的路边列队的冲锋队时，他还用耳语继续发号施令“这阵子我换了个想法，”“应该每两周登一期报道，勾上方框，要三栏，不要两栏。”突然，他将嗓音提高到顶点，面容极其严肃地说：“我们站在同志的墓穴旁，热血沸腾，满腔悲愤，赤色流氓将他……”等等。他虽然避而不看手表，但他讲话很少长于五分钟。然后和死者亲属握一下手，朝大家敬了一个“德意志礼”，在走向汽车的几步路中继续小声下达编辑指令：“是三栏，不是两栏，还要用二个西塞罗长的横栏大字标题。”话音未落，人已坐在车中了。他突然停下指示，相当漫不经心地问道：“告诉我，亲爱的贝格尔，我们刚刚安葬的人是谁？”他对此当然一清二楚，他刚才在墓边还在颂扬死者的大名和成就，但他喜欢这种冷冰冰的态度。

五、当吹鼓手

戈培尔有写日记的习惯和癖好，一生中写了很多日记，只有惟一的一本，经戈培尔本人亲手编辑整理，于1930年以“从凯撒霍夫到国务总理办公厅”为题由纳粹党的出版社出版。这其中记述了纳粹党从1932年1月1日到1933年5月1日之间的主要活动，从中能看出他如何从充当吹鼓手，怎样尽情美化希特勒而逐渐爬上显赫位子的。

这一时期对戈培尔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他担负着繁重的工作。在这攫取政权之前的最后一年中，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来到柏林，几乎每个晚上，他都习惯于在戈培尔家里一直呆到深夜，并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商谈问题。

在那一年里至少有五次重要的竞选活动：一次州议会选举，两次国会选举，还有两次总统选举。希特勒在竞选总统中失败了。在1932年3月13日的第一次选举中，兴登堡还不能获得绝对的多数票。然而四个星期之后，在4月10日，兴登堡以获得百分之五十的选票击败了希特勒和共产党的候选人恩斯特·台尔曼。

在1932年4月23日进行的各州选举中，国家社会党有胜亦有败。虽然它是普鲁士邦议会中最强大的政党，但在符腾堡、巴利亚、汉堡州选举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在7月31日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国家社会党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胜利——它赢得了230个议会议席。就在这个时候，经济危机也发展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有近700万人失业。

纳粹党成员赫尔曼·戈林当选为国民议会议长。而总理冯·巴本在议员们拒绝对他投信任票后，宣布解散国会。于是，议长戈林试图通过“非议会的”办法阻止总理发言。纳粹党自然对解散国会毫无兴趣，尤其是因为新的选举对它来说将意味着是一个一时根本无法承受的财政重负。

然而，戈林的花招却不能阻止总理巴本愿望的实现，因为解散国会已经得到总统批准。新的选举定于1932年11月6日举行。在这次选举中国家社会党失去了200万张选票，在国会中的议席也由23. 个减少到196个。

1932年11月17日，冯·巴本辞去了总理之职，他的继任者是冯·施莱彻尔将军。他于1932年12月2日就任，不过几个星期后，1933年1月28日他便下野了。

很多政治问题需要议会在1932年讨论。比如，战争赔款问题、不平衡的国家预算、失业问题、德国在裁军问题上未澄清的地位。1932年2月2日协约国召开了已经拖延了好几个月的裁军会议。冯·巴本希望利用协约国各方意见的分歧使德国国防军事实上已经开始的扩充军备合法化。1932年4月13日，总统对希特勒的私人部队——冲锋队和党卫军下了禁令。

可是，1932年6月14日，总理冯·巴本却又解除了这项对冲锋队的禁令。

凯撒霍夫饭店在任何时候都是纳粹党的行政司令部。除此以外，戈培尔在总理广场的家也是一个会面地点。在这里，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们商讨着后面几天谈判的具体的策略。1932年1月上旬戈培尔努力说服希特勒，通过参加总统竞选来检验他们的实力。希特勒有些犹豫，想到月底再作决定，但是直到2月中旬他还未下决心。兴登堡于2月15日宣布竞选总统。而希特勒却又给自己留了一个星期的考虑时间。2月下旬，希特勒嘱戈培尔在体育馆里宣布他参加竞选。

2月21日晚，柏林体育馆里座无虚席。西区、东区、北区的纳粹军官们都到齐了。集会刚开始人们就热烈地喝彩。当戈培尔用准备了一个小时的发言宣布希特勒将参加竞选时，纳粹分子欢呼的浪潮持续了几乎有10分钟，他们起立、欢呼、叫喊，体育馆的圆顶都快要被冲破了。

集会之后，戈培尔和希特勒一起回到慕尼黑。为了讨好希特勒，戈培尔和他的妻子极尽献媚之能事。他称希特勒是讲故事讲得最好的人……敌对的报纸对他的描述完全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一个比他更适合一个专制统治者的角色……他有这样的天赋，能非常迅速地作出决定。然而，他本人却又是那么无可形容的宽容和友善。玛格达施展她的魅力，母亲般地照顾希特勒。每当那无休止的讨论需要希特勒在她家一直呆到深夜，她就会非常高兴。当时，玛格达新婚后已经怀孕。每当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们到来的时候，就得按他的习惯专门给他做

菜。当时，那些随从总是坐在厨房里，她早就为他们准备好一箱啤酒，还有大量的三明治。玛格达本人也擅长烹调。于是，玛格达就亲手为他制作三餐，照顾周到体贴

希特勒的画像是由纳粹党的宣传员迎合公众的口味而塑造出来，那是一幅卓尔不群却又平易亲切的英雄的肖像——希特勒如何在深夜与朋友们的讨论中为国家的命运而深思熟虑；他又如何省出时间来，在玛格达的丈夫因公出差不在家时到医院去看望她；他如何出于对儿童强烈的爱，“在孩子们向他伸出双臂时”，随时说出一两句玩笑话，露出父亲般的微笑来；他，这位所有优秀的同志中的佼佼者，又如何出于男性的真诚，握住一位敏感的艺术家的手，被描绘成一位沉思着新奇宏伟的设计的画家和建筑师，被描绘成一个有艺术才能的人，他懂得如何在夜晚的小聚会上，在瓦格纳和勃拉姆斯、在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中放松休息。

戈培尔对希特勒极尽吹捧之能事，称希特勒千真万确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权力的接管做准备，希特勒说话、理事、思维都仿佛他已经掌握了政权，如果没有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根本无法想像的。

戈培尔还描述了希特勒是如何在危急的情况下经受住了考验：

竞选总统失败后，当天夜里我和希特勒通了电话，希特勒保持着绝对的冷静，对一切都了解于心，这和我想像的完全一样。我们的目标定得太高了，但尽管如此，我们参加这次竞选也没有错。失败了的战役并不像人们想要避开的战役那样损失巨大，如果我们现在无畏地重新开始工作，我们就能弥补损失……希特勒也立刻下了决心，他一刻也不再犹豫，开始了新的战斗

这使希特勒周围的人又都重新鼓足了勇气。只要希特勒不屈服，那么整个组织就不会垮下去。他牢牢地控制着危险的局势，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怯弱。

其他的照片也照样是令人肉麻的吹捧：射击场上的神枪手希特勒；攀登和游玩在贝希特斯加登山上的希特勒，他站在无人的山巅，远离平原的人群，进行着庄严的思考，作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还有许许多多的希特勒，一个伟大的演说家，正站在高处俯视仰望着他

的人群；希特勒，一个独坐在飞机里的幸运儿，即使在高空中也从不使用供氧设备。

对于纳粹党其他领导人的功劳戈培尔却很少提及戈林有时会受到表扬，冲锋队长恩斯特·罗姆的名字在300多页的文件中仅仅被赞许地提到过六次。相反，戈培尔过去的主子一施特拉塞，则不断地受到攻击和诽谤，以至他名誉扫地，他被人说成是一个疲于争斗的小集团的头子，无论是他在国会中软弱无力的发言，还是他受到“犹太人报绝对的盛赞”，都同样遭到指责。他被尖锐地批评为会使党瓦解的失败主义者。为了达到打垮施特拉塞的目的，戈培尔还称施特拉塞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变色龙”。

1932年12月2日，冯·施莱彻尔将军担任了德国总理。由于得不到议会多数的支持，故其统治缺乏牢固的基础。为了设法获得这样一个基础，并且为了阻止希特勒对于德国共和国的威胁，施莱彻尔试图建立一个包括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工会以及国家社会党施特拉塞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如果他的愿望实现，他就既可以化解来自希特勒的反对，又可以使国家社会党分裂，从而决定性地削弱希特勒的优势然而，施莱彻尔的计划遭到了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反对，他们禁止社会主义工会的领导莱巴特与施特拉塞谈判。

希特勒也迅速做出反应，1932年12月5日，戈培尔受希特勒委托，召集所有在柏林的纳粹党领导在凯撒霍夫饭店开会，而且打电话催促国家社会党议会党团的全体成员参加。有关“联合”问题必须紧急进行协商。施特拉塞试图与施莱彻尔会谈，但每一次都被希特勒阻止。两天以后，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又一次在凯撒霍夫饭店会面，希特勒当面指责施特拉塞背信弃义，并且断言，施特拉塞一定背着他与施莱彻尔举行了会谈。施特拉塞勃然大怒。情景非常尴尬，希特勒怒吼着，狂叫着，列述了施特拉塞犯下的所有他能想到的罪行。当他最后不得不喘一口气的时候，施特拉塞问道：“希特勒先生，这一切都是您真实的想法吗？”

“那当然。”

希特勒吼叫着，使劲儿地点着头。施特拉塞被气得脸色发白，抓起他的公文包，一言不发地走出了会议室。他回到他当时下榻的艾克

西尔西亚饭店，立即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在信里他提出辞去党内一切职务的要求。然后他乘上自己的汽车驶向南方。一切已使他感到厌倦，他决定不再与政治打交道。

“背叛，背叛，背叛！”戈培尔帮着希特勒怒骂施特拉塞。

施特拉塞出走，希特勒在旅馆房间内来回踱步，达几个小时。他陷入了沉思。最后他停下脚步来说：“如果党一旦垮台，我就用一支手枪在三分钟之内一了百了”

施特拉塞的同党非常失望，他们希望把他找回来，可不好找。他没有留言说明他的去向。几天以后，当希特勒和戈培尔对“施特拉塞派”那些同党采取行动并有望达到目的时，他才终于露面。那时，在国家社会党议会党团里仍然有多于三分之一的议员——大约70人站在施特拉塞一边，他们渴望得到坚决果断的领导。如果当时施特拉塞继续留在柏林，并坚定地维护自己的主张，恐怕世界历史将会重写。

1932年底，国家社会党欠下了高达700万或800万马克的债务，这些钱绝大部分花在了制作大量的印刷品上，比如宣传画、传单等等。

戈培尔不断地抱怨“财政危机”。1933年1月4日，巴本、希特勒和银行家施罗德科隆进行了一次“秘密”协商。第二天早晨这次协商就作为轰动性的标题新闻被世界各家报纸刊出。

希特勒知道眼下对他来说是关键时刻，“要么得到全部，要么一无所得”。施特拉塞要在新的选举时提出一份忠于他的国家社会党候选人“竞选名单”，是否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被任命为总理。

希特勒突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他甘心接受支持联合，而且在组阁的具体问题上也表示这可以商量（他甚至甘心接受了让他的政党的少数成员加入政府的条件）。如果总统任命他为总理，他只要求其他两个内阁职位，其余九个部长的位置让给他的谈判对手。这些认为，3:1的多数，可以使长期酝酿的计划将得以实现——希特勒和他的群众运动将可以通过议会的手段加以控制，“元首”将可以按他们自己的标准加以约束。

在宣传领域，戈培尔承认，只有希特勒和他水平相当。他发明了像“宣传艺术”和“宣传艺术家”这样的词汇，以便使他自己的功劳得到

恰如其分的评价在攫取权力过程中和在最后的法西斯政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他的宣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欧洲最现代化和最大规模的宣传。

1932年1月，戈培尔和希特勒非常细致地谈了他未来的那个部门的多方面作用。他们决定，不仅报刊、电台、电影，而且一部分文化事业都将归他管辖。

1932年2月10日，戈培尔自称：我有这种雄心，把今天的选举变成一次宣传的杰作。

我要将工作的重心停留在宣传上，运用所有的技巧尽善尽美。用最新颖和最恰当的方法直接把我们引向胜利，我必须不断克服其他的困难。

他的传单和宣传画上的标题在短时间内就产生了效果。如，在某些地方干脆写着：“自杀吧！”他的宣传活动一步一步地加强了纳粹党新闻组织的建设。他的私人报纸《进攻》由一份可怜的周末小报发展成一份每天都发行的晚报。他自吹我们的宣传画真是棒极了！”1932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得意地写道：

在每5万份报纸中夹带着一张留声机唱片，它小得可以装在一个信封里发送。当我们的支持者把这张小小的唱片放到他们的留声机里时，他们就会大吃一惊。

利用电影进行法西斯宣传是戈培尔的重要举措。当时欧洲刚刚开始放映有声电影，就被德国法西斯的宣传机构拿来为自己服务。戈培尔把一次特意为此目的而设计的东西拍成了电影，并且关心着胶片下一步的发行工作。在戈培尔看完爱森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和普多夫金的电影《袭卷亚洲的风暴》后，他逐渐认识到了政治性电影艺术催人醒悟的功能。1933年1月他写道：

晚上我们看了路易斯·特伦克尔的电影《反叛》，这部电影代表了电影艺术的最高成就。由此人们可以想象出未来电影将会是什么样：

那就是用非凡的生命力一挥而就的、规模极其宏大的群众革命的场面。在一个场面中可以看到，在从一个小教堂走出来的起义队伍的前面，人们抬着巨大的耶稣受难像，它使观众们受到异常的震动。从

这里可以看出，如果一个精于此道的人，他可以通过电影做些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深受感染。

第二天晚上，戈培尔又认真地观看了一遍这部电影。掌握法西斯政权之后，他把德国电影工作者召集在一起传达命令，称对于未来德国的电影作品来说，特伦克尔的《反叛》是一部典范之作。

在攫取法西斯政权之前，戈培尔仍努力进行有组织的准备工作。他称“我们的广播组织”正有力地向前迈进。现在只差一步，那就是我们还不能够利用广播电台，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我们迟早、也许一夜之间就会上台执政。

操纵政权之后，戈培尔设想着他的宣传的天国：

现在继续斗争就容易了，因为我们能够使用国家的一切力量。广播电台和报纸随时都可供我们使用，所以要给大家看一个宣传的杰作，而且这一次，当然不愁没有经费了

对手们对于大规模广播宣传的可能性尚未了解，因此我们将不放过这种可能性……我们决定，元首将在每一座有自己的放映发射站的城市讲话。我们将把无线电广播传播到群众中去，并且让听众们看到一个生动的画面，让他们看到在我们的集会上发生的一切我本人将在元首每一次讲话前首先发言，我要试图让听众们感受到我们群众集会的气氛和魅力。

但在1932年忙碌而疲惫的争斗中，戈培尔的活动只能局限在挑衅和引起轰动效应上。在纳粹党的军队被宣布为非法的那一段时期，他还带着四五十名冲锋队成员闯进了波茨坦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这些人尽力地大吵大闹。戈培尔希望，他们所有的人都被捕，由此产生一起特大轰动事件。但警察却没有理他。

1932年7月，纳粹党针对国会选举的宣传画贴到了柏林街头的广告柱上。戈培尔自夸：

我们已经制作好了宣传画，如果它不被禁止的话，它将把整个帝国的首都弄得乱七八糟因为我们攻击了伊希多尔·魏斯，警察总局已经把《进攻》禁了五天。魏斯现在明显处于窘境，他正在尽其所能地挽救他那微乎其微的声誉。

戈培尔喜欢用狠毒的恶意中伤来“调剂”他的宣传。在勃鲁宁下台前不久，他使这位总理的形象在巨幅宣传画上出现，公开地显示他与纳粹党意见不和。戈培尔非常清楚地知道，为了参与纳粹党的“表演”，勃鲁宁决不会出席他的集会。他期待着勃鲁宁的拒绝。果然，勃鲁宁立刻就拒绝了。仅仅一个小时以后，这条消息就被用广告公布了出去。戈培尔站在讲台上，在他面前放着几只箱子。为了给听众取乐，他解释说，虽然总理“逃避”了论战，但我还是把它带来了。箱子打开了，露出来许多唱片。接着，勃鲁宁各种讲话的片段由扩音器里传出来。这些片段完全脱离了上下文，被非常巧妙地重新组织了起来，这给戈培尔写讽刺性的评论文章提供了机会。他随心所欲地反驳这位总理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戈培尔本人也成了这种宣传的牺牲品。英国的无线电台在它的德语节目中，从希特勒和戈培尔的讲话里寻章摘句，故意找出内容相反的语句，揭露他们之间明显的“矛盾”，以便戳穿他们的谎言。

1933年1月15日，在利珀举行州议会选举。纳粹党这次急于取胜。戈培尔决定把他庞大的宣传机构的全部手段都集中到在利珀的选举中。戈培尔亲自穿梭于利珀的乡间，他在小酒店里对着几十个人发表演讲。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他甚至挨家挨户地进行宣传。成千上万的冲锋队队员突然出现在宁静沉睡着的城镇和乡村，他们把敌对政党的宣传画都从墙上撕了下来。整个白天都可以听到军乐声。可以喝到免费送的啤酒，晚间可以看到高举着火炬的游行队伍。

敌对的报纸讽刺说，这是“用大炮向麻雀开火”。但是，选举的结果证明戈培尔是对的，纳粹党在竞选获胜。

在进行煽动方面戈培尔是个内行，特别是他喜欢主持葬礼。他可以把每一个在巷战中或者在争斗中丧生的冲锋队或党卫军成员的葬礼变成一次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1932年1月26日他写道，“我们安葬了冲锋队的施瓦茨同志”，“这情景是多么令人感动！在墓地，我朝着坟墓大声叫嚷，发泄我的全部愤怒。”

1932年11月11日，戈培尔在舍内贝格，为冲锋队队员雷皮齐举行葬礼。他说，这位队员是在罢工中被枪杀的。有4万人来为他送葬，就好像他是一位王侯。几架飞机在墓地上空盘旋，飞机上插着几面三角

旗，上面的“卐”标志若隐若现，它们仿佛要对死者致最后的问候。冲锋队成员们被这场面深深地感动了。

另一个葬礼场面：

被安葬的叫瓦格尼茨。柏林市的不少群众参加了他的葬礼，仿佛安葬的是一位王子。中午，把他的尸体从太平间取出来，后边跟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冒着濛濛细雨，穿过柏林的郊区，所有的人跟在这个被杀的年轻纳粹分子的灵车后面，穿过接连不断的人墙，走了足足两个半小时。冲锋队、党卫军和青年组织的全体成员来为这个青年纳粹分子送行。成千上万人走出了家门。在黄昏来临的时候，送葬队伍到达了墓地，不少群众带着深深的悲痛伫立在街道两旁。直到大约午夜，有1万人从这位16岁的青年纳粹分子的墓旁走过。

再有，纳粹党青年组织成员诺尔库斯的死也给戈培尔带来了政治上的好处。

由于戈培尔此时又一次被暂时禁止公开地发表政治演讲，因此致墓前悼词恰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发言的机会。戈培尔讲：

我们冒着严寒为青年组织成员诺尔库斯举行葬礼，我面对聚集在细长的棺槨周围的孩子们和男人们，发表了我发自内心的悼词。这个青年的父亲显得异乎寻常地勇敢。一个朴素的工人，脸色苍白，在《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的乐曲声中高高举起手，满怀愤怒和骄傲地唱着：“高举旗帜！”……

1932年，戈培尔的纳粹活动几乎疯狂到了极点。5月下旬在普鲁士邦议会全体会议上，紧张不安的气氛突然发展到了极点。先是共产党人辱骂我们中的一个杀人犯，然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头目皮克又从讲台上走出来，对我们进行最无耻的挑衅。紧接着，一个共产党人打了我们党一个财民一记耳光。这正是报复的一个信号。简而言之，我们打算决战到底。于是，我们使用了墨水瓶和椅子。三分钟之后，大厅里就只剩下我们了。共产党人被棍棒打了出去，而中产阶级政党的议员们早已提前溜之大吉。我们党团的全体齐唱《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有八个来自不同党派的议员受了重伤。会议大厅呈现出一派“壮观”的狼藉景象，我们作为胜利者屹立在战场上。

两三天以后，戈培尔把整个事情“用史诗般的广度”向希特勒叙述。希特勒竟兴奋得搓起双手来。

从1932年6月1日到7月20日，在普鲁士邦就发生了461起殴斗，总共有82人死亡，400多人重伤。1932年6月10日，星期天，在阿尔托纳的巷战中有19人丧生，差不多300人受了重伤。

1932年，戈培尔的法西斯暴行，引起德国各阶层卫生员起而攻之。一次在杜塞尔多夫和艾尔伯尔费尔德戈培尔身穿制服，坐在毫无遮盖的敞篷汽车里。街道两旁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汽车开动时，狂喊声四起，戈培尔座车的速度逐渐加快，从一条街驶向另一条街，遭到了石块的袭击。戈培尔吓得绕道离开了这座城市驶进杜塞尔多夫城，但同样也遇到了很多危险和困难。

一次进入鲁尔区。戈培尔首先到达艾尔伯尔费尔德，换乘了另一辆汽车，以防自己柏林牌号的车被认出来。在艾尔伯尔费尔德，报纸把群众都召集到了街上。通向火车站的路全都被堵死。人们把戈培尔的汽车当作是一辆普通的轿车，才得以通过。在车上装了很多遮蔽物，驶向明兴一格拉德巴赫。深夜，戈培尔在旅馆里和鲁尔区纳粹党的头目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

戈培尔把冲锋队和党卫军的增援部队召集来参加壮大法西斯暴行，戈培尔像一个重犯一样离开自己的家乡，接下来遇到的是咒骂、嘲笑和唾弃。人们向他投掷石块，朝他啐唾沫。

十月份，国家社会党和德意志民族党一起在柏林新克尔恩区的“新世界”大厅里举行了一次公开集会。双方事先讲好，两个党各自分发一半入场券。但是，戈培尔违反这种协议6:30分新克尔恩区集会地点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德意志民族党人面对这种局面显得手足无措，纳粹分子有1万人蜂拥而至。

建筑物前聚集了大量群众，其中有很多高声叫喊的纳粹党员。好几百人进了大厅，激烈的争吵正在进行，集会的负责人不知所措。当戈培尔在一些人的陪同下走进来的时候，难以形容的欢呼声一直可以传到赫尔曼广场集会开始之前，戈培尔被举止像疯子一样的冲锋队队员托在肩上，狂呼乱叫地走进了大厅，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民族党的绿色卫队全都躲到了两侧的墙边。

“先来者先磨”，戈培尔用这种玩世不恭的办法保证了国社会党在室内集会时人数上占了优势。他利用大约500张伪造的入场券欺骗了集会的伙伴。民族党的辩论对手缺乏演讲技巧，并且演讲一直长时间地被冲锋队有组织的嘘声所干扰，民族党集会的领导向戈培尔提出意见。戈培尔制止了嘘声，使全场重新安静。

戈培尔发言，驳斥的论据劈头盖脸地落在了对手头上，大厅里的欢呼声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德意志民族党人开始退却，那位发言人还想再一次挽回败局，但他的讲话被在场纳粹分子的叫喊和嘲笑声所淹没集会的领导者坐在他的椅子上就像一个毫无办法的老人，纳粹分子捣乱获得了胜利！

集会上发生的事情传到了外面的大街上，游行的队伍已经组成。纳粹分子用洪亮的声音高唱《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这歌声在晚间落日的天空中回荡，然后，戈培尔把战场马上就转移到了新闻界，发行100万份报纸特刊，攻击德意志民族党想要借助它在新闻报道上的优势反败为胜。

夜里3点戈培尔的工作完成了……6点钟，戈培尔的报纸分发到各个地铁站戈培尔在集会上捣鬼玩花招，事后他每次又发誓否认这些是他所为，靠着这个本事戈培尔说服了德意志民族党人，使他们相信国家社会党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戈培尔解释说，如果国家社会党分裂，成千上万的冲锋队队员就会站到共产党一方。对于厌恶任何一种极端主义的中产阶级来说，两害相权，择其轻者，这是非常清楚的认识，国家社会党在他们看来无疑是那个轻者戈培尔一直坚信，发表演讲要比写文章效果明显。他认为，在纳粹的宣传机构中，写作的工作总归不是很好，因为即使是文豪，要他用自相矛盾的空洞的言词引起读者的共鸣，也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演说中的语言却可以在群众集会上产生直接的影响。

1932年10月1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的新闻机构将有所改变。已取得的成绩还不能完成现在必须完成的扩大了的任务。在选举期间，报纸的宣传效果无论如何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点我们的记者却不能理解。他们往往过于细致认真，也许做科学工作比做新闻工作更适合于他们……我们的宣传员要比他

们强，他们每天、每晚都和广大群众保持着最直接、最亲密的联系他们精通自己的业务，他们是我们党的一支精锐部队，在我们的阵营里，可以找到德国有史以来创造出的最了不起的演说家。

从1932年1月至1933年1月的13个月中，戈培尔几乎每天都发表演说，他效法传统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竞选时采取的“Whistle - stop”方式，即两倍候选人每人乘坐各自的专车，在几个星期里周游全国，在每一站，哪怕是在小集镇，他们也停留几分钟，对聚集在专车周围的居民发表简短的演讲。戈培尔使这种方法变得现代化了，在飞往德累斯顿的飞机上，他用专机替代了专车。

飞机在风雨中飞行。希特勒和戈培尔的小型单翼飞机晃来晃去。突然间飞机垂直地飞速向下落，最后在德累斯顿降落。希特勒在体育馆内面对3万人发表演说后，又坐着飞机飞回柏林，赶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在柏林机场着陆，改乘汽车前往梅克伦堡。有1万人从下午4点开始就在诺伊施特累利次等候着希特勒和戈培尔。晚上8点多，两人的讲话一结束，马上穿过一条条不平坦的道路前往什切青，道路两旁都是疯狂的人群。直到午夜以后，他们才到达那里，进行演说。

这些“宣传飞行”都是由戈培尔精心策划和组织，由冲锋队的军官帮助实施的。

戈培尔觉得最舒服的地方是柏林体育馆

这个体育馆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帝国最大的政治讲坛，一种与众不同的影响正是由此地产生的。如果走进这座大厅，人们会马上被挤满的人群所打动……音乐首先响了起来，然后是人们高举传统的受人欢迎的旗帜，身穿制服齐步走了进来……在这座讲台上演讲是一种高层次的享受，演讲时人们可以忘记时空。我讲了两个半小时多，我一次又一次地抨击内阁，最后人们热烈地喝彩。

1933年1月22日，希特勒发表了他上台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说，这是针对冲锋队和党卫军的一次讲话。在这之前刚刚进行完一次反对共产党的街头示威游行。行军队伍已挑衅地聚集在共产党党部门前。施莱彻尔总理由于担心着公众的安全，干脆对共产党的队伍下了禁令，但却没有阻止国家社会党的纵队前进。在警察的保护和装甲车的护送下，褐衫部队开赴比劳广场，对德国共产党进行攻击。有一次，

因为戈培尔把汽车停错了地方，他和一名警察发生了小小的冲突。戈培尔一怒，引起了激烈的争吵。当一大批围观的群众聚集在他身边时，他就用最下流的方式辱骂那名警察，说他是共产党人，而且在不断增多的人群面前发表了一番反对政府的颇具煽动性的讲话。

1932年1月，戈培尔感叹道：

如果人有了权力，就会有足够的金钱，但是然后人就不再需要它了。如果人没有权力，人就需要金钱，但却又得不到它。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戈培尔对群众发表演讲。光冲锋队的入场式就持续了40分钟，那景象颇为壮观。大厅里挤满了人，戈培尔精神为之一振……

当戈培尔面对很有影响的听众时，他会格外地努力，因为纳粹党正等待着这些人的承认和资助。

这期间，戈培尔有时相信的只有他的玛格达。1932年9月1日，玛格达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女儿赫尔加在圣诞节前夕，她重病卧床。戈培尔的感受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圣诞节。他心情沉重，内心充满了忧虑。戈培尔唯一的安慰是，小哈拉尔德在他的身边。哈拉尔德是玛格达第一次结婚生下的孩子。他和小哈拉尔德坐车来到医院，在外面的走廊里，点燃了一棵圣诞树上的蜡烛，举行了一次小小的令人悲伤的圣诞庆祝……这时，希特勒发来一份非常亲切的电报，他也是孤单一人的圣诞节。1933年2月1日，玛格达出院回家，时为希特勒上台后的第三天。希特勒多次来探望她，并把鲜花送到了她的床前。

戈培尔偶尔也在一天长时间繁重的活动后听听音乐得到休息，但他更多的是一个政治上的斗士，他夜以继日地为了他的目标而奔波。

1932年7月17日，戈培尔第一次通过广播发表演讲。由于早已习惯于面对着众多热情的听众，他在这司空见惯的麦克风前并没有感到什么特殊的喜悦。戈培尔颇有感触地说：

我第一次在广播里讲话，但我却有这样的感觉，我的演讲并不具有说服力那个由内政部任命的国家广播电台的代表剪短了我的翅膀，打断了我的牙齿。没有了翅膀，人就不能飞翔；没有了牙齿，人就不能咀嚼。我倒愿意晚上在施特格利茨、哈伦泽、新克尔恩讲话，那里

的大厅里总是挤得满满的，而且所有的人都被一种疯狂的斗争热情所感染。

戈培尔喜欢故意挑起事端，侮辱别人，他总是尽可能公开地用血腥的方式进行报复。有一次，一份“街头小报”对他和他妻子进行了私人攻击，戈培尔就派了手下的一个暴徒到编辑部找到那个编辑，用马鞭痛打了他一番，直到他浑身是血地倒在地板上。然后，这名纳粹分子把名片放在桌上，扬长而去，在场没有一个人敢去拦阻他。

1932年1月，在库尔菲斯腾达姆大街又发生了一起流血事件。事后，冲锋队的头目格拉夫·黑尔道夫和几个冲锋队成员受到指控，戈培尔也作为目击者被传讯，戈培尔和检察官在地上扭打了起来。最后，戈培尔高声怒骂检察官，然后让人把一份满纸侮辱之词的声明记录了下来，交了500马克罚款，被释放。那些被起诉的冲锋队队员笑得前仰后合，他们也都被释放了。

在这次审判后不久，戈培尔又一次被他的老对手魏斯禁止在三个星期内在公共场合讲话。1932年2月，因为戈培尔冒犯总统，被驱逐出国民议会。4月，戈培尔以攻击国家元首的罪名被最高法院起诉。那是一份发自莱比锡的长达40页的起诉书。可紧接着戈培尔搞到了一份州议会议员的委任书，这使他又重新获得了议员豁免权。到了5月，对他的起诉撤销了。7月，戈培尔在家乡莱特遭到了石击。11月选举前不久，政府交给《进攻》一个任务，将这一系列事件刊登出来，澄清真相。戈培尔把所有零售的报纸都拿来，并让人把它们“庄严地扔进护城河里”。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在他的内阁里暂时只有三名部长是国家社会党人。

在很短的时间里，德国剩下的那一点可怜的民主也被扼杀了。戈林成为普鲁士邦内政部长，政府内特别是警察局的所有重要职务都由绝对忠实可靠的纳粹党人取而代之。敌对的报纸，而且不仅仅是左派的，包括中产阶级的都被查封。1933年2月24日，德国共产党在柏林的总部被纳粹党占领。三天以后，国会纵火案发生了，这为纳粹党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时机，正像戈培尔描述的那样，他们不仅“要把所有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压制下去”，而且要按照早已精心拟定的名单，

把成千的政敌拘捕，不管他们是极左派还是极右派。戈培尔详细记述了1933年2月27日晚上发生的国会纵火案。

晚上我在家里工作9点钟元首来吃晚饭，我们边听着音乐边交谈。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国会起火了！”我想这一定是假话，所以连提也没向元首提起。我向多方打听消息，终于得到了可怕的证实，国会确实起火了。从巨大的圆顶里喷出熊熊燃烧的火舌，有人纵火！……我马上把这消息告诉了元首，然后我们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从夏洛腾堡公路驶往国会。整个建筑都起了火。我们越过一根根粗大的消防水管，通过2号大门，来到了巨大的长廊里。这期间戈林迎面而来，过了一会儿，巴本也到了。从种种迹象可以断定，这是一起纵火案。毫无疑问，这是共产党人的最后一招，他们试图通过纵火制造恐怖事件来引起混乱，以便在混乱中夺取政权。

后来，国家社会党自己承认国会纵火案是它所为，是以此借口击败当时尚有600万选民支持的、有84个议会议席的德国共产党。

此后，纳粹党成功地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怖行动”的谎言对年迈的总统施加压力，迫使他签署了紧急命令。在这些紧急命令的帮助下，希特勒把一个民主德国变成了一个国家。

1933年3月5日，即国会纵火案后的一个星期，举行了新的选举。戈培尔竭尽全力把他的热情全部投入到选举中。他第一次无所顾忌地使用经费，随心所欲地印刷大量的宣传画和传单，举行群众集会。同时，其他政党却因为报纸被查封，集会受到禁止，在宣传上明显受到了阻碍。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选举的结果才使国家社会党格外失望。希特勒的政党只获得了不足43.9%的选票，在4000万选民中只有1700万支持希特勒。为了达到51%的微弱多数，纳粹党还需要从“联合的伙伴”那里得到7%的选票。于是，纳粹竭尽全力压去共产党的全部议席，社会民主党和中产阶级政党不起任何作用。

下午，纳粹所有要人都坐在国务总理办公厅里焦急地等待着最后的结果。希特勒还像往常一样。

晚上，纳粹要人在歌剧院听歌剧《女武神》，伴随着瓦格纳醉人的音乐，外面传来钢盔团纵队经过时的有节奏的脚步声。在柏林，3月

5日是法西斯最重要的一天。

接着传来了第一批消息，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

法西斯上台。从此，一个个事件接连发生，希特勒的政权也一天天地变得更加肆无忌惮。那些“联合伙伴”只能无力地看着他们的议会议席被抢走。

1933年3月14日，戈培尔被任命为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长。两天以后，在一次讲话中他重申了宣传对于新政权的必要性：

“像我们这样一个需要经常信息处理大决策的政府.....必须通过宣传措施把人民群众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国民的教育在根本上是被动的，而宣传则是主动的.....我们有决心对人民群众施加影响，直到他们归属于我们。”

六、宣传部长

柏林威廉大街宣传部大本营的老式房屋，是一座出自建筑大师申克尔之手的漂亮房子，但在30年代初则显得十分陈旧过时了。戈培尔上任后，决定不惜摒弃传统的一切，把这幢漂亮的大楼现代化。他下令除去所有的帘子，除去所有的石膏花饰。他的这一举动，使一群在历届政府手下都忠实地履行自己职责的两鬓斑白的官员们大吃一惊。戈培尔根本不顾这些，他在日记中写道：

由于在改建中，甚至在布置我自己的房间时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我干脆从冲锋队中找来了几个泥瓦匠，让他们在夜间把所有的石膏和木头装饰都敲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塞满了书架的老掉牙的报纸和卷宗都被一股脑儿搬到了楼下。只剩下弥漫的烟尘还记录着业已消失了的官僚主义的伟绩。

当那些我接下来就准备撵走的尊敬的先生们第二天出现在部里的时候，他们都大吃一惊。其中的一个惊魂未定，张口结舌喃喃地说：“部长先生，您可知道，您会为此而坐牢的？”现在滚一边儿去吧。我好心的老头儿！如果那消息还没有传到你耳朵里，那么我就在这里再特此郑重地重申一遍：德国正经历着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决不会在几卷破卷宗面前停止……

戈培尔的举动得到了希特勒的支持。为此，戈培尔松了口气。被解雇的工作人员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在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的第二天，戈培尔满意地在日记中写道：

现在，部里的改建工作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一切阻力都被摧毁，只有在角落里才会隐约听到几声垂死的官僚主义的啜泣。

戈培尔对于宣传部大本营房屋的做法，可能已经暗示了他将采取的种种措施。

戈培尔上任后没几天，听到了希特勒对德国民众的广播讲话。立时，他为之激动，“油然而生的庄严感使他浑身发抖”。他喋喋不休地一再宣称：“对我来讲，这就好像是一场席卷了我们的历史风暴。”

在刚刚攫取了权力之后的几周、几个月里，法西斯政权组织了无数个“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各种形式的群众集会令人眼花缭乱，德国的民主被践踏，每天都有不受欢迎的人被解雇，被抓走，被虐待。德国政府中的关键位置全部被纳党党员占据。

法西斯分子阿德米阿尔·列维佐夫被任命为柏林警察局局长，卢泽为汉诺威警察局局长，舍普曼为多特蒙德警察局局长。法西斯逐渐占领了行政管理机构。戈林像个清道夫，旧政府官员一个接着一个垮台。

戈培尔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顿报刊杂志和无线电广播。无线电广播，在戈培尔上任之前，所有的要害位置都由那些老官员占据着。戈培尔发誓，必须尽快撵走他们。

对报刊杂志，戈培尔也“采取了有力措施”

现在，报刊杂志也有把柄落在我们手中。今天，禁令要在他们头上炸响，这实在干得太好了。《前进报》和《晚八点晚报》，所有那些犹太人的喉舌，那些令我们气恼、头疼的刊物，要在顷刻之间便从柏林的大街小巷销声匿迹这就像一剂精神上的良药使我们得到安宁。

柏林稳定后，戈培尔和希特勒一起飞往斯图加特，去那里同样进行清理”。

由于我们在夜间无法返航，我于是立即把无线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召集到旅馆来，并且以某种令他们晕头转向的方式向他们吹风。就在第二天，他们当中就有两个人接到电报被免去职务。现在，其他的人再也没有兴致搞阴谋来妨碍我们了。

到1933年2月底，德国有60家共产主义、71家社会民主主义的报纸被禁这些报纸的主要编撰人员被投入监狱或者盖世太保的地下室，最终又被送到新建立起来的法西斯集中营。到4月底，几乎所有的反对派报纸都已消失。

“波茨坦日”是德国的一个盛大节日。纳粹分子集中力量准备充分利用这一节日。1933年3月19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

我在波茨坦进行实地考察，看是否一切都准备就绪。在如此隆重的国家庆典中，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至关重要。

戈培尔把这次隆重的庆祝活动安排在波茨坦的加尼松教堂举行。这座教堂给法西斯运动镀上一层政治的光辉。德国总统封·兴登堡被安排在这场隆重庆祝的中心位置。新总理希特勒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他表示了一种精心设计的示范性的恭敬。

知道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和我们在一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怎样的幸福！我们现在与他同行，这是命运的一个怎样的转折。1933年3月21日，发生了下述情景：

从柏林到波茨坦，汽车在无尽的欢腾的人群中穿行。波茨坦沉浸在一片彩旗飞舞、生气勃勃之中。内阁成员和议员们几乎无法从尼古莱教堂走到加尼松教堂。我们简直被人群挤得寸步难行。兴登堡和元首一起步入加尼松教堂。会场肃然。帝国总统简短而严肃地宣读了致国会议员和德国人民书。他的声音专注有力——在我们当中有这样一个，他是几代人的化身，接下来由元首讲话。他的演讲充溢着直透人心、强大的说服力。在结束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被深深地震撼了。我坐在兴登堡旁边，看见他的眼泪怎样涌眼眶。人们都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向着年轻的总理伸过手……现在号角响起。帝国总统站在高高的检阅台上，手执陆军元帅权杖，向在他面前列队走过的德国国防军、冲锋队、党卫军、钢盔团致意。他站在那里，检阅着队伍。人人头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上帝之手庇佑着这座代表着普鲁士的伟大的责任的灰色之城。

在举行礼拜之前，希特勒和戈培尔一起离开了教堂，共同驱车前往路易斯城市公墓

节日演出把这一天的活动推上了高潮一场精彩得令人如醉如痴的演出，把一切都浸蕴于音乐之中。

3月21下午，这个月5日新选举出来的国会议员们济济一堂由于老的国会大厦被烧毁，这届新国会的开幕式在科罗帕举行。国会议长赫尔曼·戈林宣读了将于此后第三天召开的国会的议事日程。最重要的议题：商讨法西斯朝思暮想并从1932年起就精心准备的《授权法案》。

波茨坦上演的一幕证明了这是一次成功的投机。在这里，法西斯向全世界显示，他们怎样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对老德意志和普鲁士的传

统负有责任。当希特勒在1933年3月23日发起总攻向民主发难时，社会民主党主席韦尔斯是唯一说“不”的政党领袖。

1933年3月24日，《授权法案》生效。由授权法授权宣布的紧急状态的有效期本来是暂定为四年，而实际上却一直延续到第三帝国灭亡，有十二年之久。它一直被当作支持希特勒强权统治的宪法性文件。1933年3月22日，戈培尔迁入了修葺一新的宣传部。

我的新房间很合我的口味。阳光、空气、光线。这里可以让人工作下去……晚上，我和我的泥瓦匠们，他们都是冲锋队的老同志，坐在一起，共同庆祝胜利竣工。他们绝对是一群出色的小伙子。他们理所当然地和我一起大开官僚主义的玩笑，从中取乐。

1933年“三月选举”前后，希特勒和戈培尔常常是两个人一起到德国各地去旅行，到处发表正式演讲。1933年2月到4月间，戈培尔两次访问了他的家乡莱特。几个月前他还在那里被唾骂，而现在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第一次访问只是为了看望他的母亲。戈培尔携玛格达和尚在摇篮中的6个月大的女儿同行，但是他这一次只能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

4月份，戈培尔对自己的故乡进行了一次正式的公务访问。此时他就任部长已有1个月。他的日记展示了此次荣归故里给他所带来的巨大满足感：

我的这次故乡莱特之行就像一次无与伦比的光荣凯旋。我接受了故乡的盛大欢迎会，借此以恢复母亲的名誉。她几年来在这座小城里被谩骂，被指指点点，被轻蔑，被跟踪，无穷无尽地在这种境遇中煎熬。人们都知道，在这种小市民的圈子里是怎么回事。社会的唾弃会要人的命。多年来由于自己那仇视教会、政府和社会的不孝之子而不得不忍受叹息和愤怒，对一个老妇来讲实在是一种折磨……因此我回到莱特，为了在这一天向母亲表明，她为了我和我们的事业的缘故而忍受的一切没有白费。对一个平民妇女来讲，再也想像不出比这更有说服力的方式来洗刷自己的名誉了——数以万计的人伫立于街道，全城轰动，整个社区沉浸于无与伦比的旗帜的海洋……星期一中午，我回到了母校。有九年之久我和我的老朋友们在这里学习、生活。我登上学校礼堂的大讲台发表演说。16年前，我曾代表我们那届毕业生在这

同一个讲台上发表告别演说，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演说。那次，在我讲完之后，如今早已作古了的年迈的班主任向我走来他像个朋友似的和蔼地拍着我的肩膀：您的确是资质不凡，但可惜并不是个天生的演说家。

这证明，在那几年中他是怎样充满关切、充满理解地看待我的性格和资质的。

戈培尔的孩提时代的朋友弗里茨·普朗的母亲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这个荣归之日的小故事。

戈培尔在阳台上站在她的旁边，俯视着欢呼雀跃的人群。“这帮无赖”，他一边容光焕发，微笑着向下面挥手致意，一边对他学生时代朋友的母亲低语，“这下面大概就是在几个月前向我扔石子、吐口水的那群蠢猪。哼，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在法西斯夺取政权的几个星期之后，戈培尔把电影工业和电影期刊的领导人约请到皇宫旅馆，向他们说明他对德国电影未来的设想。他首先请他的听众对新政权在经济上的稳定性放心，并声称，现在电影工业可以制订出长期的计划，而在这以前的“秩序时代”是不可能做到的。

这剂“定心丸”是举行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因为戈培尔担心，在他们夺取政权之后，电影生产实际上进入了一种停滞状态。尤其是乌发电影公司，它的老板路德维希·克里茨那时还不想完全相信新政权的稳定性。此外，作为一个与世界电影市场息息相关的企业的领导人，克里茨还担心国外普遍的对嗜血的新政权的愤怒会严重威胁德国电影的销路再加上他还害怕戈培尔在新拍摄的影片中进行“世界观教育”，从而使德国电影无法销往国外。

德国电影工业的萧条不仅在经济上是一种损失，而且在名誉上也是一种损失。戈培尔在这些电影工作者面前施展了他的全部把戏。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狂热的影迷，他对这些电影工作者说，他要为他们给他带来了那么多的欢乐和享受而感谢他们。他还告诉他们，他怎样经常地和同他一样热爱电影的元首一起在电影中寻找放松，得到了休息。至于说到在座的先生们显然在担忧的世界观教育问题，他们对此只管大放宽心。电影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要让观众们感动、高兴。

而与此相反，政治社论做不了电影素材。倘若今后有这样或那样一部电影在主题上接近“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财富”，这也只能算做例外，而不是什么规定。

戈培尔彬彬有礼而又谦虚地说，如果从事电影工作的诸位能拍出《战舰波将金号》、《尼伯龙根》、《安娜·卡列尼娜》和《叛逆者》类的名片，那将是德意志民族的骄傲。戈培尔说完这些后，那些被召集在一起的专业人员们简直无法掩饰他们的惊讶。因为部长提到的这四部影片中，有一部是苏联电影，另外一部是好莱坞出品，而在所有这四部电影中，犹太人或者担任制片人，或者出任导演，或者是编剧。这与纳粹及犹太观点是大不相容的。

由于戈培尔还担负着更加紧迫的任务，故不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专注地投身于电影工业帝国电影协会—电影生产的中央监督机构，直到1933年9月才得以成立。

戈培尔宣传攻势的主要媒介仍然是报刊杂志和无线电广播。和报刊杂志打交道，戈培尔确实已有多年的经验。而无线电广播在那时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相对来说还比较新鲜，其效果亦未经证实。戈培尔便在这里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从1928年开始，德国的无线电广播事业就集中在邮电部的领导之下，所以在组织上并没有出现特殊困难私人广播电台并不存在。戈培尔只需要把业已存在的管理机构归入自己部里，并在关键位置安插上可靠的纳粹党成员，就可以大功告成了。他很快扩大了广播电台的数量及覆盖面。无线电收音机工厂接到命令，尽快生产出一批价格低廉的“大众收音机”。戈培尔的目标是，在德国每一幢住宅中都有一台收音机。在一年之中，卖出了100万台新制造出来的收音机。1934年，德国使用收音机共有600万台。到1938年，达到950万台。为了初步实现“每家一台收音机”的目标，一种更小更便宜的收音机紧接着被投放市场。此外，每当重要的时刻，例如当希特勒发表演讲时，为了在学校、工厂里、在公共场所甚至在露天广场上能够进行实况转播，戈培尔还命令安置了特制的扩音设备。1935年，戈培尔自豪地宣布，他为希特勒的演讲一次至少可以召集5600万听众。戈培尔宣称：“我们通过无线电广播已经消灭了反叛的精神。”通过宣传部的广播公司和德国广

播协会，戈培尔完全控制了广播事业，以达更能随心所欲地运用的目的。

1933年4月，戈培尔就职几个星期之后，就实施了针对德国犹太人的第一次抵制行动。他授意宣称：世界舆论对新的德国政府的暴行作出的公开报道，是由于犹太流亡者的“恶意挑唆”。为了让他们闭上嘴巴，就要对仍在德国境内的犹太人进行惩罚。“宽容大度不会给犹太人留下什么印象。他们必须看到，我们是敢于做任何事情的”。在戈培尔等人的安排策划下，4月1日，柏林所有犹太人开的商店门前都站上了冲锋队队员，以阻止顾客进入商店。

只有一些勇敢的人——绝大多数是那些不会因此而招致什么危险的外国人——毫不顾忌地从岗哨面前走过，执意走进商店。戈培尔第二天傲慢地宣称，全世界的犹太人已受到了教训，他们已放弃了恶意挑唆。之后，戈培尔的举措便收场了。而实际上，他做到的当然只是激起了世界舆论对这场“抵制行动”粗暴行径的强烈谴责。但戈培尔却指望没有几个人会觉察到这一点，因为在德国只有很少的一些人可以读到外国报刊。

接下来，戈培尔把手伸向了社会主义工人的传统节日——5月1日。戈培尔决定，对已经被摧毁的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一劳永逸”地釜底抽薪，把这一天变成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民族节日，变成“德国人民的伟大节日”。5月1日作为“德国工人日”而被宣布为国家节日。1933年3月24日，戈培尔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相应的法案。

活动计划于4月26日完成，4月28日举行了总预演，5月1日德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的活动。在柏林，游行集会在腾珀尔霍夫广场举行。新帝国的首脑们浩浩荡荡乘车前往会场。车子启动之前，戈培尔的继子哈尔德向坐在总理希特勒身边的白发苍苍的帝国总统敬献了一束巨大的玫瑰花束。他们这回又拉上了这位老先生，用他的威名来装点这次盛会。在腾珀尔霍夫广场，总统和总理对乘专机从德国各地赶来的工人代表们致以热烈的欢迎。当扩音器中传来一个接着一个的激动人心的发言的时候，肉山酒海被用来款待所有的与会者夜幕降临的时候，在探照灯的光线下，这场演出继续进行。戈培尔是如此说起那天聚集在腾珀尔霍夫广场的150万人的：“简直难以用言语形容”，“腾珀尔霍夫广场上，人山人海，望不到尽头。探照灯的光柱闪耀着，明亮

地在人群上空掠过。被照亮的一大片地方只见到人头攒动。”继而，戈培尔又自鸣得意地说道：“再没有其他的群众性运动会像我们的运动会这样了解怎样调动群众，有能力组织起如此盛况空前的集会了。”

对参加这次集会的“希特勒青年团”的编队，戈培尔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我从自己内心的最深处向你们讲话。如果人们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他们就知道在孩子们面前说些什么。”

在这个重大的节日来临的几个小时之前，鲁尔区发生了一场井下事故。有几名矿工丧生。这场悲剧为这个法西斯煽动家戈培尔又提供了一个进行宣传鼓动的契机。

我插入了一分钟，为在埃森遇难的矿工默哀。全国上下一片肃静。扩音器把这静默传送到城市、乡村。在这举国震动的时刻，举国上下所有的阶级、阶层都被联结在一起

甚至连天气都被戈培尔精心编排进了这场演出。这一天本来是春寒料峭，烟雨濛濛。而就在希特勒走上讲台的一刹那，太阳从云端露出了头，讲台沐浴在金色的光辉之中，希特勒的头上环绕着一层灿烂的光环。在戈培尔的授意下，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如上所述报道当时的情况。

当戈培尔在会场上准备结束他简短的开场白的时候，他适时地注意到，灰色的浓云正被西风吹开。于是戈培尔又把自己的发言延长了几分钟，并且准确地把握了结束语：“下面请元首讲话。”值此，当太阳真正地穿破云层之际，希特勒正好登上演讲席。

戈培尔策划这场规模空前的演出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它为一场新的暴行做了准备。在他的日记中，有两行文字详尽地表明了这个意图。而这两行字毫不引人注目地夹杂在描绘节日尾声的华而不实的词藻之中，首先是这样写道：

我们成了第一个亲如兄弟的民族。给我们指明了道路的人，此刻笔直地挺立在汽车上，穿过围绕在他周围，由人的躯体组成的凯旋门，驶回威廉大街的办公室。隔了两行，他又写道：

在帝国总统办公厅楼上元首的房间里，我们和他一起矗立在窗前。从远处传来了离开腾珀尔霍夫广场的人们的歌声和高呼“万岁”的声音。而在这两段之间还写着这样至关重要的两行文字：

明天我们就要占领工会，绝对不会遇到反抗。我们的战斗在继续。5月2日拂晓，节日的喧嚣尚未完全消散，纳粹的冲锋队和党卫军便占领了工会、合作社和军营。这场行动“一下子”席卷了全国。几千名工会干部被捕，他们中有许多人被鞭打、用刑。由德国工人自己集资修建的工会建筑和所用的工会财产均被查封。用几十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德国工人自己的组织被消灭了。

1933年5月10日，精力充沛的戈培尔又一手导演了焚书的闹剧。不仅是冲锋队的暴徒们，被煽动起来的年轻的大学生们也投入了这场行动。几乎所有的大学城里，高校门口都设置了柴火堆。早在上午，这些“宪警”们便把从私人藏书和公共图书馆中搬来的被禁书籍堆在一起。所有被这位部长看作是不利于人民教育的书籍都被列入了长长的焚书单中。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拿来火把，点燃这些书堆。当火舌舔噬着书的封面时，周围齐声高呼：

烧掉，亨利希·曼！烧掉，斯蒂芬·茨威格！烧掉，埃利希·凯斯特纳！烧掉，卡尔·马克思！烧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烧掉，亨利希·海涅！

1823年，海涅写道：在焚毁书籍的地方，人也迟早会被焚毁。

《罗蕾莱》的作者，在他的书籍被焚之后仍然令纳粹的宣传攻势头疼。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无法从人民的记忆中抹去。于是人们只好给它一个新的出处，说明“作者佚名”。

宣传部长戈培尔亲自领导了柏林大学门口广场上的焚书部长及其随从的车辆浩浩荡荡地沿着林顿大道驶向火场。戈培尔下车，走到预先设置好的麦克风前，声嘶力竭地说：

亲爱的同学们！德意志的男人和女人们！被夸大其词的犹太人唯理智论的时代结束了，德意志革命的爆发为德意志民族性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你们干得不错：在夜半更深时候把过去的野蛮思想付之一炬。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富有象征意义的重大行动。这次行动将在全世界面前表明：十一月共和国的思想基础现在已被踩在脚下。从它的废墟中，飞出了代表新的精神的凤凰。旧的一切被投入火焰，新的一切从我们内心的火焰中高高升起。在火焰中闪耀着一个尽忠的誓言：万

岁！万岁！万万岁！我们的帝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在另外几个城市里边发生了同样的景象，焚书开始了。

丢入烈焰中的许多书籍，都是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的著作。例如海明威、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海伦·凯勒、玛格丽特·山额尔、H·G·威尔斯、哈夫洛克·艾利斯、阿瑟施尼茨勒、弗洛伊德、纪德、左拉、普鲁斯特等等。有数十位德国作家的作品也遭到焚毁，他们中有托马斯·曼和海因里希·曼、里昂·孚希特万格、雅可希·瓦塞曼、阿诺德·茨威格和斯蒂芬·茨威格、埃里弗雷德·凯尔和雨果·普鲁斯等人。雨果·普鲁斯是草拟魏玛宪法的学者。用一份学生宣言的话说，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或者打击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我国人民的动力根茎的“任何书籍，都得付之一炬”。连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阿诺德·茨威格的《古力夏军曹》、托马斯·曼的《魔山》等都难逃这种厄运。戈培尔博士与他的朋友们很兴奋地看着堆积如山的书籍在烈焰中焚毁，他向学生们大声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此后，戈培尔返回了他在威廉广场的办公室，精心安排德国报纸对此事的报道。然而在几分钟之后，就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放弃了他对自己灵感勃发的创造性的信赖，因为他命令以后对焚书事件。

保持低调”。连那位以在纳粹垮台之后仍是希特勒政权的拥护者而闻名的亨利希·霍夫曼都认为，这次焚书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就在戈培尔摧残文化，禁止千百种书籍在书店出售或在图书馆流通，禁止许多种新书的出版，而且实行严格的文化管制时。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则被奉为——用教育工作者的机关报《德意志教育家》的话说——“我们在教育方面的绝对正确的指南星”，看不到这种新的星光的教师则被清除出去。《我的奋斗》读起来既枯燥又乏味，这部书臃肿冗长，共有782页。第一卷是1925年秋天出版的，全书约400页，售价约合三美元（12马克），当时并没有成为一本畅销书，第一年售出9473本。此后三年中，销售额逐年下降上下卷算在一起，1926年只售出6913本，1927年售出5607本，1928年售出3015本。但是1933年，《我的奋斗》骤增到年销一百万册，希特勒的版税收入达一百多万马

克（折合约三十万美元），使他成了德国最时行的作家，也是第一次成了百万富翁。除了圣经以外，在纳粹政权下，没有别的书有这么好的销路。当时家家户户的桌子上都有这本书，否则就会感到不太安全。在一对青年男女结婚的时候，向新郎新娘送一本《我的奋斗》几乎是一种义务——当然也是很得体的。而且学童们不论从什么学校毕业，也几乎人人会得到一本。到1940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年，这本纳粹党圣经在德国已经销售了六百万册。可惜得很，要是在1933年之前德国有更多的非纳粹党人认真读了这本书，要是外国政治家们也早一些时候认真读读这本书，德国和全世界也许可以早一点认清希特勒的法西斯面目。在这部书中，希特勒用书面精确地写下了，如果他一旦掌权的话，他要把德国变成怎样的一个国家，他要用德国的武力征服把世界变成为怎样的一个世界。在这本富有启示性的书里，他极其详尽地描绘了第三帝国的蓝图，特别是描绘了他在1939年到1945年的“晴和”年代里强加给被征服的欧洲的野蛮的新秩序的蓝图，其露骨率直，令人毛骨悚然。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只有在这个地球上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考虑‘传统’和偏见，必须敢于团结我国人民及其力量走上这条能够引导我国人民从目前有限的生存空间走向新土地的道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与我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把后者不仅视为强权政治的基础，并且也视为粮食的来源……我们必须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目标……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有的土地……”他说，要取得新土地，“只有在东方才有可能……如果要在欧洲取得领土，只有在主要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我的奋斗》中，他很清楚地表明，不会允许有“民主政治那种无聊玩意儿”，第三帝国将用领袖原则来进行统治，也就是说，将实行独裁统治。他说：“决不能实行多数决定的制度，只能由负责的人作决定……当然每个人身边都要有顾问，但必须要由一个人单独来作出决定……只有他才有权威，才有指挥力……”他还说：“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民族利益之上的理想；只要了解我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高出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之上——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希特勒

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亚利安人的创造性的产物。”他说“血统的混杂和由此而来的人种水平的下降，是旧文化衰亡的唯一原因；因为人类并不会由于战争失败而灭亡，却会由于抵抗力的丧失而灭亡，而这种抵抗力只有在纯粹血统中才能继续保持世界上凡是不属于优良种族的人都是些糟粕”。糟粕首先就是犹太人和斯拉夫人。

在希特勒看来，日耳曼人是“地球上最高级的人种”，而且将继续如此，如果他们“不仅注意狗、马、猫的培育，而且也关心他们自己的血统的纯洁的话”。

因此，早在1931年12月31日，希特勒就敦促希姆莱发表了有关党卫队队员婚姻条例。条例规定：

“一、党卫队是一个具有北欧优等民族特征的德国人的联盟，其成员是按照特殊的要求经过严格挑选的。

二、根据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学说，意识到我们民族的未来取决于优秀种族的选择和遗传继承，特制定成年未婚党卫队队员《婚姻批准规定》，自1934年1月1日起执行。

三、《规定》以建立具有良好的生理遗传和北欧德国种族优秀特征的家庭为目的。

四、党卫队队员的结婚申请的批准与否，只能以是否有利于我们优等种族血统的遗传或健康遗传为据。

五、凡是准备要结婚的党卫队队员必须预先征得帝国党卫队总监的批准。

六、对未经许可而擅自结婚的党卫队队员，要开除出党卫队，并解除其职务。

七、由党卫队种族处负责对结婚进行监督审查。

希特勒念念不忘种族问题的结果是提倡所谓“人民的”国家。他在《我的奋斗》中说：“（同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犹太人的世界）相反，人民的哲学认为人类的重要性在于他的基本人种因素。它认为国家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则是保种保族。因此，它绝不相信种族的平等，而是根据种族的不同，承认各种不同种族的价

值有高有低，认为有义务促进优者和强者的胜利，要求劣者和弱者按照支配宇宙上一切事物的永恒意志服从优者和强者。因此，在原则上，它服务于大自然的根本的等级思想，相信这个法则对每一个人都适用。它不仅看到各个种族的不同价值，也看到个人的不同价值。它从群众中间归结出个别人物的重要性，因此……它有一种组织的作用。它相信人类理想化的必要性，它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人类存在的前提。但是，哪怕仅仅是一种伦理观念，如果它危及更高级伦理的持有者的种族生活，也不能允许其存在；因为在一个杂种化和黑鬼化的世界里，所有关于人性美和崇高的思想，以及所有关于人类理想化前途的思想，都将永远丧失……因此，人民的人生观同大自然的内在意志是一致的，因为它恢复了各种力量的自由活动，这必然导致品种继续不断地进行相互提高，一直到最后，最优秀的人类在占有了这个地球以后，得到了一条自由的途径，可以在地球上面和地球以外的领域中进行活动。……我们大家都觉得，在遥远的将来，人类将面临的问题，只有最高级的种族在成为主宰民族以后，以整个地球的力量和资源为后盾，才有条件加以克服。”因此，希特勒宣称：“一个人民的国家的最高目标是，努力保持那些产生文化和创造高级人类的美和尊严的原来种族成分。”所以他又说：“人民国家……必须把种族放在一切生活的中心。它必须注意保持其纯洁……它必须努力做到，只有健康的人才能生儿育女；只有一种可耻的事情：自己有病有缺陷还要生育；只有一种最高的荣誉：避免这样做。反过来，不给国家生养健康子女，必须认为是不可宽恕的。在这一点上（人民的）国家必须充当千秋事业的监护人，在这种事业面前，个人不能有自己的愿望和自私心，而只有绝对服从……因此，一个人民的国家必须一开始就把婚配的水平提高，使它脱离原来那种不断损害种族纯洁性的水平，而使它具有有一种制度的神圣性，必须复制上帝的形象而不是复制人和猿之间的怪物。”他进一步在《我的奋斗》中谈到：由于没有能够维持日耳曼种族的纯洁性，“我们被剥夺了称霸世界的机会。如果日耳曼民族也有其他民族兽群般的统一，德国今天无疑已成了地球的主人。”

希特勒对经济学十分无知，他只关心政治权力。他说：“国家同任何固定的经济概念或经济发展都一点没有关系……国家是个种族有机体，而不是个经济组织……一个国家的内在力量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

下才同所谓经济繁荣同时出现；后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只表明一个国家的接近衰亡……普鲁士的经验极其鲜明地表明，只有靠思想力量，而不是靠物质因素，才有可能组成一个国家。只有在思想力量的保护下，经济生活才能繁荣。在德国，往往是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的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而且在很短时间内，把经济生活也拖着一起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

戈培尔正是从他充当宣传部长那天起，就卖命地推销希特勒的思想，要将《我的奋斗》中的荒谬绝伦作为每个德国人的指导思想。

1933年7月14日，内务部长威廉·弗里克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所有国家公务人员都必须使用“德国式问候”，举右臂致意，从此成为“自由人民的问候方式”。而监狱和集中营中的在押犯人则被严厉禁止使用这种问候方式。1934年，所有的德国居民都被要求抬臂向国旗和国徽致敬；所有的公函都必须以“致以德意志的敬礼，希特勒万岁”来作结尾；所有的家庭都必须拥有字旗，并且在国家的节日期间都必须在窗户上插上旗子。戈培尔非常严格地执行了这个规定。早在夺取政权之前，戈培尔就因为他家的习惯大受称赞——他家的字旗是玛格达亲手缝制的。他觉得党旗由每一家的主妇和其他家庭成员共同缝制，比在随便哪家小店购买要有意义得多。

一个为反纳粹分子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设置的集中营网迅速建立了起来。刚夺取权力不久，纳粹政府就建立了一个政治性的警察组织盖世太保。1934年4月20日开始，盖世太保便处于亨利希·希姆莱的领导之下。

对希特勒来讲，仅满足于除掉那些民族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还不够，对他的追随者，他也采取了同样残暴的措施以防这些人成为阻挡他变为最高独裁者的绊脚石。1934年6月30日这一天，有数不清的牺牲品在没有检察和法庭判决的情况下，倒在了希特勒的党卫队和警察小分队的子弹之下。在这些被杀的人当中，有冯·施莱希尔将军。他和他的夫人一起在他们的住宅中被击毙，还有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以及大批其他的党卫队高级领导人，最后还有格富高尔·施塔萨尔。为了

替这场血腥的屠杀进行辩护，希特勒称这些被处以死刑的人都是一群危害国家及其领导人的阴谋的参与者。

这场血腥屠杀主要由戈林和希姆莱一手策划。1933年6月28日，希特勒由戈培尔陪同前往埃森，以便在戈林和希姆莱于柏林指挥警察和党卫军开始行动的时候，参加埃森省党部头目特尔博文和戈培尔的一位前女秘书的婚礼。罗姆当时正在维斯湖洛场度假。6月29日，希特勒来到萨尔斯堡。在这里，戈培尔向希特勒报告，冲锋队已经在柏林行动，做好了政变的准备。而实际上，此时冲锋队正在度假。戈培尔的报告完全是一派胡言。但这个报告为希特勒的行动发出了信号。6月29日夜，希特勒和戈培尔飞赴慕尼黑。6月30日拂晓，他们在一队党卫军的护卫下前往维斯湖，冲进了罗姆的别墅。精壮的党卫队队员们把罗姆从床上拖起来——罗姆当时正和两个年轻男子睡在一起，由于夜间的放荡，他的面色灰白，而且好像还有些醉醺醺的。按照希特勒的命令，他手中被塞入了一支手枪，并且被告知要他“立即结束自己的生命”。罗姆声如牛吼：还是请希特勒自己来执行他的下流命令吧！他于是被拖走并且随即被枪毙了。

在这次行动按计划圆满结束之后，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们飞回了柏林。在机场等待希特勒到来的人当中，有当时在盖世太保任职的基斯维乌斯。当希特勒走出机舱时，出现了一队卫兵。基斯维乌斯注意到，希特勒没带帽子，面色苍白，筋疲力尽，并且没有刮胡子。在和戈林、希姆莱以及其他握手时，他一言不发。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电影幽默片画面中，唯一的声响就是鞋跟相碰发出的单调的声音。与此同时，希特勒这次旅行的陪同者也离开了飞机，“凶神恶煞般狞笑着的戈培尔”最后一个出现。基斯维乌斯还发现，希特勒从希姆莱手中接过一份长长的名单，边读这个名单边和戈林与希姆莱轻声耳语，交换意见。然后希特勒生气地摇了摇头，迈步走向停在机场上的一队梅塞德斯中的第一辆。

罗姆被杀前不久，戈培尔和这位冲锋队的参谋长保持着比别人更亲密的关系。在6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戈培尔和罗姆在罗姆最喜爱的布拉特乌斯特——格罗克尔酒店进行了几次秘密的长谈。6月30日，这家酒店的老板和侍者领班被杀。

格雷高尔·施塔萨尔被人拖出了住宅，送到柏林，投入了坐落于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的盖世太保的监狱。他被党卫军枪杀，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动脉，溅在狱室墙壁上的大量血迹在几个星期中一直是党卫军暴徒们观看的目标。

六周以后，希特勒公布，被处决的有58人，而实际上有几百人，甚至几千人被枪毙

所有存在的官方关于这场血洗的文献资料都被小心地销毁了戈培尔严厉禁止新闻界提供除了希特勒本人发布的简短而又极不完整的公告之外的一切暗示。这场血洗六周以后，希特勒威慑性地宣布，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要明白，和政府作对就意味着丧命。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希特勒立刻夺取了空缺下来的总统职位。这位新的国家首脑并没有把自己称作“帝国总统”，而是让人们用一种双重头衔来称呼他——元首和帝国总理。同时，他又使自己成为了德国国防军总司令。从此，他的名字护佑着这支军队。

戈培尔通过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沉痛宣布了年迈的总统去世的消息。此后，他命令所有广播电台停止播音半小时。再接下来，他又第二次走到麦克风前面，宣布：“现在，总统和总理的责任已经集元首一身了。这样一来，已故总统最后的遗愿已经实现了，他的政治遗嘱被执行了”

人们对此很难加以证实但是极有可能这份所谓的兴登堡在临终时写下的“政治遗嘱”，是戈培尔一手炮制的。每个了解兴登堡的人都知道，他对王室是忠贞不渝的。只要这位老先生神志清楚，他所希望的就是，有朝一日，霍亨索伦家族的人再次登上王位。而他在临终之前，会突然决定对“波西米亚的被解放者”表起忠心来，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1933年9月，戈培尔出访日内瓦。这次出访，是他一生中极少的几次出国访问之一。他在日内瓦盘桓数日，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二届世界裁军大会。在日内瓦，戈培尔给全世界的新闻媒介留下了极其糟糕的印象，因为他不管是在会议室还是在散步、参观游览的时候，都由一队人高马大的冲锋队队员陪同。

戈培尔动身前不久，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一个关于保证满足整个欧洲要求和平的愿望的讲话。他说，根据自己作为一个在前线打过仗的老兵的经历，他厌恶战争。而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有权利重新建立军备。希特勒的这一提议遭到了法国的强烈反对。于是，1933年10月，希特勒从日内瓦召回了戈培尔，宣布德国单方面退出世界裁军大会，同时宣布了德国退出国际联盟。

1934年7月，希特勒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外交冒险。7月25日，奥地利发生了一起由民族社会主义者发动的政变，奥地利联邦总理多尔夫斯在政变中被杀害，希特勒执意过问此事。但是在英国和法国的抗议下，在墨索里尼的威胁姿态下，希特勒只好放弃插手此事。

1935年1月，萨尔区被归还给德国。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宣布重新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凡尔赛和约》中关于军备的限制被废除了。1935年9月，“纽伦堡法案”使隔离犹太公民合法化。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宣布退出“洛迦诺公约”，命令军队进入莱茵非武装区。1938年2月4日，国防部长封·布罗姆堡和陆军总司令封·弗里施以破绽百出的借口被免职；希特勒亲任国防部长并且建立了帝国国防军最高司令部，任命听话的凯特尔将军为司令。这样一来，帝国国防军的首脑中对希特勒的战争计划持反对态度的人就被肃清了。1938年9月在慕尼黑召开的会议上，和平再一次被破坏；苏台德地区被割让给德国。1939年3月15日和16日，德国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其国土变成了由德国保护的国土。9月1日，希特勒发动了战争。

对戈培尔而言，在这些事件爆发的几年中，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作为每一次胜利的宣布者，他都要努力地激发起德意志民族心中的民族热情。戈培尔证明了，就是宣传部，也可以变成有合理的工作方法的模范机构。他的部分为十个处：

- 1.“法制和行政管理”处，下设财政、人事和法制三个科；
- 2．宣传处；
- 3．无线电广播处；
- 4．报刊杂志处，下设对内、对外两个科；
- 5．电影处；

6. 文献资料处；
7. 国外处；
8. 戏剧处；
9. 音乐处；
10. 美术处。

戈培尔非常精心地挑选出他的工作人员。他很重视让他的机构设置简单明了。他个人的工作班子以及部里的其他工作人员，人数加起来不过一千出头。对各处的负责人，戈培尔很放手，他希望他们能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能动性。

戈培尔总要求一种绝对对称和谐的秩序。当他每天早晨在办公桌前坐下的时候，他面前必须有一排严格按照规定的顺序排列好了的各种颜色的铅笔。如果女秘书没有把他那支最著名的绿色铅笔准确地放在离书桌边缘几厘米的那个位置上，那她可要吃苦头了。

部里的工作人员是严格禁止使用绿色铅笔或者绿色墨水的。只有部长本人才能使用绿色，用它给摊在他面前的文件的空白边缘装饰处加尖酸刻薄的批注。戈培尔工作起来极端投入。他有整整一个小分队的速记打字员来记录他以极快的速度授出的内容巢在案头工作、发表演讲和广播讲话之间还有一些空隙的话，他会在这些时间里安排上一些其他事情。时间上，戈培尔严格控制 and 来访者的谈话。五分钟的休息足够让他完全放松一下。

他是个会分配时间的人。例如，当他在圣诞节前夕为官方或者私人的礼物进行采购时，他绝不会在商场或小店里浪费他的宝贵时间。商店必须到他这里来。在宣传部的大厅里会摆上长长的一排桌子，上面陈列着从自来水笔、袖珍日历到皮夹克、裘皮大衣几乎所有的可以当作礼物的商品。在两三个手拿速记本的女秘书的陪同下，戈培尔对这些陈列品进行检阅，一个个地指出他选中的商品并说出被馈赠者的姓名。整个过程只持续五分钟。这些礼物被很快地记下来，并被编上了号。并且当戈培尔重新回到办公桌前坐下的时候，一叠名片已经准备好，部长分别在每张名片上面写上两句话。稍后，这些名片便会分别和每一件礼物包在一起。

一切事情必须雷厉风行戈培尔很喜欢向他的工作人员展示他以怎样的闪电般的速度产生绝妙的灵感。1933年底，当时尚在建设中的汉莎航空公司给戈培尔送来了一张镶在精致的镜框中的他的照片，并且请他在照片上签名。这幅照片将悬挂在公司总裁的办公室里。戈培尔问围在他办公桌周围的部里的官员和女秘书们，他们可有什么话可供他参考。没有人答言。于是，戈培尔脸上带着自得的微笑，伸手拿来绿色铅笔，在照片下方写上了两行字。然后，他隔着桌子把照片推到这些人面前：“这句话对汉莎航空公司很合适，不是吗？我的先生们？”——秘书们频频点头，“嗒，先生们，这实在太简单了。”于是，这些先生们满怀敬佩的念道：“我们的思想像飞机一样自由翱翔，它保证了德国的未来！戈培尔博士。”紧接着，戈培尔又补充道，如果他不是德国的部长的话，做一个国际康采恩，比如说壳牌石油公司或者福特公司的广告部主任，也许挺有意思的。早在任职的第一年，戈培尔就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把所有的创作性工作都置于宣传部的领导监督之下

就在1933年9月22日，就在他的指导下根据法律设立了德国文化协会。它的目的如下：“为了推行德国文化的政策，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

为了指导和控制文化生活的各方面，在德国文化协会下面成立了七个协会。凡是从事有关职业的人，都必须加入有关的协会，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这些协会可以因为“政治上不可靠”而开除或拒绝接受会员，从而使对国家社会主义不太热心的人无法从事他们的专业或艺术，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谋生之路。一经纳粹领袖们决定，艺术、文学、报刊、广播和电影都必须专门为新政权的宣传目的和野蛮哲学服务，于是，曾经有过那么悠久的极高的文化水准的德意志民族，它的文化水准发生了令人恶心的退化。除了恩斯特·约恩格和恩斯特·维查特的早期作品以外，没有一个还在人世的比较重要的德国作家的作品曾在纳粹当政时期出版过。差不多所有这些作家，都在托马斯·曼的带头下移居到国外。极少数留在国内的作家不是自动地就

是被迫保持缄默。每一本书或者剧本的手稿，都必须先送宣传部审查，经它认可后才能出版或者上演。

德国为人类贡献了巴哈、贝多芬、莫扎特、布拉姆斯等卓越的音乐天才，但是在纳粹统治时期，门德尔松的作品则禁止演奏，因为他是犹太人；德国的第一流现代作曲家保罗·兴德密特的音乐也在禁止之列。所有犹太作曲家的作品都被戈培尔禁止演奏了。大交响乐团和歌剧院中的犹太人很快就被清除出去。

在戏剧方面，马克斯·莱因哈特和所有其他犹太籍演出人、导演和演员一起走了。纳粹作家们实在蹙脚透顶，群众都不愿看他们的作品，因此这些作品的演出日子总是不长。德国戏剧协会主席汉斯·约斯特是个蹙脚的剧作家，他曾公开大言不惭地说，凡是有人向他提到“文化”这个字，他就想掏出左轮手枪来。但是戈培尔和约斯特无法禁止歌德、席勒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德国舞台上动人的演出。

希特勒自以为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认为，一切现代艺术都是退化的和无聊的。在希特勒上台后，他命令戈培尔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清除”德国的“颓废”艺术，并代之以新的“日耳曼”艺术。在德国各博物馆里，塞尚、凡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科科契加和格罗兹等许多画家的六千五百多幅作品都被拿掉了。

1937年夏天，希特勒在慕尼黑正式主持了“德国艺术馆”的开幕式。在这个纳粹艺术的第一次展览中，陈列了从一万五千幅应征作品中选出来的九百幅作品。这九百幅作品都是最蹙脚的货色。这是希特勒“钦定”的。原来的评选团的主席是德国艺术协会主席阿道夫·齐格勒，他是一个平凡的画家。希特勒对评选团原来所选的某些画极为恼火。希特勒命令把这些画剔掉，而且用他的长统靴子在好几幅画上踢了一些洞他在主持展览会开幕式的讲演中说“我早已下了决心，如果命运给予我们权力的话，〔艺术鉴赏〕这类问题是不用讨论的，要做的只是作出决定。”

戈培尔博士为了让人民看看希特勒要保护他们免受玷污的那些作品，在慕尼黑一所必须要经过狭窄的楼梯才能走到的破败的陈列室里，组织了一次展览。内容是精选的现代绘画，有科科契加、夏高尔和表现主义派及印象主义派的作品结果这个展览会的观众拥挤不堪，

等待入场的人从吱吱嘎嘎作响的楼梯一直列队排到街上。去看的人实在太多了，使戈培尔感到又是生气又是尴尬，于是很快就停止了展览。

戈培尔对报刊、广播和电影的控制更是严厉。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1933年10月4日，戈培尔制定的德国报刊法使新闻事业成为一种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职业”。它规定，所有编辑都必须具有德国公民资格，属于亚利安血统，配偶不是犹太人。最先被迫停刊的报纸之一是《伏斯日报》。这家报纸创办于1704年，像腓德烈大王、莱辛和腊希思瑙那样有名的人物过去都曾为该报撰过稿它已成为德国最主要的报纸。但是，它是一家自由主义的报纸，而且老板是由犹太人办的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它在连续发行了230年后，在1934年4月1日停刊。驰名世界的《柏林日报》，虽然它的老板犹太人汉斯·拉克曼—莫斯在1933年春季就被迫出让了他在该报中的股份，但到1937年时还是被迫停刊。德国的第三家自由主义大报《法兰克福日报》，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才准许继续出版。

由于所有报纸每天必须根据戈培尔的指令发表新闻、文章、社论，所以全国报刊内容单调划一，读者对报纸感到厌倦。所有报纸的总销售量一落千丈纳粹的主要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和晚报《进攻报》销量也大幅度下降。在纳粹帝国的头四年中，报纸的种类由3607种减少到2671种。

在1934年内有一个时期，戈培尔和全国报界领袖、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马克斯·阿曼都要求拼命巴结的编辑们不要把他们的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阿曼说，他很遗憾“目前报刊完全单调划一，这不是政府的措施所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一位鲁莽的周刊编辑，《格鲁恩邮报》的埃姆·韦尔克，把阿曼和戈培尔的话当了真。他指责说，宣

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使得报刊变得那么干巴巴。他的刊物立即被勒令停刊三个月，他本人则被戈培尔撤职，送到集中营去。

戈培尔有句名言，谣言重复三遍，就会变成真理。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比较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的。在德国从事多年记者工作的著名的英国记者威廉·夏伊勒说：

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直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集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像，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困难。”单调划一、报刊的销售数一落千丈，对戈培尔来说，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人们对他那一套鬼话的迷惑。越是极权的国家，越是需要制造愚昧，制造假相，因此，也就越是需要假话来骗人，用谣言来耸人听闻。

1933年10月4日，戈培尔颁布了“写作领导法”。在这个法的第一款中，所有的新闻作品都被概括为“由国家……管理的公开出版发行物”。这样一来，正如一项法律注释条目所说，新闻工作者们从事的是一项“类似国家公务员的，和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职业”。该法律的第二十三款规定，新闻工作者有义务加入德国新闻界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是帝国新闻协会下属的一个机构。它掌握一份从业人员名单每个新闻工作者在被许可开始工作之前都必须把自己的名字列入这份名单之中。第十四款是该法律的核心部分，它规定新闻工作者不允许发表不符合政府意志的言论。第五款说明国家对申请从事新闻职业的人员提出的在政治上的前提条件。根据该条款，所谓的雅利安人种证明书是首先要求必备的，而且此要求不仅针对申请人本人，还针对他的妻子。

在对报界进行这样的“法西斯渗透”的同时，还进行了消灭、查封所有的反对派报纸和不受欢迎的报纸的行动。1932年，德国有4703家日报；到1934年，由于纳粹政权的一系列措施，这个数字减少到3097；而一年之后，只剩下2527家报纸。

戈培尔把巨大的报业康采恩乌尔斯坦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方法，是他肆无忌惮的工作方法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家出版社在他们

夺取政权之后便一直在被直接地刁难，受损害。当时乌尔斯坦出版社唯一一家运转良好的报纸就是每逢周日出版的《绿色邮报》戈培尔亲自捏造借口，逮捕了该报主编艾姆·维尔克，并且无限期地禁止这家报纸出版发行。这实际上就是迫使乌尔斯坦集团出卖自己。这个价值几亿马克的企业只卖了1200万马克。而当这个企业的主要成员不得不流亡国外的时候，这笔钱又被纳粹政府几乎一文不剩的查抄了

乌尔斯坦出版社被变成了“国立”的“德意志出版社”。所有的报纸、杂志以及大型的图书出版社、大型的印刷企业就像以后同样多的大型出版公司、电影公司一样，成为了纳粹宣传的工具。

1935年1月，戈培尔颁布了一项法令，在没有主管的专业协会主席的书面批准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员都不得接受国外的聘请。1935年4月，帝国文献资料协会，受委托整理一份，所有在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观看来有危害性的书籍的名单。此后，所有考虑再版1933年以前出版的书籍或者准备翻译出版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商就都要首先确认，该作品不在这份名单上。在同一个月，戈培尔发布命令，没有宣传部的许可，禁止出卖报社。此外，禁止通过教会或者宗教团体向报纸、杂志提供经济上的资助，这也就是像所说的考虑到“报刊行业应当追求的独立性”。1935年4月颁布的另一个命令说：只要独立性的报纸与其同地区的党报之间发生了竞争，这家独立性的报纸就可以立即被禁止出版……

但是这些严厉的措施只是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被使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在对一家报纸采取这种行动之前就通过按照规章进行的磋商谈判把这家报纸买下来。此时总是由温克勒博士作为国家或纳粹党的代言人出面，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使被迫出卖报纸的企业主不受太大的损失。到了1941年，几乎所有的德国报纸者在纳粹党的控制之下，受欢迎的报刊的发行量（包括其在被占领区的版本发行量）达到了2460万份。

1936年11月，戈培尔对“爱挑剔的人和吹毛求疵者”展开了猛烈的攻势，这场行动实际上导致了严肃的艺术和文学评论闭上了嘴巴。另外还发布命令，禁止未经允许就公开发表部长的讲话，就连希特勒很早以前发表过的讲话也不允许随意引用。

最后是德国公民被禁止接受诺贝尔奖金。该规定是由希特勒本人亲自宣布的，是这个独裁者在奥泽茨基事件中纳粹政府大丢其脸的反应。民主主义的政论家卡尔·冯·奥泽茨基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就在他办的杂志《世界舞台》上和一切来自左翼和右翼的反民主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纳粹党人把他看作他们主要的敌人之一，并在国会纵为案发生的当晚逮捕了他，把他投入了集中营。鉴于他对反民主势力的英勇斗争，这位政论家，而当时已是集中营在押犯人的奥泽茨基获得了1935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此奖在1936年才被颁发纳粹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努力以其自己的方式解决这桩令他们痛苦的事情重病在身的奥泽茨基由地狱般的集中营中被转移到医院。不过他在那里仍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纳粹分子们向他许诺，如果他做好了准备修正自己的观点并且交给政府一份表示效忠的声明，他就会被释放。但是奥泽茨基不为其所动。1938年他死于集中营。

作为对不允许领取诺贝尔奖金的补偿，纳粹德国为科学家和艺术家们设立了德意志国家奖金。然而在一个警察国家要求精神纯洁的情况下，挑选出来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寥寥无几。对其他的奖励而言亦是如此。例如，1859年设立的席勒奖金，以前是每六年颁发一次，而到了1935年却无法颁发。这是因为在此期间根本找不到一位作家，其作品既有资格荣获此项殊荣的同时又可以为帝国文化协会的主席所接受。

由于如此多的规定、方针和禁令，艺术家和政治评论家们几乎不可能在不激起当局反对的情况下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首先影响到了靠笑话，特别是靠政治笑话谋生的小型歌舞演员。1935年5月，戈培尔的宣传部在一份措辞激烈的新闻公报中强烈声讨了柏林的小型时事歌舞剧《地下墓穴》和《低级娱乐场》。据说在这些犹太化”的小型歌舞演出中有蔑视纳粹党和国家的言论。两剧的有关责任人遭到逮捕，并且由于他们对第三帝国以及希特勒本人历史上的事件发表了令人遗憾的错误评价，他们被投入了集中营。在那里他们有足够的机会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来为德国全体人民服务，和以前相比，这要对德国人民有用得多，就连维纳·弗茵克，德国“小型时事歌舞剧”最受欢迎、最机智风趣的主持人之一，也由于戈培尔对他的笑话不欣赏而受到严厉的处罚。在一次小型时事歌舞演出中，弗茵克大胆地对“高高举

起的右臂”发表了一些议论，并且同时还举起右手作了一个“德国式的问候”，观众中爆发出一阵轰笑但是这位艺术家自己却笑不起来了，戈培尔听说了这些事，弗茵克很快被抓进了集中营。

尽管如此，还是不时有人不愿闭紧嘴巴。英国大使内维尔·汉德逊爵士那时总喜欢向人们提起，慕尼黑的歌舞演员卡尔·瓦伦亭的勇敢给他留下了怎样深刻的印象。这位演员总在《运动的中心》一剧演到一半儿的时候，向台下心照不宣的观众们讲述达豪是如何被严密地防守起来的：每隔几米就有一挺机枪，每100米就有一个瞭望哨，还有带电的铁丝网。

1937年，戈培尔命令把博物馆和美术馆所有不符合国社党人审美标准的艺术作品统统搬走。一个名为“堕落的艺术”的宣传展览作为反面教材在德国许多城市中进行巡回展出。这个展览门庭若市，但这绝非是戈培尔的成功，绝大多数来参观的人是为了抓住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再瞻仰一下这些被禁的艺术品。摄影师亨利希·霍夫曼在他的书中称，他曾运用他对希特勒的影响来保护这些被指控的艺术品，终于一些画由于参加了这次展览而幸存了下来。霍夫曼称，戈培尔打算把那些不符合民族社会主义的艺术观和崇高理想的画全部付之一炬。这些画中包括雷诺阿·高更和梵·高的作品。霍夫曼声称，他曾劝说希特勒阻止这场对艺术的摧残。

1935年，戈培尔发起召开了一次世界电影大会。在会上，他阐述了自己对电影生产的看法。他指出，电影技巧和戏剧技巧有着根本的不同，电影必须比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更加符合“普遍”一词的词义，不能允许它失去和大众的联系。此外，他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新颖的想法。戈培尔首先要求电影要有现实性。他认为，即使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也必须要有现实的意义。电影的任务是成为各民族之间的桥梁和媒介。戈培尔最后说，电影生产要像其他的形式一样必须有国家资助。

戈培尔在德国电影业上投入了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他经常看电影。许多部电影他看了不止一遍。他的办公处所，在柏林的官邸以及他在施旺思维德和朗克的私人田庄里都有设施完备的电影放映室。

在夺取政权之前，他曾经有一段时间热衷于把全国的电影工业一举收归国有的想法。但他很快地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他担心，这样一来会对电影工业的对外贸易关系产生不良影响。德国的电影公司虽然最终都成为“国有”的了，但这个过程是一步一步不引人注目地发生的。

帝国电影协会下面的少数几个处负责监督管理生产、摄制、技术、短电影、教学电影、国内外发行、电影院等等。但负责掌握电影行业各部门从业人员名单的部门是其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只有在纳粹党人看来“可以接受”的人才被允许登记入册。

而宣传部长本人对这一方针的态度却经常左右摇摆不定。例如，在刚刚夺取权力不久，他就试图任命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电影导演弗里茨·朗为乌发电影公司的生产负责人。戈培尔把朗召到部里，告诉他，多年以前在他和希特勒一起观看朗的《大都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决定，他们一上台就立即让这部电影的创作者成为德国电影生产的负责人。

而当这位惊愕万分的导演声明他的母亲是犹太人的时候，戈培尔说，这一点他早已知道。但是鉴于朗的艺术成就以及他在世界大战中上前线打过仗这一事实，这一回可以算作例外，不向他要求一般来说应该具备的“纯雅利安人证明”。

朗请求给他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进行考虑，然后便驱车回家。他收拾好一只手提箱，并请一个朋友用假名为他购买了一张开往巴黎的火车卧铺车票，当天晚上便离开了柏林，离开了他漂亮的房子和他的艺术收藏，直到希特勒的统治结束之后，他才又踏上了德国的土地。

这是，因为他在希特勒夺取政权前不久刚刚摄制完毕了一部新电影《马布斯博士的遗嘱》，在最初的那个版本中，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了直言不讳的嘲讽。这位导演流亡国外之后，生产这部电影的公司试图在把它提交给电影审查部门之前通过一系统的剪辑和补拍使这部耗资巨大的影片可以被新政权“接受”。戈培尔为自己保留了关于该片的最后决定权。1933年10月，在举行了自己的生日庆祝会后，戈培尔在他的新官邸观看了这部电影。那时属于和戈培尔较亲近的圈子里的鲍利斯·鲍瑞斯霍姆和卡瑞娜·尼霍夫对整个过程做出了如下的描述：

……戈培尔拥有决定权。今天他准备行使他的权力了。从夏天开始他就一直住在紧挨伯兰登堡门的别墅里，在那儿他拥有自己的电影放映室。

“这部电影挺棒。”部长13岁的继子哈尔德·克迈特第一个说话。

几个人笑了笑，没有人答言。

“我准备下令禁演这部电影”，戈培尔总算开口了，“我之所以要下令禁放这部影片是因为它告诉人们，一个由男人组成的极端果决的集团，一旦他们真的愿意，他们就一定有力量用暴力把整个国家翻个个儿。”

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在实在没有什么更好的题目交给他的情况下，一个杰出的导演也只好把自己的才智用在这样的一些东西上了。”

纳粹宣传部有一个专门的电影处来负责审查电影脚本。通过设立一个电影贷款银行，从中央一级解决了电影生产的经费问题。

1934年2月颁布的帝国电影法赋予了戈培尔的宣传部对每一部德国生产的电影的审查权。宣传部还有责任挑选出在政治上、艺术上、文化上、教育上值得推荐的影片。

最令人梦寐以求的评语自然是“富于政治上的价值”。戈培尔为最优秀的德国电影设立了高额奖金。第一个获得该奖金的影片是由乌发电影公司出品，古斯塔夫·乌希提导演的《逃犯》。这部电影反映了被迫向远东迁移的沃加德意志人的命运。仅仅从“民族社会主义的精神财富”中汲取养分的电影相对来说很少。除了一部试图美化霍斯特·威斯尔的生活经历的糟糕透顶的影片《汉斯·威斯特玛》之外，新政府成立的第一个月还拍摄了《冲锋队员布兰特》和《希特勒的少年魁克斯》。戈培尔这回相当聪明，他没有强求电影制作者选择重点宣扬民族社会主义的题材。

仅有的尽管是美化了民族社会主义，但仍保持了很高的艺术水准的电影是两部纪录片这两部影片由于它们高超的技巧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属于一流的纪录影片。它们是反映纽伦堡纳粹党代会的纪录片《德意志的凯旋》和分为上下两集的《奥林匹亚》。这两部电影均出自列妮·伊芬施道尔之手。戈培尔分不得一杯羹。由于他根本就不能容

忍伊芬施道尔，他甚至试图破坏她这两部影片的拍摄工作。然而伊芬施道尔成功地靠近了希特勒，在这位阴险的部长面前确保了希特勒对她的支持。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供她使用，而且她还有足够的时间。在第一部影片上她用了一年的时间，而第二部影片则几乎是两年。

由宣传部长直接下达任务拍摄的影片相对较少。但戈培尔对几部他认为特别重要的影片从剧本到首映都亲自把关，还经常不厌其烦地命令做各种各样的剪辑和修改。

戈培尔偶尔也会碰到几个不愿在他面前马上低头的人。一次，演员埃米尔·亚宁斯利用合同上赋予了的权利按自己的方式选择了题材，这一点触怒了戈培尔。亚宁斯从盖哈德·豪普特曼和阿诺·霍尔茨那里选材，完成了一部关于伟大的医生和学者罗伯特·科赫的电影。而戈培尔更希望看到他选择宣传民族社会主义的题材。但他看不到任何一点对这位演员施加压力的可能性亚宁斯是个世界级的明星他那时大概是惟一的一个可以随时去好莱坞或者到伦敦的亚国山大·科尔达那里去的德国演员。

当亚宁斯选择了克莱斯特的《破罐记》，并且在其中扮演瘸子乡村法官亚当时，戈培尔在这场幕后的争斗中遭到了惨败。戈培尔十分清楚，亚宁斯在背后称他为“瘸子”。因此，他认为亚宁斯这次是在含沙射影。在这部电影的首映式上，观众们在看到大量的跛足镜头时都悄悄地发出哧哧的笑声，并且偷偷地朝部长包厢观望，而戈培尔坐在包厢中面无表情。

戈培尔曾经想给亚宁斯一个把他在世界观上和政府联系起来的角色，使这位艺术家在国际上名誉扫地。但直到亚宁斯在战争期间不得不同意出演《科于格尔伯父》时，戈培尔才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戈培尔通过修改剧本和亲自介入剪辑而使这部影片的反英倾向增强到了离奇的程度。

戈培尔对电影界领导人物们的“关切”，就是他们的私生活面前也不放过。他曾用几年的时间，尝试使汉斯·阿尔伯斯和他的犹太女友汉希·伯格分开。幸亏伯格生活在国外，因此没有遭受什么危险。而戈培尔对电影演员约阿西姆·勾特沙克生活的干预却是以一场悲剧而告终。

勾特沙克和一位犹太女子结了婚，他爱他的妻子，从未想过要离婚。于是，戈培尔便以禁止他工作相威胁。作为未被聘用的演员，勾特沙克必须参军。这样一来，他的妻子和孩子便失去了他们的保护人。勾特沙克于是选择了与妻子和三岁的儿子一起自杀的道路。他的令人感愤的命运在战后拍摄的电影《魔影下的婚姻》中得到了反映。戈培尔得到了勾特沙克自杀的消息之后，通过宣传部电影处发出通知，不欢迎电影界人士参加葬礼。出于对这位艺术家的敬意，有许多电影工作者勇敢地违抗了这条禁令。

戈培尔对电影的兴趣还延伸到每周新闻电影上——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当戈培尔在最后一刻还要求进行技术上根本无法实现的剪辑或补充时，技术人员们往往几乎被抛到了绝望的边缘。这位部长还观看外国影片，特别是那些以反纳粹倾向而在德国被禁放的影片。其中一部无足轻重的电影《我曾是个纳粹间谍》，令戈培尔勃然大怒。这倒并不是因为其政治倾向，而是由于他一直以其高品位的布置而自豪的办公室竟被表现成了一个挂满“卐”字旗和党徽的大厅。至于对他本人形象的塑造，戈培尔认为是一幅“荒谬至极的讽刺画”。戈培尔对此类影片抱的是一种业务上的兴趣。他关心的是是否能从敌对的一方那里学到什么宣传鼓动的绝招。电影放映通常在晚上很晚的时候开始，总有戈培尔工作班子的成员以及一些家庭的家中人陪同观看。

那时驻柏林的世界各大报社和新闻机构的记者们都对戈培尔不抱好感。一位知名的美国记者艾德加·卡罗说，戈培尔“有很好的风度和文笔。其看法总是反复无常，但他非常聪明。此外，他的言行总是专横而厚颜无耻。通过他的这些言行，人民对他这个反复无常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位美国记者威廉·舍尔在提起戈培尔“邪恶、然而多产的大脑”时，讲到了他尽人皆知的虚伪，并且认为他那得到了颇多的赞誉的嗓音“令人不快”。当时的外国记者联合会的主席罗赫纳对自己的精辟见解很满意——他“憎恶”戈培尔。美国大使威廉·E·多德在他的日记中说，戈培尔“比希特勒聪明得多”，他是“一个卓越的演说家”。他又补充道：“在他能够煽动起人们的醋意的时候，他便真正地如鱼得水了。”

在德国的知名人士当中，戈培尔也不受欢迎。“如果他不是个残废，我早就几次抽他的脸了”。在沙赫特博士还是帝国银行董事长的时

候，他对维诺思·麦克恩切如此说过。戈培尔喜欢在私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冷酷的尖酸刻薄令这位董事长尤为气愤。在1944年7月20日之后被处决的外交官封·哈色尔说，戈培尔是“最危险的政党领袖”，而且是条“狗”。

在1931年至1939年任英国驻柏林大使的内维尔·汉德逊爵士笔下，戈培尔被较客气地描绘了一番：

这位“矮博士”，大概是所有纳粹领袖当中最聪明的一个。他是个杰出的演说家，在公开辩论中表现得极为敏捷。而在私人谈话中他则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公正和理智。和他交谈我总是怀有兴趣。他的外表和性格都令人联想到典型的爱尔兰宣传家……而当他站在讲台上或者拿起笔来的时候，他就可以暴跳如雷，并且首先可以谎话“连篇”。

戈培尔一点儿都没有为他的不受欢迎而发愁。他认为这是权力的代价，正如他一次对他的同事威尔弗里德·封·欧文讲的那样，比起受人欢迎来，他宁愿被人害怕。他认为，保持距离对一个处于他这个位置的人来讲是很重要也是必要的；他很高兴在纳粹的高层领导人当中，除了有一个例外之外，还没有人和他以“你”相称。这唯一的例外就是他在艾伯菲尔德时那里的省党部主席卡尔·考夫曼。

令戈培尔头痛的是外国记者。因为他无法对他们施加影响，对他们也没有多少威力。从1934年起，当他要向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通报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举行记者招待会。威廉·舍尔在日记中写道：1935年3月16日，他和他的同事们被传唤进宣传部，戈培尔“带着一副十分严肃、煞有介事的表情一拐一拐地走进来”。然后高声然而是以极快的速度宣读了关于恢复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的法律条文。此后，他便很快离开了这个房间，把从外国新闻记者那边抛来的一大堆问题留给了他的工作人员们去对付。

在任职的第一年中，戈培尔对外国新闻界根本置之不理。此后，他又试图通过相机举行的招待会和酒会对这一失策加以弥补他希望只是通过献些小殷勤而争取到全世界新闻媒体中的一些代表。但是他的想法大错特错了。他错误地认为，外国记者会中这可以轻易识破的圈套，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不再有所顾忌，在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胡扯一些谁也不会相信的谎言。比如他在1938年11月10日，即“砸玻璃窗

之夜”的第二天向被召集起来的外国记者们直截了当地宣布，所有关于所谓的毁坏犹太人的财产的报道都是“鬼话”。对此，罗赫纳报道说，在场的新闻记者们当时都震惊得目瞪口呆。后来，他们自己亲眼看到了被砸碎的窗户玻璃和燃烧着的犹太教堂。戈培尔居然对众所周知的事实说出了一套显而易见的谎言，他想从中得到什么很难说清楚。也许他无法理解，他不能像对待处在帝国新闻协会控制下的本国记者那样对待外国记者。有时候他还寻找机会，把不受他欢迎的外国记者驱逐出境。维诺恩·麦克肯切记载，在1933年到1939年之间，有不少于25名的外国记者被驱逐出这个国家，至少有同样多的人在接到正式的通知，“对他们的安全无法保证”之后自动离境了。在被驱逐的人当中，有多萝西·汤普逊——她是辛克莱·列维斯的妻子，她本人是著名的女作家——以及美国人艾德加·卡罗和《泰晤士报》最重要的记者之一，英国人诺尔曼·艾布特。

尽管戈培尔彻底研究了外国的报刊并且让人对外国报纸进行摘译呈交给自己，但他仍无法使自己从纳粹宣传部长以外的角度来看待外国。他对英语一窍不通，只能说十分蹩脚的法语的事实更促使他觉得自己对外国一无所知。他一生中总共只在国外待过几个星期：1933年参加裁军大会对日内瓦作了短暂的访问，晚一点时候对希腊进行了一次简短的国事访问，再有就是偶尔去意大利度假。在他眼里，其他的国家不过是还没有被德国兼并的德国的附庸。他的对外宣传在方法上和对内的新闻导控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戈培尔好像根本不理解世界公众对在希特勒的国家里犹太人遭受迫害所做出的反映意味着什么。

他完全信任他的规模巨大的宣传机器他自认为通过它们可以影响世界对德国的看法。1934年有2.6亿马克用于对外宣传上。德国境外有300多家德文报纸受到资助。除此之外，据一项谨慎的估算，尚有350家公开出版发行的分别使用所在国语言的报纸或者完全是德国的财产，或者由于大部分的入股者的缘故处于德国的控制之下。

此外，还有一系列的在戈培尔领导下的德国通讯社。例如，在南美洲的“大洋彼岸”通讯社，在1939年免费发送配有标准的西班牙文说明和详尽的解释性资料的新闻消息，有时一天有2万字提供给拉丁美洲新闻界。这些消息和评论的倾向首先是反英的。“大洋彼岸”考虑到其

政治性资料的销路，还在每一期上加上了准确而又吸引人的当地新闻。

考虑到在美国开展宣传，戈培尔想到了聘请伊维·李。李是美国最著名的宣传专家之一。他曾以高超的技巧成功地使约翰·D·洛克菲勒，这个从前在美国最不受欢迎的人，逐渐赢得了伟大的慈善家和“好大叔”的美名。由于他的这些高超的宣传技巧，他的名声玩播，财产可观。戈培尔显然希望这个精明的美国人可以在希特勒身上创造类似的奇迹。李给了戈培尔一个明智的建议：对待外国记者要客气一些。于是戈培尔立即把外国记者中的佼佼者召集过来，鼓励他们写一些材料详实丰富、新鲜有趣，并且对戈培尔和第三帝国不是只说好话的书。戈培尔从1934年开始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不管怎样，这一点要归功于伊维·李。

1934年年初，这个美国人来到德国。他在W·E·多德大使面前毫不隐瞒自己对民族社会主义的赞赏。此外，伊维·李还由于他的服务得到由戈培尔的宣传部的预算中支付的33000美元的年薪。大使自己对戈培尔的宣传手段不以为然这些手段在德国是非常奏效的，但在国外，它们所起的肯定是一个飞来飞去的作用，因为这位部长对其他民族人民的想法和性格没有一丁点儿的了解。

所有稍大一点儿的德国大使馆都配备了宣传专员，完全像他不断地把秘密指令下达给德国各报刊杂志的主编们一样——这些指令也偶尔会落到少数几个相信独裁的外国记者手中——戈培尔也不断地给使馆的宣传专员们下达在外国进行宣传的方针政策，就是这样的文件也有时会落入别人手中。德国退出国联时，戈培尔给各宣传专员下达的命令就是一例。当《小巴黎人》把这份从德国偷偷带出来的指示的原文公诸于世的时候，举世哗然。

我们的宣传对外必须不断强调，德国希望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都能和平地被解决……必须用一种巧妙的方式把没有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的责任推到那些反对德国的正当要求的人身上……对这一点要不引人注意地不断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强调……我们至少要使世界上一部分的公众舆论相信，在当今的情况下，德国除了拿到它应该得到的之外，别无选择。

为了尽力给第三帝国造声势，纳粹政府的使者伪装成商务旅行者、记者或者干脆是游客被送到国外。1938年，仅在伦敦就有不少于83人的特派记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差不多是作为希特勒政府的间谍进行工作的。他们四面撒网，比如到埃及和巴勒斯坦，企图在那里制造不安戈培尔亲自提携了一个从巴勒斯坦流亡出来的阿拉伯领导人——费穆尔·侯赛尼，邀请他前往柏林。在他那为数不多的出国访问当中，他有一次和阿拉伯的一个利益集团进行了接触，并向他们表示，德国在他们和以色列人的论争中支持他们。

为了在国外宣传民族社会主义，一系列的德国的联合会和协会也纷纷接到命令建立起来。这当中有德国大学生国外联合会、费希特协会，排犹的世界联盟，为在国外的德意志侨民设立的人民联盟，雇佣者联合会和许多其他的组织，据一项对1937年的谨慎估计，这些组织每年要花费2100万英镑来进行对外宣传。

费希特协会，一个早在1914年便成立的有一些“泛德意志”倾向的组织，给其在国外的代表下达了下面的指示：

把我们的传单和小册子顺带地放在工厂、学校、银行里和火车上的方法，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口头宣传也十分重要。

要编写一份每座城市有声望的居民的名单。应该尽可能地了解到他们的政治观点，至少要定期给他们提供我们的小册子。手中的小册子不要多于一本，因为广泛地分发也许会减弱效果。

尽可能地使新闻机构获得我们的宣传资料。一旦在外国的报纸杂志上发现了坚决的反德意志的腔调，就要立即给出版社寄去一封做出相应反应的读者来信。我们的传单和小册子都是免费的。

1935年，戈培尔宣传部的资金1.3亿需求量已经十分可观。仅国内工作的预算就超过了1.3亿马克。海外预算，包括对“大洋彼岸”的巨额资助，超过了1.2亿马克。另外还有4000万马克准备提供给电影和戏剧。此外，戈培尔每年还支配一笔4500万马克的所谓“爬行动物基金”。多德大使曾在日记中提到，沙赫特博士对德国纸币大量非法流到国外，从而会给货币金融带来不利的影响而感到担忧。

1935年，沙赫特授意部属，对向戈培尔的宣传部提供的整整一批纸币上做上记号。后来证明，所有做上了记号的钞票都流到了国外。

沙赫特在希特勒面前发牢骚，但他的抱怨只是引起了极度的不满。

在努力让宣传部全面担负起对内对外宣传任务的过程中，戈培尔时时遇到困难。在攫取权力的过程中，他曾经尝试把所有其他政府机构中凡是和新闻与宣传有一点关系的部门都抢过来。内政部不得不把对报刊杂志、无线电广播的监督权，戏剧检查权，书籍和电影检查权以及对公共节假日的支配权都交给了戈培尔。从经济部手中，戈培尔接管了国有广告业和对工业展览、贸易博览会的管理权。从邮电部那里接管了旅行社。

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最终成为新闻领域、文化机构和宣传的唯一领导者。他的对手之一就是拥有“帝国新闻主管”头衔的奥托·狄特里希博士。他的职位实际上是完全多余的，而且在他和戈培尔之间不断出现摩擦和权力之争。但狄特里希的地位是不可侵犯的，因为他直接隶属于元首办公厅，并且他还拥有希特勒本人的支持。希特勒支持他是因为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他曾经通过私人关系建立了纳粹党和重工业及其他财源的一些最初的重要联系。

另一个绊脚石是马克斯·阿曼。这个人掌握着大约340家隶属于纳粹党或者是受其控制的报纸的经营权。此外，阿曼还领导着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出版社。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任下级军官的阿曼就和三等兵希特勒成为了朋友，以后又作为第一批的成员加入了纳粹党。作为使希特勒、戈培尔成为特约作者的出版商，阿曼获得了声誉和几百万的财产。这个巨大的报业康采恩以及同样巨大的出版社内部的组织工作，并不是由这个尽人皆知其懒惰无能的阿曼来承担的，而是由他勤奋而又精干的同事弗里茨·莱茵哈特在发挥作用

由于戈培尔在朗科庄园的第一期工程费用是由阿曼解决的——这个出版商给了他50万马克作为以后出版他的日记的预付稿酬——故戈培尔就陷入了在某种程度上要依赖他的对手的境遇即使是不怎么聪明的阿曼也清楚地认识到，让宣传部长对他感恩图报是多么的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满怀醋意而又野心勃勃的戈培尔很难再对阿曼的巨大企业的或多或少的独立性表示异议，并且像顺理成章似的把其纳入宣传部的管辖，或者至少从属于宣传部。

虽然在宣传部内设置了一个专门的处来负责协调戈培尔的宣传部、狄特里希、阿曼以及其他的部门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戈培尔的独立性大受限制。例如，狄特里希一部分是独立地，一部分联合阿曼掌握了对各省新闻机构的控制权，没有他和阿曼的批准，新的报纸便无法出版。

为了争夺对外宣传的权利，宣传部和外交部之间也展开了一场争斗。在非纳粹分子的温和的封·漆哈特男爵主持外交部的时候，一切尚好。1938年漆哈特由里宾特洛甫取代之后，情况便开始恶化。

里宾特洛甫是外交部里第一个正宗的纳粹分子。他像戈培尔一样野心勃勃，行动起来也和他一样肆无忌惮激烈的对抗在所难免。里宾特洛甫一开始就坚持组织起他自己的对外宣传，并且在他的部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奥托·狄特里希，这位“帝国新闻主管”，记述了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之间的这场斗争。

一天，在元首的大本营，里宾特洛甫说服元首给了他组织起他自己的对外宣传的书面批准。宣传部长戈培尔对此一无所知直到第二天早上，外交部派来搬运戈培尔手底下各部门中所有有关对外宣传的文件材料的家具搬运车出现时，他才感到大事不妙。戈培尔命令他的人据守办公室，一份文件也不许交出去。同时他打电话给希特勒，并且很快地被传唤进大本营。当他到达时，希特勒命令他和同样是刚被传唤来的里宾特洛甫一起坐进元首专列的一节车厢中，直到他们排除了他们之间的一切分歧才准出来。三个小时之后，两位部长脸涨得通红出现在希特勒面前，告诉他，他们之间根本无法达成一致。这几乎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希特勒还是勃然大怒，他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口授了一份解决办法，而这个办法实际上和他以前的那道命令完全背道而驰。但里宾特洛甫不把这个于他不利的第二道命令放在心上，他继续抓着实际上已被撤回了的第一道元首命令，总是精心地随身携带一份该命令的照片复印件，不时地对戈培尔的宣传部在对外宣传方面的绝对权力提出质疑。

外交部长和宣传部长这种局面只是在战争开始之后才出现。但在战争开始前很早，两个部长就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外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并且争取在竞争中利用外国新闻界压倒对方。

战争开始之后，德国食品实行了配给制。戈培尔挖空心思出来一个高招。根据他的主意，外国记者除了拥有普遍的食品配给证之外，还可以得到重体力劳动者享用的特殊配给卡。他命令把这些特别配给证，在每两周举行一次的宣传部记者招待会上，向参加者分发也就是说，戈培尔想用香肠和黄油把记者们吸引到他这边来。为了把这些外国新闻记者和他自己的宣传机器更牢固地联系起来，他另外还给他们提供了通过宣传部的批准可以收取的丹麦寄来的食品包裹的可能性。但里宾特洛甫也没有闲着。他向外交部的俱乐部里的外国记者们提供了极精美的食品。较有名望的外国记者对这两方面的引诱都不屑一顾而那些接受了这一方或者那一方的好客举动的记者们也令戈培尔十分气愤，因为他们没有做出什么他所希望的感谢的表示，关于德国的报道也并没有和以前两样戈培尔认为，里宾特洛甫的笨拙应对此负责这两个部长之间关系的危机在1939年缔结德苏条约时达到了顶点。在条约签订之后，伯玛，一个与里宾特洛甫有关系的军官告诉新闻界：

在官方正式公告之前，全世界只有八个人知道和莫斯科的谈判已经结束。戈培尔博士不在这八个人当中。

伯玛博士高兴得昏了头，所以竟然这样冒失轻率。他最终乐极生悲，在他还没有通过睡眠使自己从沉醉中醒来的时候，戈培尔就下令把他抓起来了。对外国记者们来说，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之间不断的争权夺利当然是十分有意思的。

使戈培尔的声誉在外国新闻界十分受损的，是他毫无顾忌的排犹态度。他并不满足于公布和解释反犹太人的命令，他还努力地积极组织对犹太人的迫害和集体屠杀。这些行动从1933年4月1日随着抵制犹太人的运动而开始，接下来就是对“和犹太人有姻亲关系”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迫害。

但战前德国最野蛮的反犹暴行是发生在1938年的“砸玻璃窗之夜”事件。1938年11月7日，驻巴黎德国大使馆的一个年轻官员恩斯特·封·阿特被一个17岁的波兰犹太青年贺什尔·格林斯潘杀害了。谋杀的确切情形无法十分准确地调查出来。而四年之后，在被占领的巴黎格林斯潘被投入德国的监狱。戈培尔一手安排，公开审判，但很快又被取消了

这次对德国大使馆年轻的外交官的谋杀被用作了一次骇人听闻的暴行的借口。1938年11月9日夜和10日凌晨，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成了这次暴行的牺牲品，并且在德国的犹太人还被处以了大约5亿马克的“罚款”。

1938年11月11日，戈培尔试图对说他是这次集体迫害的设计者的谴责进行反驳：

如果我是这次示威活动的组织者的话，街道上的示威者就不会只是几千人，而是会有40万或者甚至是超过50万的示威者。而且结局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肯定会更加有决定意义。

反正实际上的结局已经够了。在整个德国有几千家犹太人的商店和上万的犹太人住宅被毁，这些商店、住宅的主人被逮捕、鞭打，被投进了集中营。和几年之后有几百万人葬身毒气室比起来，这次行动好像相对温和一些。但在当时，这次11月集体迫害的冲击波已经足够在全世界激起愤怒的风暴，并且促使罗斯福总统从柏林召回他的大使了。

11月12日，纳粹分子在柏林召开了一次讨论犹太人问题的内阁会议，包括有戈培尔和戈林之间一段辩论的速记笔记的官方会议记录被保存了下来。这份记录是从纽伦堡审判的文件中找到的。戈林的律师提交了这份会议记录，以便把他的当事人的一部分责任推到死去的戈培尔身上，再没有什么比这些辩论中的毫无人性的厚颜无耻，更能反映出这些纳粹领导人的特征了：

戈培尔：我还是认为有必要把我们这里到处都是的犹太人赶出我们的社会他们在这里起着挑拨离间的作用。例如，直到今天，一个犹太人还可以和一个德意志人共用一个火车卧铺包间。帝国交通部长应该颁布命令，设置一些专门为犹太人准备的包间。并且，如果这个包间已满，当所有德意志人都有座位时，犹太人才能得到一个特别包间，这样他们才不会和德意志人混在一起。如果车上没有座位了，犹太人就得在外面走廊上站着。

戈林：我认为为犹太人准备一些他们自己的包间更合理一些。

戈培尔：但在火车超员时不行。

戈林：你想想！只有一节专门为犹太人准备的车厢，当它满员了，其他的人就只好在等待着了。

戈培尔：可是设想一下，比如没有那么多的犹太人坐火车去慕尼黑。我们就说只有两个犹太人在火车里，而其他的包间都超员了，这两个犹太人却有一个特别包间。因此我们必须说，只有在所有的德意志人都有座位时，犹太人才有权利要求自己的位置。

戈林：我可一点儿不想首先实行这一点。我还是考虑为犹太人专门设置一节车厢或者一个包间而且每次都是固定的。在像您所说的超员的时候，请您相信，我们会这样做，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法律，就可以把人们统统扔到外面去或者他们可以在整个行程中都呆在厕所里面。

显然这个问题就此阐述详备了。但戈培尔还需要一个新的话题，下面是会议记录的原文：

戈培尔：还要考虑考虑是否有必要禁止犹太人踏进德意志的森林现在，成群的犹太人在绿色的森林里游荡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挑衅，并且给我们不断地制造出事端犹太人所做的一切是那么有挑动性，有挑衅性……

戈林：很对！我们得给犹太人划出一些特定的林区供他们使用。阿尔帕斯会负责让各种长得像该死的犹太人的动物——驼鹿也有那么一个弯曲的鼻子——跑到那里并且

接受驯化。

此时戈林哈哈大笑，以至于会议不得不中断几分钟（阿尔帕斯普鲁士主管林业的专员）。

戈林接着又把话题转到了“砸玻璃窗之夜”造成的损失上，并且把在外面等候的、来自玻璃保险公司的希尔加特博士叫了进来。

戈林：对于扮演重要角色的玻璃保险公司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受损失的人中更大的一部分是雅利安人。因为房屋的所有权大多在雅利安人手中。犹太人一般情况下只是房屋的租借者。

戈培尔：那么犹太人就必须赔偿损失。戈林：这毫无疑义。我们没有原材料，被砸坏的都是进口玻璃，它们是要付外汇的。这简直能

气得人发疯！这简直是一场暴乱。这是一个法律的范畴。没有偷窃，没有悄悄地潜入，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家一拥而进，把所有的东西都砸得粉碎。

希尔加特：部长先生，毫无疑问，可敬的德意志商人不应该成为损失的承担者。

戈林：那么就请您留心不要砸坏那么多的玻璃吧。这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把您的代理人都派出去，他们立即就会明白，砸坏的玻璃的数量正好是从比利时的全年进口量。

戈林最后说：我选择下面的话作为一项条文：作为对其丧尽天良的罪行等等的惩罚，全体德国犹太人将被课以10亿马克的特别税。这准干得成。这些猪猡不会再这么快地进行第二次谋杀行动。此外，我还要再次强调：我希望在德国土地上没有一个犹太人！.....”

毫无疑问，在夺取了政权之后，戈培尔个人的经济状况也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他很快变成了一个富有者。在从柏林的废墟里找到的一些文件中，也有一些关于戈培尔收入情况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在夺取权力之前的一个月，他还欠着几笔数目可观的税款。另外还有一份手写的关于他从1933年到1937年收入情况的记录。下面的数字被记录下来：

1933 34367马克

1934 134423马克

1935 62190马克

1936 63654马克

1937 66905马克

这些数字中并不包括戈培尔从纳粹的出版社那里获得的巨额预付稿酬。从1935年12月到1936年12月，他预支了29万马克将来的版税，而他的书（包括大规模再版的书籍）在这一年销售的实际收入也只有63416马克。

戈培尔一般来讲在金钱问题上是无可指摘的，而且作为部长，他出书也很慎重他要求他部里工作人员的费用账单也必须同样地精确。在这一点上，他使自己和大多数其他的纳粹党领袖，比如以其慷慨大

方和毫无节制而自夸的戈林区分开来。戈培尔从不否认自己是小市民的后代，就是在大资产阶级的圈子里，他也无法放弃他从小养成的节约的习惯。除了衣着和住房之外，他个人的需求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只是在他用很高的品味布置起来的乡村别墅中，他才允许自己表现出一些奢华。

他的两幢乡村别墅，分别在濒临万湖的施旺恩维尔德和博根湖畔的朗科。施旺恩维尔德是戈培尔于1934年以较低的35万马克的价格买进的。他不得不为此筹集了一笔10万马克的抵押贷款。尽管如此，他后来还是尚缺7万马克。当希特勒得知此事之后，他送给了戈培尔这笔款项。他告诉对他忠心耿耿的宣传部长，他刚刚收到了他的书《我的奋斗》的一笔比这个数目要大一些的版税。他很高兴可以在戈培尔一家购买房子的时候帮上一把。说完这番话之后，希特勒走回了他的办公室。几分钟之后，他拿着两个用报纸卷好的小包走出来。那里放着他允诺的总共七万马克的50马克一张的钞票。

朗科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程。在艾尔出版社为他尚未公诸于世的日记预付了五十万马克的稿酬之后，他便买下了这块地皮，并且很快上马施工。建筑师告诉他，这笔款子对已经设计好的乡村别墅来讲是足够的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设计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修改和补充。钱很快就“光”了，而工程的结束尚遥遥无期。戈培尔在经济上陷入了很大的困境，他请求资深的大金融家温克勒来关心此事。温克勒发现，他的产业如果要按照预定的风格完工至少还需要150万马克。而且维持这所住宅的费用每年要达8万马克。这是个戈培尔无法承担的数目。温克勒博士最后以这种方式解决了问题由德国电影工业筹措经费来使工程完工并承担维持这一片产业的费用“鉴于其对电影工业所做出的成绩”，把它以借用的方式供部长使用。

有意识地与戈林形成对比，戈培尔很重视在公众中树立简朴的形象。一次每周新闻拍摄了他的家庭生活，孩子们骑着矮种马闯入画面，戈培尔对此很不高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路易斯·罗赫纳偶然听到戈培尔的一个助手对一群来自德国各地的记者们说，部长在私生活上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要求的人，他只是由于他的地位的缘故，才不得不承担起进行各种应酬的义务。戈培尔显然非常注意给公众们这

样的影响，因为部里的其他官员对其他的各省记者们也讲述了同样的话

战争期间，戈培尔几乎每周都为《帝国》杂志撰写社论。每篇文章他收取3000至4000马克的稿酬。他在住宅的布置上花费了大量的钱财。他身穿做工考究的西服，这样的衣服有上百件。他在吃上没有多少要求。他向来吃得很少，往往是一个黄油面包、一杯咖啡便足够了。除了在精神十分紧张的时候，他很少吸烟，更少喝酒。在电影界或戏剧界人士到他那儿赴宴的时候——这是很经常的事情——他们总是在饭前或者饭后去餐馆饱餐一顿。在战时，当食物端上来的时候，桌旁的客人不仅得将就吃下眼前十分简单的饭菜，戈培尔还派一个仆人，托着一只银盘，手拿剪刀，绕桌而行，去逐个收取”他们的肉票、油票和面包票。

戈培尔十分反感其他的纳粹领袖，尤其是戈林喜欢摆出来的炫人耳目的奢侈的宴席。当戈林1935年4月为了庆祝他和女演员艾米·索纳曼的婚礼在歌剧院举行豪华的庆典时，戈培尔授意各报纸尽可能冷淡地对此进行报道。在第二年的1月份，戈林被邀请参加了一个同样奢华的舞会戈培尔对从本来就很少的几张照片中挑选出一些他认为可以发表的很感棘手。但在一些合适的情况下，戈培尔也会表现出，他同样是喜爱奢华的。1936年7月，他在万湖上举办了“威尼斯之夜”，招待3000名来宾。戈培尔举行此次盛会并非是出于个人的享乐，而是尽其实应酬的义务，款待从世界各地来到柏林的国际贸易代表团的成员。1936年，柏林举办奥运会。在来宾们面前戈培尔也想展示出一幅第三帝国幸福光荣的图画。因此，他在万湖上第二次举行了晚会。一大群女演员、女舞蹈家乔装成希腊神话中居住在水泽中的仙女，代表着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希腊精神。可惜的是她们的戏做得太过火了，拂晓时分，整个场面不像在奥林匹斯山上，倒更像是一场狂欢闹宴。这件事变成了一桩相当大的丑闻，连无所不能的戈培尔也无法把它掩盖起来。因此，追求奢华而经常挨骂的戈林对此十分高兴。几天后，为了表示对奥林匹亚精神的敬意，戈林举行了一次啤酒晚会。这场晚会和戈培尔的活动比起来，被誉为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可敬的典范。

战前，戈培尔夫妇作为主人和客人在希特勒的群体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希特勒本来可以从最吸引人的男男女女中选择出餐桌上的伙

伴和他共同消磨时光。但他却把他“奋斗时代”里的老朋友和老同志组成的小圈子放在了首位。

希特勒的总理府有一种规矩，甚至可以说像是举行仪式的程序。希特勒总是很晚才起床，约在上午十点或十一点。等到他开始到办公室视事，往往已到中午。他一般要在办公室逛一下，和秘书们聊聊天，然后再浏览成批的文件，详细阅读报刊摘要。到下午两点，他将同大约四五十个客人在“快乐的总理餐厅”共进午餐。这些客人大部分是他的党徒，或是来访的地方长官，再就是总理府成员中的常客：巴尔、泽普·迪特里希、高级副官们和建筑师施佩尔，戈培尔偶尔也来。这种聚会很少在下午四时前结束的。

希特勒是个十足的夜游神。德国人的晚餐是淡而无味的冷食，总理府的晚餐也不例外。晚上的客人主要是柏林文艺界人士，而不是政界和政府人士。午夜，大部分客人告辞，希特勒就和莱伊、莫勒尔医生、赫维尔、巴尔，有时还有戈培尔等老伙伴一起围在壁炉旁，讨论的内容始终如一，较少现实生活，而主要是谈二十年代纳粹初期那些振奋人心的事。戈培尔不在场时，这种炉边谈话往往变成希特勒的长篇独白。而有戈培尔在，情况就不同了。

希特勒毫无幽默感。他让别人互相开玩笑，自己在一旁哈哈大笑，不加节制，甚至当真笑得直不起腰来。戈培尔最善于讲一些俏皮话使希特勒开心，同时贬低他个人在内部权力斗争中的竞争者。有一次，他说：“希特勒青年团要求我们为他们的大长官劳特巴赫尔二十五岁生日发一条消息。我让人起草了一条新闻稿给他，说他充满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活力’。过了这次生日，我们就再没有听到他的下文了。”希特勒捧腹大笑。在午餐桌上，希特勒一再追述他的青年时代，说他当时受到严格的管教是很要紧的：“我经常被我父亲狠揍。现在我还相信，这是必要的，对我有帮助。”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用大家都能听得到的声音插话说：“今天看来，我的元首，挨揍对您确有好处。”合座皆惊，面面相觑。为挽救这种难堪的局面，弗里克赶忙补充说：“我的意思是，正因为如此，我的元首，您才有今天。”一向认为弗里克是无可救药的蠢材的戈培尔挖苦地说：“亲爱的弗里克，我猜您年轻时一定没有挨过打。”

戈培尔专好取笑罗森贝格，称他为“帝国哲学家”，讲他的轶事来贬低他。戈培尔拿他来开心时，肯定能得到希特勒的赞许，因此，他就老拿罗森贝格当作笑料来谈，讲的时候，就像演戏一样，各种角色好似都经过精心排练，只等着登台出场。最后，希特勒几乎肯定要插上几句话：“《人民观察家》报同它的主编罗森贝格一样地俗不可耐。本来我们党内有一份叫做《荨麻》的幽默小报。再没有比它更沉闷的了！从另一个角度说，《人民观察家报》倒是一份幽默小报”。为了让希特勒高兴，戈培尔把这家大印刷厂的老板米勒也拉进戏里来，因为米勒千方百计地既为纳粹党服务，又不失去他的老主顾——上巴伐利亚笃信天主教的团体和阶层。米勒的出版书目方面极广，从敬神的历书直到罗森贝格反对教会的著作。他之所以能有这种伸缩余地，是因为在二十年代时尽管纳粹党付不出排版印刷费用，他仍然继续给他们印《人民观察家报》。

有些笑话是别人有意准备好讲给希特勒听的，它们都同实际发生的事情有关，不过是打着这种幌子，随时向希特勒汇报罢了。干这种事，戈培尔也总比其他入更胜一筹，而希特勒也一再给予嘉许，以示鼓励。

在广播系统，有一位老党员欧根·哈达莫夫斯基得到了帝国广播电台台长这个重要职务，现在他又想当帝国广播系统负责人。可是，戈培尔已经物色了别人，并且担心希特勒会支持哈达莫夫斯基，因为此人在1933年以前的历次竞选运动中曾以出色的才干组织过有线转播网宣传部国务秘书汉克把哈达莫夫斯基请去，告诉他说，希特勒刚才任命他为广播系统的“帝国总监”。哈达莫夫斯基听说他朝思暮想的职位终于到手，简直欣喜若狂。戈培尔在午餐桌上向希特勒叙述此事时，显然用的是漫画式的渲染和丑化手法，因此，希特勒完全把它当作编造出来的长篇笑话。第二天，戈培尔让人印了几份报纸清样，上面载有报道任命哈达莫夫斯基的假消息，还用夸大的言辞赞扬这位新受命者。戈培尔把这些记得滚瓜烂熟，随后又来向希特勒讲述报上夸大的赞词，以及哈达莫夫斯基拿到这些报纸清样时是如何兴高采烈。希特勒和同桌的人又一次笑得前俯后仰。就在这一天，汉克又把新受命者请去，让他对着一个没有通电的扩音器致就职词，次日，戈培尔大讲那位受愚弄者如何喜形于色，手舞足蹈，大家听了，又乐不可支。这

是一场恶作剧。从头到尾，被捉弄者毫无替自己辩解的可能，而且一直被蒙在鼓里，不知道他再也得不到希特勒的支持了。不知戈培尔讲的全是真事，抑或纯属虚构。

驻国外通讯社社长普齐·汉夫施滕格尔，他由于同希特勒私人关系甚密，于是便遭戈培尔的猜忌。戈培尔先是加给汉夫施滕格尔一个所谓吝啬的恶名。之后，又用一张唱片来证实，汉夫施滕格尔创作的一首流行的进行曲的旋律，是从一首英国歌曲中剽窃来的。到西班牙内战时，这位驻外通讯社记者已经失去信任，此时，戈培尔又在饭桌上说，汉夫施滕格尔曾说过一些关于在西班牙作战的德国士兵士气不振之类的坏话。希特勒勃然大怒，说这个胆小鬼，他有什么权利去评论别人有没有勇气，非教训他一顿不可。几天以后，希特勒派人给汉夫施滕格尔送去了一道密封的命令，要他上了专为他准备的飞机并在起飞后才准拆开。飞机起飞，汉夫施滕格尔把命令拆开一看，大惊失色，原来要把他空投到“红色西班牙地区”，去替佛朗哥当间谍。在午餐时，戈培尔向希特勒作了详尽的汇报，说汉夫施滕格尔在读了命令后，如何绝望地请求驾驶员掉头往回飞，口口声声说，这准是一场误；飞机又如何在德国上空云层中盘旋数小时之久，驾驶员骗他说飞机在什么什么方位，他当真以为离西班牙越来越近了，最后，驾驶员对他说，飞机要紧急着陆，随后安全地降落在来比锡机场上。汉夫施滕格尔下了飞机，想必已经意识到他是一场恶作剧的牺牲品。这时，他神色慌乱地说，有人要谋害他。不久，他就失踪了。

戈培尔每讲一段，希特勒及其座上客就大笑一阵，尤其因为这次恶作剧是他和戈培尔合伙策划的。过了一段日子，希特勒获悉，汉夫施滕格尔在国外请求避难，他这才担起心来，生怕他同外国通讯社合作，拿他所知道的机密来换取钱财。可是，尽管汉夫施滕格尔背着一个贪财的恶名，却并没有这样做。常常参加这种谈话的奥托·狄特里希曾用这样的文字来描述戈培尔参加这种聚会的有趣图景：

“来宾们总是让希特勒侃侃而谈，而自己只是很少地插几句话。戈培尔是一个例外，他会在谈话中向希特勒抛去几个令他感兴趣的提示词。戈培尔总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取得关于这个或那个问题的重要决策——虽然是口头上的，但他却可以将其作为“元首命令”而加以利用。如果一时间希特勒沉默了，戈培尔也不出声，有时便会出现一段

长时间的难耐的谈话间歇。这时就必须有笑话来填补空间。特别是戈培尔会不知疲倦地用柏林的粗话来讲述最新的政治笑话。但他此时非常注意，只讲述那些与自己不相干，而以戈林或其他党的领袖为其‘牺牲品’的笑话。”

学生时代的戈培尔十分感激那曾在他贫困时解囊相助的犹太人科南大叔，他是戈培尔1924年的自然提纲的校外指路人。也许靠了他，戈培尔才能——继童话书之后——抄录第一流的有影响的书：《布登勃洛克一家》。家里谁也不对他谈论托马斯·曼。不管戈培尔注视他大学时的犹太教师还是他那十分钟爱的一半犹太血统的未婚妻，甚至他本人时，都觉得他在这些人当中既不是高贵的“雅利安种”，同尼采的那种“金发野人”的形象也绝无吻合之处。

戈培尔在青年时代根本就没有认真看待天主教教义所维护的那种宗教性反犹主义。他曾将一位犹太人，即在海德堡写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弗里德里希·贡多尔夫，视为自己精神上的良师益友；当他熟悉整个古典文学时，送给他最心爱的姑娘的恰恰是犹太人海涅的《诗歌集》；在他每次照镜子时，只要还有自我幽默感并在思想上与荒谬的纳粹学说保持距离，种族谬论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

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也是在一个犹太商人的舒适环境里长大的。犹太商人弗里德伦德尔娶了玛格达的母亲。

上述种种都表明，早先，戈培尔并未把希特勒的种族理论当作一回事。

成长中的、逐渐成年的戈培尔，直到二十七岁在政治上尚未找到归宿，这时他还没有接受他未来元首的那套反犹太主义。当时除了希特勒，谁都不会认为或者希望后来能够出现残害犹太人的暴行。然而不久以后，以及在他整个后半生，戈培尔则完全抛弃了自己的观点。

1933年，出任宣传部长伊始，在科学院院士们的喝彩声中，戈培尔策划了一次公开焚毁海涅、托马斯·曼、爱因斯坦、左拉、弗洛伊德等著作的焚书运动。他厉声宣称：“……登峰造极的犹太人的惟智主义时代现在已经结束了。德国革命冲破重重阻碍，给德国的意识形态打开了一条通路。你们在深夜将这些历史垃圾付之一炬，干得实在漂亮。这是一个剧烈的、伟大的和象征性的行动，它将向全世界证

明：“十一月共和国”（指1913年德国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支柱已经垮台了。可是，新智慧的长舌鸟将从这些废墟上展翅而起，旧的已化为灰烬，新的东西将从我们内心的火焰中升腾起来”

戈培尔组织焚毁犹太人的著作，不仅仅是消除犹太人在文学领域内的影响，而且，在随后几个月中，在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贯彻了一种新的方针，戈培尔将清除犹太人影响的活动扩展到音乐、戏剧、新闻、广播、电影等等领域。艺术家毕加索、马蒂斯、塞尚等的画幅从博物馆中消失了大学和科学研究机关中的“犹太人绝迹”了。当时高度发展的德国——犹太文化的代表，如杰出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加入了著名的政治流亡者的行列。

在戈培尔控制的报刊上，反犹舆论与日俱增。1935年9月颁布的纽伦堡法不再承认犹太人为“帝国公民”。新的法律禁止犹太人同“高贵”的种族发生任何个人接触。希特勒给“犹太人”这个概念重新下了定义，凡曾祖父母中有三人是犹太人的均为犹太人。他还根据祖父母中犹太人多少将犹太人分成几类：如四分之三犹太人，二分之一犹太人和四分之一犹太人。

将近1935年底，有八千犹太人自杀，七万五千犹太人流亡国外。

到了1941年和1942年，戈培尔作为柏林大区党部书记，成了当时推行种族灭绝政策最卖力的人物之一，他竭力讨好希特勒，把柏林作为“无犹太人区”来向他报功。

他在《帝国报》上亲自撰文说：“在这个历史性的辩论中，每个犹太人都是我们的敌人，不管他是在波兰的犹太区里艰苦度日，还是在柏林或汉堡苟延残喘，也不论他是在纽约吹起了战争号角。犹太人也能算是人吗？这就像那些谋财害命者、奸淫幼童犯和靠妓女养活自己的男人一样，犹太人是寄生种族，他们就像霉菌需要健康人来培育一样。对付他们只有一个办法：一刀两断，摆脱他们。毫不留情！至于犹太人还生活在我们中间这一事实绝不能证明他们和我们属于同一类。如同跳蚤在家里但并不能成为家畜一样。”

他所指的“跳蚤”是占德国人不到百分之一的那一部分，而为德国赢得百分之二十五诺贝尔奖金的正是他们。他也知道，1914至1918年期间，德方有一万二千多名犹太人阵亡

在“最后解决”之后，戈培尔说，必须“同耗子一样打死犹太人。在德国，我们幸好已经切实地做到了这一点。我希望，全世界都来效法我们。”

撒谎成性 大造谣言

戈培尔尽造谣生事、颠倒黑白之能事，在希特勒进攻波兰，正式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了顶峰，他制造宣传舆论的伎俩，这一次是创了新的纪录。

波兰位于欧洲东部，东接苏联，面临德国，南界捷克斯洛伐克，北濒波罗的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波兰是当时英、法在欧洲诸盟国中军事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德国若占领波兰，不仅能获得大量的军事经济资源，而且还能大大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既可消除进攻英法的后顾之忧，又可建立袭击苏联的基地。因此，德国在并吞奥地利和捷克后，便选定波兰为其下一步侵略的目标。对波兰的侵略战争，是希特勒妄图称霸世界的战争总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3月21日，德国向波兰发出通牒，要求它把但泽“归还”给德国，并将在“波兰走廊”建筑公路、铁路的权利也转让给德国。希特勒的无理要求，遭到波兰政府的严词拒绝。4月28日，德国废除了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并再次提出领土要求。希特勒的目的十分清楚，不仅要夺回根据“凡尔赛和约”被割去的但泽走廊，而且还要占领整个波兰。他在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曾明确地说过：

但泽根本不是争执的中心问题。中心问题是要把我们的生存空间向东方扩张”

早在1939年4月3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就已下达了关于制定对波兰作战计划的指示，4月11日希特勒签署了进行备战的训令，规定德军应于9月1日以前做好一切准备。德军侵波战争的计划，代号为“白色方案”，其战略企图是：利用快速兵团和优势航空兵，实施突然袭击，一举灭亡波兰。

希特勒要发动战争，侵略波兰，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

事实也是，1939年8月31日晚，一批身穿波兰军服的德国党卫队队员，按预定计划，“袭击”并“占领”了紧靠波兰边境的一个德国城市格莱维茨，并炸毁了德却奥附近的一座桥梁。德军“占领”该城的电台

后，用波兰语辱骂德国，并丢下了几具身穿波兰军服但实际上是德国囚犯的尸体。接着，德国的由戈培尔亲自控制的所有电台便广播了所谓“德国遭到了波兰突然袭击”的消息，并以此为借口发动了侵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此爆发。

可是，一个外国观察家在柏林也可以看到，报纸在戈培尔的巧妙操纵下，怎样欺骗了天真的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自从戈培尔1933年对所有的日报实行“一体化”，摧毁了新闻出版自由以后，德国人民生活在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世界里”。

在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前夕，德国的报纸是怎样说的呢？

《柏林日报》以大字标题提出警告：“当心波兰！”“对于肆无忌惮地蹂躏欧洲和平与人权的波兰的答复！”

卡尔斯鲁厄《领袖》日报的标题是：“华沙扬言将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柏林日报》的标题：“波兰完全陷于骚乱之中——日耳曼人家庭在逃亡——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国境边缘！”

《12点钟报》的标题是：“这样的玩火行为太过分了——三架德国客机受到波兰人射击——走廊地带许多日耳曼人农舍成为一片火海！”

8月27日星期日版的《人民观察家报》第一版的通栏标题是：

波兰全境均处于战争狂热中！一百五十万人已经动员！军队源源运往边境！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

一直到1939年8月31日的夜幕笼罩欧洲，晚间九点，戈培尔的所有电台都广播了希特勒对波兰的和平建议。戈培尔再一次在帮助希特勒弄虚作假，混淆视听

几乎与此同时，由党卫队瑙约克斯率领一支特别行动队在德波边境采取行动。瑙约克斯后来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作为见证人说道：“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缪勒曾对我们说他有12名囚犯。他要他们穿波兰军服，把他们弄死后放在出事地点，以此表明他们是在进攻时被打死的。为此，盖世太保雇用的一位医生给他们打毒药针，然后再用枪打，在他们身上造成伤口。事情发生后，一些报界人士和其他人士被领到现场。缪勒告诉我，他从海德里希那儿得到命令，要给我

一个这样的死囚来布置格莱维茨事件。这个死囚所用的代号是‘罐头货’”

可是，1939年9月旧戈培尔在《人民观察家报》上说什么呢？标题：“侵略者袭击格莱维茨电台”

他说“一队波兰士兵在昨夜近20时占领了格莱维茨电台大楼当时大楼内仅有几个值班人员。很明显，波兰进攻者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他们袭击了电台的工作人员，闯入播音室和机房，打死了遇到的人。

“侵略者切断了与布雷斯劳电台的转接线路，并对着话筒用波兰语和德语读了他们预先准备的广播稿。

“他们声称该市的电台已在波兰人的控制之中，他们攻击德国，说布雷斯劳和但泽都是波兰的领土。

“听众大吃一惊，于是报告警察。几分钟后，警察赶到出事现场。侵略者向警察开枪射击，但几分钟后全部被俘。战斗中，一名波兰人被击毙。”

这类文章实际上都是戈培尔他们早已准备好的。

这天，电台中，广播着希特勒的一份冠冕堂皇的告德国军队书。他说：“波兰已经拒绝了我所期望的两国关系的和平解决，而且诉诸了武力……为一个大国所不能容忍的一系列侵犯边境的事件，证明波兰已经不愿尊重德国的边界。

“为了制止这种疯狂行为，我别无良策，此后只有以武力对付武力。”

那天，德国外交部向所有的驻外使节发出了一份通电，就他们应采取的态度作了指示：“为了抵御波兰的进攻，德国军队已于今晨开始对波兰采取行动。这一行动在目前不得称为战争，而只能称作是由波兰的进攻所引起的接触。”

1939年9月1日破晓，德国军队大举越过波兰国境，分北、南、西三路进逼华沙。

天空中，德国机群吼叫着飞向自己的目标：波兰的部队、军火库、桥梁、铁路以及不设防的城市。几分钟后，这些飞机就要使波兰人不分军民第一次尝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来自空中的突然死亡和

毁灭的滋味，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恐怖，在此后六年间欧亚两洲千百万男女老幼将经常处于这种恐怖之下，但是戈培尔对此感到很得意，他在一次演讲中说：

“政治就是一种赌博”，“只要我们，纳粹政府和后台老板能赢，我们就准备把全体人民去做赌注——战争就是这场赌博的最残酷的结局。”

就这样，戈培尔利用手中的宣传机器，使用颠倒黑白的惯用伎俩，为希特勒的纳粹战车吹起魔鬼般的号角，整个世界，都注定要蒙受深重的灾难。

七、情与爱

戈培尔是个风流情种，一生情事不断，不管是已婚还是未婚时，他在强烈的虚荣心的驱使下，尽量多地俘获女人。到他结婚时，他已经谈过三回恋爱了。

第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

那时候怀着一种可以理解的好好享受一下的欲望，一代青年人从战壕、俘虏营和弹药厂返回到平民生活中。20岁到30岁的青年人想补回他们在战争期间被骗而做的“青年人的蠢事”。战前的道德观念被认为过时了。出于对陈旧的“狭隘”观念的反抗，德国姑娘们把头发剪短，穿起露膝裙。在那几年里，年轻的戈培尔经历了他的第一次重要的恋爱。这一关系从1919年维持到1922年。姑娘名叫安卡·史塔尔赫尔姆，一个漂亮迷人的金发女郎，出身于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她家对她与这个穷学生的关系感到十分生气，为最终结束这一关系从中作梗。戈培尔自己也把这些关系搞得很糟糕，他把一些事弄得复杂化，耍性子闹情绪折磨他的情侣。

1920年秋，戈培尔有过好几次自杀计划。这年10月1日，他甚至写下了遗嘱。他同安卡闹翻了，因为遗嘱的末尾有这样一句：

我希望安卡·史塔尔赫尔姆销毁我所有的信件”。另外，在遗书中，他指定拍卖他的全部外衣和其他私人财物及偿还他的债务。他遗赠给他母亲一幅小画，留给当时约11岁的妹妹玛丽亚一个闹钟和允许她自己选出的五本书，对其他家庭成员他也作了类似的决定。

他指定他哥哥汉斯作他的“文学遗产管理人”。对于他这样一位青年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措辞，他的作品连一行字还未印刷出版，而且他的“文学著作”差不多只是些未完成的各种手稿。

关系中断十多年后，安卡再一次出现在戈培尔的生活中。此间她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离异后生活拮据。在戈培尔刚当上部长的第一年，安卡来找他这位青年时代的朋友。戈培尔为她在《妇女》杂志编辑部搞到了一个职位这家杂志社刚刚在戈培尔的怂恿下脱离了乌尔施太因康采恩。不久，安卡就惹得戈培尔大为恼火。因为安卡在朋友圈

子里，展示了戈培尔在年青时代与她共处时，赠送给她的写着浮华夸张题词的海涅的《诗歌集》。并非是他从前与一位美丽女人的关系为人所知这件事使他如此难堪，而是他作为海涅的欣赏者被披露而使他十分尴尬。因为在戈培尔任部长的头几周里，他让人将海涅的著作作为“犹太人的拙劣作品”公开烧毁了。

他一生里三位恋人中的第二个人是爱尔泽，莱茵河地区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儿。戈培尔的朋友弗里茨·普朗那时正同一个名叫阿尔玛的年轻女教师交朋友。爱尔泽是阿尔玛的女友和同事。两位姑娘都在莱特一所学校任教。爱尔泽是小玛丽亚的老师，很快就发展成同戈培尔全家的友谊。一段时间后，爱尔泽就对这家的活泼好动的小儿子表示倾心，最终同他订了婚。她尤其被他那双富有表情的眼睛所吸引，“他全神贯注”。这四个年轻人，弗里茨和阿尔玛、约瑟夫及爱尔泽几乎天天会面，作长时间的散步，或坐在糕点店谈上几个钟头，有时候他们也可以在富有的普朗家中喝上一瓶葡萄酒。那时另一位朋友弗里斯格斯也经常参与这个朋友圈的活动，通过他的虚无主义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嗜迷给几小时的辩论增加些风趣。

在这期间，普朗发现自己对政治感兴趣，并在1922年成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这使他的家庭大为生气。普朗的父亲，工厂经理，是共济会成员，他和他的朋友们极其憎恨“慕尼黑的宣传鼓动者”的喧闹的政党。相反，年轻的普朗却表现出深受希特勒感动的样子。他的朋友戈培尔那时很少关心政治，他的志向只在文学领域。

戈培尔宣传反犹太主义，但他个人与犹太人的关系原本是相当友好的其中有一位是他的受人钦佩敬仰的研讨课教师贡道尔夫教授。在家乡莱特有位犹太律师约瑟夫博士，与戈培尔家有多年的友好关系。已是中学生的戈培尔常去登门拜访那位对文化、特别是对文学感兴趣的律师，同他聊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老实说他的未婚妻也是犹太女人的女儿。他经常同爱尔泽谈及此事。她看到他对犹太人的仇恨在一年年增长。

戈培尔真心爱过这位年轻的姑娘。在1922年圣诞节，他给她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了许多真挚感人的话：

如果我现在想写几句祝贺圣诞节的话，那么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能带给你福音。现在不是歌唱快乐与和平的时候，谁要是不想说谎，他就肯定不能在这一年里问心无愧地谈论人类的和平。世界变成了一所愚人院，而那些最优者们正准备在混乱的舞会上围着“金犊”（财富的象征）跳舞。而此时最糟糕的是他们自己不承认，他们企图掩盖甚至维护这一点。新时代需要另一种人，人们必须适应这种情况。确实，这些人在这一年中将激动快乐地歌唱基督——和平使者。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没有看到和平，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在我心中都没有看到外面沉寂而空旷，我内心华丽的圣坛已经翻倒，欢乐的景象已被打破，世俗开始迁入通常只有神和爱端坐的所在人们称此为在行动中考虑新时代。伟大的命运，我怎么能够经受住你的考验？我不能再当你忠实的仆人。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你，最后的和最优秀的人扔掉了你的旗帜走向世界。现在轮到我了同样我必须，是的，我必须走。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谈和平呢？我必须逃离我的家乡，走向世界。

一扇通向无数荒漠的大门无言而冷漠，谁失去了你失掉的东西，就会勇往直前。飞吧，小鸟！用沙漠之鸟的音调唱出你的歌，你这蠢人，还是把你那流血的心藏进冷酷与嘲讽之中。乌鸦哇哇叫，呼呼地飞往城镇，快下雪了，无家可归的人真是不幸。

当世界不认识并不要和平时，甚至当我忙累了的时候，难道连我的祈祷“甜蜜的和平，你来吧！啊，到我胸中来吧”！也不应该得到拯救吗？当外面响起金玫的声音，对爱抱以嘲笑时，我们的爱、我们伟大的爱，我的好姑娘，就不应当装饰一下我们的生活吗？这是我唯一的希望。这个希望给我力量，让我有勇气和决心迈步走向世界。

我求你无论你怎样喜欢，也要把最后的东西给我留下，同我一起照料它，同我一起分享这快乐。

虽然爱尔泽十分爱她的未婚夫，但她也意识到这样结合的困难。她看到她的未婚夫由于不断的失败而变得越来越苦闷、玩世不恭、喜怒无常。他还经常说起自杀。但这种消沉状况不总是存在，而是随着在朋友圈子里欢闹的情绪而变化。爱尔泽说，她从未遇到过一个像戈培尔笑得那样开心的人。

当时，爱尔泽所有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是同戈培尔一起度过的，特别是当他在莱特的时候。她是个活泼、聪颖的姑娘，很漂亮，天生妩媚。像她绝大多数朋友们一样，她也用他学生时代的绰号“乌勒克斯”（诡计多端的人）称呼他。但是她也有自己对他的爱称，有时她叫他“施特罗普”（意为：小无赖、小淘气）。他俩每晚都作长长的散步，相依相伴，没完没了地交谈，从一家走到另一家，然后再返回来。当戈培尔在他科隆的银行办公室里泡八九个月的期间，他们每隔几天就互写长信，虽然他们通常至少在周末还要见面。有时候，他们一起到海边或山里去度假、旅游往往是由爱尔泽付钱，因为戈培尔确实几乎从未有过钱。相反，爱尔泽毕竟还拥有教师的薪水，而且她还有富有的家庭做后盾。他们的婚约一再在暴风骤雨式的争吵中解除，然后又在狂热的海誓山盟中恢复，这桩婚约大约持续了五年爱尔泽至今还记得她怎样在头一年同她的女友阿尔玛严肃地讨论，他们是否确实把自己看作是订了婚的，她是否应该让一个毕竟已畸形的男人成为她未来孩子的父亲——尽管对他非常同情和对他的精神非常钦佩。两个姑娘得出的结论是：约瑟夫的腿疾不是天生的，而是一次手术造成的，因此决不会有遗传性。

当戈培尔短期度假回来重返他的银行办公室后，1923年6月5日寄给他未婚妻一封信。我亲爱的孩子：你可别因我没有墨水写信而生我的气。在我休假期间，我的墨水瓶干了。我想，总比你根本没收到信要好吧。我多么幸运，今天电车又开了。昨天我乘火车到南站，然后步行，继续赶路。今天我带着全部家当又搬进来了，现在我在自己的小窝里感觉又很舒服了我把你的玫瑰放在你的照片旁，玫瑰发出浓郁的芳香，一朵更比一朵香。银行里的工作一切照旧。唯一使我感兴趣却令我失望的是：在15号以前没有钱。现在你必须忍耐到那时。今天下班后，我还是漫步穿过城市，看见了许多美丽的东西。电车不开，我们可以共同寻找并可以找出美的东西，这有什么可叹惜的呢。是钱呢？！啊，别唠叨了，我们会得到的（你有钱吗？没有？？我也没有！）

现在到了该把我们放到一起的时候了。每当我离开你时，我总是非常想念你，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休假时都得不到清闲和安宁。现在我觉得仿佛我们已有好几星期没见面了，我几乎在搬着手指头数钟点

了，因为我们不在一起。为什么因我们如此相爱就把我们置于这么一个不幸的时代呢？也许就是为了让世界的阻挡使我们在我们的爱恋中变得更坚强、更英勇吗？有谁知道呢？有时候过分的苦难和贫困将我压倒在地，有时又把我的心举到天上。我常常为我的胆怯和气馁而羞愧，然后我又认为必须得这样，因为我是一个人，没有什么人间的东西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或我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尤其是当我们和那些人一样，认识到如今作为世界问题来争议的东西并不是什么难题，人是比一切如今使世界紧张不安的东西更宝贵的时候，难道说不是这个世界能够并且可以使我们也变得软弱和摇摆不定吗？为什么从某些人的眼睛里看出的是清醒的冷，而那里通常人却燃烧着对人的爱的火焰呢？因为大家总是互相照顾，大家嘲笑我懒惰、不理智、不合时宜、陈旧过时，然而我就是觉得我最好的力量恰恰存在于我的这种懒惰、非理智、陈旧过时和不合时宜之中。我不参与，是因为在没有彻底消灭这个旧的人，没有找到另一个更差的人替代他的位置的情况下我无法这样做。我认为，可以不参与这种喧闹场时髦起来。在所有那些众多的有关新时代精神的讲话中，其实讲的全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而这种利己主义当然总是时髦的并将永远是时髦的。我确信，如果我不参与并为了一场更美好的事情留着我那最美妙的力量、我的心和我的良知的話，可以能更好地为这个时代服务。不是经济学专家和银行经理，而是那些纯洁的、没有被一个无神的世界的珍宝所玷污了手的人们将开创这个新时代。我想在一个新世界中变成我今天不能成为的人。如果说这个新时代，对我来说到来的太晚了的话，那也只好这样了，当一个伟大时代的先驱毕竟也是伟大的和美好的。我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我觉得我和最优秀的人，也就是年轻人是一致的。我们将成为彻底变革的、带来新生命的孩子（或种子）。我们将掌握在这个新时代讲第一句话的权力。这句话应当是：真理同谎言和欺骗斗争

天哪，都已经12点了，我得早点上床睡觉，对吗？假如我再多写一会儿，或许还可以写满十页，但是你不想让我这样做

好了，祝你晚安！

你的乌勒克斯

1923年6月5日

1924年1月23日，戈培尔给“柏林日报”寄去一封长长的求职信，此间他已被银行解雇。他在详细的履历中按时间顺序描述了以往的职业情况。他声称曾经在哥哥的“公司”担任领导职位，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公司。他为谋得一个编辑职务而努力，他估计他的薪水为每月250马克。求职申请被拒绝了。

戈培尔也许很乐意去剧院工作，但是在那里他的努力也没有成功。一位在莱茵河地区剧院当经理的人讲，有位年轻人到剧院经理室找过他。他衣着整洁，但有点旧，有双明亮的眼睛，瘦削的脸庞，走路有点跛。这个年轻人说，他叫戈培尔，想在剧作部找个事做。他自己已经写过几个剧本，他的梦想是当导演。剧院经理问这个年轻人，是否已有过这方面的一些初步经验，能否出示证明。当回答是否定的时候，他把他打发走了。

爱尔泽记得，当戈培尔在莱茵河地区剧院受聘的希望破灭了时，他感到更加痛苦失望

戈培尔描述了他和未婚妻爱尔泽多年来在感情方面时而“狂风暴雨”，时而“风和日丽”的那最后一段日子。1925年8月3日，戈培尔写道：“爱尔泽来了。星期二她兴高采烈地从瑞士回来了。她晒黑了，看上去很健康，也很愉快她待我很好，使我很快活……”。两天之后：“爱尔泽走了。我生病了……我忧郁极了！我太累了！”几天之后，他那老一套短句式的描绘又出现在日记里：“爱尔泽音讯全无……”一星期之后：“她像一个少女一样追求我，她感到多么幸福！对她的幸福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多么爱她！她待我很好。”接着的一、二个星期，他们之间在闹别扭（“爱尔泽音讯全无”……）。然后，9月23日：“……爱尔泽星期一来了……”“哦，你温柔的小手，悦耳的声音，丰满的嘴唇。我们又和好了。我又得到了满足。爱尔泽是多么可爱！做黄油找不到刀子，干脆就用指甲清洁刀。哦，你这个放荡不羁的女人！”。

几天之后：“一切希望都破灭了……离别的心情是多么痛苦……我需要爱尔泽，你这个甜美的女人！”接着又是几次“爱尔泽杳无音信”。10月9日：“爱尔泽来了……高兴极了！生活多么美好！”几天之后：“她给我送了一件漂亮的毛衣做生日礼物。她待我真好！可有时我让她非常伤心……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让她伤心呢？……生活是多么

的美好啊！”11日他写道：“和爱尔泽在一起有许多欢乐和烦恼”。12月爱尔泽在没向他做进一步解释离开他之后，写给他一封“绝望的分手信”。戈培尔解释道：“她感到太孤寂了！”。

接着他和爱尔泽之间又是暂时的和解。12月9日：“爱尔泽昨天又走了，一句话也没留。我受不了！”然后他在日记中提议爱尔泽与他在杜塞尔多夫见面，并在如果这次她不来，就“一刀两断”的句子下面画了一道醒目的横线。

他们在杜塞尔多夫见了面。戈培尔说，他们决定从现在起分手。可他又说，爱尔泽哭了，并恳切地求他。“痛苦的几小时后，我们又冷静了下来”。他以极其沾沾自喜的口吻解释道，他现在得爱一个人，但这可能会给他和其他女人之间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一个让人绝望的痛苦的想法”。

戈培尔的日记中，几乎在每二、三页有关政治消息和评论之间，都穿插着这种感情的倾诉，文体就像患单相思病的中学高班学生写的情书一样后来爱尔泽女士愉快地回忆起当时是她未婚夫的这位任性的大男孩。她说，在他们每次闹翻后，不是她而经常是戈培尔主动与她和好。这一点戈培尔没有写进日记中去。因为她爱他，所以总是顺从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认识到这样一种关系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

在杜塞尔多夫见面之后，他们又开始了交往。1926年1月11日：

晚上去了科隆，爱尔泽在等着我，妙不可言的几个小时”……“星期日早晨！阳光明媚！臂挽臂地在莱茵河畔散步。没有吃午餐的钱，可我们是多么幸福和满足！哦，我亲爱的！谢谢你！”可是1月31日在其他内容中又夹杂着：“爱尔泽本来要来，但又没有来，我给她写了一封责备信。”

几个星期后，在2月的日记里，戈培尔记下了他演说成功的喜悦，同时可看出他在新婚妻子面前装出的老成持重：“今天下午爱尔泽在这儿，她很可爱，也高兴。一次愉快的小聚。她眼里闪着泪花。她怎能那么一点小小的烦恼而伤感呢？大雨滂沱”……在4月的日记里他又变成了狂热的情人，“我是多么的思念她”，在等待爱尔泽到来

6月他又为爱情中的烦恼唉声叹气：……“爱尔泽带给我许多欢乐和烦恼”……几天之后：“爱尔泽给我写了一封简短和非常冷漠的分手

信。我该怎么办呢？当然她是完全对的。我们不能再是伴侣。在我俩之间隔着整个一个世界。”

戈培尔这突如其来的转变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他已越来越靠近了希特勒的影响圈内。而爱尔泽的母亲是犹太人，这无疑对这位年轻的拼命往上爬的野心家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在上面提到的日记之后没几天，他在日记中突然写下了这样的句子：“犹太人是国际政治的恶魔。”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中断与他的有半个犹太人血统的新娘的关系。爱尔泽毕竟是一个漂亮姑娘，这足以满足他的虚荣心。他甚至把她介绍给他的“头头”（把希特勒称作“领袖”是几年后的事），当然不能点明她的出身。几星期以后，他日记里的政治评论之间又出现了“爱尔泽多么可爱！多么的甜美！”这样的词句。他还沾沾自喜地写道：“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爱我，本来她只是一个市民。”

在几天以后的日记中，戈培尔提到了一次乘火车的旅行。在这次旅行中，一位引人注目的姑娘向他作出了爱情的表示。约定的会面当然由于姑娘的失信而告吹。戈培尔在日记里详细地描述了这一切，还欣喜若狂地记下了爱尔泽在杜伊斯堡也出人意料地上了车的情景。他俨然像一个真正的卡萨诺瓦一样，周旋于两个女人之间，一个已经属于他，另一个他也正想俘虏。几星期以后，在戈培尔迁居去柏林前不久，他与爱尔泽的婚约结束了。“爱尔泽给我写了一封分手信”，在1926年9月的日记中他写道：“也只好这样了，随她去吧！”他们又一次见面告别，在第二天的日记里他吐露了当时的心情：“哦，多么痛苦！”几星期后他去了柏林。

戈培尔在和爱尔泽正式订婚后，看上去又对爱尔泽最好的朋友阿尔玛发生了兴趣。这种事发生在戈培尔身上不足为怪。在一篇庸俗无聊的日记里，他试图装出一副假象，似乎在爱尔泽去瑞士度假期间，他和阿尔玛只是临时的“关系”而已。阿尔玛夫人最终和普朗交上了朋友。她解释说，她和戈培尔之间从来没有过肉体上的关系。戈培尔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同时周旋于好几位女人之间的风流情种，甚至在日记里回忆了他很早以前的一位情人安克：“今天我特别喜欢安克，这个漂亮的”……“安克，我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忘记你！”……“她为什么

要离开我？这是她的过错还是我的过错呢？我根本不愿再想这件事，只有工作才能减轻我的痛苦。”

虚荣心很强的戈培尔，其我行我素的性格使他很难与其他人相处。这从他对牧羊犬本诺的那种装腔作势的感情中也有所流露。这只牧羊犬是戈培尔一家住在莱特时全家的宠物，被视为家庭中的一员，特别是戈培尔的父亲特别喜欢这只狗。约瑟夫·戈培尔当时在埃尔伯费尔德住，他知道父母亲肯定会比他这个生活不安定的单身汉对本诺照料得更周到，何况他的房间里摆有家具，又要经常外出旅行，但他还是总想把本诺占为己有。戈培尔在日记里的许多地方都提到这只牧羊犬。“本诺是一只多么聪明的动物”，戈培尔第一次带着本诺在埃尔伯费尔德散步之后，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狗的忠实和友善经常使我们感到羞愧。”1926年6月他又要把本诺接到埃尔伯费尔德，他在日记里写道：“我高兴地盼望着我的老朋友，她也许是我唯一的真正的朋友。”本诺来到他身边后他又写道：“本诺卧在我的床下面，发出鼾声。她和我一样有时很懒，有时又得为疯狂的狩猎迷疲于奔命。我也想和她一样，拼搏有时对我也很重要，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

几乎每个周末戈培尔都要从埃尔伯费尔德去莱特，他无疑依恋着父母的家，虽然他对父亲的关系不总是那么纯真的。在家里他装作一个拼命地做的理想主义者吹嘘说，每当他不做轰动性的演讲而在办公室工作时，总有小山似的邮件在等着他。几乎在每一页的日记中都强调他的拼命的工作。由此一方面可看出戈培尔的虚荣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读大学以来第一次有了一份安定的工作。“一个接一个的工作……我感到精疲力尽……我希望能睡上一年……像小山一样的邮件和工作…”每篇日记的结尾差不多都在叹息：“累，累，累！”有一次他还写道：“夜安！”后又潦草地补了一句：“我累了，我去休息了。”

工作对他来说成了噩梦。“绝望了……对工作我不知该怎么办……，一切都得我自己做……我的体重几乎不是一百磅……人们在滥用我的工作精力。”1926年5月他声称，如果不派他去各地演讲，他会更愉快。让他做的事超过了他的胜任能力。1925年10月29日在他28岁生日时，他写道：“我变老了，这一发现使我感到害怕。我的头发脱了，快秃顶了。但我的心永远是年轻的。”三个月后他写道：“我看上去很憔悴，太可怕了！”他心里在嘀咕，自己可能得了什么大病。9月

他担心他的精神会崩溃。12月他又一次沮丧地写道：“.....我感到自己病了。这种鬼天气让我发疯。天天在下雨.....我是多么渴望宁静.....让我的心平静下来吧！”

当他背部有点痛疼时，他马上想自己可能是得了肺结核。这一单纯的想法使他激动，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富有戏剧性的疾病，他联想起许多文人也得过这种病。可是1925年9月，他又像以前一样兴致勃勃地踏上了他的演讲旅途：“我又上路了，又过起了吉普赛人一样的生活。有时我很喜欢这种生活”。几天后：

现在没完没了的旅行又开始了.....有时旅行对我是一种解脱。”

他那每月仅200马克的微薄薪水当然不够他开支。在埃尔伯费尔德的第二篇日记里（1925年8月14日）就能找到这样几行：“钱，钱，钱！我手头又没一点钱。这真是糟糕透了！”第二天他只好回家去向家里要钱。

有时他把他的忧郁和沮丧一股脑儿发泄出来“爱尔泽走了。天下着雨。我心灰意懒，没有人来安慰我，我感到孤寂，我绝望了。工作使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了。现在手头又拮据。我如何摆脱呢？没有一个人帮助我，一切都得我自己做，我陷入了可怕的困境。母亲会帮助我，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在1926年的日记里他还在为他的债务发愁。

当爱尔泽一去不回头时，戈培尔又开始第三段恋情，他的第三位恋人是他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于1930年到1931年间与玛格达·克万特过从甚密，1931年12月份结了婚。玛格达与大工业家京特·克万特的头场婚姻给她留下一个儿子哈拉尔德，第二次结婚时儿子已经十岁了。结婚照上，戈培尔身穿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站在证婚人阿道夫·希特勒旁边。

玛格达1929年和克万特离了婚这以后性情冲动而又渴望生活的玛格达觉得日子很不充实，于是有一天又是好奇又是无聊地参加了戈培尔组织的群众大会集会戏剧般的排场给她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她于是登记参加了国社党。她的这一举动很让家人和离了婚的丈夫生气。克万特要是不出差或有别的事，每星期都和玛格达一起吃顿饭。克万特一直坚决反对国社党。

玛格达住在总理广场周围的漂亮地段，那时还没有几个党员。为数不多的几名党员不是门房就是司机所以党地方小组长亲自登门拜访这位美丽高雅而又富有大方的新党员就毫不稀奇了。他给她带去了党的宣传材料，邀请她参观黑德坚固大街上崭新体面的党部办公室。

这位夫人空闲时间很多，很愿意在党的总部里义务工作。有一天她在那里遇到了柏林党区领袖。戈培尔被这位金发美人吸引住了，沉迷于她的优雅风度、诱人魅力、待人接物的灵活有余，更沉迷于她对党、对他自己毫不掩饰的崇敬。他恰如其分地使自己引人注目，没有扮演初学者那种热烈的情人角色，而是作为富有责任心、殚精竭虑的党的领袖的形象出现，不过这位领袖总有时间陪伴一位美丽而吸引人的女士。

他先是不让她把每天做党务工作的几个小时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例行公事上。他让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修改“绝密”文件，带她了解“秘密档案”，交给她整理和掌管。戈培尔数年以前就编制了卷宗。他的档案里包括国内外的朋友和敌人；他研究那些著名的纳粹的对手，但也极为详尽地研究纳粹内部的知名人士。得以窥见机密迎合了玛格达的虚荣心。戈培尔令她敬佩，她已崇敬他。戈培尔回报了她的崇敬，献上了紧紧的拥抱和疯狂的接吻。不久，党区领袖就和他的义务机要女秘书成了一对情人戈培尔此时的物质状况比他从事党务活动初期改善多了。作为党区领袖，他的月薪只有400马克，但他还有500马克议员津贴，同时还有一辆公车可用。他的个人需求已得到满足，这可能因为他出身小资产阶级，受的是俭朴生活教育，要求不高。玛格达渐渐影响了他，他也开始用一流的裁缝和鞋匠。但他在讲台上仍旧身穿简陋的有光呢黑外衣，在街上始终身穿雨衣，头戴宽边软呢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制服。作为一名一流的宣传鼓动者，他一直以这种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也正是他希望。

这时他已在施特格利茨一所舒适而且布置得品味很高的两居室中住了一段时间玛格达仍旧拥有她离婚前夫妇二人用来做城里寓所的那处宽大、高雅的居室。为了保证她能过上与之相称的生活，克万特还按离婚协议中定下的数额每月付她400。马克。

玛格达从小就习惯于奢华生活。她的母亲也是一位美女，生平结过三次婚。她先是嫁给玛格达的父亲、外交官里彻尔，后又离异下嫁

一位犹太商人弗里德伦德尔。这段婚姻相当幸福地维持了四年。弗里德伦德尔成了玛格达的父亲，他们两人互相喜欢。当玛格达的母亲再度离婚时，她已长大了。她母亲第三次和贝伦特结婚，这时她已成了部长夫人。戈培尔对她母亲的第三次婚姻颇为满意，因为要是有一位弗里德伦德尔夫人作岳母可就太糟糕了。

玛格达生于1901年，比戈培尔小四岁。她小时候在比利时一家天主教修道院长大，后来到柏林上学。还是小姑娘时，她就进了一所高级寄宿学校。学校毕业后马上嫁给了京特·克万特。她是偶然结识克万特的，他则晕头转向地爱上了这位美丽的姑娘。他为人严肃认真，全身心扑在他领导、扩建的巨型康采恩上。他用他的方式追求这位年轻姑娘，他让人往学校里送大花束和大盒高级糖果，不时地开来大轿车，在经女校长同意后带玛格达到甜食店去消磨一个钟点他大概不知道，他此举给她和她的女同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家人和朋友都劝玛格达不要嫁给这个大她25岁的男人，他是一个鳏夫，有两个半大儿子，而她才19岁。但她觉得自己已爱上了这个英俊潇洒、熟谙世事的男人，她梦想着伴在他身边出入交际场合，家境殷实，宾客如云。他们于是结为夫妇，家境也的确殷实，城里有住宅，乡间有别墅。但京特·克万特却很少有时间出席交际应酬，而这正是急欲增长阅历的玛格达梦想之物。他要是不做商务旅行，就是整天开会，常常晚上也开。等他终于抽出时间陪伴年轻漂亮的妻子去看趟歌剧，又多半在第二幕时就进入梦乡。计划好的晚宴自然取消，玛格达一次又一次痛失她渴望的机会，能穿着她无数晚礼服中的某一件人前人后光彩照人。

长久的幸福不可能光临这种婚姻，儿子哈拉尔德的降生也只不过将不可避免的分手推迟了几年。两人友好地分手了，这位工业家同意给他离婚夫人慷慨的资助，但附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玛格达不能再婚。她离婚后结识了一个小伙子，家庭背景良好，爱她爱到不能娶她就以自尽相威胁的地步。她始终没有同意。后来她自己堕入了情网，而且爱上的是戈培尔。在和那位毛头小伙子的插曲之后，她在这位迷人的名流身上找到了她生活中最炽烈的爱情希特勒对他的宣传家和上流社会一位美丽迷人的女士的结合表示祝贺玛格达对希特勒的好感是一种狂热。希特勒很愿意让漂亮女人陪伴左右作为陪衬，玛格达是其

中的红人之一。希特勒很喜欢玛格达的优雅风度以及她的魅力、幽默和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显见的优良品质。

京特·克万特仍旧慈父般地喜爱他的前妻，虽不愿看见她与戈培尔结合，但最后还是尊重了玛格达对这个男人和他事业的钟情。克万特本人对纳粹运动的态度一如从前，希特勒和戈培尔经玛格达介绍，询问他是否愿意给纳粹捐上一两百万经费时，他无情地说，自己不会给国社党捐一分钱。与此相反，他却把自己在梅克伦堡的一座十分漂亮、布置雅致的狩猎时住的别墅供他们婚礼使用。由于猎区管理员和他主人相反，是一名狂热的国社党信徒，他就把周围的党员全动员了起来。所以当希特勒1931年12月12日莅临他的主要干将的结婚登记仪式时，气氛很是合适。尤其让戈培尔脸上有光的是，希特勒就是男傧相。

希特勒还给戈培尔增加了薪水。戈培尔后来每月就能收入近200。马克。虽然这只及玛格达资助的一半，可是足以勉强维持他们在玛格达漂亮寓所里的舒适生活——这位新婚燕尔的丈夫也搬进了这所房子。玛格达是位好主妇和热情的女主人，招待希特勒更使她无上光荣。

玛格达同戈培尔结婚后，纳粹党的首脑圈子里，显得灿灿生辉。走到那里，都有一群人对戈培尔夫妇行注目礼。

经过三场恋爱，戈培尔是跟玛格达结婚了，但是如同希特勒纳粹集团的人一样，戈培尔对于女人，也是心里想得多，手也伸得长。

尽管他曾在日记里冠冕堂皇地写道“.....思维简单一点，爱情高尚一点，期待真诚一点，信念炽热一点，说话谦虚一点。”可是，他的爱情一点也不高尚他的日记中到处流露出对他所爱的女人的思恋。并且经常同时思恋好几个。

尽管他已结婚，可戈培尔的心依旧很野，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安卡，他的初恋情人。他的日记里到处流露他对这个金发美人的不绝赞叹和她抛弃他以后的悲哀后来他当了宣传部长以后，曾以一种典型的虚荣和讥嘲口气告诉他的朋友，她为什么抛弃了他。“她抛弃了我，因为另外那个家伙比我有钱，能够请她吃饭看戏。她多么愚蠢！.....要不然，她今天就是宣传部长夫人了！她一定感到很后悔！”安克嫁

了“另外那个家伙”，后来又离了婚，1934年来到柏林，戈培尔给她在一家杂志社搞到了一个职业。

戈培尔自己对女人的需求很强烈。他寻求社会的和性爱上的承认以缓和自己由于多灾多难的身体状况而从小就存在于心灵之中的自卑情绪。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强有力的愿望——得到溺爱，有如将自己的小手贪婪地伸向糖块而不受限制。然而以为他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迫使女演员们上他的床就大错特错了戈培尔不需要这样做，他知道怎样和女人打交道。

尽管冷酷无情的命运之神给了戈培尔矮小、黑发、面目丑陋，外加一条使他不能服兵役的瘸腿；但作为文化独裁者的戈培尔，却拥有一件绝妙无比的武器——他那洪亮、甜美、极富魅力的声音。当他在演讲台上历述犹太人和其他人敌人的罪恶之时，他就成了激昂的德摩斯梯尼（古希腊演说家）。他可以把对希特勒光辉形象的颂扬提高抒情的高度。他的讲演水平可以同希特勒本人媲美，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出色这使外表上并不招人喜欢的戈培尔变成了纳粹德国一匹引人注目的超级种马，在那具不起眼的身躯里，却隐藏着巨大的能量

在他和玛格达过日子的时候，毫无疑问他和他的美丽而优雅的妻子是十分相爱的。无论是他还是她都毫不掩饰这一点。在柏林社交界，尤其是戏剧和电影圈中，人们往往对年轻的部长和他的妻子在所有的公开场合都以“甜心儿”和“小天使”一类的昵称相称而发出会心的微笑

戈培尔坚持让他的妻子奉行《圣经》中的话“要多生多育，增加你们自己”，这不仅满足了他男性的骄傲，而且履行了他的爱国义务。1932年2月9日，女儿黑尔加出世；1934年4月13日是希尔德，1935年10月21日是赫尔穆特，1937年2月9日是霍尔德；1938年5月5日是黑达，1940年10月是海德。这些名字的开头字母都用“H”是玛格达的主意，如给她在和科旺特的婚姻中生的儿子起名一样。只要时间允许，他是一个好父亲，为他漂亮的孩子很感骄傲。他很注意一天中至少要在孩子们的房间中耗上几分钟。

在玛格达接连不断怀孕的时候她还有一到两次流产的经历——戈培尔遇到了大量的来自电影界或戏剧界的美女。玛格达对待她丈夫基

本上于她无害的“婚外关系”问题上，并不小气，并且允许他拥有一些他反正是能得到的自由。这位部长在施旺恩维尔德和朗科都有布置得十分舒适的“帐篷”，在这里面他尽可以安全地远离大屋进行秘密幽会。他的越轨行为可以轻易地不露风声。在经常更替的来访者中有女演员、女秘书、社交界的夫人小姐们，她们给富有魅力的部长带来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她们对他的无限钦佩和敬仰。

戈培尔在柏林的名声不佳，被人看成是个高贵而又不谨慎的情夫。

1936年，戈培尔认识了当时在德国拍片的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这个年轻的电影明星虽然没有经典的美，显得小巧而单薄；但她的眼睛富有魅力，个性热情奔放。她那时刚刚20岁，但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尤其是，她是当时的名演员古斯塔夫·弗约里希的合作伙伴，而她在私生活中也和他的关系十分密切。弗约里希在施旺恩维尔德有一处漂亮的田产，和戈培尔的夏季别墅离得很近。

在施旺恩维尔德这两对儿碰到了一起。此外，戈培尔当然还在许多电影执行会和首映式上见过巴洛娃玛格达在施旺恩维尔德邀请弗约里希和他的女友到家里喝茶。此后，他们之间的社交往来就日渐增多人们那时都认为巴洛娃和弗约里希已经结婚了或者是很快就要结婚了，而实际上她和这位名演员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冷淡了，而戈培尔的魅力在这时正开始给这位女演员留下越来越深刻的印象，虽然她差不多只有他的一半儿大。

除一般政治性的庆祝活动之外，纽伦堡党代会期间还要举行无数的社交性招待会，巴洛娃和许多其他的艺术家们被邀请参加了1936年举行的党代会。在纽伦堡，巴洛娃第一次遇到了希特勒，而且是在戈培尔在场的情况下。

“我必须向您道歉，巴洛娃小姐。”这是希特勒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为什么呢？帝国总理先生？”年轻的女演员有些惊讶地问道。

“我的一个副官显然犯了一个错误，”希特勒接着说，“本来应该给您送去鲜花的”。

“为什么，帝国总理先生？”

“诺，您不是在这个星期结婚了嘛。就在星期一，不是吗？”

“没有，帝国总理先生。”

“您不是和演员弗约里希结婚了嘛”，希特勒解释说。他不愿看到被别人指出他弄错了。

“没有，帝国总理先生。”女演员摇着头说。

“您没有和弗约里希结婚？”

“没有，帝国总理先生。”

这时戈培尔加入了谈话。他问这位女演员，她难道不是已经和弗约里希订了婚并且考虑在不久的将来结婚吗？

“没有，帝国部长先生。”她说。

下一次遇到戈培尔是在一天或二天以后的一次有音乐演出的盛大招待会上。巴洛娃在包厢里坐在戈培尔的旁边，周围还坐着许多别的客人。乐队演奏着《艾丽阿诺》中阿谀奉承的曲调，一个女歌唱家唱着当时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中的重唱句“我处于热恋之中，我完全处于热恋之中。”突然，戈培尔在坐得满满的包厢中朝他的女邻座俯下身去，在她耳边低声说：“我也是一样。”

年轻的女演员对此事并不很当真。她依旧称他是“帝国部长先生”，而他则称她为“巴洛娃小姐”或者“您”。第二天，戈培尔将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俩又在一个有许多其他来宾的场合下相遇了。戈培尔突然说，他必须和巴洛娃小姐谈一谈她事业上的问题以及她的下一个电影角色。他请她来到隔壁的房间。她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感到很惊讶，特别是因为部长马上就该发表他的重要讲话了。他镇静自若地和她商讨着她事业上的问题，问她这个或那个导演对她将要拍摄的下一部电影是否更合适，这个或那个摄制组是否更好一些。而此时她想的只是他马上要发表的演说。

“可是帝国部长先生，您在20分钟之后就必须走上讲台了。”

“这没有什么，我对此已经习惯了。”

接着他又镇定地开始说到合适的摄影师问题

巴洛娃焦灼地注视着墙上挂着的大钟上的指针说：“而七分钟之后您就该走上讲台了。”

“没有关系”，戈培尔答道，又接着他的话题讲下去。在他“出场”的三分钟之前，他吻了吻她。而当他们二人发现他的脸上粘上了口红的时候，他只剩下两分钟的时间了。巴洛娃用颤抖的手帮助部长把他的脸弄干净。戈培尔微笑着离去了。部长发表他的讲话，巴洛娃坐在他前排正中的座位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虽然她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讲的是些什么。突然他犀利地盯住她，掏出手帕使劲地擦自己的嘴唇，就像刚才他擦去的口红留下那口印迹那样。在这个明显的表示亲昵的动作之后，他又接着讲下去。戈培尔知道什么东西会使女人们尤其是被宠坏了的女人们自鸣得意。那就是时间和小礼物。当戈培尔要向一位女士献殷勤时，他不会简单地让他的秘书给她家里送去一束玫瑰花。他会亲自挑选出几朵鲜花，连同一封以私人的语气写成的短笺送到她手里。由于戈培尔被看作是一个日理万机的人，所以他看起来总能为她抽出时间给他的每一个心上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是，帝国部长先生”，她们会在真正了解他之前这么说，“您现在必须去参加会议！还有您的广播讲话呢？还有您召集的会议呢……”“这还有时间”，戈培尔会这么回答，“现在我和您在一起，对我来讲更为重要。”对巴洛娃，戈培尔也总是有时间的。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与她见面。他很喜欢坦率地和她谈他自己的问题，尽管是一些她不感兴趣也不懂的政治问题。但更多的是，他和她谈论她事业上的和个人的事情。巴洛娃在柏林有一套小住宅，但她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秘密的“帐篷”里和部长相会。

作为一名小有成就的电影演员，巴洛娃在经济上的情形是相当不错的。但她总是开着她那辆从家乡带来的捷克产的小汽车。她每隔两三个星期在周末便开着这辆车回到布拉格看望她的父母当这辆小车停在那些纳粹高层领导人的梅塞德斯和梅巴赫之中时，总是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希特勒有一次问道：“难道巴洛娃买不起一辆体面的汽车吗？”戈培尔多次对巴洛娃说想送给她一辆梅塞德斯。但她不愿意，她喜欢她那开起来卡啦卡啦的旧汽车。她从未接受过戈培尔什么贵重的礼物，她收取的只是一些伤感的纪念品。

他们的这种关系开始发展成了真正的爱情事件。戈培尔被巴洛娃斯拉夫人的气质，被她高高的颧骨，被她能随意调整为带捷克口音的低沉声音迷住了。她温柔的女性气质赋予她一种特殊的魅力。他们在一起的两年中，两人之间没有出现过一次争吵。在丽杜什卡——他是这样称呼她的——面前，他用不着装腔作势，他可以完全无拘无束。他们在一起的确是很幸福的，没有紧张和危机。

在柏林，对他们有很多的背后议论，他们对此都置若罔闻。但对玛格达便不同了。她请巴洛娃去喝茶并且让她知道，她想和她单独谈谈。对一个年轻的女演员来讲，这不是一个小的震慑。如果排除掉艾米·戈林，玛格达就是帝国的第一夫人。她比巴洛娃几乎大20岁，而且她还是元首的私人朋友巴洛娃爱的那个男人的妻子。戈培尔的女友十分不安，而她又无法婉拒这个邀请。于是，她驱车前往施旺恩维尔德。

这次见面的情形与巴洛娃事前设想的很不一样。她的女主人向她展现了非常富于感情的一面，这令巴洛娃大惑不解。玛格达说，她了解约瑟夫的魅力，并且“在他同时爱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把我看作他孩子的母亲——他爱的是您，并且他认为没有您他就无法生活下去。”接着她向这个比她年轻的人诉说衷肠。“我们要以‘你’相称。”巴洛娃完全不知所措，只会说：“我不能这样，仁慈的夫人，我不能这样。”玛格达坚持称她为“你”，最后在这个持续了两个小时的谈话结束时她满含热泪，带着歇斯底里的冲动叫道：“保持住你和他的友情，因为他需要你。但是，丽达，千万别妨碍他和孩子们的关系。”

女演员被这个新的变化弄得目瞪口呆，但她还是能够让她的女主人最终安静下来。

然而这次充满泪水的谈话并没有改变玛格达日渐难堪的处境戈培尔的这个恋爱事件渐渐成为了一个公开的丑闻。玛格达必须有所表示了。夫妻间出现了多次激烈的场面。但戈培尔拒绝抛弃他的爱人。最后玛格达很认真地提出了离婚。在收集证据的时候，尽管宣传部副部长卡尔·汉克十分尊敬他的长官，在这件事上他还是站到了戈培尔的对立面，帮助了玛格达。在汉克收集的戈培尔通奸名单上，据说不少于36个名字，一小部分是不知名的年轻姑娘，而大多数是社交界的夫人们和女演员戈培尔和玛格达那时实际上已经分居了，因为她不允许他

进入在施旺恩维尔德的房子。这又给柏林流言蜚语的制造所带来新的谈资。

这里面还有一段使事情复杂化的小插曲。卡尔·汉克对玛格达一直单相思并想娶她。玛格达拒绝了一段时间。然后，很明显是为了惩罚她不忠的丈夫而接受了这个要求，但必须先获准离婚。汉克向希特勒交了一份他和玛格达结婚的申请，但希特勒出于“国家利益”而不批准离婚。他还邀请戈培尔夫妇参加瓦格纳音乐会。希特勒对戈培尔进行劝说，但没有效果。然而几天后，德国各家报纸还是登出了希特勒与微笑的戈培尔夫妇在一起的照片。

玛格达跟艾米·戈林提起了离婚的打算。艾米把这些告诉了戈林，戈林又转告给了希特勒。当希特勒听说他的宣传部长和他那被希特勒如此看重的妻子打算离婚时十分吃惊。

原来汉克和戈培尔夫人之间的关系已发展到要想结婚的地步，知道他们内情的人无不感到吃惊这是很不相称的一对：汉克年轻，又很笨拙，戈培尔太太年纪比他大得多，又是位时髦的善于社交的妇女。汉克对戈培尔夫人缠绵不休，厚颜无耻地向她递交求婚的信，又催着希特勒同意戈培尔夫妇离婚，但希特勒一再考虑到此事与国家的体面有关，一再拒绝。

但是戈培尔夫人一再对朋友说：“我丈夫用来威胁我的手段实在可怕。我刚去加施泰因休养，他跟着到旅馆里来。他接连三天劝说我，后来我不能再坚持了。他拿我们的孩子来压我，他要把孩子从我身边弄走。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仅仅是表面上和解了。我不得不答应他，不再私下同卡尔·汉克相会。我太不幸了，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

希特勒、戈培尔夫妇等一起坐在包厢内观听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演出过程中，玛格达不停地小声抽泣。休息时，她坐到包厢内的角落里低头呜咽起来，不能自制。希特勒和戈培尔这时正站在包厢里同观众见面，一边竭力不让观众看到这一幕。

希特勒还不知道戈培尔太太伤心的原因。第二天早晨，有人把戈培尔夫妇和解的背景告诉了他。希特勒立即派人把戈培尔请来，他决定亲自干预此事。希特勒把玛格达请到了伯希特斯加登，她坚持不愿意再和她的丈夫有什么牵连了。希特勒驱车前往柏林，命令戈培尔晋

谒，戈培尔维护着他与巴洛娃的爱情，甚至做好了声明放弃他的部长职务的准备——如果这是他和与巴洛娃结婚惟一可能选择的话。他想到日本去当大使。希特勒十分生气，他说，作为德意志的部长，戈培尔不能放任自己卷入这样的私生活丑闻之中。他必须立即放弃巴洛娃，并且永不再见她。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被执行的元首的命令。根据希特勒的意思，巴洛娃被柏林警察局长赫尔道伯爵请到了警察总局。他让她的女友和知己希尔达·科伯陪同她前往。

赫尔道夫以希特勒的名义转告巴洛娃，她至少在6个月内不许见到戈培尔。如果他们在这之后仍然相爱的话，也许会有提出离婚的可能性。巴洛娃晕倒了，希尔达·科伯激动地大叫送花露水来。在她苏醒之后，赫尔道夫尽可能客气地告诉她，她不仅必须马上断绝和戈培尔的关系，她还须尽快离开柏林。她的事业现在已经不重要了，这关系到她的安全，她必须在德国的土地上消失。

巴洛娃愤怒地回答他，她说，如果事先不和她爱的人再谈一次话——哪怕是在电话里，她绝不离开。否则她就会立即结束生命，反正她的生命对她已经毫无意义了。而这样就会出现一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希望避免的丑闻。在希尔达·科伯徒劳地努力使她的女友安静下来的时候，赫尔道夫来到隔壁的房间，向伯格霍夫要求了一次特快通话，最后他得到了必要的“元首许可”。希尔达把呜咽着的女友带回自己家里，她要在那儿等待戈培尔的电话。

电话铃终于响了。戈培尔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我的朋友赫尔曼·戈林的家里和你通话。”希特勒要求，戈培尔和他情人之间的电话谈话要在有一个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戈培尔很镇静地和丽达说话，就像他一向所做的那样称她为丽杜什卡，而她痛苦地哭泣着。他对她讲到责任和坚强起来的必要性，然后向她告别，最后说：“经历了这场加之于你的痛苦之后不要变成一个坏人，保持你的本色。”

戈培尔回到朗科隐居了几天，闭门不出，直到他的自制力又占了上风。在此期间，不幸的丽达在她的住所里哭得死去活来，但戈培尔已经说服她放弃了自杀的企图。她拍摄的电影从银幕上消失了，她的合同被解除了。丽达躺在床上生着病，充满绝望。戈培尔恪守着希特勒的命令，避免和她接触。但丽达还是在柏林又待了几个星期，希望能见到他。唯一的一次见面机会终于出现了。她开着她的捷克小汽车

沿着选帝侯大街行驶的时候，发现戈培尔的梅塞德斯就在她的前面。丽达驱车尾随着它。在一条安静的大街她把车子转到了马路的另一侧，两辆汽车都停了下来。戈培尔和丽达对望着戈培尔毫不动容的脸上看不出一丝表情，这最后的一瞥大约持续了一分钟，或者更长。然后戈培尔给了他的司机一个信号，汽车徐徐地驶远了。这段感情就这样永远地结束了。

1938年的这场风波使希特勒和戈培尔在以后三年的关系上罩上了一层阴影。而戈培尔夫妇之间依然深恶痛绝。1941年春天，玛格达曾试图带着孩子们坐汽车逃离第三帝国。但她在抵达奥地利和瑞士原先边境上的布雷根茨附近时被拦住了，被用飞机押送回柏林软禁起来。希特勒认为她的逃跑不是出于政治动机，便释放了她，宽恕了她，但要她答应行为检点一些。希特勒提醒她，现在正在进行战争。玛格达的出走本来可以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因此，希特勒有绝对必要的理由将此事包起来秘而不宣。

1942年，戈培尔和玛格达生下最后，也是第六个孩子海迪·戈培尔。柏林人都知道他是“破镜重圆”的产物。但在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和解。破镜无法重圆了。

戈培尔是否真的为了他的飞黄腾达而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联想游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和丽达分手是十分痛苦的。直到1939年9月，整个一年中，戈培尔都是在情绪低沉、痛苦中度过的。戈培尔的仕途也为此险些中断。他在德国法西斯政界和整个德国，被搞得名声很臭。玛格达开始坚持离婚，拒绝和她的丈夫言归于好，但后来希特勒把他们二人召到伯希特斯加登，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这对夫妇说合。

在《柏林画报》的目录页上，刊登了那时已经变得很著名的三个人在一起的照片，只有希特勒在微笑着。戈培尔最小的孩子——女儿海德的出生才是和解的标志。在大众的嘴里，这个孩子被称为和解的孩子”。

戈培尔又扑在了他的工作上。当然不时还有风流的冒险，但这些都不足以威胁到他的婚姻。

1939年冬爆发了法西斯战争。新的忧虑随之而来。在末日到来前不久，戈培尔烧毁了他大部的私人信件和回忆录片断。戈培尔的新闻助理威尔弗里德·封·欧文记得戈培尔在浏览照片时突然停下，隔着桌子递给他一张大照片，并说“您从这儿可以看到一个真正漂亮的女人”。这是一张丽达·巴洛娃的照片。戈培尔拿回照片又仔细端详了大约一分钟，然后撕掉了这张照片，把碎片递给了欧文，说：“投到火里去吧”。

八、战争早期

尽管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十分有效，他自己演说及文章十分富于挑衅性，但他却倾向于避免发动法西斯战争。其原因在于，一场战争将会增强军队的势力，而削弱他自己的存在意义。

虽然德国军队在1939年秋及1940年春迅速取得了最初的几次胜利，戈培尔却几乎没有抱什么幻想。他坚信，这场战争将旷日持久，并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战争初期，部里主管新闻部门的汉斯·弗里茨舍如下记录了戈培尔当时所做的按语：

所谓的公民表决在战争期间并非决定性因素。热情仅仅有如稻草点燃的火一般短暂，它对我们毫无用处，这样的火不宜煽动，因为它毕竟不能持久。我们不应该心存幻想。这将是一场漫长而严峻的战争。在此，在肆地欢庆胜利还不如日复一日坚决地履行战争义务来得重要。

然而这位部长的怀疑态度并没有阻止第三帝国的宣传机器去满足希特勒战争导向的需要。收听外国电台立刻被禁止，违者予以惩罚，由此德国公民的信息来源被限制在戈培尔的官方发布范围之内。宣传部的官员以及其他那些因工作需要而须收听敌台的国家公职人员，必须获得特殊的批准及证明。但这些批准也只限于工作时间以内，擅自将工作权限扩展至下班以后及私听收音机的人，也像收听敌台的平民百姓一样要受到惩罚。因公收听敌台的人有义务绝对守口如瓶，任何向第三者传达信息的行为将招致监禁。

在发动战争的德国出现的这一信息“真实”，被戈培尔用纳粹宣传大厨房里炮制出来的各种官方透露、评论、报道及插入加以填充，其中还包括对敌国国家军队及首脑发动的诽谤战早在战争爆发初期就有一个这方面的例子，那是英国客轮“雅典号”在大西洋中沉没的时候，船上大部分乘客是妇女和儿童。当时，它是被一艘德国潜艇“无意中”用鱼雷击沉的；日后海军上将李德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的陈述证明了这一事实。而戈培尔却指使《民族观察》、《种族保持》宣称，击沉这只客轮是由当时英国海军部温斯顿·丘吉尔布置的，为的是以后指控德国人犯下这一罪行。

为歌颂德国的进军表现，戈培尔出了一系列主意。1918年福赫元帅在一辆（节）豪华车（厢）里承认德国投降，由戈培尔提议，那辆（节）车（厢）又从巴黎博物馆里取了出来，陈列在茨比涅森林里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那时的耻辱就这样由现在辉煌的胜利勾销了。被占国家的代表必须在希特勒面前承认投降，而希特勒坐在22年前福煦元帅用过的那张沙发椅里。德国新闻周报在法西斯德国所有的电影院里放映这一情景，解说员格外强调地赞美这一历史象征。

在许多被占领地区，德国国防军刚一站稳脚跟，那里的广播电台就被接管了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宣传部总是做极其充分的准备。

“荷兰军队投降后第一天，30个柏林电台职员就出现在荷兰，所带技术装备十分齐全，可以替换任何一台毁坏的机器，甚至建立新的发射台。除此，他们还带了准备好的节目底稿及毫无瑕疵的荷兰语录制的磁带，足够用两个星期的。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不用带来的节目，而是让荷兰电台的播音员照常播出他们的节目，唯一的命令是禁止播放英、法和犹太作曲家的作品，告诉荷兰播音员尽管继续工作，还可以或多或少地讲些自己想说的话。但每次播音时都要有一个荷枪实弹并懂荷兰语的德国人在场。

为了通过播出划分成不同主题的宣传节目，让即将被占国家的居民为面临的事件有所准备，戈培尔还制定了方针路线。第一步，要创造一种友好的气氛：“德国，一个好邻邦。”第二步，在不断声明对被占国居民的友好情谊的情况下，该国府则必须遭到日益严厉的批判。第三步，如果可爱的居民们不能及时推翻他们可恶的政府，以此免掉德国国防军进行干涉的麻烦，那么就要用暴力进驻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可怕后果来进行威胁。

通过播送新闻、政治讲话以及其他各种宣传手段校正德国疆域内电台听众的世界观，这是由戈培尔部里的广播部门组织进行的。最重要的固定节目中包括汉斯·弗里茨舍每周一次的评论，并几乎每星期都要宣读宣传部长在《帝国》杂志中所作的社论。

随着德国势力范围的扩大，外语台的数量也增加了。1942年柏林广播电台播出或监督着27种语言的固定节目。短波台负责向海外播送戈培尔的宣传，主要是向美国、英属殖民地、近东、远东、非洲及拉

丁美洲。至于音乐节目，戈培尔于1941年决定优先满足前线士兵的娱乐需求。他在1941年3月1日的《民族观察》中解释道，爵士乐迄今为止因其犹太人及黑人特色而被禁止，但现在在拟定广播计划时，与政策方面的考虑相比，更应当以实践方面的考虑为指导。士兵被紧张的作战或繁重的修筑工事劳动搞得很累，到晚上是没有情绪去听严肃音乐的。因此，必须给他们听点儿轻松的。今后帝国电台要注意这一点，而德国电台却应始终播放好的古典音乐。

然后戈培尔详细谈到显然更为前线士兵喜爱的爵士乐并解释道，在这一方面也必须要区别对待。怪诞、无调性的节奏，以其尖锐刺耳或絮絮细语一般的声音使每一个真正懂得音乐的人都感到厌恶，因此仍然是被禁止的。另一方面也不可忘记，我们祖父母时代的华尔兹并不意味着音乐每一步发展的结束，我们所处的不再是毕德迈耶时代了，而是生活在一个旋律受到机器马达的轰鸣影响的20世纪。这一音乐及社会历史分析的结果是，前线士兵听到了经仔细选出的爵士乐。节目的安排委托给了汉斯·欣克尔，部里负责照料部队事务的部门即由他领导

有时这个部门也在“力量来自欢乐”这一指导原则下，也经常安排话剧队、音乐家、小型歌舞剧演员上前线演出。

散布在从芬兰到非洲，从法国的大西洋沿岸到高加索山的德国军队当然不该只有音乐电影和小型歌舞剧的欣赏，他们还必须有阅读的东西。这也是由戈培尔部里的一个部门负责的。它提供专为作战部队出的前线报纸和杂志。其中的一种——《绿洲》就是特地为非洲军团出版的，它不是在柏林印刷的，而是在的黎波里。书籍也受到重视。截至1941年底，已有6万个战地图书馆，它们部分是以捐赠的方式，部分是以购买合适图书的方式建立并完善起来的；约瑟夫·戈培尔本人的著作一定要有足够的供应。

涉及到“本土战线”，戈培尔代表一种似乎理智的立场：艰难时期让居民们尽可能地放松直到战争全面铺开之时才关闭了几乎所有的剧院。但在1940至1941年的演出季节，还有255个国家剧院、175家私人剧院和142个露天剧院开放。戈培尔始终把电影看作是最重要的娱乐手段以及对公众最有宣传影响的手段。戈培尔认为，在战争期间必用无害的，尽可能轻松的娱乐片使公众放松。政治宣传教育的任务，他主

要是交给了纪录片、教学电影以及有时延长至40分钟的新闻周报但也时时摄制具有倾向性的故事片。受官方委托摄制的新电影《愿望音乐会》、《俾斯麦》、《尤德·聚斯》、《奥姆·克吕格尔》、《我控告》和《还乡》就是这一时期完成的。

《愿望音乐会》是关于一个德国青年士兵的浪漫故事。通过电台举办的“给国防军的愿望音乐会”与他的姑娘结合了。《还乡》是一部激烈地反对波兰的电影，其中的波兰犹太人试图强奸一个德国女教师。但绝大多数在戈培尔的保护伞下摄制的电影——每年约100部，是非政治性的娱乐片。

在与德国结盟的国家及中立国家，德国电影的销售得到很好的组织在被占领地区，摩托化流动电影院补充了可支配的电影销售、租借组织。另外，还设立了制片组，摄制针对相关地区主题和趋势的短片。

战争期间，比利时上演的电影约五分之四产自德国。其它被占地区的情况也类似。法国的电影业，获准在被占期间继续进行，但却受到很大控制，影片的出口也要受到占领军机构一定程度的限制。公众的反感尤其表现在对待德国的新闻周报上。放映中经常有人吹口哨，呼喊，于是灯被突然打开，好让剧场里的宪兵发现并逮捕那些示威者。被保护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尤其是在布拉格，一放新闻周报，电影院的厕所就人满为患；捷克观众常在厕所外面排成长蛇。戈培尔十分重视在质与量两方面扩充新闻周报。据宣传部的官方统计，1942年每期新闻周报的拷贝都不少于2400个。

除了新闻周报，还有仅为宣传服务、充斥整个晚上的纪录片，如《火的洗礼》、《西部的胜利》、《永远的犹太人》。《火的洗礼》放的是用先进技术拍摄的燃烧中的华沙，旁白在尖刻地嘲笑张伯伦没有能力向波兰人提供允诺过的援助。这些纪录片大多是在接待会上放映，以给中立国的外交代表留下深刻印象。为制作销售这些影片戈培尔用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其拷贝也大量出口到中立国，主要是拉丁美洲。德国新闻周报靠专机运出去。

纳粹新闻发言人泽姆勒与戈培尔长期关系密切，戈培尔让他一天工作16个小时。

泽姆勒首次见到戈培尔时，意外地发现戈培尔很“可爱”。但很快他就认识到，作为部长家庭中的一员，虽然有听取戈培尔爽直风趣谈话的好处，有时却又当作某种“高级奴才”使唤，唯一的任务就是为那位帝国部长无尽的兴趣和需要操心。

戈培尔并不想与他的工作人员建立真正的人际关系，他更喜欢把他手下看作是毫无个性的工作机器，任人随意开关。他把他们仅仅是当作自来水笔或者手表之类需要时时修改、更换的用具。

泽姆勒发现，在戈培尔家吃午饭、晚饭虽然得交肉票、油票，但饭菜却很清淡，只与主人的简单胃口相符。戈培尔十分重视衣着的讲究，泽姆勒的前任被解职，只是因为他的裤子褶儿和袖口不符合部长的审美眼光。

戈培尔的情绪是多变的。他时而沉默不语，显然陷入了沉思，时而谈风甚健。他惯于生动地描述一日里的事件、印象、想法，但越来越让人觉得那是一场他本人的讲话，而不是饭桌上的对话。如果话题论及他即将作的一次讲演或者正在写作的一篇文章，这时人们就会觉得他似乎是在口头“打草稿儿”，好在誊清之前进行确定。他喜欢讲述他自己生活中的轶事，并几乎总是相当尖锐地评判其他人和党内头目。就连希特勒本人，也时时在这种坦率的席间谈话中遭到批评。在日常宣传会议上，可以听到他的“咆哮”，热情洋溢地支持一种观点，又尖刻地嘲讽另一种观点，而两小时后，在他的桌上客中间他又变得达观多了，让人看到另一个戈培尔，亲切、迷人了许多。

戈培尔对戈林更多的也是轻蔑，戈培尔喜欢摆出蔑视者的姿态。他很为自己对同仁，尤其对手下一贯猜疑感到自豪。戈培尔对他周围的环境，甚至对他最亲信的手下都满腹猜疑。他经常声称，这样他就感到自己与腓特烈大帝、俾斯麦以及希特勒为伍了。希特勒永远不能停止怀疑他手下人在欺骗他，或者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瞒着他。戈培尔也时刻担心会有什么阴谋诡计危及他的地位。他不相信手下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只看到每位同仁的阴暗面，并且公开承认，他不折不扣地敌视别人。

工作流程中一旦出现停顿，戈培尔就格外神经质。他无休止地思维，需要不停地忙碌。他总是需要确定人们少不了他，以及希特勒身

边的小圈子做重要决定时不要忘了他。他的自信心依赖于他永远处于事务中心的地位。戈培尔平常谈得最多的是，他总是担心别人给希特勒出的主意不好，而他戈培尔又无缘常在元首的鞍前马后。纳粹新闻处处长迪特里希在1941年10月举行的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苏联红军已被击垮，溃不成军，东线战争已几近全胜。戈培尔对此不负责任的宣传大发雷霆。戈培尔不喜欢希特勒下令特别报道要在一天之内反复播出。一段时间以后，军事报道就失去了它的特色，军乐曲也失去了它的吸引力。

1941年5月10日，鲁道夫·赫斯飞往英国时，弄得戈培尔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没有做出指示，称病回到他的田庄朗克隐居了一些日子。听到赫斯飞到英国的消息先是以为这是个迟开的愚人节玩笑，以至他先与慕尼黑进行了一次特快通话加以证实，如何恰当地向德国人民和全世界报道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而英国人起初缄口不言使得形势更加严峻。

当戈培尔重新鼓起勇气回到部里，希望多少挽回一下这一宣传上的惨败，其作法是把公众的好奇心引开，大张旗鼓地报告前线的消息，夸大一场谋杀，甚至不同寻常地在普普通通的交通事故上浪费篇幅、占用电台播出时间。这样，多年来精心描绘的最忠诚的追随者的光辉形象一点一点地烟消云散了。人们议论说：希特勒的副手在干出这次出格行为之前几个月里就已经举止怪异了戈培尔私下里对他更是大加贬斥。他讥讽地对新闻发言人泽姆勒说，赫斯在儿子降生时，就从全帝国各省州搜罗了一些土地，铺在婴儿的摇篮下面。赫斯还希望戈培尔能提议让他当柏林的省党部头目。本来他想送一块柏林水磨石，最后却决定从他花园里弄点肥料送去。

从战争一开始，戈培尔就被一种感觉折磨着，即他的见识与能力不再得到希特勒应有的欣赏了戈培尔认为宣传对政策决断具有重要影响，可希特勒这时却只对军事决断感兴趣。这样的话，戈培尔充其量只能间接地发挥作用。1941年6月通过了关于一次德国对英国入侵的日期。他命手下在《民族观察》上发表这则消息，一旦外国报纸转载这一表面的泄密事件，就立即没收所有发行出去的报纸，想以此引开对突袭苏联的真正计划的注意力，戈培尔还散布谣言说，由于泄密他在元首面前已失宠。

可希特勒总是在他坚固的密室里与他的指挥地图和态势报告在一起。戈培尔的口才因而无用武之地，即使希特勒有时候会把他叫到总指挥部，让他阐述一下他的政策方略，可他很快就清楚了，现在唯一实行的政策就是武力。他在希特勒周围是没有朋友的。他只得满足于自己无足轻重的跑龙套角色。他不停地行动，以提高自己在周围人眼中的地位。他确实有些建设性的意见，但精神上却备受折磨，因为没有人重视他的意见，而且经常根本没人听他的。戈培尔一再主张友好地对待乌克兰人，以把他们争取过来，而不要用残暴的掠夺政策把他们变成死敌。

在最初的辉煌胜利之后仅几个月，人们看到苏联这个大国显然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能“踏平”的。对此，戈培尔试图在一份详尽的呈文中证明东部的战争不仅要靠军事手段，也得靠政治手段。希特勒却没功夫读这份呈文可这时东部占领区的部长罗森贝格却抱怨戈培尔越俎代庖，未经授权就插手他的事务。而一心扑在他的作战地图和征服世界计划上的希特勒对这一位部长的诉苦、那一位部长的呈文则一概置之不理。

戈培尔在自己的亲信圈子里说，他是纳粹中的第二号重要人物。他自诩为天才的宣传家、政治家，并首先是他这一时代的重要历史学家。

20年来戈培尔一直坚持不懈地认真写日记，而且每天几乎有一小时都用来做这件事，已经有23个厚厚的本子写满了他的带棱角的小字。戈培尔深信，这些本子有朝一日会成为这一时代的历史中最丰富的材料来源。他严格地秘密保管着日记，本子都锁在一只极大的钢柜中，钥匙他不论白天黑夜从不离身。

纳粹党报建议，战争结束后出版发行戈培尔日记300万册，戈培尔嫌太少而拒绝。他无限夸大他的日记的文学、历史价值。他幻想胜利之后隐居乡村，安安静静地利用他日记中的丰富材料写作。此外，他还要完成关于希特勒的纪念文学，其中两卷已有了提纲，甚至已经出现在一些私人印刷物中。戈培尔对他文学前程的梦想还包括一部德国1900年当代的历史著作、一部“有点基督教的具有实际意义和政治价值的著作”以及一部电影艺术评论集，“它的文学历史价值将不亚于、甚至超过莱辛的《汉堡剧评》”。在关于基督教的著作里，他将“肃清旧

的过时理论，由此建立一套全新的20世纪人类伦理学体系。时不时地这位诗人、思想家、历史学家戈培尔还将从田庄来到首都——就像“那位来自萨克森森林的老人”俾斯麦有时做过的那样——针对时局中出现的不同问题吐出个把一字千钧的字眼儿。

戈培尔曾告诉泽姆勒，他的儿子赫尔穆特如果去从事“可鄙的政客职业”，他可无法忍受。那孩子应该去做农场主。当他完成学业以后，有朝一日就能管理希特勒在战争胜利后极有可能封给他父亲的田产了。

戈培尔有一次对自己下属说：“话说得好，政治扼杀个性。它令人野心勃勃，过分地追求名望，虚荣自负，从而不可避免地形成比较卑劣的人格，当个人的权力斗争和排挤对比使两者占据重要地位，则人们自认为为之服务的事业反倒退居次要地位了。”

又一次，戈培尔却又完全持相反观点，表现出对政治家生活、工作的激情，纯粹出于对自相矛盾的乐趣，他可能会在今天精心而且高明地把论据组织得天衣无缝，明天又出于同样的乐趣推翻这一切。

除了自己作为未来的历史学家的打算，戈培尔也没有忘记自己往日的辉煌。他常常向人们吹嘘，若不是有他，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会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1941年12月的一个晚上，他声称在四个要点上，他极大地推动了纳粹党的发展：

- 1．国家社会主义在南德最初那些年里纯粹是一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根本就没有社会主义成分。作为莱茵地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他是将社会主义思想带出莱茵—威斯特法伦省并使其走向慕尼黑纲领的第一人。最初慕尼黑纲领在莱茵地区很遭到冷落，因为它与德意志民族党纲领几乎毫无区别，并且没有涉及工人阶级，是他戈培尔最早促成了在这场运动之中建立一支社会主义工人政党。

- 2．他征服了柏林并因此奠定了在全帝国内夺取政权的基础。缺了他，柏林党永远只能停留在狭隘的地方运动水平上。

- 3．他创造了大型集会活动的仪式风格和技巧，如群众集会、旗帜游行、火炬游行。只消将过去的慕尼黑啤酒厂集会与随便哪次由他布置的柏林体育场巨型群众集会比较一下就行。慕尼黑啤酒馆里全年的

纪念会，因其啤酒杯和小资产阶级情调总使他想起九柱戏俱乐部的集会。

4. 他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元首神化”的成功。他使希特勒带上了一贯正确的神圣光环，并使得那些甚至在1933年以后也没有对党真正持友好态度的广大民众中间，有很多人却表现出对希特勒本人的无比信任。这一点始终发挥着作用，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千百万德国人虽然不信任党，但完全信任元首。

毫无疑问，实际上希特勒作为元首获得承认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戈培尔。

戈培尔在战争的那个阶段对他的使命有明确的认识：“我可以作为一种民族灵魂的医生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他对他的下属说，他感到，不论是老百姓还是作战的军人，他对他们的情绪和心态都负有责任。法西斯战争开始以后，戈培尔很难接近希特勒，这使他痛苦。因此，他在自己周围制造无间歇的工作的急流，多少获得心理上的平衡

他奉献给家庭，首先是奉献给子女的时间少得可怜，并且就像他的工作日一样精心安排。为了不浪费男主人的宝贵时间，玛格达通常总是当办公室一来电话通知帝国部长先生已经上路，就让孩子们站到大门口迎接父亲。

作为父亲，戈培尔通常要到周末才能见到他的孩子，由他给他们一个个分巧克力。

1945年苏军攻克柏林之后，大约有7000张文件稿纸散落在宣传部的院子里。苏联士兵想烧掉这些纸堆，但一个收破烂儿的被稿纸的优良质量打动了，他搞到了这些珍贵的紧缺商品，从而从火中挽救了这些部长的战争记录，日后整理、审编这些已部分烧糊了纸张费了很大气力。1947—1948年路易斯·P·洛赫纳编辑了这些材料，并发表了其中使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部分。手稿原件同埃尔伯菲尔德日记一样保存在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所有手稿的复印件保存在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里。那些年戈培尔已经不是亲自写日记了，而是口述给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他是速记专家奥特，戈培尔在一家新闻社里发现了她，在部里给了他一个行政专区顾问的职位。戈培尔很快就对奥特的绝对可靠和守口如瓶深信不疑，从此便向他口授一切机密，包括他的

日记。与戈培尔早期的日记不同，这些战争期间的记载更具有“官方”的性质，可以让人觉察到，戈培尔不是单纯地作为一个记日记者，而是作为一个未来的历史学家做准备工作

戈培尔自己动笔写日记时，远不能像1941年以后如此详细地表述自己，因为缮写的工作是由一个每分钟能记录350个音节的能干的秘书来作的。口授日记一般在夜间进行。奥特上床时，总把一个速记本、一把削尖的铅笔放在床头柜上的电话机旁。部长一打来电话，奥特便拥着被子坐起身。1942—1943年的冬天很冷，取暖燃料又供应不足，他经常是一气划满整整一本，直到戈培尔以每分钟超过300个音节的速度说得精疲力尽为止。

此后，戈培尔也从未抽时间将奥特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摆在他面前的打字稿再检查、润色一番。因此，文本中出现许多重复和文体修辞上的参差不齐

戈培尔1942—1943年的日记展示了一个面貌，希特勒正领导着战争。戈培尔从未忘记，他不仅是宣传部长，还是柏林的省党部领导。自从他在帝国首都获得了他曾在全国范围内追求的那种绝对权力，他就更加兢兢业业了。对戈培尔而言，宣传从不仅限于新闻审查、文艺审查，而是意味着对全体人民的总体生活态度、思想世界的监督。战争中内政部长的职位出现空缺他曾作过极大努力，希望这个部也交由他领导。他想对战时经济的总体组织施加更大影响。他一再向希特勒呼吁，不要对“资产阶级官僚们”如此宽容，应当授权他“在各处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原则”。当然，他能每月见希特勒很少超过一次，尽管希特勒总是被戈培尔的雄辩打动，并认为他的全部论点几乎都很有道理，可雄辩的宣传部长一走，他立刻就将他忘到脑后了。“一走出他的视野，也就走出了他的脑子”。一次他从指挥部回到家后，曾这样对他的副官叹息。即使得不到他所热望的绝对权力，他也始终觉得自己在一切内政问题上元首的代表。他永远不知疲倦地为严格审查制度提出新建议。1942年3月20日，他又一次从总指挥部回到家里后，在日记中记道：

.....我向他建议，凡公开进行反国家社会主义人民领导原则的人，都应关进监狱牢房，处以重刑。为此应制定一部法律，有了这部法律，我们就能为全国内部的战争进行建立一新的基础，并首先是将

那些迄今为止逃脱我们控制的事情握于我们的股掌之中。古尔特纳死后，负责德意志法律事务的法律部国务秘书施雷格尔贝尔格，针对我的提议总是重申没有这方面的法律基础。这样的法律基础是可以建立起来。但除此之外，法制的无能当然并非在于缺少法律条文而在于人。由于古尔特纳死后领导极为不利的法律部迫切需要人员变更，我向元首推荐了人民法庭主席蒂尔拉克，他是个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而且无疑决不会因小失大……法不应是国家生活中的主人，而应是国家政治的仆人……

当戈培尔获知他的部长同行和其他高级官员们一贯无视战争准则时，他就会怒火中烧甚至爆发出来。他尤其厌恶某些党的领导，尤其是戈林和弗里克在战争第三、第四年时所过的奢侈生活。在一次公务旅行途中，他注意到一些“高官”们舒舒服服地在一等车厢里享受，前线士兵却在拥挤不堪的三等车厢里站着，他立刻大发雷霆，并马上动手制定有关“负担平衡”的规定。当然他下一次去总指挥部时就阐述了他对此事和类似现象的看法，并每次都提出严格检查缺席的新建议。随后他在日记里胜利般地写道：

我关于加强战时领导的建议当然对元首的影响极大。我只需提出一个问题，就会达到目的，我提出的一切，都一条条被元首毫无异议地接受了……

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希特勒只关心军事行动，一切有关内部管理事务的改革措施都被一拖再拖。但戈培尔毫不放松。“我不得不责怪雷博士……我指出不少枉法现象……”但这些干预却几乎没起作用。

在自负驱使下戈培尔经常夸耀他作为演说家和作家的成就。他自夸的本领实在令人惊异。“我写了一篇关于提高效率的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或者“我对当前形势仅作了几句简明扼要的描述，便获得了如潮的掌声……”他自豪地写道：保加利亚国王波利斯是钦佩他的一人之一。

我写的文章是他最常阅读的读物之一。是的，正如他向我说的，他在所有的外交谈话中都要引用其中的论据。他佩服德国人思维进程的精细，照他的说法，这与一战中的情况截然相反。

同他的“帝国文章”中不讲情面的直率坦诚一样，他的骄傲也丝毫不减。“正是这一点，使他对德国读者和外国读者都同样有吸引力。对自己关于毫不留情地对待“国家敌人”或解决占领区少数民族问题的观点，他也同样自豪。1942年3月16日他就此写道：

国家社会主义在这些问题上要冷静、客观、现实得多，它只做有益于人民的事，而在这里，对我们的人民有益的就是，在那些地区严格地实行德意志秩序，毫不考虑当地小民族或多或少的利益……

一年后，1943年5月8日，他满意地引用一段在总指挥部希特勒同他就德国的欧洲问题所讲的话：

……不管怎样，元首最后说，欧洲迄今尚存的破烂小国必须被尽快消灭掉。我们建立统一欧洲的奋斗目标必须保持不变，但只有通过德国，欧洲方能成为一个严密的组织，别的领导国不可能存在。

关于德国对法国的占领和大量枪决人，戈培尔只是说：“不管从哪一方面看，我们德国人都太善良了，我们仍没有学得像胜利者一样行动。”

戈培尔不仅知道杀害数百万犹太人的详情，而且还赞扬灭绝营里的处决，并且要求这样做。

1942年2月14日，他写道：

元首再次重申他决心无情清除欧洲犹太人的态度。这里决不允许我们有感伤情绪。犹太人活该遭受今天的灾难。他们应该同我们的敌人一起被消灭，我们必须加速这一进程。毫不留情至此，我们为千百年遭受犹太人折磨的人类做出不可低估的贡献。在我们的人民中，最不顺从的群体也要持有仇视犹太人的态度。1942年3月7日：

犹太人问题必须在全欧范围内解决。欧洲还有1100多万犹太人。今后他们必须先集中到东部。需要的话，战后要把他们赶到某个岛上去，比如马达加斯加之类。无论如何，犹太人一日不被全部清除出欧洲，欧洲就绝无一日安宁。这带来一大堆棘手的问题。半犹太人如何办？与犹太人联姻的人如何办？因此我们还有一定事情要做。解决这些问题时肯定还会有很多个人悲剧发生，但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时机已成熟。子孙后代们不会再有本能的冲动、

觉醒了。因此我们按部就班、激进地行动是正确的。我们今天的重负，会使全国受益匪浅。

.....我们最后又谈到了犹太人问题。对此元首始终毫不退让。犹太人必须被赶出欧洲，必要的话，可以使用最残酷的手段。1942年3月27日：

.....由洛林开始，占领区已开始向东驱逐犹太人，所用方法极野蛮，难以形容。犹太人没留下多少了，大体上可以确定，其中百分之六十要被消除，仅派百分之四十去干活儿。过去的维也纳党部领导指挥这一行动，做得十分谨慎，使用的方法尽量不引人注意。有一个刑事法庭处理犹太人，虽然野蛮，但却是他们应得的。元首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时忘不了他们的预感，已开始以最可怕的方式实现了。这些事上不可受感伤情绪的支配。如果我们不摆脱犹太人，犹太人就会毁掉我们。这是雅利安种族与犹太毒素之间的生死决斗，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政权能有如此的力量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此元首也无疑是我们彻底解决问题的带头人和发言人，这一解决是形势所迫，因此不可回避。谢天谢地，我们在战争期间获得了一个难得机会，使我们能保住我们的和平。我们必须利用这些机会.....1942年4月29日：

.....在所有被占东部地区对犹太人都采取了果断措施。数以万计的人都必须相信这一点.....1943年3月2日：

.....我们终于把犹太人赶出了柏林。上星期后他们转瞬间就被集中起来，短期内即将被赶到东部。遗憾的是我们发现，一些更高尚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不理解我们的犹太人政策，甚至部分人站到了犹太人一边，因此我们的行动事先走漏了消息，致使很多犹太人漏了网。但我们定将抓住他们，至少在首都的犹太人肃清之前，我是不会休息的。

即使戈培尔没有自己做出对犹太人直接进行杀伐的命令，但其宣传舆论也足够使他在任何一个法庭上接受审判。

戈培尔对希特勒的敬佩是不可动摇的。1942年1月31日，戈培尔在日记里详细记述了希特勒前一天在体育场所做的夺权九周年讲话。戈培尔在结尾处说：

.....公众被极大地鼓舞了.....他给人民心中灌注了无穷的力量.....只要元首在，就根本无须担心未来的发展。发现元首身体很好，这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只要他健康地活在我们中间，只要他精神力量、勇气长存，我们就会一往无前。这一信念今天在全体民众中再一次牢牢地扎了根。1942年3月20日戈培尔记述道：

将近中午我与元首进行了第一次谈话，下午又有一次持续数小时的谈话，这些谈话深深感动了我，使我认识到，我迄今为止在柏林所做的工作，在任何一方面都符合元首对于领导人民战斗的设想.....这次与元首的会见格外坦诚。你能立刻感觉到，他能够再次与一位老战友会面，他很快乐，尤其为畅谈在更大的场合中不宜谈论的话题而高兴.....元首的健康外表不大可靠。如果匆匆地看他一眼，会以为他的健康状况极佳，但这不是实际情况。他跟我推心置腹地说了些话，表示他前一段感觉身体不适，他与一阵阵的头晕抗争。漫长的冬天对他的精神有很大影响，以至不会不给他留下痕迹.....

我的工作获得了元首的高度称许，并使他极为满意，能这样长时间地与元首谈及一切个人问题真是太好了。他能给人以力量。谁和他在一起度过一个下午，谁就会感到自己像一节重新充满了电的蓄电池。

晚上9点半钟我们不得不分手了。我离开时，元首非常激动，他希望我能很快再去看他。这会儿要离开，我也觉得几乎有些不知所措.....

在另一个场合，戈培尔充满感情地记述了一只小狗，这只狗是人们送给领袖的礼物，现在整天在他脚边玩耍。他整个心灵属于这只小狗1942年5月1日，戈培尔写下：

领袖审批了我为五月一日向德国人民演说的讲稿。这篇演说对社会人民国家做了一个极其详尽的解释，很适用于国内宣传工作。在本文中领袖首次对纳粹国家的目标以详尽的形式做出了规定。

几天前的4月26日，希特勒在国会作了一次发言，对东线的困境毫不掩饰。他说，他已决定接管最高指挥权，只有这样，德国国防军才能有救。然后他要求国会允许他使用这种总括性的统治手段，戈培尔早就要求在“本土前线”上运用这种手段。

戈培尔考察民意，主要是采访他母亲。1942年1月29日，戈培尔和他母亲进行了详谈他称自己母亲比大多数的民意专家更熟知民意，那些人只会从科学经验的高高遥望台上做出判断，而这里人民的声音自己在说话，我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首先，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像中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始终坚持简单和重复。只有那些能用最简洁的表达方式说明问题，并且有勇气不顾知识分子的异议，用这种简化形式永远重复下去的人，才会长远取得影响公众舆论的根本性胜利。

戈培尔深知，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新教在广大群众中都享有广泛的影响。因此，他认为还是暂且避免公开的争端。他阻止了一次事先计划的对因窃听英国电台而被捕的宗教人士的公开审判。在1942年4月10日的笔记里，这位柏林党部书记解释了他解决帝国首都教化问题的设想。

时下柏林卖淫活动猖獗。一次大搜捕表明，所有染指的妇女中百分之十五以上患有性病，其中大部分甚至患有梅毒。我们务必要采取措施，不能永久地对在帝国首都建立妓女区这一问题搁置不问，汉堡、纽伦堡和其他若干大城市都面临这一问题。对这样一个有4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不能按照基督教主义道德观进行组织和管理……

希特勒发动法西斯战争之后，戈培尔非常重视尽量灵活进行战争宣传，迎合他一贯面向的国内外听众。他认为新闻通讯尤其重要，他不是要如何通过它提供消息，而是赋予它政治任务。他1942年2月9日写道：

我认为帝国占有通讯社极为必要。新闻政策是国家的崇高职能。国家本身决不能放弃它。新闻政策是一项基本政治事务。这类政治事务应由帝国掌管，而不是由党掌管。党也没有能力实施这样的新闻通讯新闻通讯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由管理国家方面的消息组成，剩下的一丁点儿百分比才是党务消息。尽管要达到这一结果需要战斗，但我决不放弃……

他在别处写道，新闻通讯尤其在战争期间教益作用多于提供消息职能。通过新闻应该使人深思，应该激发大家思考如何管理国家方面的问题。他提到，有些词在战争期间必须避免使用，就像魔鬼要避开

圣水那样。这些词有例如“破坏”、“暗杀”等等。这类概念必须从日常语言中消失，以防人们产生愚蠢念头。戈培尔说，言语会引起危险的后果，即使所说的话没有什么特殊的相关联系。出于这种原因，他于1942年2月开始操心在占领国应使用什么样的词典。

我发起由我们部为占领区编写词典，在那里首先应教授德语。而那种德语应含有符合我们现代国家思维的专门用语。首先应将源于我们教义的用语翻译过去。这是一种间接宣传，我对此一直抱有期望。

就在同一天，戈培尔详细叙述了如何才能使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战争造成的日益贫困指出我们在进行这种宣传时必须考虑到眼前日益减少的仪器定量，这必须向大众仔细解释清楚。我让所有的人挑选理由，加以组织，力图有力地解释短缺问题。这些理由虽然很吸引人，但我还是有一些怀疑它们是否能说服别人。因为当一个人被剥夺了黄油和肉食时，是听不进那些花言巧语的。

戈培尔坚决认为，在战争的第三和第四个年头，纯客观的消息要比富于感情的评论和论战更具宣传效果，不管消息是真是假，他于1942年3月23日谈到他对英宣传：

我们据一位可靠的内线人断定，我们的英语广播在英国影响很大。不被接受的只是一种带攻击性、傲慢而又侮辱的口吻。这一点我经常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提起，敦促他们立即改变这种弊端。目前人们对英国人只能通过循循善诱的方法有所企图首先英国播音员豪豪勋爵就是大论战的一把好手，但我认为大论战的时代大势已去。在战争的第三个年头，人们必须采用不同于第一年的宣传形式。第一年人民还愿意听这种口吻，他们惊叹于它的风趣幽默和思想深度。可今天人们只愿听事实。事实说得越巧妙，和听众越贴心，效果就越强烈。

戈培尔提到的“豪豪勋爵”，真名是威廉·乔伊斯，他在战争爆发不久，头一次发表广播讲话后，《每日快报》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乔伊斯一露面就被认为是一个滑稽人物，这首先由于他那矫揉造作的语调，他硬装出来的幽默很快大受欢迎，他本人将之归功于这个绰号。德国宣传部长在战争第一年就通过“可靠的内线人”得知对英国播音的乔伊斯的听众数以百万计，这倒是个正确消息。这不是因为他的反英宣传，而是他语调“高雅”的噪音，乔伊斯认为这是听众的功劳。“豪豪

勋爵”被搬上了无数的文艺歌舞舞台加以丑化。这样威廉·乔伊斯竟意想不到地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就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广播中，他也成了受人欢迎的滑稽人物。当戈培尔对不幸的乔伊斯直呼其小丑外号时，他显然没有想到，他已深深刺伤了这位广播官员

盟军攻入德国以后，一位英国士兵向乔伊斯提问时听出了他的声音，马上逮捕了他。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声音是多么出名。他被送上法庭，处以绞刑，因为后来入了德国籍的乔伊斯在第一次德语广播时还是英国公民，故而犯有谋反罪。乔伊斯原是爱尔兰人，一生痛恨英国。他参加了休斯瓦尔德·摩兹利爵士所谓的法西斯党，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崇拜得五体投地。与其说他是个人物，倒不如说他更是个悲剧角色

戈培尔相当坦诚地表达了他对“另一个德国”的态度，当时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英国上议院展开了一场有趣的辩论，涉及战后主要用何种方式对待德国人。有部分意见颇有影响，他们强烈要求区分纳粹分子和德国人民，否则德国人民就不能被英国的宣传所打动。人们首先是和范斯塔特辩论，此人以支持不仅消灭纳粹、也要消灭德国人而著称。迄今为止，我们对范斯塔特讲话知之甚少。我动用了一切手段，去搞到她的讲话文本，因为她对我们的对内宣传肯定极为重要。英国人如此无礼地侵犯德国人民是非常愚蠢的他要是区别对待我们和老百姓，那他们将取得的成就无疑会比现在大得多，我对英国上议院表现出的这些倾向里发现了危险的苗头，所以我严禁德国新闻界报道此类言论。我们提得越少，这些政治病毒的危害性就越小。

由于戈培尔对电影情有独钟，所以他在日记中以很大的篇幅考虑国内和占领区的电影工业问题每部重要的外国电影他都要看——尤其是那些敌手的电影，他托人通过中立国搞拷贝。

1942年5月某日，戈培尔的日记写道：

下午又有许多电影界的客人造访。所有的制片人都到场了。晚上我们一起看了一部美国彩色电影《斯瓦内河》，随后我对新创作一部德国民歌电影有许多话可讲如今的情况是这样的，美国人懂得如何把他们那点文化家底用现代化的表现手段创造出对目前时代有用的东

西。我们相反却由于历史的灿烂悠久而背上了包袱。我们耻于用现代服饰来装点我们的文化财富，所以它们只能呆在博物馆里而不朽，最多会被一些党小组、希特勒青年团或青年义务劳动军利用。只有当我们用现代化的手段宣讲、展现我们往日的文化财富时，这才能做到大规模古为今用。美国人深谙此道，这大概因为他们不像我们那样为历史包袱所累尽管如此我们也要做。美国人只不过有几首黑人歌曲，但表达得极富现实意义，用它们征服了当今世界的大部分，还让人们深有同感。我们的文化财富博大精深，可我们没有技术和力量对它们进行现代化改造。现在必须有所转变。

戈培尔同意由德国占领军控制下的法国电影生产继续进行，并对这些电影的质量有自己的想法：

我又看了一部法国电影《阿奈特和金发女郎》，这和达里热的电影《任性》一样轻松优雅。我们必须对法国人留点心，不能让他们在我们的领导下建立一门新的电影艺术，对我们在欧洲市场上构成严重竞争。因此，我要想办法逐渐争取那些颇富天才的法国电影工作者为德国电影服务。

戈培尔有时提到他的妻子和孩子。1942年5月的日记里有一处暗示很有趣，这位著名演说家的妻子要在母亲节那天向柏林妇女作简短讲话，她“怯场得极为厉害”。下一个月里他提到，玛格达染病后又痊愈。他在另一处遗憾地说，他留给家里的时间太少，很少见孩子的面。

1942年初夏，发生了一次暗杀戈培尔事件。事件发生后，按照戈培尔严格的准则，新闻界对这起暗杀事件缄口不言。在他的日记中也只有一处提到军事法庭对此案的审理。这是一桩不公开的审判，“阴谋暗杀我的叛国贼被判处死刑”。刺客叫库梅罗，职业是无线电工程师他企图在通向施瓦尔韦尔德的大桥下遥控引爆一枚地雷。库梅罗伪装成钓鱼者，在戈培尔的车过桥前不久安好了地雷，但他被一名警觉的警察发现并逮捕了。此后本来就很严格的安全措施更加森严。

当有人向希特勒报告了这起暗杀事件时，希特勒非常震惊。他下令，只要是戈培尔逗留的地方，就应该多加武装护卫。1942年平安夜，也就是暗杀事件刚过几星期，戈培尔公邸前开来一辆巨型梅塞德

斯。这辆车车身装甲厚达8厘米，绝对防弹防爆。车窗由3厘米厚的玻璃制成。这是希特勒送给他的宣传部长的最佳礼物。车子带来了送礼者最良好的祝愿和希特勒的战略命令戈培尔以后不许坐其他车。

戈培尔之所以得到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和不同寻常的奖赏，是因为他为希特勒不遗余力地卖命中，创造了后者所需要的成绩。戈培尔的努力可以从他在苏德战争中的日记中反映出来。同时，这些日记流露出了戈培尔对于时局的看法。下面摘录一些日记。

1941年6月23日（星期一）

昨天：天气闷热。我们的士兵不会感到作战容易。

莫洛托夫发表了演说。野蛮的辱骂，夹杂着爱国主义的呼吁，声泪俱下的谴责，不乏恐惧心理。他说：“我们将取得胜利。”可怜虫！英国的态度仍然模棱两可。多半感到震惊。没有明确的立场。美国只表现出惊异。安东尼斯库向本国人民和军队发布了富有诗意的公告。芬兰尚未采取行动。匈牙利发表了强烈的反布尔什维克声明，对我们表示支持。意大利已向俄国宣战。真妙。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浪潮正横扫欧洲。元首的决定再英明不过了。

我们的空中打击已大规模开始。900架“斯图卡”式轰炸机和战斗机攻击俄罗斯的城市，包括基辅，并攻击机场。战斗已沿着3000公里的战线打响。首战告捷，小河屏障已被完全突破

我们对英国南安普顿实施猛烈的袭击英国空袭我莱茵和鲁尔区，但未获成功。

中午与阿尔莫耶里在一起。（……）已被里宾特洛甫传唤，他对他说帕沃里尼的访问不受欢迎。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必须尽快将此事告知元首与帕沃里尼讨论电影问题，尤其是正常交换新闻纪录片和故事片问题。我们达成了完整的协议。我们还打算组织大批记者互访。

各国的心理状态在整个下午变得越发明显元首的公告已在全世界被逐字逐句转载。伦敦最初的反应是宣称希特勒发疯了，并正在步拿破仑的后尘，这句话莫洛托夫也早已说过。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少数英国人叫喊应进行理性研究，并指出如果德军占领乌克兰，英国将会失败。美国已转为谩骂。但是，众所周知，言论决不会伤害任何

人。如果我们取得胜利，正义就将在我们这一边。日本仍未作任何声明，俄国人的飞机早已遭受极其严重的损失。在我对提尔西特的一次打击中，他们丧失了43架飞机中的22架。军事行动正在按计划进行。

一位来自伦敦的中立目击者报告：几乎所有被炸城市损失严重。然而，士气完整无损。充满强烈的社会意识和反富豪情绪。丘吉尔仍然极受欢迎。其地位也十分稳固。

整个下午我都在紧张工作。当我读完元首的公告之后，里宾特洛甫作了一文不值的补充。虚荣心的需要俄国人的行动类似于1870年法国人的行动其军队将遭受同样的灾难。在初期阶段，俄国人仅进行了中等的防御。但他们的空军一开始就遭受了令人震惊的损失：200架飞机被击落，200架在地面被击毁，200架受损。无论从哪方面看，均是一笔巨大的赤字。我们将赢得胜利，我们必须赢得胜利，并将速胜。公众情绪略显压抑。国家需要和平，尽管不能以失败为代价，但每个新战场的军事行动都使人担忧。西班牙的报刊正在全力以赴。瑞典的报纸也是如此。欧洲洋溢着一种十字军精神。从我方的观点看，非常有益。但是我们不能地于强调“为基督教”而战。这毕竟太虚伪了，安东尼斯库已任命其兄弟为其副手。这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但与我们无关。伦敦仍无明确立场。对它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晚间早些时候，在兰克为帕沃里尼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众多文雅悦人的宾客。但我无暇充当主持人。每分钟都有大量的新闻送达。非常令人满意。至此，1000架俄国飞机被毁。这是致命的打击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被拿下。全天所有目标均已达到。现在已不存在问题。我们应该为此高兴。苏维埃政权将像朽木一样被摧毁，丘吉尔发表了演讲。一个反元首的歇斯底里万言书。这个演讲只能证明伦敦和莫斯科一直在联手对抗我们。

帕沃里尼的访问在非常愉快的气氛中进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惬意和令人激动的夜晚。

再次很晚上床。近来睡觉对我们来说已成为一种奢侈享受。

1941年6月24日（星期二）

昨天：东线的军事进展极好，超出我们的想像。我们的新式武器全部在他们面前亮相。俄国人颤抖着从他们的工事中走出，经不住此

后一天的审问。我们沿着两条巨大的战线推进。至今1500架俄式飞机被毁。它们像苍蝇一样栽落下来。他们的战斗机速度慢于我们的“容克88”。一切按计划进行。形势喜人。

无足轻重的英国空袭。事实上毫无意义。这应该如丘吉尔本人所云，是他的最佳时刻。我们在英国上空派有80架飞机组成的强大机群。这将为人们制造一个深刻印象。英国人说俄国人“正把我们碾成粉末”。我们走着瞧吧。我在部长会议上勾画了整个局势，并描述了我方情况。各条战线均令人震惊。我们的策略旨在削弱英俄共谋。丘吉尔的演讲提供了绝妙的炮弹。美国的舆论正在急剧分化，这是我们设想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战争的一种结局。在欧洲大陆，似乎正在形成一个统一战线。于我们非常有益。我们正在逐渐地敲响反布尔什维克的战鼓采取这种渐进性策略旨在使这种转变不至特别困难。公众的思想仍然是模糊的。180。的大转弯过于突然。公众必须逐渐适应新的观点。这不会经历太长的时间。让我们先取得最初的具体胜利。由于防空演习、疏散等等，东普鲁士的局势有点失控我必须立即制止这种趋势他们必须首先适应新局面。

陪同帕沃里尼去见元首，元首以极大的热情接见了。就意大利的国内需要解释了对俄战争。元首认为，对于我们来说，军事行动进展顺利。他明确指出关键是建立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联盟。这一点将被意大利方面充分理解，在意大利，他们由于我们的缘故而改变了他们的传统政策。意大利总是反莫斯科的。

我向元首描述了我们与意大利进行文化合作的成果。他对此非常理解。这将非常有助于反击外交部。

元首即将出发前往前线。我向他告别。他极为严肃和庄重。胜利归来！一路平安！上帝保佑你！

他是一个如此伟大的人物，只有在他的面前，才能感受到对他的敬畏。帕沃里尼告知我有关里宾特洛甫的阴谋。这个家伙以损害我们的对外政策为代价而追求部门优势。但我将击中他的要害。

最近的电影数字已被公布。很好。估计约有4千万的利润。

批准反酗烟的新宣传影片，

马丁要求批准一份以德军为对象的新的基督教杂志我加以拒绝。这些懦弱无力的说教是我们送给士兵的最糟糕的东西。

在施瓦恩韦尔德工作片刻。天气闷热难熬。

与帕沃里尼前往乌法电影制片厂。

.....观看500米长的有关对俄战争爆发的新闻纪录片。我们的一部分新式武器被展示在眼前。它们具有清除其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的毁灭性力量。俄国俘虏爬出他们的防空洞和战壕，在恐惧中瑟瑟发抖。神圣的历史高级法庭现在正对苏联进行审判。暴行累累，清算的时候到了。帕沃里尼完全折服于高质量的胶片材料。

亚历山大遭到我空军的轰炸决定性战斗发生在托布鲁克209辆英国坦克被击毁。4万吨船只被击沉。这可以使丘吉尔感到，他并未被忽视我们在所有战线采取的压倒行动已赢得整个世界的无限倾慕。欧洲的反苏统一战线似乎正在自动形成。我们对其未加任何鼓励，以避免引起怀疑。无论从心理学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看，我相信反莫斯科的战争将成为我们最伟大的成就。

反莫斯科情绪正在整个欧洲高涨。甚至《时代》也以非常怀疑的措辞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仍然分辨不清其明确的立场。

晚上，观看新闻纪录片。气势恢弘。体现了编制、技术和视觉效果的高级成就。

然后，与帕沃里尼共进晚宴。一个小型舞会。

这次访问已使我精疲力竭

1941年6月25日（星期三）

昨天：陪伴帕沃里尼上飞机。友好告别。我们将在威尼斯再见。我们发表了详尽的访问公报，这引起外交部的恼怒。里宾特洛甫施展某些雕虫小技，但他们不能改变事实。

战争局势：英国对德西北部进行中等程度的空袭。轻微成功。仅对基尔构成严重破坏。我们攻击了泰晤士河口的城镇。死亡比率为22：5。在东线，2585架苏联飞机已在头两天被击毁，而我们是51架。地面行动进展顺利。获得巨大的成功，超过了我们的想像。但敌人正越打越好。波罗的海国家试图发动起义。我们已进入科夫诺。列宁格勒的

某些地方正在起火。我们尚未在最高司令部公告中发布详情。敌人还完全蒙在鼓里。他们可能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

在莫斯科，他们正以传统的共产主义方式吹牛和咒骂。但这在枪炮的隆隆声中成为空谈。此外还有针对我们的所谓野蛮暴行宣传，对此，我们立即着手对付和给予反击。但是他们的宣传优于伦敦。我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现实对手马德里举行了于我有利的示威。即使没有我们的直接介入，欧洲反苏战线也越来越呈现清晰的轮廓。我要报界不要过多宣传苏联的多民族特性，这种特性已被过分强调了。这仅仅有助于加强敌人的抵抗力。我还命令不要涉及我们战胜莫斯科带来的经济优势。我们的宣传战将仅限于政治领域。我还禁止出版苏联的巨大地图它所囊括的广大区域可能使公众产生恐惧感。我坚决反对规定我们取胜的时间表的轻率行动。而这种趋势正在外交部蔓延。如果我们说4个星期，结果它变成了6个，那么，我们的最辉煌的胜利也将变成最终的失败。外交部也不注意保守军事秘密，我要让盖世太保采取行动对付这个特殊的长舌妇。

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之间的联合阵线开始呈现清晰的轮廓。我保证使该问题被给予高度关注。我这里有详尽的证据材料。罗森贝格发表了一篇有关东方问题的非常有指导意义的文章。

格拉斯麦尔已让阿纳克为对苏战争作了一首歌曲，但至今完全不适用.....

.....在冯克对我的长时间拜访中，我与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总是很高兴花费时间和我们在一起。他忧虑重重。这些天来，他的工作是组织几乎整个欧洲的经济。意大利人被他视为眼中钉。他们总是提出过高的要求，并纵容具有国家背景的黑市通货交易。什么国家！冯克还陷入了与莱伊的某些纠纷之中。莱伊的胃口真大，总是超过限度，我向帝国的宣传家们发表了演说。我以最真实的可能方式概括了当前局势，并展示了这种局势是如何出现的。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酷热正在减弱我在施瓦恩韦尔德继续工作但我实在太累了，不由伏在我的办公桌上沉睡过去，2小时后昏然醒来挺直脊背，直到难以忍受而跌倒。造病，但妙极了。我只有这样做，别无他法萨姆纳·韦尔斯已代表美国发表讲话。完全屈从于红色布尔什维主义资本主义和布尔

什维主义之间传统的、非常密切的联盟已在外交领域复活。我就此问题为《民族观察》撰写了一篇题为《古老的联盟》的文章。用以证实反对德国的阴谋我们正在发表有关这方面的更加深入的文件材料。但是我指示，应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而不是以很长篇幅逐句加以转载。这是极其复杂的工作。此刻，我们需要恢复一种战斗性报刊：坚韧、高命中率、具有进攻性。正如在过去的最好时期一样。

叙利亚的局势非常暗淡。甚至维希政权也承认这一点芬兰仍伪装中立。出于军事策略的考虑。但这种状况不会持续长久。那里的公众日益发狂。匈牙利已与莫斯科断绝关系。在西班牙，整个公众站在我们这一边。日本仍然踌躇不前美国完全分裂。在那里我们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英国最初的欢乐狂潮已经消退。目前的舆论表现出极大的怀疑情绪，并害怕德国速胜，但这将成为现实。

土耳其迁怒于海峡问题。我们在那里打出了一张真正的王牌。

伦敦报刊大加吹嘘皇家空军对德国领土的严重破坏，且已达到荒唐的地步。对此，我们将应付裕如。

这便是直到深夜为止的形势发展状况。

闷热的天气耗尽了我全身的精力。

这些天对我们的士兵来说可谓艰难的时日。

1941年6月26日（星期四）

昨天：天气燥热沉闷，令人窒息。然而，我全力工作，电报雪片般飞来，电话铃声也持续不断。

我们已深入苏联领土。考那斯、维尔纽斯、斯洛尼姆和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已到我们手里。南方在进行激战。俄国人在英勇抵抗。没有撤退行动。好事一桩。不久我们将更加牢固地掌握他们。他们正在损失无以计数的坦克和飞机。这是胜利的前奏。我们站在了辉煌胜利的门槛上。目前我德军最高司令部公告仍不动声色。从我方策略考虑，俄国人正陷于两眼一抹黑状态。美国人现在给了我们10天时间取胜。我要采取有力措施打破这种断言如果我们超出美国人提出的时限，巨大的胜利如同失败英国人对我进行袭击。在布伦、里尔获得某些成功。我们使用80架飞机攻击利物浦。提尔西特、墨麦尔、哥尼斯

堡遭到俄国人轰炸。如同小小的蚤咬苏联军事公报充斥着谎言。我们对苏联方向仍旧引而不发。当我们真正表态的时候，我们的胜利将是辉煌的。苏联的广播电台试图削弱我军的士气。滑稽可笑！我们的电台正受到莫斯科的干扰。但是现在我要让考那斯的广播电台投入使用。我对它寄予高度期望。

我的文章《古老的联盟》效果极佳。该文将出现在《民族观察》之中，施瓦茨·范伯克已为我的新作撰写了一篇才华横溢的前言，欧洲反莫斯科联合阵线正在形成。我们正给予其各种支持与辛克尔讨论文化和军队娱乐问题。我们正为招收新的人才而努力工作。蒂斯莱尔提出一些有关党的人事问题。费舍尔为党提出一个新的宣传计划。但该计划过于大胆了。在这种热天，将无人出席会议。比伯拉赫从克雷莫纳发来报告。狄赫格为使我们的广播办得更加有效提出了一种新方法。他们非常勤奋，善于思考。

我接见各省红十字会领导人，并向这些女士们概要地讲了一下她们的职责讨论关于伦勃朗电影的已经过修改的计划，仍存在一些缺点。

布鲁韦尔斯汇报在比利时一年的工作。那里的士气正在改善。如果我们现在打垮莫斯科，我们将获得长久的利益。

与弗里茨彻交谈一系列有关报刊的问题。狄特里希从司令部打来电话，告知我最重要的新闻。元首像往常一样乐观。

西班牙出现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我们对莫斯科的进攻已经向富豪阵营打入一个楔子。从心理角度看，目前我们的地位十分有利。

晚上前往施瓦恩韦尔德。我已精疲力尽，柏林酷热异常。

此时芬兰已正式向苏联宣战。

深夜，观看新闻纪录片。战争资料片已经大量生产。

然后，与希波勒尔讨论某些电影问题。这种酷热天气，我根本不能入睡。

1941年6月27日（星期五）

昨天：不管怎么说，又是一个热天。我们与英国的空战在继续。但是，很长时间，英国皇家空军没有使用令我们感到恐惧的力量发动

攻势。只是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战斗。没有人解释这一点。少数船只沉没。但是，所有目光集中在东线。南方战场没有重要行动。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那里仍然使敌人陷入慌乱状态。感谢上帝，敌人没有显示退却的迹象。明斯克现在我们掌握之中。第一只大口袋开始收紧。我们俘获了大批俘虏和装备。苏联人遭受了巨大的坦克和飞机损失。但是他们越打越好，甚至自星期日开战以来，他们已经学会了大量的东西。目前我们的胜利令人十分满意。就北方而言，胜利更为巨大。芬兰已正式发起攻击。瑞典已允许一个德国师通过其领土。丹麦已表示坚决支持我们。马德里出现许多反莫斯科的示威活动。意大利打算派遣一支远征军——只要它能够发挥作用，而不是带来更多的麻烦。在欧洲，反布尔什维克的战线正处于上升趋势。

我们仅为最高司令部公告增加了少量报道世界紧张局势正在达到一个高峰。布尔什维克正在发布军事公报，这些公报的内容更多是为了宣传，而不是尊重事实。十分野蛮和讨厌。不会产生任何效果。每个人都在等待我们的报道，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这些报道将展示真实情况

莫斯科电台正在大肆编造所谓德国野蛮暴行的故事。号召我们的军队士兵开小差。愚蠢而拙劣，但我们仍要给予密切注意。布尔什维克分子不是英国人。关于颠覆性宣传，他们略知一二。现在我们要启动考那斯广播电台。其他广播电台继之。现在，我们要针对其民众，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失败主义宣传。在我们看来，广播电台的确干得不出色——莫斯科电台远比我们强大——但是，它正在日益改善。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对莫斯科作出反应伦敦陷入巨大的困境。同样，美国的公众舆论也正在分化。人民逐渐对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联盟感到不适。相反，我们在他们心理中的地位是明确的、清楚的和牢固的。土耳其开始坚决地站在我们这一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海峡问题。伦敦和华盛顿正在失去大量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在占领区，我们的股票也在上升。我收到来自巴黎、布鲁塞尔、海牙、奥斯陆、布拉格和克拉科夫的大量报告，异口同声。目前，我们的地位非常有利。

大量的迫在眉睫的问题需要处理。格拉斯麦尔作了几首有关对苏战争的新歌曲要我批准。但无一首好歌曲。施密特·德克尔汇报海外A0

的工作，非常广泛。大量有益的工作正在那里开展

与费舍尔和瓦赫特尔讨论党的新的宣传计划。不召集大会，更多地强调向党内同志澄清问题和进行口头宣传。扩大“周口号”计划，瓦赫尔很适应做此工作……。

……接见60位我党老警卫。我为他们的假日旅行送行，给他们作了简短的告别演讲他们非常高兴再次见到我他们依然是最好，最忠诚的男子汉。

与阿尔菲耶里长时间地进行争论。依然涉及帕沃里尼的访问和联合公报。此时我讨厌所有的事务，我毫无保留地对他这样说。他已成为外交部那些难以言状的背叛阴谋的牺牲品。但是，即使帕沃里尼本人，也只是个无足轻重者。其主子的忠实仆人是齐亚诺。与这样一个弱者不可能共事和使事情取得进展。因此，我必须走自己的路，不允许这些没有灵魂的外交官打乱我的计划。

与古特尔讨论人事问题被监禁的博默送来一封令人动情的信件。对他的惩罚过于严厉了。他确实愚蠢地发表了言论，但并不比其他许多人做得过火。待对俄战争结束时，我将干预他的事情。

该城市像个火炉。尤其是在威廉普拉策。我驱车前往施瓦恩韦尔德去工作，但那里也没有多少改善。

整个下午一直在阅读电报和报告。来自前线的新闻非常少。那里的一切仍然变化无常。但不久胜利就将降临。

晚上沃达哥前来汇报关于德国空军在东线所做的巨大贡献。令我们焦虑的唯一事情是，俄国人不久可能撤退，并避免与我们决战。但迄今为止。他们采取的这种行动只是一些孤立现象。如果他们不撤退的话，他们不久就将失败，苏联战俘的供词暴露出惊人的无知。布尔什维克教育的结果。没有良好的军事训练机会。他们许多人宁可自毙，也不当俘虏，因为他们已被告知有关我们士兵的耸人所闻的故事我们必须通过传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电台正受到干扰。

沃达哥利用整个晚上告诉我们有关德国空军最高司令部的工作，这种工作错综复杂和包罗万象。他涉及了许多有关如何指挥这个庞大的军事机器的令人着迷的细节问题

我俩坐在阳台上海阔天空地谈到次日凌晨，沃达哥是个聪明的男孩，总的说来，他是个正直的人在这种烤人的天气，我不能入睡。

1941年6月28日（星期六）

昨天：灼热。难以工作

中等规模的空袭。我们在英国上空未采取更大的行动。英国皇家空军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开拓新局面。更多的船只沉没。海战在继续。

东线：南方出现非常顽强的抵抗。敌人拼死防御，并得到优秀的指挥员指挥。局势尚未构成威胁，但我们忙于应付。

中央：极好的进展。第一只口袋已被收紧。所有东西都被装在里边。敌方士气每况愈下。缴获的物资装备数量不断上升。坦克战的优势完全在我方。我们在北方的进展也很顺利。德国空军已经击毁4000架敌机。我们的损失微不足道。芬兰总统吕蒂已向他的国家发布令人激动的公告。一部对布尔什维主义罪行的揭露书。我们在整个新闻界给予全文发表。

整个前线强烈要求获得宣传品。面对俄国，他们迫切需要这种东西。尤其是保证俘虏安全和作为身份证明的传单。俄国军事公报是极其野蛮的宣传品，没有任何价值。我们不打算重蹈莫斯科的覆辙。我们依然将自己限制在含糊其辞的声明之中。但是，我们的言不及义将逐渐给我们整个宣传工作带来有害的效果。但是，一旦我们顺其自然，我们将获得更大的好处。在中央战线，俄国人正在缓慢的撤退。这并不符合我们的意图。

俄国电台正在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有害宣传。我们对付它绰绰有余。我们的广播电台尚未送达消息，因为它们正受到干扰，甚至在新的频道。但是，当我们缴获更多的电台时，问题会迎刃而解。

不必号召敌兵开小差只要让俘虏在收音机里和在传单上发表声明就够了，这将对德军的行为作真实的描述。其他人必将加以效仿。

斯大林早在5月6日就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他预测了反德战争。随之，“国际新闻社”给予报道。这正中我们下怀。我正在为证实美俄共谋而努力工作。

来自英国的有关空战的报道荒谬绝伦。按照他们的说法，半个德国已变成了废墟。我们不能更多地加以否认，因为英国绅士们多半击中了伪装物。在其他方面，英国也在编造谎言：德政府处在崩溃的边缘，莱伊早被免职，我也即将离职等等。我们不予理睬。

我要采取措施保证新闻纪录片和报纸不出现有关前线的相同照片。这是由于各宣传公司的拙劣编排。我与德国最高司令部发生了纠纷，它与外交部串通一气。他们拒绝允许占领区的电台人员来此处向我报告。多米尼克未被允许前往考那斯解决那里的广播问题。我决不就此甘拜下风。一整天我似乎都在解决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

柏林的粮食供应非常糟糕。没有土豆，蔬菜极少。但是巴克告诉我这种状况一周后将改善。这是由于气候和运输不畅所致。但是人民必须吃饭。我要盯住这件事情。占领区的局势非常严重。某些地区出现饥荒。在其他方面，局势仍不明朗。特博文报告挪威完全混乱。亲英组织与布尔什维克分子发生冲突。敌方阵营的分裂日益加深。目前，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开拓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有可能使裂痕加深，直到敌方阵营最终崩溃。

依然没有关于反苏战争的新歌曲，我保持着压力，但是，我们的作家拿不出任何东西。

格赖纳向我道别，他前去服役。他将接管战后电影和戏剧公司的管理工作。届时政府的三个行政部门将分开。

（……）将作为德国电影工业的代表前往直意大利。他的任务：获取他能为我们获取的一切。微笑加恶棍。不让意大利的电影工业做大。德国必须在欧洲保持电影生产的头号强国地位和永远支配它的国内局势。

一些偶然拥有交响乐团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打算将乐团的房屋作为谷仓出租。我制止了这种作法，并发布一条法规：未经我的允许，我们的文化遗产，包括建筑物在内的任何组成部分不许出售和擅自处理。

威廉普拉策的天气极其炎热。我驱车前往兰克，在那里的平静和安宁中工作。户外的天气真好，阳光灿烂，但凉爽宜人。

匈牙利已宣布与俄国处于战争状态。从军事角度看这对我方并无多大用处，但从心理角度看则是有益的欧洲联合阵线正在发展。最终，丘吉尔与他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将成为孤家寡人。

下午，所有事情都被处理完毕。晚上，天气更加凉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视察我们的新木屋，它不久即将完工，造得非常美观。它坐落在密林深处，但真正是为了和平。那个时代不久即将来临。

在我们的领导下，欧洲正在加强凝聚力。整个大陆正在苏醒。国家不分大小，均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它将向何处发展，尚未可知。

无论如何，我们将继续向前，向前，向前，直到那个伟大的时刻到来。

1941年6月29日（星期日）

昨天：东线局势：南方罗马尼亚战线处于僵持状态，小规模战斗出现在俄国的突出部，某些出现在罗马尼亚境内。没有严重危险。在中央，一切在按计划进行。我们早已越过明斯克。敌人损失了大量坦克和飞机。第一口大锅接近封顶。在北方战线，一切也在按计划进行。除了南方以外，局势很好。俄国人正在英勇作战。他们的指挥系统已比最初几天发挥了有效作用莫斯科正在广泛传播最无耻的谎言和进行所谓德军暴行的报道。但是世界舆论拒绝相信布尔什维克说的每句话。在美国，斯大林的地位被认为已经无望。在我们国内，人民早已沉浸在幻觉之中。传闻俘获60万战俘，已打开进入列宁格勒的大门等等。这是我们长期保持沉默的结果。然而，元首拒绝打破它。即使存在着公众听到第一批冷酷的新闻时会感到失望的危险。目前，军事考虑必须放在第一位。我们正在全力印刷更详细的新闻以向公众发布但是元首打算等到星期日——今天——才打开发布特别公告的潮水闸门。为此我们全部忙于准备材料。SD的报道也抱怨整个国家的过分乐观。这是海外报道提供的材料。第一次冲击已经过去。某种过分自信已取代其位置。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舰队打得很好。红海军遭到沉重打击。我命令报纸和电台对这些事情保持最大的克制力来自于美国的有关过分乐观的报道决不能再发表我已就将老媪打扮成美貌少女的问题使外国记者们再次受到警告。否则，盖世太保将采取行动。

英国袭击不来梅和汉堡，获得某种成功。俄国空军不遗余力地保持沉默。我们在英国港口附近布雷。

俄国广播网完全以传统的布尔什维克方式进行工作。我们将毫无困难地反击它。现在我们正在发挥我们电台的作用。敌人阵营的分裂日益加深。反莫斯科的欧洲联合运动正在高涨。

对俄战争的新歌曲已经写好：阿纳克、蒂斯莱尔和科尔伯的联合作品，我将其综合在一起，并加以修改。待我加工完毕，它已面貌皆非。一支气势磅礴的歌曲。尼尔和诺贝特·舒尔策为其各谱写了一支曲子。这正是时候，因为我们打算将它作为第一批伟大的新闻公告发布时的伴奏曲。我将采用其中最好的歌曲。

批准费舍尔和瓦赫特尔的新宣传影片与德军最高司令部的小摩擦在继续。总是同样的事情：权力范围。此时，罗森伯格又加入进来。他早就将自己视为俄国沙皇。

如果我们倒下，那么，这就将作为这些争吵的结果。

在戈林斯特拉斯作简短视察，情况很好。工事已经成形。

在兰克的静谧中工作。天空落雨。凉爽的空气使人感到清新。可振作精神继续工作，欧洲联合阵线日益显现清楚的轮廓。丹麦、西班牙、葡萄牙等等，均成为该阵线的组成部分。美国报刊悲哀地说：“俄国没有朋友。”非常正确！

英国驻莫斯科记者宣称伦敦与莫斯科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军事合作。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件事情。

我写了一篇社论：《新政策》，在该文中，我解释了我们低调进行战争报道的原因。对公众作这样的解释此时极为必要。它的效果极好。

对俄战争的新歌曲由赫尔姆斯·尼尔和诺贝特·舒尔策分别谱上乐谱。两人都为我演奏了各自的作品。舒尔策的乐曲更好一些。我做了一点修改。它必须在今晨准备好，因为今天是发布公告的伟大日子。仅一天之内计有15万吨船只沉没。我飞机损失与英国的比率是1:36。由于这一原因，英国对德国很少采取空中行动。在马德里的英国大使馆前发生强大的示威活动。局势正在逐渐发生变化。

狄特里希博士从元首司令部打来电话：一切均好。元首处于最佳状态，对我们的工作非常高兴。现在沉默将被打破。里宾特洛甫也在那里，一直打算发牢骚。但是他一事无成。

马格达晚间来到兰克，我们可以聊上一个小时。

雨点降落下来。神圣的水流。我们将获得一个好收成。在各个方面。

1941年6月30日（星期一）

昨天：特别公告发布日。共计12个，我们于上午11点在电台开始广播。整个世界都在倾听。我们已获得整个制空权，已经占领格罗德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考那斯……。两支红军在比亚利斯托克以东被俘。没有逃走的机会。明斯克在我们手里。俄国人已经损失2233辆坦克和5107架飞机。这就是我们告诉公众的事情同时发布的公告简直太多了。结果，我可以感觉到人们在收听新闻时表现出的半麻木状态。其效果并非如我们预期的那样。收听者可以极其清楚地看出我们对新闻的控制。在他们看来，新闻积压得太厚了。我曾不时地警告过这一点，但徒劳无获。尽管如此，其效果还是巨大的。尤其是在海外。在美国，唯一的反应是普遍的震惊。我们又恢复到胜利的顶点军事局势：罗马尼亚战线未发生变化。俄国人向雅西的推进被击回。北方邻国军团正向利沃夫运动。敌人在优秀的指挥下进行了顽强的反击。大量的物资装备被缴获。俘虏行列几乎一望无际。比亚利斯托克附近的军队完全被包围。明斯克由装甲部队守卫。北方，俄国人正在撤退。整个战线再次发生变化。到目前为止，形势完全对我们有利。夜间未出现英国人的袭击。我们袭击了赫尔港。

我们现在正在启动三种针对俄国的秘密电台。意向：第一个，托洛斯基分子；第二个，分裂主义分子；第三个，民族主义分子。我们正在清除所有的障碍和使用我们在西线战役期间加以完善的技术手段进行工作。在官方广播电台，我们正在构筑一道坚强的反莫斯科战线，使用完全适合于布尔什维克心理的技术。俄国军事公报变得越来越蠢。它们一定是犹太人所起草的。浅薄、低能、头脑简单，就像《红旗》中的社论。我们对付它易如反掌。

大约5千万份发给红军的传单被印制、打包和送上飞机去投放。莫斯科正在没收无线电收音机，一个确凿无疑的迹象：我们的宣传正在发挥作用。但我们仍然不予理睬。许多人肯定将设法保存他们的收音机，而且，在这种动荡的时刻，谣言将确保每一条新闻报道像野火一样蔓延。莫斯科正在咒骂我们企图复活沙皇主义。我们要迅速地给这种谎言以迎头痛击。

危机正在美国上升。罗斯福落得个鸡飞蛋打。伦敦的敌方阵线也出现分裂的迹象。反布尔什维主义实在是根深蒂固。我们正在得益于我们早些时候的宣传。整个欧洲都在行动。5万名志愿者早已到西班牙报到以履行义务。这是一次十字军行动，他们正在向世界大声疾呼。我们对世界其他地方也进行了这方面宣传。但在国内这种宣传并非适用。如果加以区别的话，我们的军事态势正在被判断得过于乐观，甚至我们的敌人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我们德国军队能够获得难以置信的辉煌成就。我总是谨慎地将这些报道压下。

对俄战争的新歌准备就绪。舒尔策所作的音乐编排好于尼尔的音乐。所以我们选择了前者。阿纳克和蒂斯莱尔为原歌词的著作权争执不休。我强迫他们让步。下午2点30分，歌曲第一次在电台广播，在全国引起极大的热潮。人民在整个周日沉浸在激动的气氛之中。在几个小时内，我们成功地纠正了由于不明智的安排特别公告的发布而对整个士气造成的轻微损失，不满情绪被骄傲和激情所代替。报刊通过发表某些精心策划的社论也尽到了职责。一个愉快的周日，一个被胜利之光照亮的雨天。

我完成了有关新闻政策的文章。现在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为人们需要。

与马格达和巴特尔斯审查重建兰克的计划。马格达晚间离去。前往慕尼黑艺术大展购买一些照片，再到维也纳观看我们准备在那里使用的房子。然后她打算去看望住在奥塞的孩子们。如果我能同她一道前去，哪怕只一天的时间，我将多么高兴。但是此时没有时间度假。在柏林，令人难以喘息的生活节奏很难提供给我时间去呼吸新鲜空气。我必须像抢劫犯一样抢时间写下这几行文字。但这是我所寻求的生活方式，它是令人感到欣慰的。

晚上，观看新闻纪录片。有关东线的恢弘巨片。汇集了许多鼓舞人心的场面。但尚需我作大量的矫正和剪裁工作。经过加工，它将更加扣人心弦。

里加到了我们手里。卢茨克附近发生坦克大战。莫斯科军事公报已经降低了调门。

我们的新歌曲已使每个人感到欣喜异常。它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一直工作到深夜。但这早已成为我的乐趣。

1941年7月1日（星期二）

昨日：英国袭击汉堡、不来梅和基尔。此次获得某些成功。我们未对英国采取更大的行动。

东方战线：罗马尼亚边境没有军事行动。在匈牙利战线，敌人正在撤向其第二道防线。我们的摩托化军团已经占领敌人打算占领的位置。南方集团军群的一部推进到利沃夫。该城市被攻克。第二支军队插向奥斯特罗格，并越过戈伦河。俄国人拼死防御。一个俄国坦克师冲破我们的装甲部队防线。中央集团军群：一个装甲师已经穿过博布鲁伊斯克附近的别列津纳河。比亚利斯托克大锅已被一分为二和缩小。北方集团军群拿下了雅各布施塔特。迪纳堡西部发生某些抵抗行动。利巴瓦和米陶被攻占。

英国已向莫斯科建议，将俄国海军转移到大西洋。芬兰曼纳林军团准备发起进攻。迪特尔军团大规模进攻摩尔曼斯克。

俄国总的意图：可能撤至第聂伯河之后，占据基辅—维贴布斯克—普斯科夫一线。预计沿诺夫哥罗德—西韦尔茨克建立俄国集团军群支撑点，并据守基辅东北方向200公里远的杰斯纳河。

我南方集团军群由伦斯德指挥，中央集团军群由包克指挥，北方集团军群由李勃指挥。芬兰军队由曼纳林指挥，山地军团由迪特尔指挥。总的来说：情况进展顺利，尽管俄国人作了超乎我们意料的坚决抵抗。我们兵员和武器装备的损失微不足道。只有到现在，我们才能看到，进攻是多么必要。如果我们等待日久，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元首的直觉再次被证明是正确的

莫斯科正在极尽撒谎之能事。高校和教堂正在被纳入动员范围。布尔什维克已经把目光转向了神职人员。我们将以此给他们以响亮的耳光莫斯科对我们的公告加以否认，其论据根本站不住脚。伦敦似乎认为我们的胜利并非如此巨大莫斯科将我们军队说成是横冲直撞的醉鬼，捏造逃兵，让他们出现在俄国电台节目中，号召我们的士兵加入他们的队伍。极其愚蠢拙劣。我们的三个秘密广播电台现在已经启动，工作很好。我们又恢复到最佳状态。正如对西线的宣传攻势一样。而对东线的宣传攻势尤其令人满意。在这次攻势中，我们的广播人员所做的工作优于所有其他国家的工作（英国或美国）

对我们周日发布的12条特别公告进行的批评带有普遍性，即来自国内也来自国外。得到了证明！该行动是个彻底的失败。我们试图激发人们的热情。公众则窥见了在宣传战中发生的真情。这是一件坏事。我保证此事不再发生。我们为东线战役作的新歌受到普遍欢迎。

在西班牙，佛朗哥分子涌向了征兵办公室。一支意大利军团经元首批准将赴俄国参与军事行动。瑞典外交部长公开表示支持我们。特博文在挪威征集了一个志愿军团。欧洲正在开始行动。英国和美国的新闻媒介只能为两国与莫斯科的合作寻找理屈词穷的借口。敌方营垒的分裂在继续。

在我的要求下，元首对所有俄国作家和作曲家下达了一道禁令。目前尚未出现意外情况。我拒绝了为士兵创办一份宗教杂志的要求。德军最高司令部正迫切要求这种杂志。目前，士兵有更好的事情去做，而非阅读宗教宣传品。我向马丁解释了这一点，并趋势训导他说，基督教教义缺乏逻辑性。这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霍斯霍弗和其子已被逐出公众生活。他们两人对传播神秘谣言负有责任，并负疚于“赫斯事件”。然而，赫斯本人在国内外早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在柏林继续解决犹太人问题。我们仍有许多事情要做，许多问题需要密切关注。无论法律如何严厉，犹太人总是能够找到漏洞。这就需要保持敏锐的目光，不让他们侥幸逃脱。

我正在为布拉格物色一位负责生产的新头目，还有一位负责将被收归国有的私人企业的头目。有几个人的名字已被提出，但我还未及

审查，把这件事留给格特尔去做。

马丁发表了一个长篇报告，他在文中概括了东线整个军事局势。展示了所存在的巨大危险，尤其提到元首使欧洲和德国避免了这种危险。维希政权已和莫斯科断绝了关系。一件好事！但是，未占领区的报刊依然极其傲慢无礼。

整个下午在兰克工作。我总是将大量待处理的工作带回家。从这里走出，在森林的静寂之中，是处理那些问题的最好地方。每天我必须使我的办公桌保持清洁，以使我的头脑也保持清洁。

世界对我们的胜利作出的反应是巨大的。我们德国军队赢得了所有国家的最高赞誉。唯一的，也是最严重的批评是针对我们零打碎敲地发表报道的方法，我尽管与此无关，但仍首当其冲作为责备对象。这一点在来自于帝国宣传办公室的报告中表现得也很明显。

美国的公众舆论日益分化。胡佛和孤立主义者们正在进行反战宣传，宗教界也是如此。

类似明显的变化出现于伦敦。比弗布鲁克已被任命为供给部长。看来，丘吉尔已把他的眼中钉挪到了另一个窝儿。

我完成了有关新闻政策的社论。效果很好。

苏联现在每天发布两次军事公报；这些公报充斥谎言，而不包括军事消息，事实上不过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品。这即使对于路透社来说，也是太过分了。没人转载它们。我们对此嗤之以鼻。这些东西简直是浪费印刷的纸张。

晚间，新闻纪录片。对其尚需做大量工作，主要是剪裁和音乐。但此后它将优美流畅，堪称电影杰作。

新闻依然源源不断。今天完成

1941年7月2日（星期三）

昨天：东线战役：战斗继续。敌人抵抗加强；它正在作拼死防御。军队集中于罗马尼亚战线。匈牙利军队朝着（.....）方向运动。南方集团军群打退敌人的一次突围企图。中央：比亚利斯托克大锅现在一分为三。20个师被围。比亚利斯托克附近的敌人拼命企图突围。敌人遭受大规模死亡打击，仅少数人受伤和被俘。但一个红军团已经

成功的突围。北方：里加完全由我控制。俄国人似乎准备撤退至（.....）。包克已获得一些空间。这里的战斗是肮脏和邪恶的。

空军正在创造奇迹。1000架德国飞机正被用于支援地面陆军行动。德国与敌人飞机之比是9：220。莫乐德斯已经击落第82架。不幸的是，北方的天气已经恶化

总之，战斗非常激烈和艰苦。绝不像郊游那样轻松。红色政权已动员全民参战。加之，俄国人的桀骜不驯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的士兵已全力以赴。但是直到目前，一切仍按计划进行。局势并不严重，但却是棘手的，因此我们需要鼓起我们所有的勇气。

俄国人正在他们的公报中大肆吹嘘，声音之高，时间之早。我们正在进行强有力的回击。伦敦正在发布夸大其词的战斗报道。但是我们在以前对法兰西的战争中就已目睹这种伎俩。失败就将来临。在美国，谩骂谴责之声再次高涨。诺克斯已发表一个目空一切的演讲，要求立即参战。罗斯福显然想采取另一项措施试探公众的反应。

我们正在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尤其是三个秘密电台正在对准俄国发射电波。我们的长波发射电台也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总的来说，短波正在受到干扰。莫斯科正在被迫对我们的宣传采取强硬的抵制措施。布尔什维主义已经被迫进入防御状态。它们的宣传工具非常原始。就像卡尔·李卜克内西时代的陈旧设备。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问题

芬克要求从海牙调往东线。他不能再与施密特和赛斯-英夸特共事。外交部也在给他出难题。还有其他例外吗？我决不允许他从荷兰调走。现在，罗森伯格也要求启动他自己的宣传设备。格特尔正在采取适当的措施阻止这种行动。每个人都想搞宣传。他们对宣传知道得越少，却对此越着迷.....

.....我们与鲍曼合作很好。他正在以超过赫斯的决断力解决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他总是对我个人表现出极大忠诚。

发给地方官员一个严厉通知，禁止收听外国电台。这已再次成为必要。尤其是当我们自己的公告很长时间未被发布的时候。

博勒告知我有关外交部发生的事情。他已经6个月未见到里宾特洛甫了。情况特别。而且，他担忧元首可能将AO隶属于外交部。这是不

可能的。国家不能统治党。这将是对我党基本原则的打击。我将阻止此事。博勒在赫斯出走之后正在寻找一个保护人。我应在某种程度上将他置于我的羽翼之下。

天在下雨。气温转冷。我们必须增加一些热度。在7月，整个世界已经发疯了。但是必须对它加以容忍……。

……莱伊大声疾呼召开第7次会议。我们不久将宣布其提议。除此以外，他已再次成为一个幸福的父亲。

我们与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一道，对汪精卫领导下的南京政府给予承认。日本必须被赋予在中国更自由地处理事务的权力，以使其纳入我们的算盘之中。迄今为止，它已被捆住了手脚，而不能果断行事。

白天，英国袭击基尔，获得某些成功，但也遭受重大损失。夜间又对科隆进行一次中等规模的袭击。24架英国飞机被击落。但是他们恬不知耻，的确如此。狂呼乱叫于所谓对西欧的制空权。喋喋不休的吹牛大王。

作为回报，我们袭击加的夫和北非的托卜鲁克。那里的战斗依然呈消长态势。

《时代》已就苏联的形势发表了一篇极为悲观的文章。它可能一语中的。我们的地位正在不断改善。如果几天之内一切照此发展，我们将扭转最不利的局面。

伦敦正在声嘶力竭地宣扬某些和平建议，它宣称是冯·巴本提出的，事实上，这只能追溯到一次无关紧要的谈话。我们的否认将泼其一头冷水。

来自于伦敦的悲观情绪正在上升。莫斯科的局势被认为越来越无望。

类似的舆论来自于美国。对我们极为有利。

我们在一天之内击毁235架俄国飞机。一旦俄国丧失他们的空中力量，他们就要完蛋。

上帝赐福！

1941年7月3日（星期四）

昨天：双方均无空中行动。坏天气！4万吨船只被德国潜艇击沉。

东线局势再次呈较佳状态。比亚利斯托克附近的大锅已被封顶。20个师、10万人和无以计数的军事装备被俘获。加里西亚的坦克战以我方的胜利而结束。继续向东挺进。艰苦的战斗。但是，俄国正在逐渐衰弱。北方的局势是好的。21艘船只在利耶帕亚和温道被完好无损地缴获。在南方，战斗艰苦卓绝，目前尚无具体的成功消息。在罗马尼亚，战线稳定。莫斯科早已变得非常驯服。伦敦继续吹嘘即将到来的胜利，但是早已掺杂了悲观情绪。韦佛尔被调往了印度。拿破仑式的惩罚。一个对英国不抱希望的人。

我们的秘密广播台正在艰苦工作。大肆叫嚷斯大林做好计划准备逃离莫斯科。要求成立“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但是我禁止号召街头示威游行。如果游行不曾发生，我们将丧失脸面。官方电台现在已在广播。它们已稍微减缓了攻势。罗森伯格已不再找麻烦。他正将所有的宣传事务交由我们单独处理阿曼早就在忙于为占领区创办大报刊。

《民族观察》办在莫斯科；那将是件新鲜事。

对英国的宣传并未放松我们必须打掉他们对莫斯科寄予的最后希望。有关空战的宣传战尤其激烈。英国正在发布惊人的数字统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空军也可能做同样的事情。甚至我们的人民也并非过于认真的看待这些数字。

莫斯科企图进攻德国和中欧的计划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地被证实。元首在最后的时刻采取了行动。一个在我们的领导之下联合起来的欧洲对英国是一种诅咒。现在他们的口号是：“建立反对德国的欧洲！”英国和美国被他们称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不久我们就将对付这种谣传。

美国的舆论界仍在急剧分化。孤立主义者已采取强大攻势，罗斯福不得不讲述一些有关热爱和平的不痛不痒的话语。

法国和比利时正在接近饥饿的边缘。由于这个原因，那里的情绪极其混乱。假如苏联真的发动了进攻，布尔什维克传染病将能获得什么？简直不堪设想。感谢上帝，此时我们已取得各方面较好的收成。只要天气不在最后关头捉弄我们。

“炸弹流浪者”，即那些从遭受敌机轰炸威胁的地区逃出来的，在今年夏天露天而宿的男女懒散人员，正带来极大的麻烦。他们对公众士气造成毁灭性破坏，并损害了德国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美好名誉。我将为他们制定政策。如果轮到我，他们将被强迫去工作。

SD的报道反映出较好的士气和巨大的鼓舞，但也反映出极大的幻想情绪特别公告在星期天被间隔发布的方式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在占领区也是为此。这不是件好事，坚决不能再次发生。

与比伯拉赫讨论慕尼黑大展。我从照片中所看到的東西太一般化了。

与希特勒讨论有关新闻纪录片的计划伯斯在艺术工作方面表现得极为愚蠢，必须把他甩到一边。他擅长于驱使别人，但是没有决断力。

我对来自于占领区的新闻广播官员发表了演讲，主要内容是关于当面临包括外交部在内的其他部门提出权力要求时，我们的管理权限问题。然后又对整个广播系统的工作人员发表了演讲，是关于当前的任务问题。演讲获得极大成功。此次会见是为了在此关键时期对整个系统起到一种激励作用。

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这些事务总是突然出现，成为一个人工作的一部分，但往往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它们再次花费了我的时间，直到夜晚。

我们的空军又击沉一些较大的敌船。尤其在托卜鲁克海边。对亚历山大实施了大规模空中袭击对于英国人来说，局势非常糟糕，以致他们再次向犹太人许诺巴勒斯坦，完全无视阿拉伯人的存在。韦佛尔的解职引起巨大的轰动。由于苏卢姆战斗的失败而成为丘吉尔的替罪羊此事在美国产生深深的压抑感罗斯福完全陷入困境。林白和惠勒正以尖刻的语言对其大加抨击，并特别强调诺克斯的观点。出于策略原因，我们对这些未加报道。但是，在美国，知识分子的分化正在加深。英国前海运部长克罗斯发表了一个戏剧性的有关英国船只吨位损失的报告。敌方阵营的形势再次发生变化。

挪威军团的招募工作进展顺利特博文处理该事务非常带有艺术性。

苏联的乌克兰政府已从基辅搬到哈尔科夫这就是喧嚣的口号背后的残酷现实。又一特别公告在夜晚发布：到目前为止，在比亚利斯托克，计有16万人成为战俘，加之大量的军事装备被缴获。在这一点上，历史已做出了决定性审判。

摩尔达维亚的犹太人正向德国士兵射击。但是安东尼斯库正在解决局势问题。总的来说，他在此次战争中的表现是极为出色的。

深夜，与玛格达通电话。她仍在维也纳，此时正准备前往奥塞看望孩子。如与她同路我将是多么高兴。

很晚上床。窗外，月亮正在升起，俯视着雾霭笼罩的森林。

1941年7月4日（星期五）

昨日：英国对德国北部和西部实施严重的空中袭击。造成大量损失。在东方战线：对诺夫哥罗德的包围已完成。我们在那里期待一个巨大收获。但还不能提出可能的数字。整个战线的各个部分继续飞快地向前推进。北方的局势也是好的。但是俄国人正在进行艰苦奋战。我们正在通过合适的传单和电台广播进行新的尝试，以打垮他们的抵抗。我们将看看这能否成功。G·W·米勒在对摩尔曼斯克的战斗中严重负伤。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考虑到战争规模，我们的伤亡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微乎其微的。

中央战线的局势很好。敌人每况愈下。我禁止德国宣传部门对莫斯科给予特别强调我们必须防止把公众注意力固定在这个令人着迷的目标上南方战线的局势也是好的，罗马尼亚人在坚守阵地，抵抗敌人的打击。俄罗斯人已损失大量飞机。他们不再准备冒夜间袭击我东部城市的风险。目前，他们的主要盟友是斯拉夫人的桀骜不驯。但是总有一天，这也将被粉碎。

今天早些时候，斯大林发表了一个演讲。充满负疚感和深深的悲观情绪。该演讲说明了局势的严重性，号召粉碎我们的进攻，并警告提防敌人散布的谣言和制造的战争恐慌。他暗示了我们的工作。我从其他方面搜集了关于俄国的报道，即我们的电台广播正开始产生巨大效果。现在要全力促进这一工作的深入进行。我们对斯大林的演讲作出了十分不同的反应，依国内需要还是国外需要而定。就俄国而言，我们将它描述为崩溃的前兆。在这里，我们开始使用在西线战役中已

被检验的方式，即制造战争恐慌等等。这些方式的成功早已显而易见。俄国内部正开始分裂。其迹象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我们正在打击这一处暴露的伤口。特别是，我们必须反击斯大林的谴责，即我们企图复辟沙皇主义。在其他方面，我们已备有大量的有效论据，我们打算逐渐将它们派上用场。我们的秘密电台正在高效率地工作。

海外，尤其在美国，甚至在英国，他们认为莫斯科的局势极为昏暗他们相信他们已经看到一个历史上最大的毁灭性战争的初期阶段。

我们在前线的士兵现在完全相信这次战争的必要性。对于他们来说，布尔什维主义不再是一种危险。但是，他们对苏联在各处甚至在农村已经建立起来的巨大的共产党建筑物感到惊恐。所以，他们说，莱伊将来某时在我们国家也应这样干。好，那个时刻必将到来！

与古特尔一道处理日常工作。莱因哈特在帕绍作了一个接近叛国的演讲。我将告知元首此事。

斯蒂芬报告有关狄特里希的忧虑之事外交部再次严重插手新闻政策问题。但是我将在此领域妥善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讨论和处理许多电影和戏剧问题。

为对俄秘密电台广播起草和审查宣传稿件。目前，大量的工作正在进行。

我将许多待处理的工作带到兰克。

天气再次转好。既有益于收成也有益于战争。我们不能对有关英国皇家空军获得成功的夸大性宣传加以否认。因为大多数飞机袭击了伪装设施。英国人创造的数字荒谬之极。但是也许他们真的自信不疑。他们给了我们某种喘息的机会。

6月，763950吨船只被击沉，其中417450吨毁于德国空军之手。这肯定是一种致命打击。

伦敦出现巨大的忧虑情绪。韦佛尔事件仍然是世界新闻界重要的谈论焦点。丘吉尔的日子很不好过。

俄国人在比亚利斯托克的损失是惊人的被抓为战俘的16万人远远不如死伤的人数。正如美国报界所断言的，对于莫斯科来说，这是一个远远超过坦恩贝格的大灾难。在整个战线上，红军的抵抗似乎正在

逐渐崩溃。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体制上，布尔什维主义目前正在经历最大的危机。我们要竭尽全力恶化和加速这一进程。斯大林已经号召他的人民烧毁粮草和谷仓。我们的反应是完全公开地宣布，在它被打败之后，俄国不要期望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东西，我们将让它遭受饥饿。这有可能使一些头脑发热的人清醒。

近日来，潮水般的新闻丝毫未减少。新报告每半小时送达。一个疯狂和令人激动的时刻。

晚间，将新闻纪录片修改完毕一个真正具有轰动效应的巨片。从胶片、音乐和内容来看都令人震撼。现在我完全满意于此。然后，我在外边阳台上坐了约半个小时，并进入睡梦之中。

1941年7月5日（星期六）

昨日：军事形势继续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匈牙利人正在越过喀尔巴阡山。捷尔诺波尔被攻克。石油生产区几乎原封未动落入我们之手。杜布诺附近发生双方机械化部队的艰苦战斗。我们的装甲部队正在向比明斯克更远的地方推进。波罗的海国家的局势非常喜人。诺夫哥罗德的绞索正在勒紧。预计一个巨大的收获将出现在那里。我们德国空军正在被迫与恶劣的天气搏斗。90多架俄国飞机被击落。从罗加乔夫附近越过第聂伯河。带领我军穿过“斯大林防线”。按照我们的估计，莫斯科大约还乘下2000架飞机。但是布尔什维克分子继续做顽强和痛苦的抵抗。试图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列宁格勒，并正将各种军力投入战斗，而不考虑作战的损失。这样做只能对我们有利。如果现在有更多的军队与我们相碰，那么不久我们的地位将更加有利。

东线未发生空中袭击行动，但120架飞机袭击了西线，获得某些成功。时至今日，我们所担心的英国大规模的攻击行动尚未发生。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有这种企图就足够了。在科隆，士气稍有下降。长期缺乏睡眠的结果。我派遣科尔伯去那里解决问题。

我们散发的有关号召俄国人投降的传单在敌方产生巨大效果成建制的军队变成了战俘营。莫斯科下令凡是拣传单者格杀勿论。总的说来，我们的宣传似乎使敌营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心理。

我们正在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战役我们的秘密电台可谓施展骗术和诡计的典范。斯大林无以为乐。俄国的国内宣传多半用于反击我

们。这部举世闻名的，处于恐慌状态的布尔什维克宣传机器完全居于守势。现在我们的官方正式电台也在动作。它们在作客观如实报道，而秘密电台则对准对方的咽喉。效果极佳，在瓦解敌人士气方面功勋卓著。斯大林的演讲在英国和美国得到广泛赞许。相互勾结的证据。美国公众舆论的分化正在加深。罗斯福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联手已使其四面树敌。他做了一次演讲，其内容似乎完全是陈词滥调。既然他已与莫斯科同床，也就不必侈谈什么他愿为之献身的“四大自由”了。我们要以此作为打击他的武器。

伦敦事实上处于尴尬境地，试图证实与莫斯科的联盟的合理性。有关空战的数字欺骗仍在继续。但我们正给予有力回击。伦敦将逐渐回到现实中来，即对俄战争将带给我方极大的优势。我们应强化这种印象，而不拘泥于数字、日期或某些特殊目标。这是目前最佳选择方式。

周日特别公告的发布仍然面临公众的强烈批评。作为我，尽管总是反对那种过分扰人的方式，依然是只替罪羊。但我有宽阔的臂膀，任何重负都能放置我的肩头。

在新闻纪录片问题上尚存分歧元首期望原版带有更多的争议性资料而我则要求画面为自身做出说明和向观众解释他们所不理解的东西。我认为这样做更为有效，因为这样观众便看不到其中的艺术加工。但是元首对刚才的新闻纪录片感到非常高兴。

雷德尔请求同意发行一本有关纳尔维克海战的宗教书籍，并向我提出强烈的要求。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海军司令。但是海战的胜利并非由于祈祷者，而是由于德国潜艇和鱼雷。在此有争议的问题上，元首必须做出最后决定。

克雷默呈送一份有关加强农村文化工作的计划。东方战役结束后要令其返回。而目前，我们既无时间也无人力作此事情。

我将在7月中旬使“慕尼黑艺术大展”开幕。元首告知我为他准备演讲稿。我驱车前往兰克，立即开始工作。此时，这并非一件轻松的任务。窗外，大雨倾盆。天气使我对案头工作兴趣倍增，甚至激动不已。它最终得到圆满完成。

詹姆斯·罗斯福结束了他的旅行，为其父作了一个有关英国局势的极为悲观的描述。这引起巨大的轰动。总而言之，无论其宣传家如何大声鼓噪，英国都处于一种极为困难的境地。我们发表了一个有关英国在希腊战役中对德国海军船员施以残暴行径的声明，并告知他们我们将以牙还牙。我们将坐视伦敦作何反应。

玛格达在格伦德尔湖与孩子们在一起。我们通了电话，可爱的小东西们高兴异常。赫尔德在电话中吃吃地发笑。黑尔加和希尔德已写给我一封动人的信。我非常希望再次见到孩子。但我不能想像这种事情。这些天来，有多少父亲必须过这种没有孩子的生活。

一个灰暗、朦胧和阴郁的雨天。我们的军队正向斯摩棱斯克挺进。俄国人正在犯下大量骇人听闻的罪恶暴行。他们将为此作出偿还。

重庆政权已与我们断绝了关系。对于我们来说，中国是现在的南京。

世界正在改变模样。时间在飞逝。和平何时重返？在明斯克附近，2万名布尔什维克在击毙他们大部分政治委员后缴械投降。暴风雨的前奏？也许这场暴风雨早已开始。狄特里希深夜打来电话：元首要我们现在开始反布尔什维克大战。时候到了。让猎队开始行动！

干吧！

1941年7月6日（星期日）

昨日：所有战线的局势是好的。罗马尼亚安然无恙。中央部分的钳子正在夹紧。我们的装甲部队已转向北方。目前，莫斯科保持原地不动。它正在投入所有的后备力量。一支德国党卫师在芬兰边界的战斗中已显示出它的不足。曼纳林的指挥太不灵活了，他还不如敌人的指挥官。在其他地方，一切都在操作之中。德国空军战绩卓著。总而言之，我们的行动正在致力于实现各种宏伟的目标。这将经历漫长的时刻，无法详述每一件事。

100架飞机袭击了英国。成功地轰炸了伯明翰。英国对德国的西部实施了中等袭击。目前英国正利用白天攻击我占领区。在此过程中遭受了严重损失，对其中某些损失，他们也予以承认。然而，总的看来，他们正在空战上大做文章。但这在东线战役之后就将告终。

科隆的士气曾经低落，但现在早已恢复。那里的人民所急需的是夜间好好睡上一觉。蔬菜和马铃薯也普遍缺乏。柏林情况也是如此。我将在那个地区施加更大的压力。

作为权宜之计，我送给隆美尔一架满载物资的大型飞机，以款待军队。

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大战开始了。报刊、电台、电影和宣传。我方阵线：面纱已经揭开。在这里，莫斯科被暴露无遗。我们据有来自利沃夫的所有关于俄国暴行的资料，我已向那里派遣了20名记者和电台人员。那里发生的事情令人毛骨悚然。布尔什维主义是人类的灾难，是一种必须被消灭的瘟疫。我们感谢元首抓住了这一危险，并摧毁了它。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大战立即开始。所有的宣传手段正在被采用。几天内我们将看到国内外产生的结果。莫斯科正以极其愚蠢和原始的宣传方式进行反击不过是一种对英国散布的谎言的苍白无力的模仿甚至它的军事公报似乎也完全抄自英国。我们正在整个新闻战线向东方发动猛烈的进攻。连日来，陶贝特和他的人民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

SD的报道展示全国情绪高涨而紧张。星期日丧失的元气已被极大的恢复。我们的新闻纪录片受到人们交口称赞。它的确堪称一部艺术之作。元首对此相当满意。他邀请我到司令部拜访他，并说他要和我讨论大量问题。我将于周二飞抵那里。

“炸弹流浪者”继续令我忧心如焚。此时，埃塞尔也以他作为旅游部门负责人的资格对他们进行袒护。然而，我则开始挣破羁绊。我告之格特，与盖世太保协商采取适当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寄生虫正在严重损害我方士气。遗憾的是对这些妇女流浪者尚未采取强迫劳动的措施。

与格特讨论预算问题克罗西格克仍然不允许我们花钱雇用一部分工作人员。但不久我们就足以自主行事。

兰克。天气稍有变化。我修改我的慕尼黑演讲稿，它已产生极好效果，并口述一篇有力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章。我们正在逐渐收复这里无比可爱和熟悉的领土。该文也产生极好效果。德国整个报界在

下午的版面上开始了对莫斯科的大规模宣传攻势这一行动对外国的民众来说也妙不可言，此时他们完全被这一战役的魅力惊呆了。

法国出现动乱的迹象。他们似乎认为我们不再有充足的军队投到西线。他们将为此遭到当头棒喝。维希政权在叙利亚的处境极为严重。如果萨洛尼卡的增援部队不能及时到达，法国将在战斗中失败。

莫斯科的军事公报继续大言不惭地掩盖布尔什维克的失败和溃退。局势恶化的证明。《时代》发表了一篇有关欧洲新秩序的文章，其目的可能为了削弱我们号召欧洲团结的力量。但我们不会让他们侥幸得逞。艾登发表了一个演讲。在演讲中，他拒绝了与我们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但是我们并未提及此类讲话。然而，总有一天，他们将来找我们。等着瞧吧。

土耳其总理发表了一个演讲，在我们看来，该演讲的态度非常积极。似乎那里形势低落的问题有了解决的保证。

另外，一切都在动荡不定。

巨大的军事进展指日可待。

也许，未来的一周将看到决定性的变化。

我们的士兵将尽其所能。

我们必须行动神速，东线战役绝不能拖宕日久。但是元首将为此做出谋划。

1941年7月7日（星期一）

昨日：东线局势是好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取得了进展。俄国人正在对前线进行大规模增援。这是我们期待的一桩好事。我们不必将他们深深驱入内地。5.3万名布尔什维克在明斯克附近开了小差。我们在那里的收获是无法计数的。红军正在各处拼命抵抗。但是在莫斯科。他们逐渐认识到军事局势的严重性。俄国军事公报证实了这一点。它所涉及的字眼全是撤退。

英国对明斯特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其他城市进行了严重空袭，获得某些成功。他们越发厚颜无耻，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空袭。试图以此解除莫斯科的压力他们甚至振振有词地吹嘘要对西欧发动侵略。

对此我们不予拒绝。让他们来吧。显然，他们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延缓他们的末日。但是我们期待那个时刻不会耽搁日久。

3. 3万吨船只被德潜艇击沉。这已达到最好时期。

我们所有的广播电台正在给予莫斯科强有力的打击。秘密电台正在产生巨大效果。给布尔什维克带来了极大麻烦。我们正在对焚烧谷物的行径发出警告，并频繁地使用相同的字眼，因此这给人们造成了一个深刻印象

我们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大战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开局所有的新闻宣传媒介都在高效运转。我下令此战役要继续保持和加强。其目的不仅是启发国内人民，而且要带动欧洲与我们同路，并加深美国甚至英国的公众舆论中的裂痕。在这一方面，我们早已获得部分成功。我正在组织一个由记者和党的发言人参加的，前往利沃夫和前苏联领土的大规模旅行。我们必须趁热打铁。我的文章已发表在《民族观察》，效果极佳

埃塞和科尔现在终于对“炸弹流浪者”采取了某些行动。我的抗议并非无效。从现在起，将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

柏林和威廉普拉策的天气再次出现热浪。该城市在周日沉浸在欢乐之中。我午后驱车前往兰克。

广播电台的几位先生来拜访我：格拉斯麦尔、狄韦格、温克尔凯珀、瓦赫特尔和施图登科沃斯奇。我们可以讨论一系列问题，并聊一点儿过去和将来的事情。

新闻纪录片晚间送来画面宏伟，但我仍要对其进行大量加工。这次的内容和剪辑极为粗糙。但我们要把它改好。

俄国人正在制造弥天大谎。我们不可能随时加以否认。尤其是他们正在大肆渲染什么德国人的巨大损失——70万人。这是在我们发动宣传攻势期间他们编造的老掉牙的故事。然而，归根结底，是我们据有30万战俘。莫斯科的情绪极为低落。我们要发扬蹈厉，使其局势更加恶化

在伦敦，他们正在幻想一次侵略行动。让他们来吧。

一个如此漫长的日子。我极为疲倦

1941年7月8日（星期二）

昨日：所有战线的局势极为有利。辉煌的战绩。南方战线发生极为艰苦的战斗。道路几乎不通。切尔诺夫策被攻克。军事行动在不断变化。敌方未再出现军事行动命令。战俘们说，他们由于惧怕被枪决而拒绝投降。我方战线的士气极佳。士兵现在已认识到此次战役是必要的。中央战线的局势继续于我极为有利。芬兰方面极为困难。芬兰人不适合攻击行动。尽管供给缺乏，贝柴摩仍被稳固地守住。东线未发生空中袭击行动。证明红军的空中力量已丧失攻击能力。我们的供给线完全畅通无阻。

英国再次对德国西部进行严重空袭。获得某些成功。我们对英国进行中等空袭。伦敦正在大肆喧嚣所谓“制空权”。我们给予了简单驳斥。由于安全的原因，我们遗憾地不能透露详情。

布尔什维克正在以所谓德军犯下弥天大罪的故事对我们的宣传战进行反击，这些故事自然得到了伦敦热切的支持。面对这种反击，我们要继续发动攻势揭露布尔什维主义，我们的口号在海外被一再重播。

俄国人正在用德国伞兵来吓唬他们的孩子我们正在加深这些印象，发表了我们自己的故事，并成功地引起更加普遍的恐慌。按照无可怀疑的材料，莫斯科的情况看来极为严峻。我们不能坐待红色统治者倒台。1933年我们在这里获得成功，这次我们还将成功。因为目前我们所攻占的领土均不是俄国本土，因此世界舆论已出现左右摇摆现象。我们必须通过具体的胜利来证实我们自己。我们利用传单进行的反苏宣传正在被进一步加强。“投降！”就是我们的口号。我已令人设计一个短小精悍的标语用于占领区。施韦策尝试进行此项设计，但很不适用。我们整个宣传战线正处于攻势，而莫斯科被迫处于守势。这已经取得了一半成功。我们正在竭尽全力以确保不出现复杂的问题。

敌人在我占领区已经将“V”（胜利）变成他们的宣传符号。干脆，我将这一符号为我所用。现在我们正在使用我们自己的“v”，并宣布它意味着德国的胜利。问题解决了！我曾对该问题冥思苦想，但我做梦也没想到答案如此简单。在其他方面，占领区的局势依然变幻莫测。我们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战斗已使我们获得了许多朋友。但是饥

饿的影响力是极为巨大的。甚至在巴尔干，正如夏姆堡亲王在结束那里的旅行之后发表的报告所云，那里出现了真正的饥饿。尤其是在希腊。在意大利，报怨之声不绝于耳。墨索里尼没有采取足够的强硬政策。在罗马尼亚，对我们的支持也稍有下降。无论我看到什么地方，都令人忧心忡忡。

在柏林，粮食供应也在恶化。蔬菜和马铃薯的供应停滞。但是，据估计，到下周末情况会有好转。

参观戈林斯特拉斯。工事建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不久就将竣工。天气灼热。到兰克工作。

对电视问题提出某些设想。在这一领域，邮政局有很大的权力。将来它必须放弃这种权力有关节目编制的所有决策权必须归于我的部门。电视在战争结束后将有一个广阔的前景。也许它将完全取代电影。

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大战在继续。中立的报纸正在起配合作用。利沃夫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主要的论据。俄国人在他们针对我们的暴行宣传中正在失去理智，其目的是转移人民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我们的报纸和广播电台工作非常出色。美国的舆论仍在分化。没有人对我们将在俄国取得胜利再提出怀疑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公报充斥着该党的标语口号

斯摩棱斯克遭到两次轰炸。我们正在一步步接近莫斯科。

英国在海峡上空又损失19架飞机。夜间8架。在最近3天中共计83架，而我们是9架。他们现在已承认其中某些损失。为开辟“第二战场”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正在使他们付出昂贵代价。这一侵略行动将带来什么变化？

在美国，所谈论的话题是和平。但完全是空洞的闲聊。卡达希在猛烈抨击德国的烟幕后面，掩盖着他对罗斯福的攻击。这一举动对我们来说弊大于利？过于深奥的宣传根本不是宣传。

就这一次来说，某人应该告诉美国人民事情的真相。

罗斯福已命令美国军队占领了冰岛。以取代英国军队。并为驶往英国的船只提供适当的保护。他就此问题向国会作了一次无耻的演

讲。他企图向我们挑衅。但他不会成功

晚间做新闻纪录片的修改工作。大量令人痛苦的镜头展示了布尔什维克在利沃夫犯下的暴行。一部震撼人心的真实影片。元首打电话对我说这是迄今我们做的最好的一部新闻片。我欣喜若狂。

今天，我飞往司令部与元首在一起。

九、死心塌地

1943年2月2日，德国第六军团在斯大林格勒投降，德国为此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国丧。电台广播中的节目预告由低沉的鼓声引入。各种报纸也印上了沉重的黑框讣告。

这是战争的转折点，法西斯自此开始了走向失败的日子，开始了恐怖的全面战争。

形势的进一步逆转，希特勒的处境更形内外交困，犹如一个狂徒站在面临深谷的悬崖上，时刻都有跌下去摔得粉身碎骨的可能。在这样的关头，戈培尔则跟希特勒跟得更紧了，表现得更加死心塌地，尽管纳粹集团有些人却已经醒悟并密谋努力刺杀希特勒。在这些事变中，戈培尔怙恶不悛地站在希特勒一边，与正义的德国人民为敌。

当时一些反纳粹的密谋分子认为，要使德国取得和平，从而使德国有希望体面地生存下去，就必须用谋杀的办法搞掉希特勒，同时消灭国家社会主义。他们开始积极准备起来，企图在希特勒把德国投入毁灭的深渊之前，采取谋杀这个纳粹独裁者和推翻他的政权的最后尝试。1943年，密谋分子进行了不下六次暗杀希特勒的尝试，其中有一次，他们在希特勒乘飞机巡视苏德战场后方的时候，把一颗定时炸弹放在他的座机里，只是因为这颗炸弹没有爆炸，密谋才告失败。

现在，当决定命运的1944年夏季快要来临的时候，密谋分子认识到，由于红军迫近德国边境，英美军队也已部署好大规模渡海进攻，而德国在意大利对亚历山大率领下的盟军的抵抗正在瓦解，他们必须赶快除掉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才能取得某种议和，以免德国被占领和消灭。

但是要接近希特勒十分困难。希特勒的大本营，是个警卫森严的地方。它隐蔽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附近的一处密林里，这是童话中妖魔和巫婆出没的地方，取名狼穴。希特勒及其军事参谋班子设在森林的中央，方圆几英里内绝无人迹。这里是军事要地，岗哨林立，进入“狼穴”要经过多道岗卡。

快到1944年6月底时，密谋分子交上了一个好运。施道芬堡被提升为上校，而且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补充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职位不但使他可以用弗洛姆的名义给国内驻防军发布命令，而且使他可以直接地和经常地见到希特勒。事实也确是如此，希特勒每星期总有两三次要召令国内驻防军司令或其代表到大本营去，要给在苏联伤亡惨重的师团补充兵员。施道芬堡想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放置炸弹。

施道芬堡是机智多谋的军官，1907年他出生于德国南部一个著名的世家。他的母亲是女伯爵，他的父亲曾经做过伍尔登堡末代国王的枢密大臣，外祖父则是抵抗拿破仑战争中的英雄格奈斯瑙。他虽然像许多同一阶级出身的人一样，思想深处是保皇派，但并不反对国家社会主义。1938年的排犹行动，使他第一次对希特勒产生了怀疑。随着希特勒把德国越来越引向灾难，他的怀疑、仇恨与日俱增。施道芬堡现在成了密谋集团的中心人物，成功的唯一希望也完全在他身上。因为在密谋分子中，只有他能够进入警卫森严的元首大本营。由于弗洛姆还没有完全争取过来，所以在杀掉希特勒之后，指挥军队占领柏林，也是施道芬堡作为补充军参谋长的任务。他要同一天里，在相距两三百英里的两个地方——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或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和柏林——实现这两个目标。在第一个和第二个行动之间，他还必须花两三小时，乘飞机回首都，而他在飞机上的这段时间里，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指望他在柏林的同伙已经放手执行他的预定计划。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在柏林，他们手上的军队太少，人数不及党卫队。在城内和城外四周还有为数不少的空军防空部队。除非国内补充军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否则，即使希特勒死了，这些部队将继续忠于戈林。他们的高射炮可以当大炮用，来对付补充军。鉴于党卫队和空军部队的实力，施道芬堡十分重视控制首都的行动时间。最初两小时是最关键的时刻。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陆军部队必须夺占全国广播总局和两个本市电台、电报局、电话局、总理府、政府各部和党卫队总部。戈培尔是唯一很少离开柏林的纳粹显要人物。他和党卫队军官必须加以逮捕。在这段时间里，希特勒一死，他在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必须立即同德国其他地方隔绝，使得不论是戈林或是希姆莱，或是凯特尔、约德

尔这样的纳粹将领，都不能接管政府或试图纠集警察或军队来支持纳粹政权的继续存在。

只有在政变发动后两小时内完成这一切事情之后，才能通过广播、电话和电报，把先期拟好的公报发给其他城市的国内补充军指挥官，在前线和占领区指挥军队的最高级将领，宣布希特勒已死，一个新的反纳粹政府已在柏林成立。在24小时内，起义就应该结束，新政府巩固地建立起来。否则，那些摇摆不定的将军们就可能会反悔。戈林和希姆莱可能把他们争取过去，那么会发生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前线就会崩溃，密谋分子希望防止的混乱和崩溃就不可避免。

1944年7月20日早晨，施道芬堡上校在伦格斯道机场登机飞向腊斯登堡。在他那鼓鼓的皮包里，装着有关新的“人民步兵师”的文件他将根据这些文件于下午一时在“狼穴”向希特勒作报告。在这些文件中间，用一件衬衣裹着的是一颗定时炸弹。一切在按计划地进行。

中午十二点四十二分，炸弹爆炸了。

施道芬堡看到了当时发生的情况。他正和长驻元首大本营的通讯处长、密谋分子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离希特勒所在的办公室有两百码远的地方。他焦急地先看看手表，他看到会议室在轰然一声中烟火大作，人体从窗户里被抛出来，碎片飞到空中。他以为毫无疑问，会议室里每一个人都已经被炸死或命在旦夕了。他匆忙地同菲尔基贝尔告别。现在暗杀已经成功，菲尔基贝尔要立即通知柏林的密谋分子，然后切断通讯线路，直到首都的密谋分子接管了柏林，并且宣布新政府的成立。

施道芬堡在下午三点三刻在柏林伦格斯道夫机场降落。他兴高采烈地奔向机场最近处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以便确切了解在这决定命运的三小时里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当他一听说什么也没有完成时，不禁大惊失色。原来一点刚过，菲尔基贝尔的电话就来了，但是因为线路不好，他们没听清楚，究竟希特勒被炸死了没有。因此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大家都在等待施道芬堡回来在新政府里将分别担任国家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贝克将军和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本来预定在得讯之后要立即开始发出准备好的文告和命令，并且通过广播宣告德国新时代的开始的。但此时他们还没有露面。

施道芬堡在伦格斯道夫机场上给奥尔布里希特打电话时表示肯定相信希特勒已被炸死了。但事实与此相反，希特勒并没有死。勃兰特上校把施道芬堡放在靠近希特勒身下的皮包无意识地推到结实的橡木桌子底座外面，这一无意识的行动救了希特勒一命。他只是头发被烧焦，两腿灼伤，右臂扭伤后暂时不能动作，耳膜震坏，脊背也被落下来的一根椽子划破了。

下午四点刚过，密谋分子终于在施道芬堡回来之后活跃起来。施道芬堡的好友，奥尔布里希特的参谋长基尔海姆上校取来“代尔克里”命令，并用电传打字机和电话发出这些命令。第一道命令要求柏林城内和四郊的部队立即戒备。第二道命令由维茨勒本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名义签署，由冯·施道芬堡上校副署，宣布元首已经死亡，维茨勒本“把行政权力转移”给国内的各军区司令和前线的战斗部队司令。

柏林卫戍司令冯·哈斯将军打电话给驻在邓伯立兹的精锐的大德意志警卫营营长，命令他下令全营戒备，并立即到菩提树下大街的司令部报到。警卫营营长是新近任命的奥托·雷麦少校。他虽然不是密谋分子，但他是不问政治的军官，只知服从顶头上司的命令。他最近还得到过希特勒亲手颁发的橡叶骑士十字勋章。

雷麦少校遵命下令全营戒备，并且立即进城来接受哈斯的具体指示。将军告诉他，希特勒遇刺，党卫队企图发动政变。命令他封锁威廉街的政府各部以及设在附近的恩哈特车站的党卫队保安处总部。下午五点半钟，雷麦已经完成了任务，回来向哈斯将军报告，等待新的任务。

不巧的是，一个名叫汉斯·哈根博士的中尉，是雷麦的警卫营的国社党指导员，他也在宣传部的戈培尔博士手下担任工作。这时他实际上被宣传部派驻在拜罗伊特，协助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写一本名叫《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史》的书。这天他来到柏林，在去邓伯立兹途中，他确信自己从一辆驶过的陆军汽车里看到了身着全副军装的勃劳希契元帅。他立刻想到，这些老将军们一定在干什么。

叛国”的勾当。勃劳希契很久以前就被希特勒一脚踢出了他的司令部。在雷麦少校接到占领威廉街的命令的时候，哈根正同雷麦谈着话。这个命令引起了他的怀疑，他立即赶到宣传部去向戈培尔报信。

戈培尔刚接到希特勒打来的第一个电话。希特勒告诉他发生了谋刺的事情，命令他尽快地把谋刺失败的消息在电台上广播。不一会，哈根给他带来了柏林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最初消息。戈培尔起初还有点不信，他认为哈根有点无事生非。哈根请戈培尔亲自看看窗外发生的事情。他见到的情景比哈根那些歇斯底里的话更有说服力，陆军部队正在宣传部四周围布哨。他要哈根通知雷麦立刻来见他。哈根照办了。这样，雷麦的手上既有抓戈培尔的命令，又有戈培尔邀请他去会见的通知。雷麦带了二十个人走进宣传部。雷麦嘱咐他们，如果过了几分钟他不出来，他们就到部长办公室去接他。然后他同副官握着手枪，走进办公室，去逮捕当天在柏林的最重要的纳粹官员戈培尔。

戈培尔的宣传部里一片混乱，施佩尔正好也在那里。戈培尔正站在他的办公桌旁汗流满面地打电话。戈培尔知道，波茨坦和其他邦的驻地部队正在向首都挺进，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政变已经开始。他最后的希望是，但愿广播电台还没有被叛乱分子占领。

雷麦一进门，戈培尔就开门见山地要他好好想想他对希特勒的效忠宣誓。

“但是元首现在已经死了。”雷麦说。

“元首还健在。”戈培尔反驳说，“几分钟之前我还和他通过电话。”

雷麦又说，只有他能亲自听到元首的说话声，他才会相信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

当时在场的施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雷麦感到庆幸，但仍似信非信地瞧着我们发愣这时戈培尔要雷麦注意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注意业已落在他肩上的历史重任。戈培尔说，命运很少为一个人提供这样的良机，利用它或者抛开它，现在就看他自己了。这时见到雷麦的人，见到他听了这番话后所发生的变化的人，都知道戈培尔已经获胜。但是戈培尔这时又使出了他的绝招，他说：‘我现在要同元首通话，您也可以在电话上同他谈谈。元首会给您下达命令的，这样不就撤消了您的将军下的命令了吗？’戈培尔用稍带讽刺的口吻结束了他的话。然后他叫通了拉斯滕堡的电话。宣传部的电话总机有一条直通元首大本营的专线：不一会儿，希特勒接了电话。戈培尔把情况稍作

介绍后，就把听筒交给了这位少校。少校听得出他的声音吗？最高统帅问道。在德国，人们千百次在戈培尔控制的无线电里听到过他的讲话，谁听不出他那嘶哑的声音呢？而且，在几星期之前受勋的时候，他还直接听到过希特勒的讲话。少校在电话里听到希特勒的声音立刻立正。我们只听他不断重复说：

是，我的元首……是！’随后，戈培尔接过听筒，希特勒把谈话的结果告诉了他；这位少校已经受命接替哈泽，执行将在柏林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同时，要他服从戈培尔的一切指示。唯一一条幸而保全的电话线，导致了起事的最终失败戈培尔继而采取反措施，命令警卫营全体人员到他的住宅的花园集结待命。”雷麦少校当即被提升为上校。对雷麦来说，这就够了。他从威廉街撤回全营部队，占领了菩提树下大街的卫戍司令部，派出巡逻队去阻挡任何其他可能正向柏林进发的部队，自己则出发侦查密谋集团的总部所在地，以便把首犯一网打尽。

下午六点半钟刚过，全欧洲都能听到的发报力很强的德意志广播电台播送了一则简短的公告，宣布有人引刺希特勒，但已失败。戈培尔在等待雷麦的时候，已把公告的内容用电话通知了广播电台。七点差一刻，施道芬堡用电传打字机给陆军司令官们发出了一个通报，告诉他们，广播的公告是假的，希特勒已经死了。但是德意志广播电台播送的公告对政变分子造成的损失是怎么也补救不了的。在不少地方的司令官们本来已经着手逮捕党卫队和纳粹党的首领，现在又开始缩回去了。下午八点二十分，凯特尔设法通过陆军电传打字机，给陆军各部队的司令部发出一个元首大本营的通告，宣布希姆莱已被任命为补充军总司令，“只许服从他和我本人所发的命令。”凯特尔又加上一句：“由弗洛姆、维茨勒本和霍普纳所发的任何命令均属无效”

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在快到八点钟时才出现。他似乎立即发觉，政变已经失败了。他对贝克和施道芬堡大发脾气，说他们把事情全都搞糟了。在被审讯时，他对法官说，当他听说连广播电台都未占领时，他已清楚看出，起事没有得手。在德意志第三帝国十一年半的时间中，这仅有的一次反希特勒严重叛乱，在十一个半小时内就被平息了。希姆莱到达戈培尔的寓所时已是后半夜了。尽管没有人要求他谈，他自动详细地说明了他不到出事地点来的理由。希姆莱没有立即

执行希特勒在下午五点钟发出的要他返回柏林的命令。最初，他呆在自己的司令部里。到了晚上，他才乘飞机到柏林，在柏林郊外一个偏僻的机场着陆。他说，对付暴乱分子，历来有一条可靠而正确的法则：必须离开暴乱中心，从外面采取反措施。这就是他所采用的策略

戈培尔似乎接受这种说法。他津津有味地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详细地向希姆莱讲了一番，说他如何如何独挽狂澜，控制了局势“他们要是没有那么蠢就好了！他们有许多机会。真是笨蛋！真是幼稚！当时我想，要是我，我会怎么干呢？他们为什么不占领广播电台，广播最荒唐的谣言呢？他们在我的门前布了岗，但是他们让我安详地同元首通电话，动员一切力量！他们没有切断我的电话线。他们掌握这么多的王牌，全白白扔了——真是没有经验哪！”

戈培尔继续说，这些军人，过于信赖传统的服从观念，根据这种观念，以为下级官兵理所当然地会执行每一项命令。单是这一点就注定暴乱要失败。因为他们忘记了，近几年来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已经教会德国人从政治上去思考问题了。“现在简直不再可能使他们像傀儡一样服从某个将军集团的命令了”。

希姆莱的临时总部设在戈培尔的宣传部里宣传部现在已由雷麦上校的警卫营的一支部队保卫着。希姆莱打电话给希特勒，报告叛乱已经平定。在东普鲁士，一辆广播车正向腊斯登堡疾驰，以便元首发表预告已久的广播演说。德意志广播电台从下午九点起，每隔几分钟就预告一次元首即将发表广播演说。快到深夜一点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的沙哑的声音在夜空中响起：

“我的德国同志们！

我今天对你们讲话，第一是为了使你们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安然无恙第二是为了使你们了解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罪行。

由一些野心勃勃的、不负责任的同时又是愚蠢无知的军官组成的一个很小的集团，合谋杀害我，以及与我一起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领。

施道芬堡伯爵上校放置的炸弹在离我右边两米的地方爆炸。它使我的许多真正的、忠贞的合作者受了重伤，其中一人已经去世。我本

人除了一些很轻微的碰伤、擦伤和烧伤之外，安然无恙。我把这看作是上天降大任于我的证明……

这些篡夺者的圈子是很小的。它同德国武装部队，特别是同德国人民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个犯罪分子的匪帮。这个匪帮将加以无情消灭。因此，我现在命令，任何军事当局……都不得服从这群篡夺者的命令。我同时命令，人人都有义务逮捕任何散发或持有他们命令的人，如果遇到抵抗，可当场格杀勿论……

这一次，我们将以国家社会党人常用的方法来对他们实行清算。”

希特勒这一次没有失信，他说到做到。

元首的广播讲话还未开始。在巴黎，党卫队头目已全被抓获；在维也纳和布拉格，密谋集团的余党也在活动；在班德勒街，非叛乱军官起先静观了一天，当他们嗅到哪一方将会胜利后，也拿起了武器。

其中8人，拿着冲锋枪和手榴弹闯进了奥尔布里希特的办公室这位将军企图阻挡，这时施道芬堡走进房间，这些军官立即调转枪口向他打出一排子弹

施道芬堡受了伤，急忙退到旁边一间房间。后来，他，贝克、奥尔布里希特和其他密谋分子一起被拉到已被反政变分子救出的弗罗姆上将面前

“诸位先生，”这位后备军司令说，其实他还不知道他已被凯特尔解职，其职务已由党卫队全国领袖代替，“现在，我要以你们今天下午对待我的办法来对待你们”

他命令他们放下武器。

“我是你从前的上级，”贝克上将答道，“你不能这样要求我。”这位原来为抗议希特勒而辞职的前总参谋长伸手去摸手枪。

弗罗姆看到贝克把枪口指向自己，于是说：“行动吧！”

这位辞职的上将扣动扳机，但子弹只擦伤了他的头皮。

“请给这位老先生帮帮忙。”弗罗姆命令两名解救他的军官。但是他们拒绝执行命令。贝克倒在椅子上，呻吟着，流着血。这时，弗罗姆上将自封的临时军事法庭庭长的身份对这些密谋分子说，你们可以给家属写一封简短的诀别信

弗罗姆去自己的办公室，不到5分钟他又回来宣布他的判决：

一个由我组建的临时军事法庭现在以元首的名义宣布判决判处总参谋部的冯·默茨上校、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他指了指施道芬堡，“还有这个我不愿意再提他名字的上校和冯·哈夫滕中尉死刑。”

施道芬堡对企图以此保全自己的弗罗姆极为愤恨，他表示愿一人承担全部责任，说，所有其他人只是作为他的士兵执行他的命令而已。弗罗姆暗示了一下房间，被判刑者捆绑着一个接一个默默地从他身旁走过。在此期间，贝克第二次开枪自杀，但又未击中，一名上士把他拖到走廊上，在他颈上加了一枪

处决是在班德勒街的院子里进行的。奥尔布里希特第一个死。施道芬堡排在第二，但是枪响时他的副官冯·哈夫滕上前挡住了子弹。零点33分，默茨也被按军法处决。身材魁梧的弗罗姆上将站在班德勒街大楼的阴影之中。他作了一个简短而有力的讲话，他说：

感谢天意拯救了元首的宝贵生命。”三呼“胜利万岁”后，他离开了这个凄楚的现场，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拟了一封电报交给班德勒街的通讯中心，电报说：“不负责任的将军们的叛乱已被敕平，全部首领已遭枪决。”

弗罗姆接着去戈培尔处，戈培尔将他逮捕。他对自己同事的态度并未给他带来什么优待，1945年3月他也被枪决。

在死者被运往舍内贝格的马特海姆教堂公墓安葬时，时钟正敲午夜一点。广播电台传出了希特勒的声音。

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来自11个机构的四百名国家秘密警察和刑事警察组成了一个“七月二十日事件特别委员会”，来无情地清洗各军参谋部。第一批受害者中无一生还。施道芬堡及其朋友的尸体，根据希姆莱的命令被火化，骨灰被胡乱撒到农田里。戈林甚至建议把骨灰撒在臭水沟里，因为农田对他们来说太干净了。

大部分害怕遭到死亡耻辱的人，虽然有同纳粹制度打交道的经验，但这次却无法预料等待他们的是何等样的命运。直到后来他们才认识到，还不如当初也被按军法处决为好。

“圣巴托罗缪之夜”又开始了。逮捕的浪潮此起彼伏。

迫害者们根据偶然发现的军事谍报局的文件，拘留了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和奥斯特少将。在巴黎，那些刚刚逮捕了党卫队首领的军官们在拉斐尔饭店惊悉，柏林暴动已告失败。德国驻法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自己反而落入了他为希特勒的打手们设置的圈套。在这一危急关头，军官们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应急措施。他们和两名被捕要人，党卫队的高级军官和警察首领卡尔·奥贝格和党卫队保安处头目赫尔穆特·克诺亨博士谈判。

两人被带出监狱，调停人奥托·阿贝茨大使打断一开始的交锋说：“在柏林，一切都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这里是法国。诺曼底战役正在激烈进行，这里的所有德国人必须精诚团结。”于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抓人的和被抓的达成了协议，联合反对希姆莱和国家中央保安局。所以巴黎密谋分子的处境相比之下要好一些。

当然，冯·克卢格陆军元帅后来罢免了施蒂尔普纳格尔的职务，并命令他去柏林汇报情况。途中，他去看了凡尔登北部的马斯河古战场，他让司机开车先走，自己企图开枪自杀，但未打准，动手术后被捕，后被绞刑处决。看风使舵的克卢格在回德国途中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服了氰化钾，但是在给希特勒的信中仍然表示效忠于希特勒。这是一个介于可笑和可怕、屈服和狂妄之间的德国陆军元帅。

只有少数人知道，由于自己参与了这一密谋或者知道这密谋的内情终将被送交荣誉法庭，被判刑乃至枪决，企图隐藏起来。

他们希望敌手们也会遵守荣誉的传统。这样，他们在惨败后再次低估了纳粹运动。这个政权不仅要他们死，尤其要他们惨死并对他们的家属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被捕的家属中，年龄最小的是格德勒的孙子，还是个哺乳婴儿；年龄最大的是施道芬堡的堂伯，85岁。

事到如今，在密谋分子当中还有人抱有天真的想法，如弗尔吉贝尔将军。他是个主要密谋分子，在暗杀事件过去后几分钟还曾看见过幸存的希特勒。在七月二十日的混乱中，他（那时还未受到怀疑），曾多次出现在希特勒身旁。他知道，他的参与可能很快就会被发现，本来完全可以在施道芬堡行刺失败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枪杀希特勒，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却准备像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那样，以宿命

论的方式去承担后果。当天下午，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命令他去“狼穴”，也就是说要逮捕他。

他的通信官和亲信黑尔穆特·阿恩茨博士中尉问他，是否有手枪。

“只要活着，就不能这样做。”这位将军回答说。他不愿自杀，而是想向战时法庭公开申述自己的理由——战争罪行的必然结果临别时他对副官说：“如果我们可以相信那里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说一声再见。”

但是费尔吉贝尔将军在被捕后没有申诉的机会，他进了盖世太保的行刑室，受到了骇人听闻的残忍待遇。

密谋集团的驱动力——特雷斯科企图逃脱这种命运7月21日，他来到第28步枪师的前沿无人地带，如他所说的那样，想亲眼看一下前线的败局。就在苏军防线附近，他用两支手枪制造了一个交火的假象，然后拉响一颗手榴弹，炸掉了自己的脑袋。

由于特雷斯科的作用还未被揭露，他的英雄般的死在武装部队的战报中作了突出的报道，其家属获得了把他的遗体运回德国的特许，并以军人的荣誉安葬在特雷斯科庄园里。几个月后，这位将军被查出是“七·二〇”事件的罪魁之一，于是他的半腐烂的尸体被取出棺木，用作审讯其朋友时的恐吓武器。

维尔纳·施拉德中校在营房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不进监狱，不让别人折磨我。”然后开枪自杀了。总参谋部的汉斯·乌尔里希·冯·厄尔岑少校在柏林霍亨佐勒坦的军区司令部里被扣留。他的供词自相矛盾，因此被勒令交出手枪。这位军官要求上厕所，他在那里烧毁和吞下了有关文件，回来的路上他在消防沙桶里藏下了两只手雷。

7月21日10点钟左右，冯·厄尔岑少校再次要求上厕所。途中，他取出了一颗手雷，举到头边爆炸。他受重伤倒地，看守也被炸伤，现场立即被封锁。医生认为厄尔岑已死，所以也就无人管他了。他苏醒后挣扎着爬到消防桶旁取出了另一颗手雷，用嘴咬住，然后拉响。他的上司，忠于希特勒的约阿希姆·冯·科茨弗莱施将军说：“少校的死至少是体面的。”

国家刑事警察总监阿图尔·内贝最初特别忙于“侦察”7月20日事件的工作。黑尔多夫伯爵被捕后，他的同谋行为再也隐瞒不住了。这位

德国的首席刑警写了一份绝命书，制造了一个自杀的假象，染了发色，和吉泽维乌斯一起隐居起来了。1945年1月16日，内贝终于被捕，后被绞死。吉泽维乌斯得以在一周后用假护照逃到了瑞士。

炮兵将军弗里茨·林德曼也隐居起来了，虽然曾以50万马克悬赏缉拿，但是直到9月3日才被发现。他企图从监狱的四楼跳窗自杀，但被狱警及时发现，腹部挨了一枪被击倒在地。人们给他开刀取出子弹的目的是要把他绞刑处死，但是林德曼因伤势过重，于9月21日死亡。5名曾隐藏过他的帮手们分别被处以绞刑

纳粹行刑手们想出了很多惨无人道的刑罚，这一政权很少这样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的面目。希特勒本人也多次强迫使用各种别出心裁的残虐刑罚。他把被称为“我们的维辛斯基”的人民法庭庭长罗兰·弗赖斯勒召进大本营，对他说，对这些要判决的人决不能采用任何仁慈的办法，特别是不能让他们保持理智。这位独裁者指示，要像宰“肉畜”一样绞死被判刑的军官。

为了把这些军人交给人民法庭审理，“荣誉法庭”必须先把他们开除军籍。唯命是从的凯特尔、古德里安等人为了讨好希特勒，把这些军人一一削职为民。1944年8月7日和8日，人民法庭首次开庭，被告们被弄得极为狼狈；满脸胡子，衣衫褴褛，没有腰带，提着裤子，甚至被拿去了假牙。他们就这样站在穿着红袍的“法官”面前，字旗后装有摄影机。

“你这个不要脸的老家伙，”罗兰向前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大声吼道，“为什么老弄你的裤子？”

维茨勒本虽然外表寒酸，但军人的威严不减。他对这个嗜血的法官道：“你可以置我们于死地，但是不出三个月，愤怒和受磨难的人民将要向你清算，把你活活地扔到街上的污泥中去！”

被告们虽然被剥夺了任何权利，受过严刑拷打，家眷们都掌握在这帮暴徒手中，但是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在法庭上都表现出了临危不惧的态度。

当弗赖斯勒无意地用“伯爵”来称呼舒伦堡时，冯·迪·舒伦堡伯爵立即纠正他说：“是舒伦堡无赖。”

律师约瑟夫·维默尔警告庭长说：“如果我受绞刑，那么害怕的将不是我，而是你。”

“你马上就要进地狱了！”这个身穿血红色长袍的恐怖分子说道。

“如果你也紧跟而来，对我来说倒是一种乐趣，庭长先生。”被告回答。

遭到非人虐待的弗尔吉贝尔甚至建议庭长赶快去上吊，以免被告们未死他倒先被绞死。

被捕的人越来越多，刑罚也日益残酷。曾以他的坚贞不屈而救了很多朋友性命的施拉布伦多夫写道：

“他们提醒我，这是招供的最后机会。当我坚持不招时，他们又对我进行拷打。这种刑罚共分四步进行。

第一步，我的双手被反绑，然后套上一个装置，十指分别夹住，装置内有铁刺，外有螺丝，螺母扣紧时铁刺扎进手指肉里。

第二步，我被捆在一个像床架一样的刑具上，脸朝下头上被盖上一条毯子，每条赤裸的腿上套上根炉管样的东西，管子内壁有尖钉，外面有螺丝，扣紧后钉子扎进大腿和小腿。

第三步，我和刚才一样，被捆在床架势刑具上，头也被盖住，床架’可以缓慢分开，以致被绑住的整个身体随着这一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的动作一起拉长。

第四步，我被捆在一具特制的刑架上，弓着腰，身体既不能向后也不能向两侧活动，然后刑手和警卫长用粗棍从后面抽打，每打一棍我的头就重重地撞击地面，旁观者们在—边高声狂笑。”

施拉布伦多夫曾休克过一次，醒来后继续受此摧残。但是这种刑罚没有奏效，他被送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他们把他带到刑场，押解人作一手势说：“现在你该知道自己的下场了吧，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还准备给你选择另一种命运的机会。”

他们又把施拉布伦多夫带到收尸室，里面放着特雷斯科的棺材。“他们当着我的面打开棺材，”施拉布伦多夫写道，“指着这具已经在地下躺了几个月的尸体，连威胁带利诱地问我，现在想不想全面招

供。我的态度一如既往，他们就当着我的面焚毁了棺材和尸体。接着，我并未像所期望的那样被枪毙，而是被送回了监狱。”

希特勒的闪电式判决在他的指示下达后几小时就执行了第一批遭判决的有8人，他们是：维茨勒本、哈泽、施蒂夫、贝尔纳迪斯、哈根、克劳辛、赫普纳约尔克及其助手。处决前，每人都喝了烧酒壮胆。摄影师为希特勒拍下了他们临死挣扎的场面。

其他死囚穿着木拖鞋，双手反绑着带到一间只有两扇小窗照亮的小房间里，头被塞进用钢琴弦做的套圈，然后用肉钩子缓慢吊起绞死。前后用了20分钟……

信使在当天就把有关影片和照片送到元首大本营给希特勒看，一些照片放在他桌上的地图边达一星期之久希特勒每天让人汇报死刑执行情况。这个独裁者在体质上日益衰弱的同时，他的虐待狂症反而有所增强。

后来，人们对希特勒的命令就没有那么认真了。一些死囚甚至在死牢里蹲了几个月之久。其间没有人进行过营救。久而久之，人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似乎密谋分子还未等他们供出同党就都被绞刑处死了。费尔吉贝尔等死等了一个月；格德勒先是隐居起来，后被一名空军妇女辅助队员发现。在1944年9月8日到1945年2月2日期间，悬赏缉拿他的赏金高达一百万马克。

德国舆论界对第一次审判和紧接着的处决作了报道，不久，就对有关消息进行了压缩，或者根本不予报道，目的是为了维持“非常小的集团”的说法。自然，这又有戈培尔的一份“功劳”。

并且，戈培尔对希特勒的效命是发自内心的死心塌地，他无时无刻不在努力使希特勒满意自己的工作。

这在他的日记中有明确的反映，如 1943年3月9日他写道：

……元首在会谈结束时变得特别的坦诚与亲切，他对任何事都毫不隐讳。这样的两人单独会谈确实增进了两人的感情。元首反复向我保证，他对我的工作不仅非常满意，而且他也同样地赞赏我的工作。德国的战争宣传但愿从头到尾完全都是第一流的。我有权力为我从中感受到的赞赏而骄傲。六周之后，4月23日，他骄傲地记下：

.....元首当着施佩尔的面极力赞扬了我登在《帝国》杂志上的文章。他每次读我的文章从未发现过其中有心理上的错误。他称它们是目前在德国写出的最好的政治散文。

当他看到自己受到敌国新闻界的攻击时，他也同样感到很得意。

我看到一些英国报纸和杂志以极大的敬意提到我个人以及我的工作。《新闻年鉴》称我为纳粹集团中最危险的人。我为能得到这样的称赞感到自豪。如果英国人继续如此敬佩我的工作我的话，那么我相信，德国人民也是会逐渐对此表示赞同的。

戈培尔在战争中不断地努力，促使希特勒下放更大的权力，这巩固了他在宣传鼓动领域中绝对的专制地位。

.....我向元首阐述我对宣传实质的看法。我认为，如果要设立帝国宣传部，应把帝国范围内以及占领区内全部的宣传、新闻以及文化事务交付给这个部门。我向元首强调说，我坚持对帝国宣传和新闻工作的全面领导。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地、毫无条件地同意我的观点。

戈培尔希望看到自己的权力在扩大，作为柏林盖世太保的首领他享有这些权力，并为此而骄傲。在希特勒面前他反复夸耀自己的镇静，说他作为盖世太保首领，如何带着这种镇静在最严峻的轰炸之夜与痛苦的柏林民众在一起，如何领导灭火及清理废墟，如何为稳定秩序操作。

.....元首再一次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我独自拥有对帝国首都发布命令的权力其他各个部也必须听从我的指挥。全部公共生活将由我安排。在灾难危机中只能有一个人发号施令。

.....我们在帝国范围内的宣传也没有达到良好的效果，我能够从一系列关于各省领导情况的报告中得出这一结论。在这里人们也同样感到十分痛苦的是，在家乡缺乏有力的领导。当我得到必要的全部权力时，我将欣然准备把解决这些问题作为己任。但是现在确实无法做到同时兼顾四面八方的工作。例如，一些省份报告，现在外国的广播再次大范围地被收听原因当然在于我们的新闻政策是完全捉摸不透的，它再也不能使人民了解战争局势的全貌就是我们保守地关于斯大林格勒问题和那里我们的失踪人员的滞留问题的评论，都自然会把听

众引向大规模地收听布尔什维克的广播，因为它报道了据称被俘德国士兵的姓名。

对于戈培尔来说，宣传机器是国家政权的表现形式，“如果说宣传应该是极具影响力，那么在它后面应悬挂一把利剑”。因此，这位宣传部长感到，自己应以国家社会党领导意志的化身出现在公众面前。

1943年5月12日他写到：

我再一次为总体战争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头至尾按部就班地进行的，我收到了大批的公众来信。几周内已超过15000封。所有的信都表达了人民对我的观点的毫无保留的赞成，但是最重要的是，也是使我非常高兴的是，他们在信中对我表达出极大的信任。我必须证明这一信任是正确的。这就是说，当全面战争出现失误时，我决不会让自己撤到后备军去。人民把对全面战争的设想与我个人联系在一起了。因此，我也以一定的形式为全面战争的实施公开负责。

1943年3月9日，戈培尔对纳粹内一些高级官员的追求享乐大为恼火，这些人看着人民的贫困，却对因战争而制定的限制佯装不知。

.....我对许多盖世太保领导人提出批评，他们不适宜地过着一种奢侈的生活。元首也耳闻了有关情况。因此他决定在战争期间禁止打猎以及在党的集会活动中禁止饮酒。原则上只允许吃“一锅煮”的菜。这已是一大进步了四天之后，他又回到了这个主题上：

这并不是说，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方面，有的省松懈，有的省紧张地为之准备。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在某些省中，为妇女染发和烫发是禁止的，而在另一些省份却是允许的，以至于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妇女为了化妆，她们得从一个省跑到另一个省。这当然不是全面战争的含义。

戈培尔对他的报界负责人维尔弗里德·冯·欧文说：“电影演员们根本不配享受特权的待遇，这些人只是以他们的意志薄弱、忘恩负义和奸诈地进行干扰来作为回报。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了，您就会对所有这些女士们、先生们（除几个人之外）有所了解。他们吃完我们的面包，挤到我们的桌子前，极愿意从我们这里得到百万元薪水和专业的以及国家级演员的称号。然后呢，我对此一清二楚，他们会率先向新

的主子涌去并声称他们始终坚定地反对法西斯，并且是被迫地接受金钱和荣誉。我了解这帮无赖。

“如果人们从一开始就允许他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他会到处严厉地采取措施，就是他在自己的党内也同样如此。

“如果元首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任命我为副总理，那么我从一开始就会为党和国家领导的纯洁及秩序操心我将会毫无顾忌地采取有力措施。我将忠实地遵循我的准则，清除障碍，铲除腐败产生的根源避免腐败现象的出现。”

当纳粹党的国家机器的处境越来越不妙时，极端的戈培尔越来越明显地露出了真面目。1943年9月10日他的日记写道：

国家社会主义必须彻底地改革。在与人民大众的交往中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社会主义化但是人民也必须时刻清醒地知道，我们是他们公正的宽宏大量的代言人。国家社会党的领导决不允许与贵族统治或所谓的社会有所联系……

在极端的戈培尔政治思想体系中，征服全世界的梦想具有妄想性。1943年5月8日他写道：

元首表示他确信，帝国终将会统治全欧洲。对此我们还面临着许多斗争但是这些战斗将毫无疑问地取得最完美的成果。从那时起，一条统治世界的道路将具体地展现于我们面前。谁拥有欧洲，他就会以此得到对全世界的统治权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当然不会去讨论什么公正和不公正的问题。战争的失败才是对德国人民最大的不公平，而胜利给予我们最大的权力胜利者理所当然应拥有一切机会，去向世人证明他的战争在道义上的合理性。

日记中几次提到与希特勒的会晤。描写冗长至极，不断地强调希特勒对他的宣传部长的巨大信任以及希特勒对他出色工作的高度评价，还有希特勒与他两人一致的对党内其他领导人拙劣工作的批评。

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戈培尔认为寻求一些联盟伙伴的做法是适当的。他选择了戈林，认为一位“老战士”要比博尔曼之流，那些领导层中的暴发户更具有吸引力。但此时戈林与希特勒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主要是希特勒对这位帝国元帅极度奢侈腐化的生活感到反感。戈培尔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正相反，他在此前不久刚刚表示过对戈林的“愤

怒和恼火”。戈培尔下令关闭的豪宴餐厅正是戈林最喜爱的地方，而他也同样成功地违抗了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命令。在争论这问题时戈培尔曾嘲讽地对他的部门负责人欧文描述，在战争的头几年戈林已经是如何贪食。一次偶然的机会，戈培尔与戈林共用一节卧铺车厢，戈林的举动使他感到不快，因为戈林不停地吞吃各式各样特意随身携带的精美食物和甜点心。

虽然如此，1943年春戈培尔认为自己与戈林重修友谊是合适的。这当然主要是为了与他结成盟友共同对付博尔曼。1942年3月21日的日记记下了他对戈林态度的变化：

.....下午我同戈林会谈了三个多小时，这次会面是在极其友好和坦诚的气氛中进行的。我很高兴，我能够再次同他倾心谈论艺术的法则。我们环顾了一下总的形势，其间我十分满意地肯定，我们俩在一切重大问题上是一百分之一的一致。就算我们没有对此探讨很多，我们对局势的评价也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果。戈林的身体状况极好。他努力工作，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以健全的理智而不是过多的理论教条来处理问题，因此也对党内的某些事情抱有怀疑。我不能为此责怪他。他十分幸运，在他的工作中不必与党发生联系，所以他拥有行动的自由。在某些时候，这一点是让人嫉妒的。

戈培尔眼下大加赞赏一个人的“努力工作”和“巨大成就”，而在不久之前也正是此人的懒惰和毫无成就被他尖刻地讽刺过戈培尔之所以变化，不仅希望在戈林的支持下对抗博尔曼，他还希望在他的帮助下说服希特勒展开全面战争。戈培尔同样试图动用施佩尔来达到这一目的。几乎就在与这位帝国元帅建立联系的一年之后，戈培尔在乡间别墅拜访了戈林，这座别墅是戈林在贝尔希特格根据希特勒的“山庄”极近的地方建造的。

.....下午4点钟我去戈林那里。他的住所坐落在高高的山上，沉浸于冬日的宁静之中。戈林亲自热情和坦诚地接待我。他身穿一件巴洛克式的服装，如果人们不认识他的话，肯定会觉得这人有些可笑。但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人们必须容忍他的怪僻。是的，这有时让人同情.....在几句客套寒暄之后，我们马上进行中心议题的讨论

这中间包括共同的对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批评，以及共同的对于希特勒健康状况的担忧。

戈林对元首本人怀有极大的同情。他也同样感到，在近几年的战争年代，元首一下子老了50岁。元首是如此的与外界隔绝，过着这样一种不健康的、不规律的生活，是十分不幸的他不再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也得不到休息，只是呆在他的避弹室内工作及思考要是人们能让他换一个环境多好！但是，他自己已决定，以斯巴达克斯的方式领导战争，并对此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1943年3月2日，戈培尔以烦琐的语言试图为他的新同盟戈林亲自辩护：

我对局势做了一番描绘，就像我看到的一样。我从很久以前的事情讲起，并且非常准确、巧妙地摆出了我的证据。这给戈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一个小时的报告之后他完全同意我所说的一切。在我看来，戈林确实是与那些政界人士分开太久了。因此他对形势发展的看法贯穿了一些错误，但是它们是容易纠正的。戈林的优势在于，他拥有健全的理智。这使他能再三排除混乱局势中灌木丛一般的障碍。因为他不再与那些政界人士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也许有点疲惫，并且有些听天由命。对于我更重要的是，使他重新振作起来，因为他的威望是第一流的。那些在我们工作中偶尔出现的小的不愉快，根本不值得一提。

他们共同的批评指向里宾特洛甫、罗森贝格，首先是指向每天都与希特勒有来往的“三人委员会”，即帝国总理办公厅主任拉默斯、元首办公厅主任博尔曼以及德国国防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凯特尔。

三人委员会对戈林来说也是如在喉之鲠。他认为没有一人，像他所说，“三个圣洁的国粹”，有所作为。他从内心深处痛恨拉默斯，他视他为一个官僚主义者，他企图把帝国的领导重新掌握到官僚部长们的手中。可惜的是，希特勒尚未完全看透他，希特勒认为这个极端的法学家是一个非法学家，这个极度的官僚主义者是非官僚主义者。人们对此必须让希特勒慢慢地把眼睛睁开。凯特尔在戈林眼中更是一个大傻蛋，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他只是为另外两个人服务，以显示他至少在防御问题上还参与他们的行动。

戈林对纳粹司令部做出极为尖刻的评价，尤其是约德尔使他很开心。戈林讲约德尔走得更远，他甚至开始讲关于希特勒的笑话。希特勒却十分信任这些人当着希特勒的面，他们当然是十分友好。但在内心，他们想的完全是另一码事.....

施佩尔、莱和冯克是希特勒的外层盟友。1943年3月18日他们聚集到一起：

中午时分，我、莱、施佩尔，冯克与戈林谈了大约三小时在这次会谈中我们明确了当前国内政治领导的决定性道路戈林首先向我们详细描绘了他对当前权力形势的总结和看法在描述中他基本上使用了我在上萨尔茨堡向他作的报告为依据。我感到十分满意。我向他作的论述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以元首的心理作结论，这主要是关于人们应当正确对待他，并在恰当的时机以充足的论据向他提出自己的建议。只是我们在这方面迟了一步，博尔曼、拉默斯和凯特尔则很狡猾走到了我们的前面这一状况必须改变。戈林对这三人的评价并不高，根据其成就把他们排列为博尔曼、拉默斯和凯特尔，但凯特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傻蛋。他是一个没有火的火车头，他最后一步也走不动了，突然停在那里。但首先毋庸置疑的是，他们企图建立起一种内阁统治，即在元首和部长们之间竖起一堵墙，这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容忍。

这些摘抄极真实地描绘了核心圈子内部的斗争和一贯的阴谋诡计。希特勒对戈培尔努力试图恢复戈林的名誉的做法并不特别喜欢。几个星期之后的5月，戈培尔本人也再次怀疑，戈林是否真的可以让人忍受？早先当“我们的赫尔曼”由于他无度的挥霍而引起人们纷纷议论时，人们在德国宽容地一笑了之。人们甚至还为此感到骄傲。但是在战争的第三和第四个年头，所有的人都经受着巨大的痛苦，对戈林的行径人们至少理解为是奢侈。此外，还要加上大众对空军在防御敌对轰炸机联队时的失职的不满再加之戈林许久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这也同样引起人们对他的不满。

戈培尔的宣传没有否认轰炸所引起的巨大损失。但是就算这种企图可笑地存在，那些燃烧着的房屋废墟也是不能回避的。但是戈培尔努力改变城市被炸成一片废墟这一不利处境，使之成为有利的绝妙的战斗精神。在1942年12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解释说，用一句干

巴巴的句子报道像杜塞尔多夫这样的一座城市置于瓦砾之中是不行的宣传人员组成的特别小组应更多地以战争报道的英勇风格来反映那些恐怖的夜晚发生的事件。

与希特勒和戈林相反，戈培尔总是出现在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他多次视察鲁尔区和其他一些特别遭受攻击的地区。在对柏林的进攻中，他自己的官邸被炸毁，他的宣传部大楼严重受损，就是他的省办公室也遭火灾。皇家饭店——国社党历史上的圣地，也被彻底烧毁。

1943年11月25日的日记，戈培尔对此做出了反应：

现在人们再一次渐渐学会，习惯于一种原始的生活方式。早晨，在戈林大街，没有暖气，没有电也没有水。人们既不能刮脸也不能洗漱，靠着点燃的蜡烛人们离开地下避弹室。我极早就起床了，感到从未有过的头疼。头痛持续地折磨着人们。但是那又有什么办法。人们必须工作我马上出发去办公室，以便在那里洗漱并刮脸。在这里，工作受到极大限制。所有的电话线都断了。人们和外界只能通过信使取得联系。帝国部门大楼绝大部分被彻底炸毁部长们根本不见了踪影，以至于工作一部分变得困难了，而另一部分却也容易了许多……1943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戈培尔在日记中这样写着：

人们几乎无法从街上走过，因为到处都被残砾碎瓦所覆盖“金色莱茵”的废墟被炸飞到半空。我在一个障碍物前等待能行，令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现在柏林市民站在我的车旁，所有的人都充满着怎样一种高亢的情绪。没有一个人哭泣，没有一个人抱怨人们信任地拍着我的肩膀，给予我极好的建议，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让我继续前行，就像人们所说的，我不要发生什么意外，因为人们需要我。总之，柏林人民如此对待我比任何奖赏都高……

人们时常有这样一种印象，柏林人民的道义行为几乎带有宗教色彩。妇女们向我走来，做出祝福的手势并祈求上帝保佑我。所有这一切都让人心动。我也要为人们做出我能作的一切……

我还把几位妇女从食品供应点带上，带她们来到东部乖坐着普通的交通工具她们是到不了那儿的，这几位妇女是极其幸运的。一点小小的帮助姿态就可以摆布这些人，这几乎难以相信，在1918年11月这座城市发动了政变。如果是在我的领导下，这种事情决不会发生。在

花园广场我参加了一个公开的食品供应男女工人们以一种狂热迎接了我，它是那样地令人难以置信，也是那样地难以描述在这里也就是阿克街的周围曾一度举行过那最火红热闹的婚礼大典我从来不认为在这里可能发生这种观念和精神状态的变化。我在这里同人们一起进餐，并被高举到一只箱子上，向他们发表讲话。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粗俗的、随便的演讲，但它很投工人们的心思。我被称为“你”，并直接呼以名字。人们想把我抬过广场，我费了好大的劲才阻止了他们的这一行动妇女们拥抱我我得替人们签名到处分发着香烟。我们一起舒舒服服地吸了一支雪茄烟。总之，就像在娱乐场里一样，这里笼罩着一种欢快的气氛……

……我同人们告别。这是一幕令人感动的情景。一位妇女在两三天前的轰炸中分娩了一个婴儿。即便如此，当她得知我将来到这里时，仍坚持起床穿衣，赶到广场上来。在道义上我们永远不会失去战争……

毫无疑问，在这些描述中戈培尔试图显示他自身的勇气。在其他众多的文章中他也多次写道，人们的心情十分恶劣，他自己也被沮丧情绪控制着。

……在来信中有许多批评。人民大众的情绪可以用“严峻”来形容。就是那些友好人士现在也为战争的继续发展而担忧。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军事的困境中再也看不到真正的出路。与此相应，对于领导层，一部分甚至是直接指向元首的批评被提出来了……

每天都是工作和一个接一个的担忧。传来的消息只有报警的消息。人们必须好好控制自己的内心和紧张的神经，以便不会在不断增多的这类消息面前惊惶失措。但是我决不会如此。我知道，战争是一件艰苦的手工艺活。我还知道人们必须完成它。我十分清楚，它将带来异常沉重的负担。但是如果人们勇敢地将此重担挑于肩上，并与危机作斗争，最终是会迎来胜利的。

鉴于北非战场上的失利，戈培尔沉痛地写下：“我时常有这样一种印象，为了进行这场战争我们缺乏必要的主动性”。1943年9月一次在纳粹司令部的会谈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局部和平是否有可能实现：

.....我问元首，他是否准备与丘吉尔进行谈判，还是坚决拒绝它。元首是这样回答我的：“在政治方面关于人格问题的准则是根本不存在的”。总之，他认为，同丘吉尔的谈判是不会取得任何成果的，因为他太深地陷入一种完全对立的世界观中，他是受仇恨而不是受理智支配的。元首倒是准备认真同斯大林进行谈判。但是，他同样认为，这不会取得什么成果。因为，他在东部渴望得到一切，斯大林决不会从自己手中转让给他。正如当前形势所趋，我建议元首，我们必须同一方或者另一方把关系弄明确。帝国从未赢得在两条战线上的胜利。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不论使用何种方式都要避免双线作战。

戈培尔对英国和英国人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从表面看他仍一如既往地从事着决不手软的仇恨宣传，但是在1943年5月中旬的日记却记载了他如下的想法：

.....我们德国人并不十分擅长统治被占领地区，因为我们从未演练过。英国人，他们在他们的历史上除此而外没有干过别的事情，因而在这方面远远领先于我们.....盎格鲁萨克森的物理学在研究上大大超过我们。其结果是，盎格鲁萨克森领导战争的人也同样在物理学研究成果的运用方面比我们强。不论在空战还是在潜水艇的战斗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在他对不断恶化的局势的抱怨中，戈培尔极力反对那些在他看来尚未有能力承担时代的召唤的人，首先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1943年3月9日他写到：

.....对于那些将军们，元首对他们的评价是否定的。只要可能，他们就欺骗元首。此外，他们不学无术，根本不懂得他们手中的战争，这本应是人们对他们的最低要求。将军们缺乏高层次的文化，所以人们不应对他们提出批评指责，因为他们对此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们是那样地不懂得战争中最简单的问题，这是决不可饶恕的。几代人以来对他们的教育就是错误的。我们今天在面前的高层军官中看到了这种教育的后果。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举出几个实例，对于元首来说，这些例子只是为他的观点提供了一个证实。

当戈培尔得到墨索里尼垮台的消息时，他刚刚在德累斯顿一家疗养院看望过他生病的妻子。这是1943年7月25日的第二个噩耗，因为就

在前一天夜里一次可怕的空袭彻底地摧毁了汉堡整个城区戈培尔的报界部门主管欧文担负了这一痛苦的使命，向部长报告这两条消息。他汇报说：

……我走向部长先生，他仍和古特尔在大厅里站着。我向他作了简短的、事实性的报道。他以一种不敢相信又震惊的混合神态望着我，就像我先前望着电话接线员一样。然后他转过身走到大厅的侧室里最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下，那儿是我们每天吃早饭的地方。当着他的面我打电话询问更确切的消息这些消息来自官方的意大利新闻公报和国王及巴多格里奥的呼吁书。部长先生仍是无言地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就像我们这些站在他周围的一伙人一样，他还是不能相信和理解这件可怕的事情。我还从未看到过他这种样子。大约一刻钟的时间，他只字未吐。他只是不断地摇摇头，轮流地望望国务秘书和我。在他脸上流露出彻底的束手无策的神态，它最后渐渐转为强忍的愤怒，此后他在楼上办公室里说的第一个字是“臭混蛋”。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指的是谁，是那个墨索里尼，国王，巴多格里奥，是所有这三个人，还是笼统地指意大利人……欧文接着写道：

……部长先生渐渐平静下来，他以他喜欢的姿势坐在写字台前的沙发里，完全蜷成一团，像侏儒似的，把膝盖顶在桌子边上。突然他从冥冥的沉思苦想中跳了出来，以刺耳的，不自然的声音高喊“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就像几万人看到他们的偶像时，经常发出的那种疯狂的喊叫……

当德国伞兵以一次极为勇敢的奇袭在意大利的大萨索山把墨索里尼从监狱里救出来时，戈培尔再次见到了以前的领袖（指墨索里尼）。在他的日记中戈培尔对这位倒台的同盟伙伴表达了其轻蔑之意：“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个意大利人，并且秉性难移。”

1943年11月9日，戈培尔继续写下他的看法：

这个墨索里尼根本就不知道，他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他过高评价了法西斯党的作用。他完全生活在现实之外，同英雄式的空话打交道。而这些空话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再有其立足之地。实际上他相信，意大利人民还会再一次被说服，站在我们这一边共同作战，而我却认为这完全不可能。他是与事实怎样遥远地分隔开，人们可以从下

面这件事中清楚地看到：他竟然认真地打算，到米兰作公开演讲。泽普·迪特里希对我解释说，如果他真是这样打算的话，他必须在德国部队的保护下才能进行，否则他可能在米兰被噓下场。就是领袖（指墨索里尼）同他女友的个人生活，也引起了许多议论。泽普·迪特里希必须把他的女友重新领回到他的身旁。人们可以从中得知，墨索里尼自己完全不清楚他所处局势的严峻性，因此也就把重建法西斯党更多地当作一种理论，而不是实际行动去做……

最后一张零散的日记残页是1943年12月9日的，戈培尔抱怨说：“元首让我们把宣传引向东部的命令被罗森贝格彻底地破坏了。”他继续说，他实在不能理解，元首为什么仍把这群精神错乱的无用之辈留在政府中。

如果我处在元首的位置，我将迅速地把这些人清除掉。罗森贝格不仅是在东部，而且在整个政治领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现在是时候了，人们应直截了当地毫不客气地对他说说话了！

戈培尔也是以如此蔑视的口气提到里宾特洛甫：

拉默斯受我的委托向元首提出了关于宣传部驻巴黎公社的问题，并表明了里宾特洛甫的企图，他想通过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把公社从我手中夺走，元首对此十分生气，并且以极端粗鲁的语言大骂里宾特洛甫……元首在会见时非常激动，并且不容许里宾特洛甫在他面前再次提起这问题。这个决定的目的是，目前一切仍按老样子进行，直到我有朝一日得到机会，把事情的原委向元首说清。人们再一次看到，里宾特洛甫是多么习惯于在这些问题上不讲道德，而且在他那里能有多少的同事之谊可谈呢！如果里宾特洛甫也能像他的同事们在内部事务中一样，在对外事务中十分能干的话，那么我完全可以想像得出，为什么我们在外事方面没有取得一丝一毫可以称道的成绩。

戈培尔经常召开宣传部会议。在那里，他坐在一张垫得厚厚的皮扶手椅上。椅子那巨大的靠背突出于他瘦小的身体之上，几乎要把他吞下。他把膝盖顶在桌子边上，面前桌子上放着一大摞从世界各地电传来的最新消息。他开始几乎是耳语似的宣读它们，下属费了很大的劲才能听清。从一排占了大厅一面墙的高窗户外，射入明亮的光线，照在巨大的哥白林双层挂毯上，这幅挂毯挡住了与窗户相对的一整面

墙。在它上面，一位农牧之神吹着笛子，一群快乐的农牧之神和仙女们随着他共舞。那么奇特的寓意！在桌子周围坐着宣传部的决策人，宣传部里最重要的人士以及来自内阁和宣传部其他机构的代表，还有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宣传部的代表和其他政府部门和武装部队最高指挥部的联络员。

戈培尔那不同一般的轻声讲话是精心设计的。在他的讲话技巧中包括逐渐提高声调和加强表达此外他强迫他的听众从第一个字开始就极认真专心地听他讲话。戈培尔另一个特点是，在会议开始时把手表摘下，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这是一个明显的暗示，他要用于开会的时间，是精确地控制的。

有一次在施万恩威尔德的宴会上，瑙曼向冯·欧文介绍了部长夫人。玛格达给这位年轻的下属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像所有其他客人一样，欧文也忍受着由于主人极小的胃口而定下的简单饭食。他非常详尽地描写了戈培尔在他柏林官邸的办公室：一个巨大的壁灯，一张红色的皮面写字桌，后面是一把转椅，地毯和窗帘是深红色的。写字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比真人还要大的希特勒画像，左边是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画像。在这座城市中一共只有六幅普鲁士皇帝的画像或半身肖像其余的几幅收藏在部里和一些乡间别墅中。

戈培尔的工作习惯是：早上7点30分整，仆人埃米尔走进部长卧室旁边的更衣室，在他推着的餐车上，放着一杯咖啡，一个盛着三种不同维生素药片的小碗，一个放着两片厚厚的、被切成四块的黑面包片的盘子以及一个大的红色公文包（上面写着：部长先生的电报）。仆人敲一敲卧室的房门，然后当部长咕噜着应声时先退下。戈培尔在早晨一般情绪都不太好。

戈培尔每天早晨的洗漱不多不少需要45分钟。他非常仔细的刮脸，喷洒许多科隆香水，并且对他的衣服极为讲究。他几乎总是穿淡黄色的丝绸衬衫，他还有上百套的西服和几十双定做的皮鞋。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他没有穿过同一套西服。所有的西服，不论是剪裁还是式样都很精美。戈培尔很少也不喜欢穿整套的制服，他习惯于褐色制服上衣与礼服下装和漆皮鞋相配。他每周进行一次美容和修剪头发。就是在炎热的夏日，他也决不会不戴帽子、手套，不穿风衣出门。他

当然不把风衣穿在身上，而是把它干干净净地叠好随后带上放到车里。

欧文的服务于6点钟开始，到时那个红色公文包就由执勤的党卫军送到床前，它里面满满地放着从德国新闻局和各种晨报电传来的最新消息。文件当然被装在一只上了锁的秘密公文包中，只有报界负责人才有它的钥匙。因为那些政治新闻报并不是面对公众的，就像它们从国外汇集到新闻局来一样，根据它们的重要性被相应地分为“可信”、“机密”和“绝密”。德国新闻局根据消息的可靠程度负责打上不同的颜色。德国报界能使用蓝色和绿色消息，那是一些无害的，或多或少已经反复登载过的新闻。虽然大多数的编辑室能得到红色消息，但是其内容只能在内部传播，或者由宣传部负责出版。白色消息只能由少数几位头面人士得到，第三帝国一般的盖世太保首领都不属于这个范围之内……

所有这些电报、消息、报纸和信件都必须由报界主管来加以确认和分类，因为只有重要的消息才被报到部里，大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重要关键之处要用蓝铅笔划出，在报纸上也是如此。大部分报纸是以剪报的形式展现于戈培尔的面前。但与之相对应，他习惯相当仔细地翻看他家乡赖特的地方报纸，他甚至有时有兴趣看一看广告和家庭新闻。8点15分，报界负责人和副官在大厅里等候他们的上司。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得到一份早餐：一杯咖啡，几片极薄的黑面包片。其间他们两个人还必须极快地同部里通电话，以便得知是否有什么应该在上班途中向部长汇报的重要消息。8点20分整，戈培尔出现了，埃米尔跟随其后，拿着两只公文包，一只是红色的公务文件夹，一只是私人公文包。

司机拉赫在外面恭候着。他用一只手打开沉重的车厢门，另一只手向其他人行“德国式的敬礼”。戈培尔总是坐在司机的旁边。报界主管和副官坐在后座，并在这辆新型轿车开往宣传部大楼的短短两分钟之内向他报告新闻。在戈培尔的车之后跟着一辆敞篷奔驰车，上面是执行护卫任务的党卫军士兵。

宣传部大楼举行了常规的迎接仪式，纳粹党卫军低级军官奥克斯上前，接过部长的帽子、大衣和手套，同时报界主管和副官的两只公文包也被接了过去。然后，这一小队人继续沉默地前进，迈着军人的

步伐走过厚厚的红地毯来到部长在二楼的办公室。在那里，公文包被放到巨大的写字桌上，甚至要距桌沿有一定的距离。秘书和速记小姐们分为白班和夜班在前厅工作。10点整，维尔纳·瑙曼开始做报告。当时他已是副部长了。瑙曼的办公室在部长办公室旁边。11点召开各部门领导人会议。之后戈培尔进行口授，并接待来访者，所有的来客都必须是事先预约好的午饭经常被错过，副手和下属总是饥肠辘辘地坐在那里，直到终于响起一声大赦般的喊声：“部长先生上路”。

维也纳厨娘施密特夫人所做的绝妙的饭菜只有一个缺点，与她出众的手艺相比，她的饭菜量实在太小了。她不但遵循严格的食物定量，而且以部长那小小的胃口作标准。每顿午餐都是以一小份汤开始，少得几乎让人一勺就能喝完，但是下属必须像部长一样长时间地在里面搅来搅去。这时埃米尔端上被切成四份的半个白面包。肉菜由一个鸽子蛋大小的肉丸子、三四个土豆和蔬菜组成。戈培尔最喜欢的蔬菜是菠菜。午餐以一道甜食结束，在这道菜中施密特夫人达到了她厨艺的最高峰

饭后，戈培尔喜欢喝咖啡，抽支烟，并同他的进餐伙伴聊上几句。然后，他离开半小时习惯性地以一种极不舒服的姿势中休息一会儿那是一种弗里德里希大帝享用午觉的姿势坐在一张椅子上，膝上盖一条毯子，头向后仰着。在戈培尔再次喝一杯咖啡，吃两片薄面包片和三粒药丸之后，负责人则应手拿记事本和铅笔出现在他的面前。下午的后半段时间戈培尔时常给《帝国》杂志写一些文章。对于这些文章他十分尽心他习惯于手写一些建议并多次修改打字机打出的样稿。他的文章被打印出来放在他面前，他十分惬意地把它读上几遍，并愿意听到人夸奖它。然后，他问：“嗯，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您认为这有用吗？”或是类似的问题。他总是十分用心地注意打印错误，拙劣的装潢或是朗读时重音的错误，这些情况的出现会使他很生气。他的夫人了解他，并接受他的做法。某天吃饭时他向他的夫人递上关于他最近一篇文章的最新报界反映总汇。这份总汇必须每周由戈培尔的副手来完成其中哪怕是随便一个被雇佣的附庸小报上的最阿谀奉承的文章都不能漏掉。戈培尔夫人大声诵读着这些摘抄，听任汤和菜凉下去，不知疲倦地、一声声带着强调的语气念出一些字句，并评论说：非常正

确——就是这样——或者他有权力这样做。戈培尔本人则在一旁着了魔似的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晚饭前，大约是8点钟，负责人和副官试图从他们上司的举动中推测部长情绪的好坏，不知将来临的晚上是一个还过得去的，或是不怎么好受的晚上。如果戈培尔心情好，人们可以从他谈话的欲望中看出，这时他还会用手打响指。开饭前，他还要听取瑙曼刚刚从元首司令部取回的关于军事形势的最新消息。晚饭后一般要放一部电影，至少照例会有最新的一周综述，特别是一天之前才开始公开放映的。在战争年代戈培尔特别爱看敌国的一些著名影片。德国新闻参事在中立国一直担负着重任，不计精力和财力弄到这些影片的拷贝。当戈培尔看过影片《穿白貂皮大衣的夫人》之后，他称它为“一次为盟军所作的极成功的宣传。从这部影片中抒发出了怎样一股对英国人同情，对德国人痛恨的情感浪潮。这不仅是一部艺术作品，这也同样是宣传工作的范例”。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他看了一部德国电影，使他很讨厌。“简直是白痴！”他叫道，“我们德国人看起来毫无言外之意的意境这些人除了大喊大叫之外就不再会些别的什么了吗？它只能使一个人走向绝望。”

戈培尔习惯于把他晚上的客人留至午夜或者更晚如果他谈兴很浓，他就会把他们当作他独自的听众。当他终于离开时，经常要带几本书和几张唱片到卧室中去，以便做好度过不眠长夜的准备。柏林受到狂轰时，戈培尔冷静地注视着一切。他使他的仆人埃米尔感到绝望，因为埃米尔是多么希望以最快速度冲进防空洞去，而戈培尔却一如既往地精心地刮着胡子，穿衣服。毕竟部长是要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的，当他指挥着消防队和防空部队投入战斗时，他决不能以未修面和慌乱地打上领带的形象出现。

在他经常的旅行中，不论是去参加活动，还是拜访希特勒司令部，戈培尔都喜欢坐火车，因为这样几乎不会打断他的工作。开车前一分钟他准时和他的随从们出现在站台上，漫不经心地回答着车站乘务员僵硬的“德国式的敬礼”，登上他的豪华车厢。宣传部的下级军官党卫军奥克斯负责照看行李，政府参事奥特看管打字机和速记小姐们。开车后一分钟，一切工作重新开始，而它只是十分钟前离开宣传部大楼时才被中断的一间豪华包厢由桃木家具装饰得很漂亮，并配有

落地灯和台灯，而且还配有卧室和厨房。在一次旅途中，火车在德累斯顿站停留几分钟。玛格达出现在站台上，她正在当地一家疗养院疗养。戈培尔以一个吻迎接了他的妻子，并送给她一束白玫瑰。就在一家人相见的同时，像以往火车较长时间的停留一样，豪华车厢接通了城市电话网，戈培尔能够同时进行一系列的公务会谈。

1943年，戈培尔在政治上发展的野心被抑制了几次。1943年1月4日戈培尔对他的部门主管作了一次关于立即进行全面战争必要性的煽动性讲话。

两星期后希特勒不是授权戈培尔，而是让拉默斯、博尔曼和凯特尔制定领导全面战争的计划。戈培尔完全有理由忌妒这三个竞争对手。此外，他确实十分严肃地，也并不是不公正的担心，这三个人不能胜任交予他们的重担。他经常在家庭内部的午餐聊天中提起，他偶尔有机会以顾问的身份参加三人委员会的会议，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滑稽剧。戈培尔知道，当时关于全面战争的问题人们更多的是在讨论着，而不是着手进行。他本人由于他的职权范围只得限制在宣传领域发挥影响。作为希特勒的代表戈培尔曾发表了一篇长长的讲话，其中他向公众有力地展示出进行全面战争的必要性。希特勒是因为不愿公开露面去承认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而拒绝了作此番讲话。戈培尔勇挑重担。毫无疑问的是，在这次演讲中他展现了他登峰造极的演讲水平。由于这次他认为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讲话，戈培尔下定决心，在公众面前以英雄的形象出现。他精心准备，把他的听众带到暴风骤雨般掌声的集会氛围中去。人民自身应以最响亮的呼声向元首表明，整个民族盼望着全面战争。戈培尔极为细致彻底地准备着他的演讲。这项工作使他处于高度紧张兴奋的状态。直到2月13日凌晨，他一直在对演讲稿进行修改和润色。一位过度疲劳的速记小姐得了一种名为啼泣痉挛症的怪病。她很快被有无尽精力的政府参事奥特替换下来，他也能娴熟地以最快速度在打字机上工作。直到凌晨4点，秘书们才得以离开。戈培尔演讲之前，他也让自己睡了几个钟头。他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手势都在一面三折镜前演练过。晚上，挤得再无插针之地的体育馆看台上，戈培尔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平静与自信，只是更加威严、勇敢、严峻。他开门见山，以极为灰暗沉重的色调描述了前线的局势。他解释道：“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是关系到死亡或生存的斗争，只

有德国才能把西方人民从来自东方的冲击中营救出来，人们不能有任何一点幻想。形势十分严峻，全面战争迫在眉睫。”

他煽动着听众，刺激他们高喊口号。在演讲的最高峰，他面向听众，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向他们讲话，向他们提出了十个精心准备好的问题。在整个德国，在全世界人们都可以通过广播听到。这一连串的问题是被以怎样暴风般的兴奋激动和雷鸣般的赞同所回答。你们是否要紧跟元首？是！你们是否准备以无畏的勇敢精神把战争进行下去？是！你们是否准备，一天十个小时，如果必要的话，十五、十六个小时为军备而工作？是！你们是否同意，妇女们也应将全部精力投入战争，并且根据紧急状态法立即处决每一个游手好闲之人、每一个投机商、每一个压迫人的人？对，对，对！这位演讲者是这样结束的：全体德国人民必须协调一致地，以令世人惊叹的决心共同承担战争的重担演讲者被他的支持者用肩膀抬出了大厅。

如同以往类似的情况一样，戈培尔自己始终保持着冷静，他问他的随从，效果如何。他发现，他使人们疯狂，并使人们如此为他的雄辩术所着迷，以至于他不再需要对人们发出任何号令，他们都会一起跳出窗外像每次重要演讲之后，戈培尔站在浴室的地秤上，发觉他的体重通过这次巨大的体力消耗减轻了7磅。戈培尔处心积虑地让希特勒听到了这次演讲的录音。当这位纳粹元凶露出被听众们的风暴般激动的情绪深深打动的表情时，戈培尔感到万分幸福。但是此外他再也没有得到什么。希特勒根本没有想到，因为戈培尔这次天才的行动而以全权去赏赐戈培尔而这全权正是戈培尔所盼望得到的。

在失望中，戈培尔坚守着他的宣传阵地。如果希特勒不愿任命他为帝国的二号人物，戈培尔至少能够做到，让他的威名在民众心中上升于是戈培尔打算，提高他名字的出现率。他试图通过为《帝国》杂志撰写文章来展现才华。他多次作广播演讲，在柏林和其他城市发表公开讲话，他到处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并以此显示党内的其他领导人变得多么沉默寡言和回避公众在每一次严重的轰炸过后戈培尔都会出现在受灾地区。他的下属曾写道：

昨天我陪同戈培尔来到科隆，头一次看到被轰炸成一片废墟的大城市。戈培尔十分震惊，并希望说服希特勒尽快视察这座城市。令我惊讶的是，戈培尔在大街小巷到处受到人们友好的问候。他同群众用

他们的家乡话交谈，人们很容易看出，他本人在受到严峻考验的科隆城里，是全国高层领导人中最受爱戴的人物。那些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男人、女人们，显然感到至少还是有一位部长亲自关心着他们的命运……

戈培尔企图向公众显示，他是希特勒之后最重要的人物。如果希特勒最终将目前为止尚未做出的权力任命给予他的话，那么他享有的名誉对他是十分有利的。一次戈培尔在小范围内承认，去赢得新的名誉，对他来说绝非是件容易的事情。戈培尔说：“没有什么比重新赢得一度失去的名誉更难的事情了”。他这样承认，自己从痛苦的教训中总结出这一点。他用了整整四年的努力工作，才再一次赢得从1938起失去的信任和尊重。现在不管怎样他都坚信他完成了这项工作。他的幸运之星正在上升，戈培尔指的是巴诺娃事件，当年几乎使他的仕途中断。但后来，即便是在最为严峻的战争岁月中，戈培尔也没有完全放弃桃色冒险。

1944年6月的晚上，在戈培尔的乡间别墅发生了一次微妙的偶然事件。近两天，戈培尔在这所小小的木屋中住下。它位于森林的中间，距主楼约800米远。他告诉随从们，他想单独呆一会儿，不希望被打搅，除非是电话或急需做出的决定。一个仆人开车给他送来晚餐，然后立即返回主楼，戈培尔夫人在德累斯顿的白鹿疗养院疗养，他的孩子们在施万恩威尔德。

他接待的少数几个来访者，必须事先电话通过警卫人员，以便他们能够毫无困难地通过栅栏。一天晚上，大约是深夜10点，警卫看到一个女人在林间小路上骑着自行车。这是一位极其美貌的妇人，当警卫叫住她时，她绝口不提她的名字和她出现在部长禁地的理由。这位警卫像十足的骑士一样，帮这位女人推着自行车，带她走过那漆黑的树林。他打算带她去主楼见副官。警卫很快发现在20米外的云杉树的阴影中闪现了另一个闯入者。根据命令，警卫把冲锋枪推上了膛，大喊一声：“站住！举起手来！”当他听到一声呵斥时，吓得险些把冲锋枪扔到地上。这声呵斥来自戈培尔本人。此刻警卫也不再怀疑这位神秘的骑自行车的女人。因为当他看到戈培尔很尴尬地对这位年轻女士道歉时，警卫推测部长正等待着这位来客。警卫被置于一旁，两个人向不远的木屋走去……

显然戈培尔与这位年轻的女电影演员事先有约，为了避免任何议论，这次来访不被秘书、副官甚至是喜欢饶舌的佣人们所知。因此，这位年轻女士没有乘汽车来访，而是从那林间小路上骑自行车而来。她若乘汽车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受到警卫阻拦的。

戈培尔将他工作中过剩的精力用于在希特勒司令部与博尔曼派系的斗争。1943年4月，他认为，针对博尔曼一伙人的措施就要见效，他信任地对璫曼透露了一点有关情况，并同意他转达给泽姆勒和其他一些部里的同事。但是他再一次失望了。博尔曼比以前地位更稳固了。戈培尔却不得不与这个被他称之为“不开化的怪人”达成协议这是令人丧气的。此外，1943年对柏林的轰炸越来越严重，戈培尔精神十分紧张并且感到彻底的失败。

在最后几个月，戈培尔是陷入了一种失败的情绪中。他在饭桌上，甚至当着他夫人的面，说：“如果我们的所有努力、工作和斗争都是徒劳的话，那么死亡对于我来说将是一种解脱。在这个世界中，没有我的理想存在之地，我也就不再追求什么了……”

在另一次，当他请以前的副部长利奥波德·古特尔吃饭时说，他认为帝国绝不可能只限制在战前的疆界中这种念头促使他以一种疯狂的热情和速度去完成他的工作，以至于他并没有多少时间来进行思考。

这种神经质的人显然是没有持续的活动和刺激是不能够活下去的。他并不惧怕日复一日带给他的沉重的工作负担，而是为国家的安全而担忧以及对形势发展的失望。他似乎不可能重新走出他日常工作的漩涡。他看起来像需要呼吸空气一样地需要会议、谈话、电话、会客、闪电会谈和紧急决定……他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有时会令人害怕。

1943年11月21日晚，就在柏林遭受另一次严重轰炸之前，戈培尔在郊区发表了一次演讲。当炸弹飞来时，他没有让自己失去冷静。轰炸进行到最高潮，当几乎所有的人都躲进防空洞时，戈培尔带着泽姆勒来到位于威廉广场的指挥所，几分钟后，所有从遭受打击的城区传来的可怕的消息都汇集于此。这是一次绝少的机会，泽姆勒看到他的上司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当他十分激动时他才抽这么多烟。当那损失的程度可怕地呈现出来时，戈培尔显得完全不知所措。

戈培尔把在那些可怕的日日夜夜关心市民的士气作为自己的责任。1943年圣诞节他好像达到了他精神支撑力的极端。在圣诞夜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兰克他同他的妻子和仆人们大闹一场。人们把一棵圣诞树放在了放映银幕的前面，而没有注意到，房子的主人想看一部美国电影。人们完全可以把圣诞树移开，并且他们正准备这样做但是戈培尔让他紧张痛苦的神经通过勃然大怒得以放松。他完全丧失了自控能力。他咆哮着大声责骂，命令人们立即准备一辆车。盛怒之下他开车到施万恩威尔德去了。他以一本叔本华的书度过了那孤寂的圣诞之夜。玛格达此间必须向孩子们对父亲的离去做出一个很好的解释。他们的爸爸当然是去工作了。

1944年1月戈培尔再一次有机会让他郁积的激动通过怒火发泄出来。完全被炸毁的帝国首都柏林市长向戈培尔先生征求意见，询问这一次帝国元帅戈林生日时该给他送什么礼物，这是一个难题。去年戈林曾表示过希望得到一幅25万马克的凡·戴克的画购买这幅画的钱得由市政府支付。戈培尔一听此事就勃然大怒，这位市长赶紧狼狈地退出来。戈培尔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从愤怒中恢复过来。

他有比戈林的生日宴会更需要关心的事情早在一周前他就把一份长达40页的研究报告交到了希特勒司令部，而希特勒对此却一直没有反应。因为戈培尔鉴于危急的形势对在多条战线取胜感到怀疑。他呼吁尽快地同斯大林进行和平谈判。在这份思想汇报中他详尽地阐明了他的理由，为什么他认为同丘吉尔或是罗斯福的谈判将是没有意义的。他在另一方面看到了一丝希望：就是同斯大林私下和谈。戈培尔在报告中也没有忘记明确地表示，鉴于里宾特洛甫、菲亚斯克斯在外交部，戈培尔愿意把外交部长的职务和谈判的重担一同接到自己身上。

当希特勒司令部对此没有答复的时候，戈培尔是怎样关心他的研究报告并且十分紧张不安。实际上博尔曼认为这个报告太荒唐，根本没有把它交给希特勒。但是直到三个星期痛苦的等待之后，戈培尔才得知这件事情这是博尔曼在帝国司令部地位的一个新的证明。最后戈培尔去了司令部，打算让希特勒得知他的建议。这些建议当然没有被接受。那份研究报告，那份凝聚了戈培尔多少心血和被寄予了巨大希望的研究报告，在希特勒几个不置可否的话语之后被“放到了一旁”。

那时，戈培尔同施佩尔、冯克和莱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们三人已完全准备承认他的权威。他们几乎是定期在星期三晚上在戈培尔家会面，谈论他们将战争领导极端化的方案。

每当戈培尔到帝国司令部去时，他都对希特勒的才能充满怀疑，他几乎是坚定地 toward 希特勒阐述他的观点。由于这些会谈都是两人单独会谈，所以世人不知道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每次当戈培尔在会谈后回到家中，总是对希特勒充满赞美之辞，表示很乐观。

1944年6月5日盟军在法国北部登陆的前一天晚上，泽姆勒和瑙曼陪同他们的上司一起来到了贝尔希特格登，希特勒传见戈培尔。戈培尔想再一次提起他的研究报告，而这希望却没有实现。会谈一直持续到午夜之后。几个小时之后泽姆勒叫了他的上司，报告进攻的消息。

4点5分，我得到了关于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登陆行动的第一个消息。毫无疑问，盟军方面的进攻开始了，我马上给戈培尔打电话，以标题的形式向他报告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新闻。我可以想象，他是怎么从床上一蹦而起：“终于来啦！”他喊到：“谢天谢地，这是决胜局！”

在返回柏林的途中戈培尔告诉他的随从们，希特勒仍然很乐观，并坚信最后的胜利。几天之后戈培尔举办了一个夜间聚会。在聚会时他显得异常兴奋，说一种秘密武器要用来对付英国，他亲自为这一新武器起名为v1（复仇一号），编号是要表明更多的“杀伤性武器”正在研制中。第一枚v1导弹在1944年6月15日被用于轰炸伦敦。戈培尔非常恼火，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没能及时事先通告他有关情况，否则他就能对这个轰动性的事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7月20日，希特勒遭暗杀的当天，戈培尔在柏林。大约2点钟左右在赫尔曼·戈林大街的戈培尔官邸里，戈培尔脸色异常苍白并且精神紧张不安。此时戈培尔已经得知，希特勒遇刺，几乎迈进了死亡的门槛。戈培尔没有返回宣传部大楼，而是在家里等待进一步的确切消息。泽姆勒在午饭后任务就完成了，他毫无困难地赶上了郊区火车雷默少校领导下的柏林警卫大队对政府所在地的封锁发生在一个小时之后雷默少校在16点得知“女神”行动开始了，他马上来到柏林城市司令部报到。“女神”是一系列措施的代号，指的是当德国内部发生混乱时国防军采取的措施。雷默赶往柏林，他从城市司令官哈塞中将那里得

知希特勒伤势严重，也可能已经死亡。这位中将命令雷默带领他的部下封锁政府驻地，逮捕每一个企图冲过封锁线的人，连部长和将军们都照此办理。雷默少校没有多想，他上司的这道命令产生何种后果。封锁被实施了，在政府驻地的党卫军警卫被解除了武装。

正当雷默为贯彻执行上述命令作安排的时候，在他的内部产生了分歧。后备军少尉汉斯·哈根博士，即雷默的副官和国家社会主义警卫营的高级军官，在命令下达时回忆起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这是他前一天在柏林看到的，他看到被希特勒解职的陆军元帅冯·布劳希奇身着全套军服从眼前开车而过现在当哈根听说要由国防军接管政府部门时，一个由布劳希奇谋划策动的武装叛乱的想法便在他脑海中闪现。哈根在平民生涯中是《帝国》杂志的工作人员，并从那时起就与戈培尔很熟。来到雷默面前，他要求去拜访一次戈培尔部长以便澄清事实的真相。哈根的紧急情况介绍把雷默弄糊涂了。哈根终于被允许同戈培尔进行一次会晤。

哈根立即来到戈培尔处。他得在前厅稍作等待，因为戈培尔正好在同纳粹司令部进行特快通话当通话结束后戈培尔让这位官员进入办公室，问道：“亲爱的哈根博士，什么事使您到我这里来啦？我能为您效劳吗？”

哈根报告说：“女神”行动已经开始，并简短地解释了一下命令的内容。但是正当他要谈到希特勒可能已经死了这一段话时，戈培尔开始谈话了

“这是鬼话。”他说，“元首仍活着。我在2分钟前刚刚同他通过话。虽然可以肯定有人对他进行了一次谋杀，但是他奇迹一般被救活了。这道命令是毫无意义的。”

哈根看了一眼窗外，再次转向戈培尔。“博士先生”，他说——因为他属于少数几个允许这样称呼戈培尔的人之一，“现在我们团的一部分人已开始行动。我建议您立即去见我的司令员。”

戈培尔平静地坐在他的写字桌上的第二个听筒前，这样哈根就可以成为亲耳听见谈话内容的证人。戈培尔以纳粹党省党部头目的身份命令这位指挥官集合他的队伍。但是在他得到戈培尔寄自下的进一步命令之前，不要采取行动

“您亲耳听到了，”戈培尔对哈根说：“我虽然已经动用了贴身警卫部队，但是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将尽可能地避免国防军同党卫军之间的武装冲突。所以，亲爱的哈根博士，现在请您回去，告诉你的上司尽快到我这里来。”

戈培尔陪哈根来到门口，抓住他的胳膊：“请告诉我这个雷默值得信任吗？”哈根回答说：“他可以用自己的性命为他担保”。

“那好，”戈培尔说，“那么您去叫他，并告诉他，如果在20分钟之内他没有在这里出现的话，我将动用贴身警卫部队。因为到那时，我就认为他被用武力扣留在班德勒街了。”当戈培尔等待雷默时，有人向他报告说一位少尉带着三个人奉柏林卫戍部队的命令，来保卫部长先生。戈培尔打开他的写字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他的两支手枪，把它们放在桌上，然后命令说，让这些人进来。但把通向前厅的门敞开。

当这位军官进来时，戈培尔对他大声斥责说，你应该清楚，你正在执行叛乱者的命令。也许你还不知道，希特勒仍活着？这位少尉在极度惊愕混乱中退了出去。

此间哈根向雷默少校汇报了他与戈培尔会面的结果，并请他立即亲自去见部长。在几番思考之后，雷默接受了这项建议。戈培尔成功地说服了这位少校并把他拉到了自己这一方最后他要通了希特勒的电话，在几句开场白之后，把听筒交给了雷默。希特勒那熟悉的声音彻底打消了这位少校残存的一些疑虑。希特勒对他识时务的行动进行了赞扬，并任命他为上校，命令他严厉地对付班德勒大街上的叛逆者。当谈话结束时，戈培尔建议这位新任命的上校，集合他的队伍，给他们作一次讲话。但是雷默太激动了，他没法去讲话。于是，就由戈培尔代替他致辞

雷默收回已做出的安排决定，取消对政府驻地的占领并发布新的命令抵制“女神”行动。同时戈培尔走出他的官邸，像泽姆勒形容的那样，它是监狱、司令部和法院的混合体。大约晚上8点钟希姆莱从拉斯顿博格来到这里，立即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整个晚上戈培尔和希姆莱审讯了在这段时间内逮捕的叛变将军们。进一步的逮捕命令已被下达并执行。在7月21日夜里一点钟之前，广播中播出了希特勒的一篇讲话。这位独裁者在讲话中大骂：“那是一伙追求名誉，毫无良心，同

时也是罪恶愚蠢的军官。”他还向德国人民报告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他已被奇迹般地救活。希特勒的讲话很短，他声音低沉、沙哑，声调毫无变化。人们能清楚地感到他仍然处于惊吓的状态中，当戈培尔听到希特勒这次讲话时，他非常震惊。他担心这种形式的讲话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直到7月26日他才亲自在广播中演讲。这是一个精心准备的报告。他详尽地介绍了这次暗杀的经过以及叛乱的失败。在此期间，他亲自去了几趟拉斯顿博格，在事发现场收集有关暗杀的细节情况资料。

泽姆勒陪同他的上司一起去了拉斯顿博格他报道说希特勒显然身体很虚弱，同时在精神上的惊吓要比身体上的创伤严重得多。他显然时常会有点短暂的精神失常，他的听力受到极大损害，有时他与人交谈时跟不上别人的谈话。他只是不断地重复，他要向那些背叛了他的人报仇，向他们以及他们的帮凶血腥地复仇。

戈培尔利用了希特勒的弱点。1944年德国至少要有一支100万人的军队在几个月时间内必须组织停当准备投入战斗。戈培尔渴望负责这个多军团部队的组织工作并且接管它的装备工作。希特勒把戈培尔渴望已久的全权终于交给了戈培尔。戈培尔以“全面战争的全权负责人”的身份凯旋柏林。

在从拉斯顿博格返回柏林的途中他对泽姆勒说：“如果我几年前就得到了这个全权负责人任命的話，那么我们早就赢得了胜利。战争也可能早就结束了。上帝知道我向希特勒作了多少次劝告，但是显然他一定先要在屁股下面放一个炸弹才会变得理智。”

十、垂死挣扎

1944年下半年，德国所有可以参战的人都被武装起来。8月24日戈培尔发表了讲话，详细阐述了全面战争的要求。为了使有作战能力的男人都能上前线，所有50岁以下的妇女都有义务去兵工厂参加工作。在所有兵工企业当中，尤其是军需品企业，普遍实行了每周70小时的工作制度。10月18日，16岁至70岁不适合上前线的男性公民都被编入了“人民冲锋队”。

德国人的生活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私人旅游被禁止，剧院关闭，杂志停版，报纸的出版发行降到最低限度。一切怀疑战争最后胜利的思想、厌战情绪和行为都被处以严厉的惩处。

1944年初冬，盟军部队逼近德国西部边境，同时进入意大利北部。苏联红军也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一时间，各方前线突然出现暂时的平静。

德国军队节节败退，8月失去罗马尼亚，9月失去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希腊也在10月失守。只有在匈牙利，德国军队熬过了新年。12月16日，为占领安特卫普，德军从其他前线调来大批军队，突然发动攻势。但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12月底德军便又毫无希望地陷入了停顿。1945年1月12日，苏联红军突破了德军的东部阵

1945年1月的柏林，寒风凛冽，惨淡凄凉，依然是希特勒的首都、帝国的首都、现已摇摇欲坠的大德意志帝国的中心。前方的各条战线虚弱万分，濒于崩溃。美国第一和第二军团击败并且重创了希特勒仅有的两个完整的装甲兵团，他的心烦意乱的将军们知道需要这批精锐部队来保卫首都。

柏林人默默地站在城市的瓦砾中的时候，看到了更加凄惨的事情即将来临。一队队衣衫褴褛的难民，日以继夜，绝望地迈着沉重的步伐经过这个城市曾经企图毁灭其他许多民族的希特勒现在也想要毁灭德国人民。

希特勒离开了“鹰巢”大本营，乘坐夜班火车回到了柏林。返回柏林不到二十四小时，他就决定进入柏林暗堡。

阿道夫·希特勒还要再活一百零五天。但在这之前的一整天他是在地面上度过的。党卫队的优秀卫士（元首警卫队）之一皮尔曼上尉在这整个期间都是负责侍候希特勒的。他说，“就我记忆所及，希特勒在1月16日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日出或日落。”他工作、睡觉、吃饭、喝茶、洗澡、梳妆、结婚和死亡，统统都在地下。在一个不分昼夜、只靠耀眼的灯光过日子的世界里，脱离现实的状况一周甚于一周。希特勒总是发火，时而又自卑自怜，他感到自己被背叛、抛弃。另些时候，他又像个半残的人，头部的动作就像一个精神病人。

希特勒固执地拒绝所有理智建议，他坚持不缩短战线，战机最后丧失。他丝毫不关心为德国人战后的岁月保留下些什么。在他失败的前六个星期，他曾对施佩尔说：“如果战争失败，德意志民族也就完了！”对他来讲，或者胜利，或者彻底灭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他下令破坏工厂，炸毁桥梁和铁路。他对每天前线接连不断传来的失利充耳不闻。有一次，戈培尔把一些被炸毁的城市的照片带给他看。照片被送回来时，博尔曼加上了注语：“元首不希望被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打扰”

对希特勒来讲，战争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形势讨论会。虽然残酷的战争带来的是满地弹痕，血流成河，可对希特勒而言，拉斯腾堡那美丽的草场和小溪却像一幅美丽画面，“与可怕的战争毫无关系”。希特勒避免与真正的前线发生任何关系，以此来保证其“天才的判断力”不受影响。然而眼下的战线不是在那神话般的拉斯腾堡东面几百里开外，而是一天天向柏林靠近。暗堡里的希特勒面对指挥地图，对那些名存实亡的部队发号施令。戈培尔和博尔曼虽然一直为争取希特勒更多的宠爱而明争暗斗，然而，在这可怕的一幕之中，他们两人都扮演了完全踏实的奴仆的角色；名义上里宾特洛甫始终是外交部长，可他早已变得无足轻重；戈林和希姆莱曾计划取代希特勒和对方谈判只有施佩尔一个人勇敢地拒绝执行希特勒丧失理智的命令——惨无人道地的毫无意义的大破坏。在纳粹内高级领导层中，只有他一人，意识到投降的最终结局，不承认这一点将带来损失和牺牲。他就像个男子汉，没有只是叹息，而是动手行动，他尽最大可能进行挽救工作。一段时间，他甚至一直存有一种念头，利用通气袋装置将毒气输入地下暗堡，毒死丧心病狂的独裁者——希特勒。

1945年1月间，苏联红军通过波兰，直逼奥得河。柏林局势岌岌可危3月16日苏军在南部前线维也纳方向打开突破口。3月，英、美军队跨过莱茵河。4月9日，柯尼斯失守。4月13日维也纳失守4月25日，美苏军队在易北河畔的托尔高会师。同一天，苏军对柏林的包围圈正式形成。

希特勒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判断力，他根本不晓得局势发生了什么变化。4月20日，他56岁生日时，曾有人建议他将指挥部转移到德国南部。他在短时间犹豫之后，决定在柏林等待他的末日。4月22日，戈培尔携夫人及六个孩子都搬到地下暗堡和希特勒住在一起。

1945年1月15日戈培尔在迎接希特勒回城以后，他就同他的私人新闻助手奥文中尉离开了柏林。戈培尔作为柏林地方长官依然要在剧情需要的地方进行表演，他要到前线去视察，要鼓动部队战斗到最后一刻，要为他私人报纸《帝国》的每周专栏写文章，还要每天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他的宣传部，成了留在地面上的最活跃的一个部。

到了三月初，红军快要发动横渡奥得河的攻势的时候，戈培尔把全家，包括戈培尔七十六岁的老母亲玛丽娅·凯赛琳娜和他的妹妹玛丽娅·基米希迁到柏林市中心的赫尔曼·戈林大街二十号。但他们刚刚安顿下来，美国空军就发动了白昼袭击，给政府所在地以最沉重的打击。新总理府受到直接打击。戈培尔的官邸虽未击中，但是窗玻璃全被震碎，楼上的多数房间都被消防水龙浇得湿透，再也不能住人了。因此戈培尔决定把全家搬到施万南韦德的避暑寓所里，而他自己仍然留在柏林。3月13日晚，戈培尔的办公室遭到一阵狂轰滥炸，整个建筑物彻底被摧毁。戈培尔把他的办公室挪到了他的官邸。

戈培尔临到最后，似乎更加疯狂。1945年3月5日，他劝希特勒在柏林组建女兵营。直到3月14日他还相信，只要人民法庭在柏林存在一天，特别军事法庭就没有必要设立。他口述道：“元首对我说，从现在起，流动的特别军事法庭在休伯将军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第一个受审的是一个失职的司令员，他对未炸毁雷马根大桥负主要责任而被处以死刑，两小时后被枪决。这至少是一个好的征兆。”3月9日，戈培尔去西里西亚看望他所推崇备至的陆军元帅舒埃纳尔时，称赞舒埃纳尔吊死了不少德国士兵：“我的工作人员托登霍费尔为此帮了舒埃纳尔大忙。”4月1日，戈培尔希望德国在投入“冲撞歼击机”后能在轰炸战中出

现转机，飞行员们应该驾驶自己的飞机冲进英美轰炸机群，将它们连同自己的飞机一起同归于尽。他说：“人们在期待着辉煌的战果，然而元首把下面一条消息看作是近期最佳报道，即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向斯大林作出让步，答应将德国战俘从西线送往苏联去服劳役。这和其他类似的报道肯定有助于提高我军的士气，因为我们还得留在西线。”

3月14日，如同往年一样，玛格达·戈培尔夫人带着她的孩子海尔加、希尔达、赫尔莫特、霍尔德、赫达和海德向妇产科医生施特克尔祝贺生日，这六个孩子都是由他接生的。戈培尔夫人说：“亲爱的枢密顾问先生，今天我们不可能像样地庆祝一番了。但只要斯大林不久以后感到厌烦。希特勒率领统一的欧洲战胜俄国，我们就能像往常一样来好好地庆祝您的生日。”在七十四岁的施特克尔住处倚着窗子可以看到街垒戈培尔夫人问施特克尔夫人，那是什么，听说”，其实她本来就已经知道了这是为巷战用的街垒。施特克尔回忆说：“玛格达太太表现出了极度的乐观主义。她说，‘啊，这只是为了安慰老百姓才干的，实际上它没有任何意义。’”

4月8日，身为“战争总动员全权代表”的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在柏林一兰斯多夫，自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发生了小规模骚扰事件。二百多男女拥进两家面包铺，抢走了面包……尽管眼下食品供应不是最好，但决不允许这样的事件发生。肇事头子，一男一女，当天下午就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其中一个女的情节较轻，我已决定予以赦免。其他两个人……我指使人将他们在夜间处死。”

1945年4月8日，美国人占领了图林根的爱尔福特，苏军占领了维也纳的火车东站和奥得河西岸。现在戈培尔只能口授日记或下令处死他的德国“男女同胞们”，他自己已经不能较长时间地写日记，而是开始向他的速记员奥特和雅克布斯进行口授。以前除希特勒之外，他是纳粹党人中精力最旺盛的人，而现在已经完全被1941年7月9日开始发作的那种疾病所制服，这种病就是：多言癖。他平均每天口授三十页打字纸——最长的一天有好几百页之多，不过是用一种特大号字体。

戈培尔每天口述，直到搬进帝国总理府的暗堡为止从那时起，他的目光更多地向着后世，而不是面对现实。他自1943年8月27日以来就做好了准备，那时“他的思想只是集中在一个宗旨上：历史的作用”。

谁若是威胁到戈培尔的身后荣誉，他就会设法除掉这个人。对他自己办公室里找借口出逃的人也同样如此，他通过报警电台下令抓住他们并立即处死。戈培尔当时主要担心的是怎样保存他的日记。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帝国机密收集人”奥托，吩咐他把打字件副本制成缩微胶卷，然后再把副本烧毁。大部分日记原件可能被苏军在帝国总理府的暗堡里缴获其余的被一位旧货商人在威廉大街的废墟堆里捡走，路易斯·洛克纳把这一部分进行了整理，在1948年出版了戈培尔的第一本日记选。

一个意外的消息，又突然使戈培尔振奋起来。

1945年4月12日，德国无线电监听站收到英国广播电台广播的路透社一条快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逝世。晚上十一时，这条消息传到柏林暗堡，正是希特勒举行午夜形势汇报会之前。

早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时，有人为希特勒提供了一张抽签算命的星相图，这张星相图预卜：“1939年爆发世界大战，1941年之前获得惊人的胜利，1945年最初几个月里会遭到一系列挫折，紧接着在1945年4月下半月取得压倒一切的胜利……”

午夜刚过，戈培尔乘坐汽车从奥得河前线视察归来，途中在宣传部门口听到罗斯福病逝的消息，他满面红光，邀请他的助手以及几名德国和中立国的记者到他的书房。他立即打电话给只隔五条街的希特勒。戈培尔说：“我的元首，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着的‘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这是不可思议的历史重演，这是在你的星相图中早有预言的转折点！”希特勒则回答说：“随着这一非同小可的转折事件的发生，美军和红军的大炮就会越过总理府屋顶进行交火。”希特勒的意思显然是指西方大国和斯大林之间的联盟会突然破裂。

戈培尔打完电话之后，紧接着就在他的书房里举行聚会来庆祝。

然而无论是戈培尔，还是希特勒都高兴得太早了。他们所期望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1945年4月中旬，戈培尔全家在施万南韦德住下后，关于如何拯救玛格达和孩子们曾经提出过两项计划。斯佩尔的计划是把玛格达和孩子们迅速转移到专用汽艇上，然后，沿着哈韦尔河顺流驶向易北河。此项计划不让戈培尔知道，因为斯佩尔认为戈培尔会坚决阻拦实施这

一计划。另一项类似的计划是戈培尔的国务秘书璩曼制定的，与上项计划只有一点不同，曾呈送戈培尔过目并得到他的赞许。这艘汽艇藏在芦苇深处作为他们的藏身之所，直到躲过最坏的时刻。可是玛格达立即拒绝了这两项计划。她说，她一定不能抛弃她的丈夫，又说，她决心让她的孩子们同元首一道死，“因为我的宝贝们太好了，这个糟糕的世界简直不配得到他们”。

几个星期来，戈培尔几乎是独自一人坚决主张在柏林坚持到底。而暗堡里的绝大多数人则赞同选择阿尔卑斯山堡垒作为最后防御阵地。他们渴望撤到伯希特斯加登。早在3月29日，以鲍曼为首的伯希特斯加登派控制了元首。戈培尔从宣传部匆匆赶到暗堡，他拉住希特勒的两边衣襟，恳求他记住1933年1月30日夜同戈培尔一起所作的庄严宣誓。那一天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入主总理府。他同戈培尔一起宣誓：“我们决不自动放弃这座建筑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赶出去！”

这期间，戈培尔经常出现在暗堡，但从不逗留太久。当希特勒部署幻影部队时，戈培尔调集了八万名人民冲锋队的士兵。配备了柏林制造的火箭筒，用柏林双层米色公共汽车把他们运到奥得河。他经常视察那条战线他同被困扰的将军们举行的会议要比希特勒同他所举行的会议现实得多。在他的疯狂之中有着条理性。

4月20日，戈培尔参加希特勒的生日庆典后没有呆多久就早早地离开了。他径直到他的办公室，同奥文中尉一起站在旧式瓷砖壁炉前，把许多纪念品扔进火里，其中有：他七岁时穿着海员服装的照片，他的中学成绩单，他父亲的一叠来信，履行基督教按手礼的照片，他们毕业班同学的集体照片。最后扔进火堆里的是一个年轻女人的上光相片。这是捷克美人莉达·巴洛娃1938年赠送给她情夫戈培尔的。

很难判断，戈培尔对希特勒的信念是否自始至终都未曾动摇过。从他的日记和他周围人的介绍情况来看，可以肯定，他已对希特勒的“永远正确”不抱任何幻想。他把自己和家人共同面临的末日不仅看作是对希特勒的效忠之死，而更看作是他从世界历史舞台退出的英雄壮举，是他将留给后世的英雄形象的最后一笔。

希特勒被戈培尔在最后几个月里所表现出来的忠诚不渝，献媚的言辞，及近乎狂热的工作热情所打动。在戈培尔庆祝最后一个生日的时候，希特勒用行动证明了他对戈培尔忠诚的珍视。希特勒亲自给戈培尔家里打电话，表示祝贺。之后，他又要与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通话。玛格达放下电话后便高兴地哭了。希特勒向她保证过圣诞节时在西线取得胜利。希特勒这里所指的是阿登山脉战役。这次战役在10月29日显然已经计划好了。当时，所有参加生日会的人都被这一消息所鼓舞。每个人都认为，元首将打出取胜的王牌。戈培尔信心倍增他还让他母亲在圣诞节前来到时时受到轰炸危险的帝国首都。这其中当然还有家庭的原因：戈培尔的妹妹玛丽娅·金米希自结婚后便住在柏林，要在新年初生孩子。1944年的圣诞节，金米希和戈培尔两家最后一次相聚。其间玛丽娅和玛格达谈了很多。在玛丽娅答应保守秘密的前提下玛格达告诉她，约瑟夫看见了一种新的秘密武器这种武器将使希特勒通过宣传部长之口许诺的根本性战争发生转机。

1945年1月12日，戈培尔家里举行了一次聚会

希特勒自五年来第一次来戈培尔家里做客。他来喝茶。戈培尔的孩子每人手握鲜花在大厅里欢迎他。4点30分希特勒的汽车开到，所有人都做好了迎接的准备。女孩子们向希特勒行屈膝礼，男孩子们上前服侍希特勒说他没有想到孩子们都长得这么快。然后，他向戈培尔的妻子献上百合花，并解释说，因为戈培尔博士关闭了柏林所有的花店，所以也找不到更好的花

戈培尔把在场的同事一一介绍给希特勒，随希特勒同来的还有一位副官，一位侍官和私人卫队的6名党卫队军官。侍官手里拿着希特勒那只写着白色“F”的文件包。他的口袋露出一只暖瓶头，这说明希特勒带来了自己的茶和点心。

喝茶喝了一个半小时，普通人不允许参加。在中厅里的只有戈培尔一家、希特勒、副部长瑙曼博士。晚上，戈培尔夫人介绍说，希特勒很喜欢这家庭气氛。看起来，他很高兴能有机会摆脱他那僧侣般的清净生活。他还答应，不久还会再来做客。

戈培尔夫人告诉人们，大家一直听希特勒一个人讲话。他不仅回忆起1932年，而且也谈了重建柏林的计划。

在吃晚饭时，不仅戈培尔夫人，就连戈培尔也为希特勒的来访深感骄傲。“他肯定没有去过戈林家。”戈培尔夫人说。

璩曼对这次喝茶记忆犹新，他同样记得当希特勒要来做客的电话从总理府打来时所引起的振奋，因为和从前一样消息来得很突然。

这时的戈培尔不仅是宣传部长和纳粹党柏林党部负责人，而且还负责全面战争，所以在战争最后一个冬季，他忙得简直不可开交。有时突如其来的沮丧使他无法不知疲惫地工作，于是他便把自己关在家里读历史书籍。他特别喜爱读的是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政治通信及蒙森的《罗马史》，史中有关布匿战争的章节。他身边的人如果对战争表示怀疑或有气馁情绪，他总是愤怒地驳斥。他仍是亲赴前线，鼓励军官和士兵安定信心，给他们描述不败的祖国将给予他们的伟大前程。然而，他自己却似乎并不完全相信这一切。1944年10月29日，在他过生日之时，他曾在晚餐后把温克勒尔博士拉到一边，向他倾诉了自己对家庭前途的忧虑，而且还讲了一些有关遗嘱中财产分配问题。很显然，这时的戈培尔已经开始策划自己的死，但并没有设想一般人的死。几个星期后，将近11月底，在他的命令下，宣传部开始有计划地销毁那些无论如何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的文件。1945年2月，戈培尔可能告诉他弟弟汉斯，把有关家庭的所有材料，包括他本人青年时期的文学创作全部销毁。他弟弟没有按照他说的去做。

情绪消沉时戈培尔常大发牢骚，可他从不允许下属有任何抱怨。有一次泽姆勒从南德短期探亲回来，讲述那里人们道德的沦丧，戈培尔狠狠地骂了他一顿。相反，他自己在一次宣传部的会议上出乎意料地对他的下属们说：“我们应该清楚，我们的末日就要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简直是一无所有。没有什么秘密武器。”还有一次，当一位联络官吹嘘阿登山脉战役时，他打断说到：“像我们这些人都在考虑是不是到了该毒死妻子和孩子的时候，你却坐在那儿讲些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

戈培尔确实很少像这样表露自己的感情。有一次，他曾对弗里采说战争结束后他要去美国那里有人懂得真正重用他这个宣传天才，并付给他相符的报酬。没人晓得，他这私话是出于真心还是自我欺骗，抑或只是耸人听闻的装装样子不管怎么产，戈培尔在他搬进地下暗堡之前，对他的文章和讲话做了大量修改。

他把自己十分得意的日记看作是一部珍贵无比的历史文献。就在死前几个月，他还让人为他的日记制作了缩微胶片。近三十年的日记制成缩微胶片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技术人员日夜不停地干，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完成全部日记的缩微胶片最后保存在瑙曼的装甲车里。后来这些胶片落到了苏联人手里。

有时，戈培尔还表现出抑郁病人的症状。右一段时间他以为得了癌症，并且做出许多病态，实际上他只是患了轻微的胃溃疡。他时常被迷信的强迫观念所控制。“戈培尔是一个很迷信的人，形势越是危急，前途越是暗淡，这一点就表现得越明显。有一次，戈培尔对部下说，他母亲曾产生过幻觉，后来一位耶稣会的神父帮她摆脱出来。戈培尔曾看见死了一个星期的祖父来到他面前。在维尔茨堡上大学时，有一次，他说他看见了当时被俘在法国的兄弟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房间里”

有一次，戈培尔曾无意间从写字台上把希特勒的像框碰到地上。一块碎玻璃片扎进相片上希特勒的左眼里。戈培尔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搞得不知所措，呆了很长时间才回过味儿来。

1944年，戈培尔费尽心机要找一位算命女人，因为这个女人曾在1923年详细预言了希特勒取得权力的各种细节。他想让这个算命女人告诉他眼前的战争将会有个什么结果。然而他耗尽了人力和物力也没有找到在指挥全面战争的九个月里，戈培尔没有多少时间顾及宣传部长的工作。实际上，他除了号召德国人民誓死抵抗并摧毁可供步步逼近的苏军、盟军所用的一切之外，没什么可以说的了。他曾发表了许多被苏联人奸淫的妇女的照片，可这并没有激发德国人们的反抗意志，反而增强了人们的恐惧。所以，东部向西部的所有道路都被挤得水泄不通，只因为人们宁可落入西面敌人的手中，而不愿落入东面敌人的手中。

戈培尔最后一段时间的新闻稿和广播稿中出现了一种他那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的奇怪变种：

.....现在，一切都趋于毁灭。所以，我们必须承担重建欧洲的使命。从前个人财产的增长力会使人变为有产者，如今枪炮并不比监狱的高墙更能将欧洲人消灭.....敌人企图破坏欧洲的未来，而他们所达

到的，只是消灭了它的过去，其结果只是旧的和过时的一切被消灭了。

疯狂的破坏欲驱使他要毁灭整个地球：“不要留给他们任何有用的东西，烧毁田地，把工厂夷为平地，炸毁桥梁，让所有的交通工具去见鬼吧！”他和希特勒一样丝毫不关心德国人民的命运前途。“如果我们退出历史舞台，那么我们就只能背水一战。让地球发抖吧！”

戈培尔想用德意志游击运动的英雄传说来振奋已经在精疲力尽地等待美军到来的德国西部城市里的人民，他发明了“狼人”。可“狼人”没有什么英勇行为可供报道，宣传部长只好借助于“诗意的真实”。4月1日，在最后失败的前几个星期，广播里开始常常报道狼人。宣传部长戈培尔宣称，比起在法国、挪威和巴尔干半岛上的反法西斯游击战，德国的游击战更强大，更壮烈，更有效。这最后的“诗意的真实”预言，西方盟军与苏联军队不久将会宣战，那样德国就会变成坐山观虎斗的第三者。1945年1月30日，希特勒正式命名戈培尔为“柏林的保卫者”。戈培尔于是成为武装抵抗的领袖这一命名使惊恐中的柏林人认识到，希特勒将把帝国首都变为战场。为表明自己的身份，戈培尔有时戴一顶军帽，不过大部分时间他仍不穿军装或佩戴军衔。戈培尔决不让人怀疑他坚持战斗到底的决心。当政府其他各部有的已向南移，有的做南移之准备时，他却命令宣传部顽强地坚持工作。2月4日和2月23日，宣传部遭到了严重的飞机轰炸。戈培尔一方面把工作人员转移到防空帐篷里，另一方面把他本人和高级官员的办公室搬进了附近自己的住房。

2月中旬，德累斯顿遭受了唯一一次轰炸，结果非常惨重。城市的五分之四成了废墟，约有6万人丧生，戈培尔悲愤至极。

戈培尔完全丧失了自制力……在第一批可怕的消息传来时，他便大哭大嚎起来。20分钟之后，他仍哭泣不止，看起来精神完全崩溃了。后来，他突然间又可怕地发起火来，头上青筋爆裂，满脸通红。

气愤之极的戈培尔想起要向希特勒提建议，通过破坏日内瓦公约来阻止空袭，他建议立即枪毙德军手里的盟军空军战俘。希特勒很赏识这一建议，并着手准备实施时，他又从人道主义出发，把这消息透露给一位中立国的记者朋友。这位记者马上将这一情报报告给伦敦方

面。英国外交部和作战部马上便做出严肃郑重声明，倘若德方准备破坏日内瓦公约这一传闻是真的，他们将施以最严厉的报复措施。纳粹总理府里的人们只好放弃这一计划。

戈培尔为自己的想法泄露到国外又一次感到气愤之极。可他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的元凶就是他身边的人。当戈培尔副手泽姆勒采取这一行动时，想到了三个月前他与玛格达的一次谈话：

“戈培尔夫人比我更清楚，她丈夫虽然是个天才，可有时又是个地地道道的魔鬼，昨天喝茶时我们又谈到了这一点。她再次请求我，一定要尽力阻止他在丧失人性的情绪下所采取的行动。她还告诉我，她同时也向我的其他同事发出过同样的请求。”

这时，在希特勒的地下暗堡里，自杀药囊像无价的珍宝一样在人们手中传送。希特勒的那些忠诚而勇于献身的随从们做了充足的准备，以使他们可以很快地死去。玛格达·戈培尔从墨雷尔教授那里得到了足够她和孩子们服用的自杀药囊。可她不和她那忙得不可开交的丈夫谈论此事。当她忍不住要向人交谈时，她便去找泽姆勒和他的同事。

“……这段时间她常来到我们的工作间，向我们倾诉。我内心深处很同情她，她对未来不再怀有任何幻想。她承认，她很怕死，并且知道死正在时时向她逼近。她不想和她丈夫谈这些事情她认为，他正承受着平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今天她告诉我她已经决定冷静地去迎接死亡。但她总不能想像她怎么能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每天晚上，当我送六个孩子去睡觉，四岁的海德，五岁的海姐，七岁的霍莉，九岁的赫尔穆特，10岁的希尔德和12岁黑尔嘉，一想到几个星期后就要亲手杀死这些无辜的孩子，我就痛苦得要发疯。到那时，我可怎么下得了手啊，我的脑袋简直要炸开了。我不能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丈夫。他决不会让我动摇他的决心。他认为，只要他还可以战斗，那么就不会输得精光。几天前，她丈夫还劝她和孩子一起向西边转移，不管去哪，只要求能落在英国人手里。他们英国人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玛格达·戈培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建议，我决不丢下你离开。’她决心已定。”

这些事发生在2月底。早些时候，2月10日，她还给在英军战俘营的大儿子哈拉尔德·万克特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儿子：从我上次给你写信到现在，已有差不多四个星期过去了。可我无时无刻不挂念着你。我担心，你会惦念我们，因为现在的形势的确很不妙，可你不必担心，我们身体都很好。在这种关键时刻全家人应该呆在一起，所以我们离开了家都住到柏林来，虽然不断有空袭，我们的房子还没有被炸倒我们，你祖母以及其他亲戚都不愁吃喝。弟弟妹妹们为不用上学而高兴谢天谢地，他们都无法理解现在的形势有多么严峻。我和爸爸仍充满信心，会尽好我们的职责。

11月以来，我就一直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你爸爸听说，你的情况有所好转尽快写信告诉我，你被打掉了几颗牙，臀部的伤不影响走路。

紧紧地拥抱你！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

你的妈妈

戈培尔的妹妹玛丽娅·金米希也证明，玛格达已经放弃了自己和孩子生存下去的希望玛丽娅曾劝她把最小的孩子海德留下来由她来抚养。玛格达坚决不同意：“我现在不能离开约瑟夫”，“我必须与他，与元首一起死。如果我死，那么我的孩子也得死。所有的孩子，没有例外。我不能容忍让其中的一个留在世上，即使交给你也不行。”

璫曼也曾试图劝玛格达，保全自己和孩子们的性命。就在宣传部遭到第二次严重的空袭时，一部分办公室被迁移到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柏林的住宅，戈培尔把家人送到了施万恩威尔德。璫曼自做主张在紧靠玛格达和孩子住房的万塞湖的小岛上拴牢了一只船，他准备在船上贮藏足够几个月的食品他建议玛格达和孩子们在失败后前几个混乱星期先躲在这只船上，之后再向占领军投降。戈培尔表示同意并力图说服他妻子。可玛格达根本不听这一套。她已决定为了希特勒和行将毁灭的帝国而献身。另外，她一想到她和孩子落入占领军手中将要受的痛苦便害怕。她不想忍受这种折磨，所以在四月的第一星期她便又回到城里，回到了自己丈夫和希特勒身边的位置上。

这期间，戈培尔尽力扮演他柏林保卫者的新角色，做好了抵抗到底的准备。只要有写字台、打字机、电话，他就让他的下属坚持工作。后来，他们也像其他柏林人一样拿起了手枪或防坦克导弹发射

器，准备为保卫帝国首都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这是戈培尔的想法他根本没有想过，大部分柏林人更想熬过这场战争，生存下去。戈培尔命令在城里到处修筑街障他对德国西部城市举白旗向盟军投降不屑一顾。“如果在柏林的街上，出现一面白旗，我马上就让这整条街和街上所有的人上西天。元首完全同意我这么做。”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被编成了一个特殊的“人民冲锋队”，队长由维尔纳·瑙曼担任，冲锋队的名字为“威廉广场大队”

四月，围绕希特勒是否该留在柏林这一问题，希特勒身边的人一直争吵不休。戈培尔不止一次劝希特勒应该去南方，收回那里的指挥权；又曾说服希特勒在柏林坚持到最后，并死在一直作为他权力象征的这座帝国总理大楼里。希特勒本人同意这后一种想法，并顶住了大多数人对提出到巴伐利亚去作最后斗争的建议。在4月20日的会议上，他又好像已决定转移到阿尔卑斯山的工事里去，从凯塞林手里收回指挥权。这时，他命名海军元帅邓尼茨为北部总指挥，总指挥部设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普伦。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希特勒和几位军队要人外还有纳粹党的六位领导人：戈培尔、博尔曼、施佩尔、希姆莱、戈林及里宾特洛甫。戈培尔对身边的这些同僚褒贬不一，他看不起戈林和里宾特洛甫。施佩尔没有任何权力欲，戈培尔对他的勤奋及组织天才深表钦佩，对博尔曼和希姆莱他从未掉以轻心。这两个人都是实力派，博尔曼是希特勒最亲密的人，希姆莱既是党卫队的头目又是内务部长。戈培尔曾试图与这两位实力人物共谋大事。1945年2月，在柏林北边40公里的霍恩申疗养院，他曾和希姆莱进行过一次长谈。两人讨论是否可以说服希特勒改组内阁。戈培尔曾当着泽姆勒的面向她妻子玛格达谈起过他对新内阁的想法：他自己当总理，希姆莱当军队最高统帅，博尔曼做党的主席，希特勒做高高在上的领袖，只是由于希姆莱想再等一等，所以这个计划便最终没有实现。戈培尔的部下描述戈培尔和希姆莱的关系：

虽然他们俩人在工作上配合默契，戈培尔却很明显无法忍受希姆莱，戈培尔非常讨厌“不具美感”的人，他毫无疑义把希姆莱划归到这类人当中。他那亚洲人脸部轮廓，香肠一般的手指，脏污不堪的指甲——所有这些都与戈培尔格格不入。相反，他很佩服希姆莱的专制及为达到目标而采取的残忍手段。

自希特勒常常来玛格达家里做客以来，戈培尔与希特勒的关系在最后几个月里较之希特勒夺取政权以前明显密切多了。施威林·冯·克里西克伯爵曾在其日记中写道：戈培尔告诉过他，为了安慰元首，他给希特勒读过英国作家查尔斯的作品《弗里德里希大帝》，特别是七年战争中最困难时期的一章。那时，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弗里德里希大帝像希特勒一样也准备好了自杀的毒药。虽然，俄国敌人使他深受困扰，可他在给阿尔让松侯爵的信中仍言辞优美，充满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当听宣传部长用他那专业水平的嗓音绘声绘色地朗读这一段时，希特勒一定感到这是一种享受。

更打动希特勒的是，天意在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这位伟大的皇帝。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突然暴死，她的继承人彼得三世是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崇拜者和朋友。戈培尔告诉施威林·冯·克里西克伯爵，听到这段时，希特勒的心情便激动异常，兴奋的泪水在他眼中闪亮。

查尔斯的书带给希特勒和他的帝国一种天命的安慰。希姆莱还建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天意的部门。两者的结果都预言，在4月后半月时间里，德国将取得扭转败局的胜利。这种预言鼓舞着人们，他们期待着伟大的神灵显示威力。

戈培尔在4月13日经历了这一显灵。这一天下午，他视察第九军团的总指挥部，向年轻的军官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又一次提到弗里德里希大帝在最危急时刻的命运转变一位年轻的军官大胆地问他，这一回该是哪一位女沙皇的死亡才能使祖国得救呢。戈培尔无言以对，可就在当天晚上，遭受着空袭的柏林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的消息。当宣传部长从屈新特林刚一回来，泽姆勒便把这一好消息告诉给他。戈培尔的脸色苍白，这消息对他的触动太大了。他命令马上在他的办公室里准备好香槟酒，并立刻打电话通知希特勒。他打电话的语气极其庄重，当时在场的都记住了他讲的原话：“元首，我向您表示祝贺。罗斯福死了，命运惩罚了您最强大的敌人。上帝没有抛弃我们，奇迹终于发生了。他的死和七年战争中女沙皇的死一样，星相上说了，四月的后半个月将给我们带来伟大的转机。今天是星期五，4月13日，今天就是转折点。”

然后，他们便推测谁会是罗斯福的继承人。杜鲁门很有可能，他比强硬的罗斯福要温和得多，满怀希望地与希特勒通过电话之后，戈

培尔又立刻往屈斯特林打电话，告诉那些丧失信心的军官“美国女沙皇”之死的消息。当他放下话筒时，满脸红光，精神异常振奋。在1945年4月，这是让人抓住不放的最粗的救命稻草。相信天命的人同样无法不相信这一历史性的相似，整整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是在一种极度亢奋的情况下度过的。可第二天，他们的亢奋便大大减弱了，盟军并未变得友善没有了罗斯福，战争照样进行，快到晚上的时候，戈培尔又很垂头丧气：“前途不测，命运又一次愚弄了我们。”

几天之后，4月17日，戈培尔就刚刚拍摄完毕的一部影片《科尔贝格》发表讲话，这部影片在老百姓的嘴里被称作“顽固电影”。为了完成这部影片的拍摄，戈培尔一反他在战争中一切开销厉行节俭的做法，影片讲述的是科尔贝格城堡在反拿破仑战争中的英雄事迹。

戈培尔在电影放映前对下属们说：先生们“百年之后，将上演描写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苦难的战争时代的影片你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自己选择在这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我们英勇战斗，那么我保证这将是一部激动人心的影片。百年之后，当你们出现在银幕上，你们将赢得观众的掌声还是被人唾弃，这完全取决于你们现在的努力。”

这是宣传部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泽姆勒也参加了。有近50名部门负责人出席泽姆勒说戈培尔离开会场时面色苍白，两眼发光他的那些听众一时不知道是该大笑还是该诅咒。第二天，泽姆勒让妻子和孩子搭乘了最后一辆去南部的公车，他把日记本交给了自己的妻子。

几天之后，又有一家人转移了，戈培尔那近80高龄的老母还住在柏林她女儿玛丽娅家里。由于一月份刚出生的孩子，再加之玛丽娅的丈夫金米希手上有烧伤，所以转移的事情一拖再拖。当局势的发展不允许他们继续留在柏林时，已经没有交通工具了。戈培尔的老母只能在她女儿的搀扶下徒步离开这座燃烧的城市。他们为快满三个月的孩子找来一辆小推车，金米希一只手吊着绷带，一只手推车。

4月19日，希特勒生日的前夜，戈培尔发表了他最后一次重要的广播讲话。他力图使用一种充满希望的声音，从他的用词当中，人们几乎可以猜到戈培尔打算效忠元首而死。

我们看到，战争进行到今天，或许所有仇恨我们的破坏力量都完全从西、南、东和东南方涌来，他们要冲破我们的防线，置我们的帝国于死地。在这一时刻，像1933年以来的每年一样，在4月20日的前夜，我又来到人民面前，讲述元首的业绩。往年的这个时候，虽说有幸福有困难，但都从未像今天这样，形势如此严峻。德国人民必须起来保护自己的生活会，保卫自己受到严重威胁的帝国。

今天不是像往常元首过生日一样说些老生常谈的客套话或向他表示一般性祝福的时候。今天我们谈的要更多一些。要谈一个对元首和人民来说都需要谈的事。我跟随元首有20多年，从他本人及他事业的开始一直到他取得政权，我都在他身边并尽了我所有的力量，与元首荣辱与共。20年来我们取得过前所未有过的胜利，也遭受过最惨痛的打击。从1939年到今天，我一直与他共同度过。现在，命运向他和他的人民提出最后、最严峻的考验，我仍站在他身边，我要向他和他的人民献上胜利的花环，我坚信会是这样的时代。我只能说，在最黑暗和最痛苦的时代，我们的元首是时代唯一的代表。如果说德国依旧存在，如果说欧洲和文明的西方国家的文化和文明没有完全坠入我们面临的深渊——这一切都应该感谢元首。

我们的敌人称元首的士兵是践踏欧洲国家的侵略者。然而，元首的士兵所到之处，出现的是富裕、幸福、安宁、秩序，稳定的关系和大量就业，从而产生的是一种尊重人性的生活。我们的敌人称他们的士兵是来到这些国家的解放者，可他们的所到之处，出现的是贫穷和痛苦，社会混乱，百业停顿，毁灭、失业、饥饿和大批人口死亡，所谓的自由所带来的只是一种即使在非洲最黑暗的地区都被称作不人道的苦难人生。这里有一幅轮廓清晰的蓝图这反对犹太——财阀——布尔什维克破坏世界的誓言，只要有合适的时令，这张蓝图对我们的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所有人都将是切实可行的，有益于人类和各民族的，具有积极意义和未来眼光。这里有一人，他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抵抗那些破坏世界的阴谋者所结成的敌对联盟欧洲曾在两者之间进行过一次选择，它选择了无政府混乱的一方，今天它必须为此付出百万倍的沉重代价。它现在马上又要对自己的未来做抉择。这是生死攸关之举……

纳粹首都的最后包围及苏军对所有交通要道的封锁都已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想离开柏林的人也不能再犹豫了。戈林草草告别之后便离开地下暗堡，很快在通往上萨尔茨堡的路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希姆莱去了霍恩申疗养院，里宾特洛甫在北面消失。希特勒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

戈培尔没时间举行告别仪式。尽管柏林白天和晚上都遭受空袭，可他和他的下属们仍继续工作。他手下的人很少有开小差的。这期间，施佩尔已着手为战败后的时间做准备，并为德国人民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生活基础他没有完全遵守希特勒和戈培尔下达的毁灭一切的命令。在这一点上他与汉堡的市长、汉堡纳粹党部书记卡尔·考夫曼结成了紧密的联盟。毫无疑问，这两个人，一位是部长，一位是地方党部书记，使德国人民避免了一场饥饿灾难，而希特勒所预言的正是这样一场饥饿的结局。

4月21日，希特勒命令向苏军阵线发动猛攻，这场战斗一直没有进行4月22日上午，他为自己的命令无法贯彻执行而暴跳如雷。眼下总理府一片废墟，谁在这儿工作或假装工作，都只能坐在各部和花园下面无数地下室或地下暗堡里。有一天，戈培尔和瑙曼站在被炸毁的宣传部的剩余的一扇窗前。戈培尔有感而生：“我们所经历的，是本世纪史无前例的历史戏剧，除耶稣受难之外其他世纪也没有类似的情况。”轰轰炮声构成他讲这些话的声音背景，在他绝望的妄想中，耶稣受难圣地和世界的末日组成的差不多是一种亵渎神明的混合体

4月22日，希特勒召集指挥部的人举行最后一次大型形势讨论会。整个会议期间，大家都哑口无言惊恐地听希特勒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大发脾气，他诅咒敌人的可恶，自己人民的劣根，那些把他撇在柏林等死的人对他的背叛，他整整骂了三个小时。然后，他突然坐下来，这是他最后一次发火。很显然，在这种时刻，希特勒承认了自己的最后失败。当时，戈培尔并没有在场，后来他通过电话宣布了这次会议的决议：

保卫柏林的战斗必须坚持到最后，元首将留在柏林，一切顺其自然。

希特勒平静下来之后，便派凯特尔去增援被困在易北河的温克的第七军团。人们一直期待这支部队能来解柏林之围。可它始终没有到达柏林，甚至一直都没有任何希望达到柏林，然而它却是希特勒从战火硝烟的城市躲入地下暗堡里时唯一的一点希望之火。这天中午，他同意戈培尔和他家人都搬进地下暗堡。

十一、恶贯满盈

1945年4月22日，像希特勒最后那段时间的所有日子一样，在会议室里聚集着前来参加例行的“局势讨论会”的陆、空军将领和海军将领。趁等待元首到来的时候，他们讨论了逃离柏林的问题。但怎样才能说服希特勒？剩下的机会已不多了。前一天，希特勒命令党卫队施坦因纳将军在柏林西北部的装甲军发动反攻但是施坦因纳残剩的兵力不足一万一千人，不到五十辆坦克，其中多半又缺少汽油。而这时，苏联红军的整整一个军团正在向他的阵地运动。

希特勒一到，会议就开始了。希特勒说，战争失败了，他将放弃最高指挥权，派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到南方去，指挥抵抗运动，他自己则留下指挥柏林战役，他是不会投降的，因此他将自杀，现在想离开暗堡的任何人都可以走，全体妇女可以飞往伯希特斯加登。

会上是一片惊魂未定、消沉、悲观的气氛。但是戈培尔出现后，与会者的情绪发生了变化。这个善于辞令的戈培尔发表了“激奋人心”的讲话，声称西方大国正在准备……同希特勒政府进行谈判。这条新闻又勾起了某些幻想，也就是说，还必须坚守数日，不让苏军进入柏林中心，如果可能的话，迫使苏军退出市区，退回到奥得河一线去……

陆军元帅凯特尔、约德尔将军和克莱勃斯早已习惯于听戈培尔的空话，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希特勒于是命令把西线的全部军队调来保卫首都，“这是必须做到的。”戈培尔补充了一句。

希特勒还下了一道命令，这是戈培尔长期以来求之不得的命令：由宣传部长在柏林电台宣布，“元首在柏林，而且将同他的部队一起为保卫首都血战到底。”柏林人同其他德国人一样，上一次听到希特勒的声音是在1945年1月30日，那是他最后一次在电台的讲演，但他当时没说他在哪里。因此，这是柏林人第一次听说希特勒同他们在一起。戈培尔在元首提出要求的半小时后，就作了4月22日的广播讲话。这次广播讲话使戈培尔巩固了对希特勒在暗堡的一班顾问们的胜利，因为他

们中除斯佩尔以外，全都赞成撤到伯希特斯加登去。现在，戈培尔本人则准备接受希特勒的邀请迁入地下。

下午五点半，戈培尔把工作人员叫到一起，突然宣布将他们全体解职，要他们参加即将开始的战役，否则他们可自谋出路。他的助手们已帮他烧毁了他自己的文件，另一名助手几天来一直忙于把他的日记摄成一式三份的缩微胶卷。

两辆奔驰牌小轿车停在门外，象征着现在已到了戈培尔进入暗堡前的最后时刻。其中一辆是1941年希特勒赠送给戈培尔的高级官员用的防弹车。他把夫人和孩子们塞进一辆普通车之后，钻进了他自己的专车。由于苏军突破德军防线的速度比戈培尔预料的要快，甚至没有时间给孩子们装一些梳洗用品，每个孩子只抓了一件玩具。玛格达只拿了一只旅行箱和一套换洗的衣服，而戈培尔只带了两件珍贵的白衬衣戈培尔同他的夫人玛格达和六个孩子作为常住居民搬进柏林暗堡。对住在暗堡的人来说，他们的到达只有一个含意：它与一星期前爱娃·勃劳恩的到达一样，暗示了末日也许即将来临。

戈培尔的下属泽姆勒站在房门前与他们告别之后，就要去他所在的冲锋队

戈培尔感谢他的工作，并告诫他要尽好一名士兵的职责。戈培尔很平静，一切都像例行公事，而玛格达和孩子们则不停地哭泣。泽姆勒在门前又站了几分钟，目送着汽车在远处消失。

4月的第四个星期天，对戈培尔来说过得相对平静一些。他与几个人谈过话，口授了日记，然后又通过广播宣布希特勒把柏林变为战场的命令。录音的时候，盟国的炮火轰个不停。有一次，炮弹在附近爆炸，干扰了录音工作。当监听录音时，他竟认为炮弹的爆炸声起了很好的烘托作用。之后，他又接见了温克勒尔博士，感谢他这些年来为他所做的一切。当他与这位老先生握手告别时，他说我们不会再见面了”。他对速记官奥特却没有这股诚实劲。他只告诉他，他要到希特勒的地下暗堡去住一个星期。只要温克的军队打进柏林，他还会再回来的他告诫奥特不要参加战斗，保护好自己，很快就会有更多工作等着他去做。

戈培尔完全没想过要从希特勒的地下暗堡里出来。而瑙曼认为，西部盟军早晚有一天会和苏联人闹翻脸，与德国军队结成同盟共同抵抗布尔什维克对世界的威胁。

戈培尔刚刚离开，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人便纷纷逃命。这情景就像船长离开了将要下沉的船，船员们马上四下逃窜。他们大部分人早就收拾好了箱子，所以撤离的准备很早就做好了。他们很感激有这种解脱，只是有点担心，现在跑是不是太晚。所有参加了人民冲锋队的人还必须坚守岗位这期间戈培尔和希特勒在暗堡里进行了第一次谈话。他向元首保证自己心甘情愿与他一同面对死亡。

希特勒的地下暗堡的内部结构共分两层。第一层分为十二个小间，其中有四间专用作厨房。房间都连着中间走廊，吃饭一般都在走廊里。在走廊的尽头有一旋转楼梯向下通向希特勒的地下宫殿。这一层由十一间不很大的房间组成，中间同样也有一条走廊。走廊的后半部当作会议室用，据人讲，这儿只有6平方米。墙一律漆成灰色，上面没有什么装饰物。所有的家具包括一张棕色的靠墙长凳、一张很大的放地图的桌子和一把椅子。两条走廊相对来说比较宽敞，而所有的住房则比较窄小，不比火车卧铺包厢和船上的小包间大多少。希特勒和埃娃·布劳恩使用六个房间，另有五个房间分别是洗手间、配电室和电话间。地下暗堡有两个主入口，一个通向总理府的厨房，一个通向外交部花园地下暗堡还有一个紧急出口，从暗堡下层的尽头通向总理府的花园。希特勒、埃娃、戈培尔、戈培尔的妻子和她的六个孩子就是这座双层暗堡的主要居住者玛格达和孩子们分别住在同一侧的四个房间里，戈培尔住在希特勒对面的房间里。暗堡里住的其他人还有戈培尔的副官冈特·施魏格曼，希特勒的医生路德维希·施图姆菲格博士，他来接替4月22日离开的默雷尔教授。另外，暗堡里还住着希特勒的副官·希特勒的侍卫官和两名女秘书以及为希特勒做素食饭菜的厨师。博尔曼在附近有自己单独的暗堡。据暗堡里值班的军官讲，戈培尔一家住的房间“布置得非常豪华”。但瑙曼的说法与此正相反。博特说，在暗堡里面及其四周工作的党卫军、传令兵、文字人员、侍卫、厨房人员一共约有六七百人。博特曾到过地下暗堡多次，每次从里在出来的时候，他都为逃离了暗堡里令人窒息的气氛，重新又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而感到轻松愉快。另外，他还提到，在希特勒和埃娃举行婚礼之

前，他“不仅从没有见过这个女人，而且从未意识到过这个女人的存在”。

当然，在最初的几天，地下暗堡里拜访者络绎不绝，也经常举行会议。在暗堡的灯光下，人们失去了真正的时间概念。希特勒仍旧在快天亮时才睡上几个小时。他中午起床，然后谈话、工作、口述命令，不管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在4月最后的一个星期里，苏联军队完全包围了柏林城，在东部郊区已经发生了巷战。这里，暗堡与柏林城以外各地的指挥部的联系只能靠小飞机来维持。飞机在柏林城里的东—西轴线街上停落。有些人，如格莱姆和施佩尔，都是用这种方法一次又一次来暗堡拜访。戈培尔进入暗堡的头几天，感到空闲得很。戈培尔的办公室在希特勒的办公室隔壁，他往往长时间地在自己的办公室阅读和写作。他仍在写日记，写遗嘱，以便附在希特勒遗嘱之后。他参加军事汇报会。而且现在他也发现，他有充裕的时间同孩子们在一起，以前他是抽不出这样的时间来的。他读书给他们听，讲故事给他们听，同他们在一起做游戏和唱歌。这并不是一种表演，因为戈培尔确实很喜欢他的孩子，但这却增添了一种不现实感。

米施中士回忆戈培尔一家有一次团聚的场面：“我们记得那是4月29日（星期日），即元首死前一天，戈培尔在新总理府地下室举行了一次小型的聚会戈培尔说这是他及全家向在整个战争时期他们都与之生活在一起的柏林市民们所作的最后告别。聚会的房间就在欣克教授的伤员急救站隔壁，约有四十多客人，有女护士，还有大约二十名柏林男女青年和一些能走动的伤员。希特勒青年团有一名身着制服的十五岁的团员拉着手风琴唱道：‘穿着蓝色军服的轻骑兵啊，骑着马儿，在军乐声中迈出大门。嘹亮的喇叭声伴随着他们，自豪地转向崇山峻岭……’”

戈培尔及其妻子和六个孩子坐在一张栎木长桌旁大家都一道起劲地合唱这支年轻的高音合唱队企图以荒诞的不断的歌声盖过更大、更不祥的炮弹爆炸声。

在最后的几天里，戈培尔完全变成了希特勒的影子。所有的人都围着希特勒一个人转圈子，没有人理会他戈培尔。就连瑙曼都直接听希特勒调遣，因为他在暗堡里不再是什么宣传部的国务秘书，而是这

里的卫队长。戈培尔在暗堡里的唯一一个正式随从就是他的副官冈特·施魏格曼。

瑙曼总是趁其工作之便来看望他曾依附仰仗且对他友善的戈培尔一家。因此，他才能在后来对戈培尔一家在暗堡里的生活情况做出比较真实可信的描述。戈培尔当时彻底无事可做。他的宣传部丧失了作用。如果说他要保卫柏林的话，那么实际上与此有关的一切也都由希特勒一人亲自指挥或在其监视之下。于是，戈培尔便把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孩子们的身上。他和他们一起玩，给他们讲书，帮助他们消除暗堡生活的恐惧和惊吓。玛格达则总是忙个不停。她要为孩子们洗洗涮涮。由于离开家时太匆忙，他们只带了很少的换洗衣服。谁都预测不出要在暗堡里住多久。最后，这家人在这里一共生活了9天，暗堡里的人把最后一线希望全部寄托在温克将军的第七军团身上。这支队伍在4月22日开始突围并力图从西南面向柏林靠拢。希特勒派凯特尔去指挥部督促温克加紧行动。他已做出了不向南部转移的最后决定。希姆莱从霍恩吕申疗养院打来电话时，希特勒向他讲了自己的这一决定。与此同时，他不同意其他人撤离柏林。许多人都利用了这唯一可能的逃生机会，匆匆离开了柏林。

4月23日，星期天，发生了下面的事件。在德国南部的戈林，根据他在柏林的联络官空军元帅科勒尔将军的报告，认为作为帝国和军队元首的希特勒被困在四面楚歌的柏林城中无法行使其职权因此，戈林建议，现在必须执行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帝国议会上所宣布的决定。在这份决定中，希特勒任命戈林为他的第一继承人。就此，戈林给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请求希特勒同意他作为元首的代表行使各项职权在德国北部的希姆莱与瑞典伯爵伯纳多特见面时，伯纳多特鼓励他率西部的德国军队向西线的盟军投降。施佩尔来到暗堡与希特勒告别希特勒认可了他没有执行全面破坏一切重要战略设施命令的做法。希特勒的原谅使他略感轻松。希特勒这个时候表现得异常平和。他向施佩尔解释说，他已下定开枪自杀的决心，然后让人把尸体烧掉。他决不想让自己的尸体落入苏军的手中成为展览品。戈培尔再次重申他对这一决定的赞同。施佩尔也认为，对希特勒来说，自杀是唯一可能的出路。只有博尔曼一人直到最后仍在努力想让希特勒改变这一决定。他本人也不想追求殉死的荣誉。他想活下去。这个时候，柏林的

大街上，苏联红军的坦克、装甲车滚滚而来，要想离开柏林只能靠空中的飞机或选择合适的地点突破苏联人的包围。

希特勒对施佩尔没有执行命令采取了平静宽容态度，对戈林的电报却气不打一处来。况且戈培尔和博尔曼又在旁边添油加醋。希特勒宣布取消戈林帝国元帅的称号，将他开除出党，免去一切职务，并且吩咐打电话给上萨尔茨堡的党卫军，以叛国罪逮捕戈林。年轻的博特亲身经历了这一幕。他叙述说，戈培尔“被气得火冒三丈，”装腔作势地嘴里说个没完。他大讲什么荣誉、忠诚、恪尽天职。

同一天，约德尔上将和凯特尔元帅已告辞离去。几乎同时，里宾特洛甫也不见了。4月24日清晨，施佩尔离开暗堡。4月25日至26日的夜里，汉娜·莱契驾飞机送里特·冯·格莱姆来到人走城空的柏林，并陪他来到希特勒的地下暗堡。希特勒要里特·冯·格莱姆接替戈林空军总司令之职。其实发电报宣布任命就足够了，因为实际上已并不存在什么空军。可能是要彻底羞辱戈林，所以希特勒特别重视正式的任命仪式。里特·冯·格莱姆也只好冒着生命危险飞到柏林飞机在飞临柏林上空时被炮弹击中，格莱姆的脚也受了重伤。女飞行员汉娜·莱契克服了巨大的困难。飞机着陆时，格莱姆已经完全精疲力尽了。格莱姆飞行负了重伤，女飞行员又大吹大擂他们的惊险飞行，这都使暗堡里的人大受感动。新被任命的空军总司令原来只打算呆上几个小时，后来竟在柏林耽搁了好几天。格莱姆一直卧病在床，施图姆菲格医生为他治疗。

4月27日，星期五，希特勒终于找到一个发泄怒火的倒霉鬼。这人便是赫尔曼·费格莱因，希姆莱派在希特勒身边的联络官，埃娃·布劳恩的妹夫。他的消失很突然。原来他径直跑回家，换上一身便服，想逃离柏林。在满目废墟的柏林，费格莱因当天晚上便被带回暗堡，被党卫军关押起来，准备在第二天接受审讯和判决。

晚上，希特勒召集他忠实的随从商量自杀的时间和方式等各种细节问题。自杀的时间不用更多的讨论，就定在苏联军队的第一支先头部队到达只有一个侍卫队保护的暗堡的大门之前。

虽然已做好了自杀的各种准备，可希特勒似乎在这个时候仍对温克的第七军团存有一线希望。实际上，在波茨坦附近的费尔希和柏林

西南的贝利茨两地的突围战都没有任何进展。4月28日，成捆的电报和电令从暗堡发给外界，全部都是有关军队部署的急件。遗憾的是那些军队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同一天，希特勒又发现了希姆莱的背叛行为。盟军电台将希姆莱和英国伯纳多特伯爵会谈的情况作了报道。希特勒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变得狂躁不安。对每个人都发火。众人都静静地听着这个被命运逼得走投无路的人大喊大叫。最后，他终于平静下来，命令戈培尔和博尔曼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安排最后的日程。

希姆莱派到希特勒身边的联络官费格莱，接受了审讯他承认，他知道希姆莱和伯纳多特伯爵会谈的事情。审讯后他又被暂时关押起来，随后按照希特勒的命令被抓到花园里枪毙了。

之后，又发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当时，苏联军队的坦克和装甲车已经逼近柏林市中心，但是有一位德国空军下士竟驾驶一架过时只能当作教练用的飞机，从4000多米的高度从雷希林飞抵柏林，降落在东—西轴线街上。这简直称得上是一项飞行奇迹。这位下士是被派来接格莱姆回指挥部的。在暗堡生活的几天里，格莱姆和他的女飞行员也已下了与希特勒一同去死的决心。可现在，希特勒只好又利用他的能言善辩之舌说服他们改变了决定格莱姆的脚伤经过四天的治疗仍没有什么好转，还根本不能行走。最后，人们把他送上了那位勇敢的下士驾驶的飞机。女驾驶员汉娜·莱契也一同上了飞机。暗堡里的人都利用这个好机会把信件带给自己行将永别的亲朋好友。玛格达给正在英军战俘营里的儿子哈拉尔德·克万特写了一封诀别信。这封信被保存下来，上面写着4月28日，写于元首暗堡。

亲爱的儿子：

我们在元首的地下暗堡里已经呆了六天了。爸爸、你的六个弟弟妹妹，还有我，我们都准备为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生命划上一个唯一光荣的句号我不知道你是否能收到这封信。或许会有这么一个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给你带去我对你最后的祝福。你应该知道，我是违背了你爸爸的意愿留在他身边的。上个星期天，元首还曾试图帮我离开这儿。你了解你的妈妈，我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液。对我来说这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我们神圣的理想破灭了。随之而去的还有我一生中所理解的所有美好、伟大、高贵和善良。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之后的世界定不值得为之，所以我把孩子们也一同带来了。我身后的生活对他们

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如果我亲手把他们从灾难中解脱出来的话，仁慈的上帝会理解这一切的。你将活下去。对你，我只有一个请求：永远别忘了你是一个德国人。永远不要做有损荣誉的事情。用你的生命证明我们不会白白死去。孩子们的表现都很出色。在这种比原始生活都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互相帮助，不需要别人操心不管他们是否睡在地上，不管他们能否洗浴，也不管他们有没有吃的或吃些什么，他们都从没有抱怨过，也没有哭过。当炮弹的爆炸震得地下暗堡里到处颤动，大的总是护着小的。他们常常使元首露出微笑，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昨天晚上，元首从他的身上摘下金制党徽，把它戴在我的胸前。我深感幸福和骄傲。愿上帝赐给我力量到完成最后、最艰苦的斗争。我们还只有一个愿望：至死效忠元首。和他一同结束生命是命运给我们的恩赐。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敢奢望的事。

哈拉尔德，亲爱的孩子！让我把生活中得到的最珍贵收获转送给你，让它伴你走未来的路不论何时何地，忠于自己，忠于人类，忠于祖国。

重新开始并非易事。谁知道我还会不会完成得好。我多想给你更多的爱，更多的力量，又多想为你消除你对我们的死的悲伤啊！为我们自豪吧！高兴地、骄傲地记着我们吧！人终有一死。与其苟且偷生，哪如勇敢地、光荣地结束短暂的生命？

这封信寄出去——汉娜·莱契会把它带走。她还要飞出去。我用最真挚、最深切的母爱拥抱你！我亲爱的儿子，为德国而活！

你的妈妈

玛格达所说的党徽是一枚纯金制品。希特勒把它送给她后，玛格达感到非常幸福，竟一时忘记了她所将要面临的可怕现实。

戈培尔也利用这最后的机会给他的继子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哈拉尔德：

我们被困在总理府元首的地下暗堡里，为我们的荣誉和生活而战斗。这场战争将如何结束，只有上帝才知道。但是，我知道，不管是生是死，我们决不会羞耻地离开这里。我想，我们没机会再见面了。

所以，这有可能是你收到我写的最后几行字。我期待着你，如果能度过这场战争，今后希望你只做使你父母感到自豪的事情。影响我们民族的未来并不一定要我们活在世上。也许，你是唯一活下来发扬我们家传统的人。永远不要做有辱我们的事情。德国决不会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灭亡。但只有在它拥有能担负其重建大任的榜样时，它才不会灭亡。我们只想给你做一个忠实的榜样。你可以为有这样一位母亲而自豪。昨天，元首把他佩戴了很久的纯金党徽送给了她。她当之无愧

今后，你只需认清一个职责：你要让我们死得其所，我知道，你会这样做的。不要让现在的混乱所迷惑，终有一天，谎言会不攻自破，真理将重见光明。我们将重新站在世人面前，清白无瑕，就像我们的理想和目标，这一刻一定会来到的。

再见了，我的孩子。我们能否再见，这要看上帝的意愿。如果我们不能再见，那么为你属于这样一个家庭而骄傲吧，危难中我们誓死忠于元首和他那纯洁崇高的事业。

祝你万事如意，衷心地祝福你！

你的父亲

天还没亮，格莱姆和汉娜·莱契离开了暗堡。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飞出了这架飞机的极限高度，从高空俯瞰柏林，柏林城烟火一片，像一只巫婆用来煎魔药的大锅。最后他们总算飞到雷希林，然后朝普伦方向飞，去邓尼茨的总指挥部。

格莱姆离开暗堡的那一天是4月29日，星期天。这一天是希特勒结婚的日子。结婚的仪式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主持人是一位希特勒不认识的人。他叫瓦尔特·瓦格纳，是戈培尔所在的党区领导人之一。婚礼上由他来充当市政部门的代表。在暗堡的一间小屋里，希特勒和埃娃·布劳恩并肩站立。瓦格纳身着军装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向两人提出这种仪式中最不可缺少的几个问题，然后便宣布他们两人为合法夫妻。有一组问答让人一直记忆犹新。那就是，当问他们两人是否都是纯雅利安人时，两人异口同声地做了肯定的回答。婚礼上只有戈培尔和博尔曼两个证人，他们在婚姻证明上签了字。这时前来祝贺的人已涌到了门外。一阵握手、立正敬礼和吻手礼之后，戈培尔和妻子又被邀请回到希特勒的小屋。他们要为过去的一个美好时刻干一杯香槟

——希特勒曾是戈培尔夫妇的证婚人眼前的紧张局势不允许人们有片刻的偷闲。希特勒又开始大骂那些背叛他的人

虽然希特勒邀请戈培尔及其一家住进暗堡，但这两个人在最后一星期里却很少互相见面。每天只见面一小时。他们的旧日友情明显地冷淡起来。原因之一就是希特勒对任何人，即使对戈培尔，也不愿改变常规他任何时候也没有同戈培尔在一起吃过饭盖尔达·克里斯蒂安说：希特勒“几乎不理睬戈培尔。使我吃惊的是元首不停地重复着‘最后只有勃隆狄和勃劳恩小姐是忠诚的’这些悲伤的话。他有意无视戈培尔和他的妻子。……”然而，希特勒和戈培尔定期举行的简短会晤却是重要的。现有的证据说明：在会晤期间，戈培尔草拟了希特勒的政治遗嘱。希特勒在4月29日凌晨，向荣格夫人“照稿宣读”，口授了他的遗嘱。她对口授作了速记：

自从我竭尽绵薄，在德国被迫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一名志愿兵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

在这三十多年中唯一指导我全部思想、行动和生活的是我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热爱和忠诚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作出人世间最艰难的决定在这三十年中我消耗了我的时间、我的工作力量和我的健康。

说我或者任何其他德国人在1939年要战争，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

我曾经为限制和控制军备提出过无数次建议，这是后代任何时候也抹杀不了的，谁也不能把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我也从来没有希望在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还会再经历一次与美国或英国为敌的世界战争。时光会流逝，但是在我们城市和建筑物的废墟上，对最终要负责任的人们的仇恨将永远不会消失。他们就是对眼前这一切负有责任的人们、国际犹太人集团和他们的那些支持者。

还在德波战争爆发前三天，我已经向英国驻柏林大使提出解决德波问题的建议，同时包括解决处于国际控制下的萨尔地区的问题。这一建议不容否认。仅仅由于英国统治集团需要战争，这才遭到拒绝。

他们之所以需要发动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集团的宣传影响。

但是我也不怀疑，如果欧洲人民只是重新被视作国际财政金融界阴谋家的股票，那只有一种人会这么干，这就是犹太人集团。它们是这场可怕的战争的罪人，要追究他们的罪责。我要让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一次千百万欧洲雅利安人的孩子要饿死，千百万成年人濒临死亡，城市里几十万妇女和儿童也许被烧死或炸死，而负罪者自己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哪怕是用极人道的方法。

六年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败，但终有一天会被认为这是一个民族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最光荣、最英勇的壮举，它将载入青史。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不能抛弃这个国家的首都。在这儿继续抵抗敌军的进攻，已势单力薄。我方的抵抗因为那些丧失理智的家伙而渐渐失去作用。我要与千百万留守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生死与共。而且，我不会落于敌人手中。我知道他们正需要由犹太人导演一场新戏，来取悦他们的歇斯底里的群众。

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职位已经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以身殉国。看到我们农民和工人的无比功勋和业绩，看到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年轻一代所做的史无前例的贡献，我将含笑与世长辞。

我衷心地感谢他们，不言而喻，我也希望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中断斗争，应该永远与祖国的敌人战斗，忠于对伟大的克劳塞维茨的信仰。我们牺牲了的战士以及我们永久的团结是德国历史中的种子。种子已经撒下去，有朝一日会生长出来的，在一个真正团结的民族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将获得光荣的再生。

多少英勇的男子汉和妇女们决定将他们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系在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我请他们并最后命令他们不要这样做，我们应该去继续战斗。我请陆海空三军将领以各种手段加强士兵们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信仰，以便提高他们的抵抗精神，并特别强调这一事实：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建者，宁愿牺牲而不愿怯懦地辞职或者投降。

希望我们的陆军军官将来像我们的海军那样，把决不放弃一城一地看作是荣誉攸关的大事；尤其重要的是，指挥官们至死也要忠诚地恪尽职守，做出光辉的榜样。政治遗嘱的补充部分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并剥夺1941年6月29日命令中以及1939年9月1日我在帝国国会声明中授予他的一切权力。我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兼国防军最高统帅。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革除他的一切职务。我任命大区党部书记卡尔·汉克为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首脑，任命大区党部书记保罗·吉斯勒为内政部长。

戈林和希姆莱不仅对我不忠，还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私自与敌人谈判，并企图非法夺取国家控制权，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耻辱。

为德国人民创建一个由诚实的人组成的政府，这个政府会采取一切手段完成继续作战的任务，我作为国家元首任命下列同僚为新内阁成员：

帝国总统：邓尼茨

帝国总理：戈培尔博士

党务部长：鲍曼

外交部长：赛斯—英夸特

内政部长：大区党部书记吉斯勒

作战部长：邓尼茨

陆军总司令：舒埃纳尔

海军总司令：邓尼茨

空军总司令：格莱姆

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首脑：大区党部书记汉克

经济部长：冯克

农业部长：巴克

司法部长：韦拉克

文化部长：谢尔博士

宣传部长：瑙曼博士

财政部长：施维特·克罗西克

劳工部长：胡普福尔博士

军备部长：索尔

德国劳工阵线主席兼内阁成员：莱伊博士

尽管在这些人中，个别人如马丁·鲍曼和戈培尔博士等包括他们的妻子都自愿留在我的身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离开首都，而且准备与我一起在这儿以身殉国。但我务请他们听从我的要求，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的感情之上。他们通过工作和对我的忠诚，即便在我去世以后，作为同伴也与我心连心我希望我的精神留在他们中间并永远陪伴着他们。愿他们坚强，但要公正；尤其愿他们不要害怕当成行动的指南；愿他们把国家的荣誉放在第一位；愿他们明白今后世世代代的任务——建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使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永远为大家服务，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我要求所有的德国人、所有国家社会主义者、男人们、妇女们和国防军的所有士兵们，誓死忠于新政府，誓死忠于并顺从他们的总统。

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尽全力拥护种族

法律，无情地打击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阿道夫·希特勒

1945年4月29日凌晨4时于柏林

见证人

约瑟夫·戈培尔博士

马丁·鲍曼

威廉·布格道夫

汉斯·克莱勃斯

就在同一天，戈培尔也写下了他的政治遗嘱。他谦逊地仅作为希特勒遗嘱的附件，遗嘱说：

元首已经命令我在首都的防御全线崩溃的情况下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里去担任领导。

一生中我还是第一次毅然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也同我一起拒绝服从。在最危急的时刻抛弃元首，实为人情和忠贞所不容；何况在今后余生中，世人将把我看作是一个可耻的卖国贼和下贱的无赖，我不仅会失掉同胞们对我的尊敬，也会失掉自尊心，正是这些构成了我个人继续服务于未来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国家的前提。

被叛逆的梦魇绕着的元首在战争最危急的日子里，至少得要有一个无条件地陪着他直到牺牲，虽然这违背了他在政治遗嘱中所表示的客观上还有理由的命令。

因此我相信自己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做一件有益的事情。在今后艰苦的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重要。而为国家指出通向自由之路的人总是有的，但我们的人民和国家生活的重新形成，如果没有明确的，使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模式为基础，那是不行的。基于这种理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太小了，还不能表示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年龄比现在大一些，也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示坚定的决心：即使帝国首都沦于敌人手中也不离开它。并且要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不能生活在元首身边为他服务，生命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戈培尔博士

1945年4月29日早晨5时30分于柏林

然而，在戈培尔正忙于撰写这些政治遗嘱时，他已被鲍曼暗算。鲍曼有一本诬陷人的笔记本，其中就有戈培尔等人。被“叛逆的梦魇”缠绕着的希特勒此时却怀疑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

有两个证据证明鲍曼在希特勒面前告了戈培尔的状。其一，希特勒在他的私人遗嘱（不是戈培尔起草的遗嘱）里称鲍曼“我最忠诚的党内同志”。其二，米施中士说：“我长期以来（在电话室）的做法是，戈培尔要电话时，我总是给他直接接通头头。但是，大约在4月27日国

务秘书鲍曼来到我这里，强调所有的电话都要通过他那里。他告诉我这是元首的重要命令。当然，我不得不服从。”

在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56岁生日的时候，还有七位部下能够同希特勒通电话。按地位排列先后次序，他们是戈林、戈培尔、希姆莱、斯佩尔、邓尼茨、凯特尔和鲍曼。一个星期以后，却只有鲍曼一人能同希特勒直接通话了。

戈培尔的孩子们在上暗堡呆了八天。欢蹦乱跳，许多人们都同他们混熟了。最大的孩子叫海尔加，十二岁，她是戈培尔的宠儿，聪明、高个子、早熟；她像她父亲，胡桃形的眼睛，一头黑发；第二个是希尔达，十一岁，长得最漂亮，皮肤、眼睛和头发都是褐色的；赫尔莫特，十岁，唯一的男孩，富于幻想，学习成绩不佳；霍尔德，八岁，白肤金发，有点傻气，其他人经常戏弄她；赫达，六岁，也是白肤金发；海德，还不到五岁，家里的宝贝儿。对成年人来说，暗堡几乎是恐怖的场所，但对这些孩子来说，在这个极其混乱、昼夜不分的暗堡里生活是一种乐趣。

但是妩媚动人、富有魅力的玛格达·戈培尔已经决定将这几个天真烂漫的孩子的尸体放在地下混凝土祭坛上作祭品。正如她经常说的，她的这些孩子是为“第三帝国”生的，尽管她愿意他们是属于“他的”（希特勒的）。她只有作出这种牺牲，才能感到比那个年纪较轻，又没有孩子，现在已是希特勒夫人的少女胜过一筹。

1945年4月30日，星期一。四点半日出时密集的炮火重又降临，希特勒大概睡了还不到一个小时。

上午大约八点半，停了几个小时的炮声又响了起来，希特勒这时还在吃早餐。

克莱勃斯将军带来了比蒙克将军三小时前汇报的更惊人的战况。克莱勃斯报告红军将军怎样慢慢地、无情地合上铁围。柏林主要的商业街道莱比锡街的两边，都被苏军部队占领，刚才又攻占了安哈特火车站，克莱勃斯以低沉声音往下讲时，希特勒无动于衷地静听着，连问题也不提。当这最后的简要汇报结束时，希特勒转向他的一个副官，口述了一道元首指令，这也是希特勒发布的最后一道命令：

“致柏林城防司令炮兵部队威德林将军：

为了防备与帝国首都失去联系，无法增援，特此批准我的部队组织一次突围，全力跟仍在柏林城郊进行战斗的德国部队会合。如不能实现，则柏林部队必须进入森林，继续抵抗。”

下午三点刚过，希特勒夫妇就在地下室下层的主走廊里露面向大家告别。对于挣扎在总理府里的人来说，这就是永别了！

当时在场的有戈培尔、鲍曼、克莱勃斯、布格道夫、赫威尔大使、伏斯海军上将、海斯教授、腊登休伯少将、霍格尔上校、林格侍卫长……

地下室里举行的这个正式的告别仪式很简短，只有三分钟。后来谁也记不起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语句。在难堪的沉寂中，最后是林格按希特勒的暗示，打开了通往希特勒房间的门。希特勒做了个殷勤的手势，示意死到临头的妻子先进去。

希特勒迟缓地却稳当地走了进去，关上门。

所有在场的人都在等待着最后一刹那的来临，大家都侧耳等着听那左轮手枪的枪声。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士兵出身的古塞开始怀疑人们是否真能透过沉重的、保险库似的铁门听到枪声。而实际上有两重门，因为在希特勒的起居室前还有一道小门。

当时，门外也并非毫无动静。两个迟到的重要人物突然出现。他们已经错过了走廊里举行的告别仪式。第一个是戈培尔夫人。戈培尔夫人猛地从古塞身旁跑过，冲进元首书房。戈培尔夫人哀求希特勒：“现在还有机会飞往伯希特斯加登。”但希特勒粗暴地拒绝答话，甚至听都不听。

第二重要的迟到的人是阿克斯曼。他出现时，戈培尔夫人还在密室里跟希特勒商谈。

当阿克斯曼走近门前的古塞身边时，这位恼怒的少校干脆告诉他：“晚了，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太晚了。”

古塞后来说“现在想起来，当时起码有六个人和我一样挨近门口。有戈培尔、鲍曼、林格、克莱勃斯、布格道夫、阿克斯曼，或许还有一两个别的人。我们一声枪响也没有听到。我坚信这完全是由于那紧闭的双重门这种双重门既防火又防毒，因而也是隔音的。我和林格直

接从希特勒得到口头指示，要过十分钟，必须在十分钟后，我们才能进去。我们正是照此执行的。我一直不停地看着表，我觉得它一定是停了，那是我一生中最长的十分钟。”

希特勒有两支手枪，一支是大而效力高的七·六五口径标准华尔特牌手枪。另一支小点的，也是华尔特牌，口径六·二五，这件武器藏在他缝在裤内右边口袋近旁的皮套里，希特勒已佩带它多年了。他将这把小的搁在沙发前的桌子上。

希特勒曾经告诉哈斯：最后的心愿，就是同爱娃·勃劳恩同时死。哈斯教授同希特勒最后商讨之后，为了要保险，他在事前到卧室拜访了爱娃·勃劳恩，并告诉她：“你一听到枪响，马上咬碎胶丸就行了。”

新娘显然照办了她可能是怕看到爱人的死而影响她自己的行动，因此可以肯定，爱娃·勃劳恩是唯一听到这声枪响的人。这让千千万万的人听了会无比欢欣的枪声

砰，这一响，记下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重要的一声枪响。手枪从暴君希特勒的右手滑落下来，掉在他脚边的地毯上。爱娃·勃劳恩的姿势像个女学生，她的小手枪靠在她颜色鲜艳的头巾旁。希特勒倒得更为倾斜，但仍留在蓝白色的天鹅绒沙发上，血从右边太阳穴里流出来。

元首侍从卫队中三个高个的小伙子抬着希特勒的尸体，他们既无担架，也无棺柩，连块木板也没有。抬的人和送葬的人都看不到希特勒血迹斑斑的头颅，只看见人们熟悉的那身制服的黑裤子。爱娃·勃劳恩又小又软的尸体很容易抬，她的头、脸和肩都清晰可见。她死态安详。

这伙人从地下室出来，立即进行了快速的葬礼，它是历史上最短的安魂弥撒。而且是给人类造成最大灾难的人的安魂弥撒。

三个党卫队军官把尸体放入一个长长的、临时挖掘的沟里，元首侍卫队军官赫尔莫特和贝尔曼用啤酒桶向尸体上倒了几桶汽油，不过50加仑。后来，他们退了几步，将划着的火柴向沟里投去，想点燃浸透汽油的毯子裹着的尸体。但风太大，没有结果。

终于，经过各种尝试，燃烧的纸捻落到沟里，紧靠两具尸体，骤然喷出蓝色的火焰。

没有任何人的命令，所有在场的人都像一个人一样的在旁肃立，行纳粹式举手礼。没有音乐，没有旗帜，没有字徽，也没有戈培尔的悼词。

虽然戈培尔已根据希特勒的遗嘱，这时已经成了帝国总理。但这只有柏林暗堡里少数人知道，外面人无人得悉，就连当时正在北方石勒益格—荷尔斯太因的帝国总统、海军元帅邓尼茨也不知道。

甘心殉葬 追随元首

那天夜间，鲍曼和戈培尔有了一个新的打算。他们决定尝试与苏联人进行谈判。仍待在暗堡里的陆军参谋总长克莱勃斯将军，曾在莫斯科当过助理武官，他被派去进行这项使命。戈培尔和鲍曼特别想要获得的是让他们安全通行，以便他们能够到邓尼茨的新政府那里去担任新职。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准备放弃柏林。但是谈判没有成功。朱可夫将军要求暗堡中的人以及在柏林的德国守军全部无条件投降。

5月1日下午三点十五分，戈培尔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这是暗堡中发出的最后一封无线电报。

“海军元帅邓尼茨绝密昨天下午三点三十分，元首去世了。4月29日的遗嘱任命你为德国总统……已遵照元首的命令，派人将遗嘱给你送去……鲍曼打算今天到你那里去，并将情况报告你。关于向报界和军队宣布此事的时间和方式由你决定。请复电

戈培尔”

五月一日傍晚，玛格达把她的孩子们召集到一间房子里，告诉他们全家很快就要同“元首伯伯”一起离开这里到伯希特斯加登去。然后让他们准备上床睡觉。她给每一个孩子喂了巧克力“以防晕飞机”。这些夹心糖里掺进一种叫做非那丁的安眠药。随后，她领着他们回到各自的床上，很快他们就睡着了。从此，他们再也没有醒来。

现在，戈培尔作为总理觉得他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干的了。他一上任，使命就已经完成。剩下的，米施中士说：

“我认为这一定是在下午七点钟左右……当我起身到总理府花园时，我唯一见到的人就是戈培尔。他现在是德国总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他就是我的新领袖。他单独一个人踱步，口里叼着一支烟，

没有平时跟随他的助手。我决定告诉他有关我的一个小问题，征求他的意见。他告诉我，他认为我管理电话室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建议我参加突围：‘劳赫将军的部队仍在夏洛滕堡守着。’他建议我到他们那里去，并祝愿我‘万事如意’。他举止沉着和实事求是，讲话时不紧张。当我同他谈话时，我想他的孩子早已死了，但是他对这件事一句话也没有说。……

戈培尔大概在花园里查看了他打算自杀的地点。米施恰巧碰上了他的高级助手施瓦格曼上尉和司机拉赫慌乱地寻找汽油。因为在前一天同一时间焚烧了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尸体，此时汽油供应不足。这两个人终于找到了六罐汽油。下午8点15分，戈培尔再次走进上暗堡他妻子的房间，然后他们一起又到下暗堡。当时下暗堡只有孟克将军、施瓦格曼上尉和戈培尔的低级助手奥尔德斯。戈培尔把他亲笔署名的元首照片交给施瓦格曼。他说：“你们这些好心的人至少不必把我们的尸体抬过那一段一段长长的楼梯了。”然后，戈培尔走到作为书室的小房间的衣架前，戴上他的帽子、围巾，穿上军大衣，慢慢地戴上他的小山羊皮手套，使每个手指都套好。然后像一具僵尸，把右胳膊伸给他的妻子。他们没有说话，缓慢而坚定地互相依偎着，朝通向院子的楼梯走去。

戈培尔和玛格达·戈培尔都仔细演习过哈斯教授推荐的手枪加毒药的方法。玛格达走在前面，她咬破了胶囊，慢慢倒在春天松暖的土地上，她胸前别着希特勒本人临死前给她的金色党徽。她的丈夫朝她开了一枪，子弹击中她那披着浅黄色头发的后脑。戈培尔咬破了他的胶囊，紧接着扣动P—38型瓦瑟手枪扳机，子弹打进他的右边太阳穴。元首警卫队的那位军官找来施瓦格曼上尉，他们一起把汽油浇在两具尸体上，点着火，匆匆地进行了火化。早在1923年希特勒说过：“在这个世界上判断一个男子汉有两种方法，一是看他娶什么样的女人，二是看他怎么个死法。”这即为希特勒自己，也为戈培尔。

清晨，苏联人来了。他们荷枪实弹小心仔细地搜查了暗堡。他们从一个房间搜到另一个房间，看到的只有尸体和瓦砾。然后，他们沿着楼梯来到花园。约瑟夫·戈培尔正躺在他们的脚下。一只烧焦的手像一只爪子般向前伸着，似乎在欢迎苏联人的到来。苏联人没有掩埋尸体，而是问了被俘的暗堡中的每一个人。有的紧皱眉头，没有抬起眼

睛向上看，嘴里咕噜着什么。有的不知是由于恐惧还是由于清晨的寒气，直打哆嗦。有的还在擦眼泪。

房间内走进一个胖子。他的脸红红的，这是希特勒的厨师威廉·朗格。

“这是谁的尸体？”苏军中校问。

朗格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戈培尔博士的尸体。”

“您敢肯定吗？”

厨师的脸上微微露出一丝冷笑。

“我每天都给他做饭。他喜欢吃煎牛肉排。”

“你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昨天，他来厨房要酒喝。他走到我跟前，拍拍我的肩膀说‘哎，老伙计’。”

沉默了一会儿，朗格又补充说：

“他再没说什么。而一小时后，我得知他已经离开人世。”

上午10点钟。苏军鲍里斯·戈尔巴托夫将军和军政治部主任克雷洛夫也来了。鲍里斯看了看戈培尔的尸体以后，很正经地对着士兵们高声说：

“躺在你们面前的就是那个瘸腿的戈培尔，一个渺小的人，他给人们带来那么多的灾难。他活得卑鄙可耻，他死得令人厌恶……他想要你们屈膝投降，而他自己现在却躺在你们的脚下。他想把你们消灭在俄罗斯，消灭在乌克兰、高加索，而他自己却在柏林找到了坟墓。……”